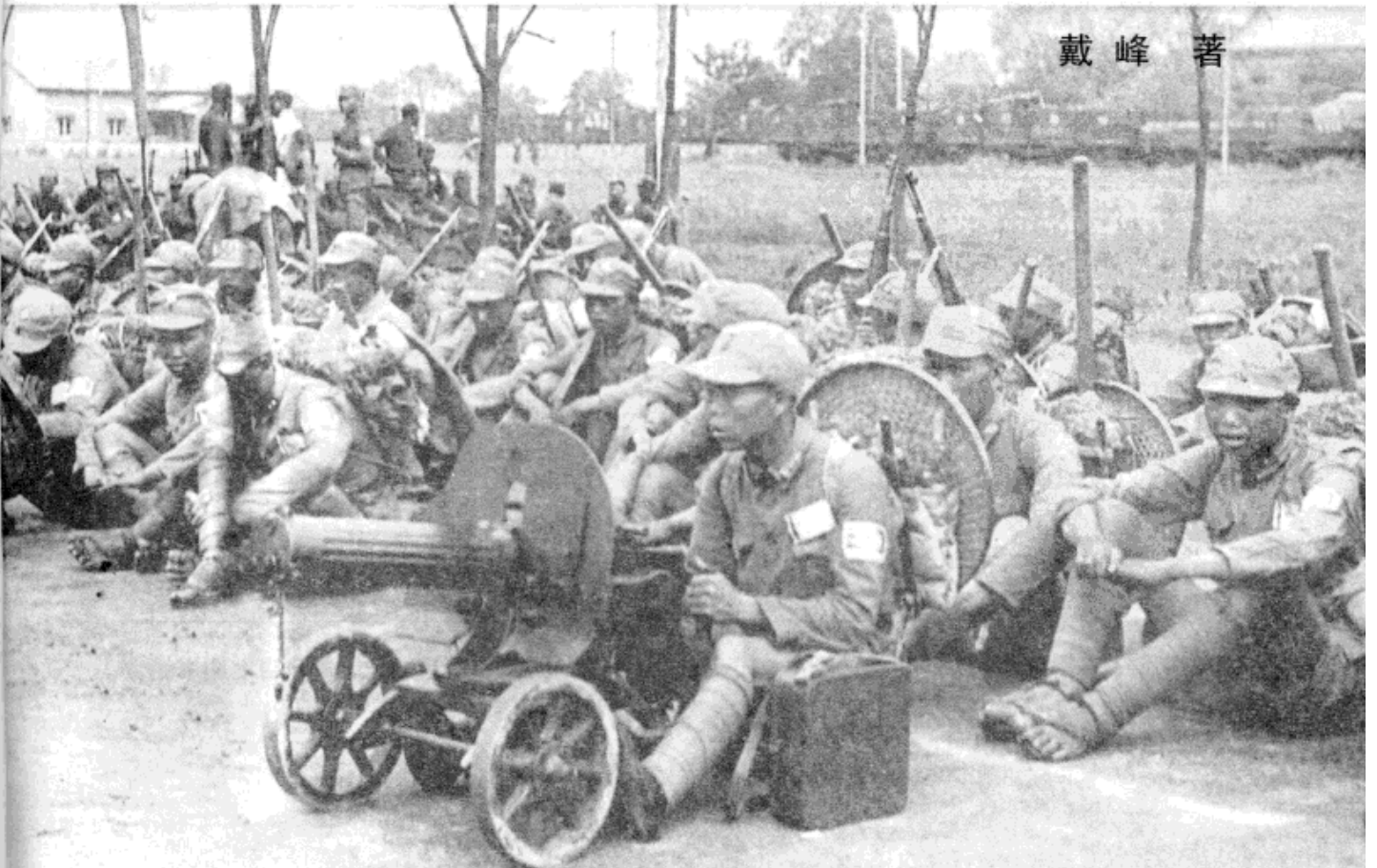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戴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肉磨坊:淞沪会战/戴峰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0
经典战史回眸·抗战系列
ISBN 978-7-307-07328-9

I. 血… II. 戴… III. 八·一三事变(1937)—史料—图集 IV.
K265.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0515 号

本书原由知兵堂出版社以繁体字出版。
经由知兵堂出版社授权本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发行简体字版。

责任编辑:王军风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湖北地矿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8.25 字数: 305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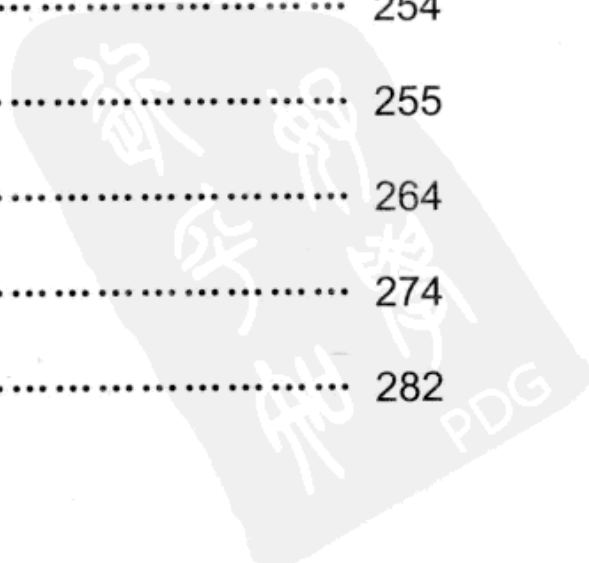
版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7328-9/K · 421 定价: 37.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开战之前.....	1
第二章 十日围攻.....	30
第三章 血肉磨坊.....	82
第四章 惨烈决战.....	130
第五章 全线溃退.....	155
第六章 海空作战.....	189
附录一：壮士悲歌——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纪实.....	209
附录二：淞沪会战中日两军轻武器简介.....	254
手枪篇.....	255
步枪篇.....	264
轻机枪篇.....	274
重机枪篇.....	282



第一章

开战之前





属于中国却又不完全属于中国的上海

上海起源于长江口上的一个小渔村，据说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公子之一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的封邑就在这里，所以上海的简称之一就是“申”。公元991年（北宋淳化2年），为了方便外来商船上陆，在长江口附近的上海浦建立了一个小镇，定名为上海镇。公元1292年，当时的元政府正式批准上海建县，这也就是上海建城的开始。

鸦片战争后，根据战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成为新开辟的通商口岸之一。此后，英、法、美、日等列强纷纷进入上海。他们在上海设立领事馆、驻军队、租借土地、建赌场、开银行、修纱厂，闹了个不亦乐乎。一时间，上海作为冒险家的乐园

的“美誉”传遍全世界。上海也随之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工商业城市。

上海能够迅速发展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工商业城市和港口城市决非偶然。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上海位于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入海口处，基本上可以看作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轴。沿长江上溯，万吨级的舰船可以直通华中重镇武汉。由上海市区向北、西、南三面放射，便是中国最重要的财源和粮源——长江中下游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带来了丰厚的财富。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上海是中国最主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其关税收入几乎占到了全国总收入的一半。除此之外，上海自身的工业实力也不同凡响。除了传统的纺纱厂、火柴厂等轻工业以外，民国时期，由晚清名臣李鸿章所创建的江南制造局演变而来的江南造船厂，不仅可以在国外

的技术支持下建造万吨级的民用运输船，也具备一定的军用舰艇的建造能力，其制造能力之强、技术水平之高、产品数量之大在国内的造船厂中首屈一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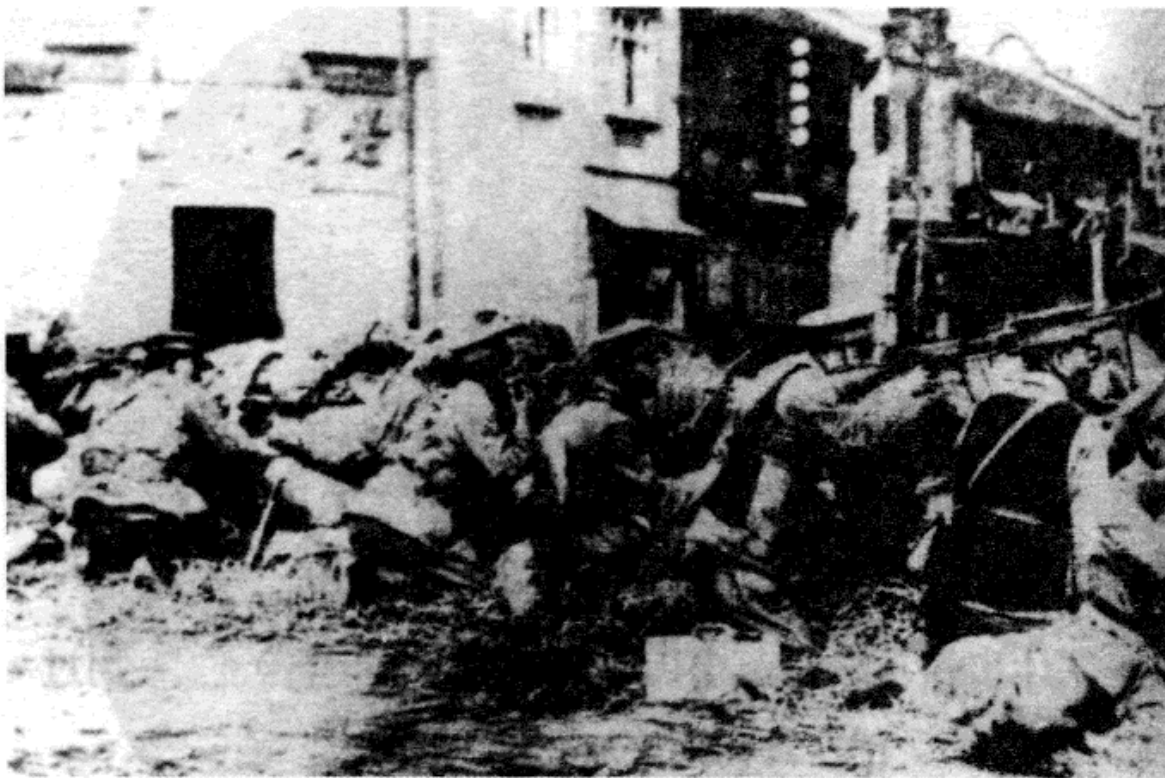
作为中国最早的5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上海还是美英法日等列强国家在华政治、经济利益的交汇点。不同肤色的操着不同语言的“洋人”们在这里为着各种盘根错节、扯不清道不明的利害关系争吵着、叫骂着，做着各种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人家做不到的勾当。

对于从清末到北洋时期再到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各派势力来说，上海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一个可以买到洋枪洋炮的大商场和

开洋荤、出洋相的风水宝地。而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上来说，上海的地位也是非同小可。从上海沿长江上溯大约360公里，就是当时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如果来自海上的侵略势力控制了上海，沿长江上溯西进的话，则南京旦夕可至，守无可守！

上海的地位如此重要，按理说绝对应该是中国的重点保护对象之一，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实际情况却是刚好完全相反：大鼻子和小鼻子的洋人舰队和地面部队可以在上海进进出出，完全合理合法，反倒是理论上掌握有上海主权的中华民国，却不能在上海部署一兵一卒。

1932年1月，日本军方为了策应九一八



■ 1932年十九路军与日军在上海发生武装冲突，史称“一·二八”事变。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事变后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而在上海挑起事端，与在上海的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该军为广东地方部队，下辖第60、61、78师）发生冲突。战役中，南京国民政府又增派了中央嫡系部队第5军（下辖第87、88师）参战。在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中，中国守军浴血奋战屡挫敌军，但最后终因力不如人、器不如人而且后援不继，最终被迫后撤。由于战事爆发于1932年1月28日，史称“一二八”事变（日本称之为第一次上海事变）。事变中，日军在军事上并没有占到很大便宜，但在事后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却取得了很大好处。

停战协定的第二条规定：“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之前，留驻其现在地位。”在第二条的附

件中为这个“现在地位”明确规定了范围，“由安亭镇正南苏州河岸之一点起，向北沿安亭镇东最近小浜之西岸至望仙桥，由此北过小浜至沙头东四基罗米突（即公里）之一点，再由此向西北至扬子江边之浒浦口，并包括浒浦口在内。”以国际协定的形式规定了中国无权在本线以东地区驻扎军队。这条线一划下来，中国军队便被“合理合法”地从上海市区乃至整个淞沪地区轰了出去，只能驻扎于苏州、昆山一带。更荒唐的是如果中国有意在这条线以东重新驻军的话，就必须经过与日、美、英、法、意等国协商达成一致，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人真的以为这个“一致”有能够“达成”的那一天吧。

中国在上海驻军是非法，而日本在上海驻军却是合法。协定的第三条还规定：“日



■ “一·二八”事变中十九路军的炮兵阵地。



■ 繁华的上海市区，但从1932年夏季起，中国正规军队再无一兵一卒进驻。

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中国军队被轰得远远的，而且不经过敌国同意就不能回来的同时，“撤退”的敌国军队却可以无限期地自由自在地在上海街头游游逛逛。

在列强调停和监督下签订和执行的这个停战协定，给冲突的中日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不过实际上给中国的五十大板是打得结结实实的，入肉三分，给日本的那五十大板却连在耳边吹的微风都算不上。

《淞沪停战协定》所酿成的恶果到1937年时终于尽显无遗。

其一，在上海市区和整个淞沪地区，中国没有也不被允许驻扎正规的国防军，而只能保留规模有限的地方保安团和警察。在当时的上海，有华界和租界之分。租界也就是外国政府根据历史上签订的中外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境内“租借”的土地。1937年的上海租界分为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两大区域。这两部分区域拼在一起，便构成了上海市区内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工商业最为发达最为集中的地带。在租界里，中国政府既没有行政权、司法警察权，当然更没有驻军权。上海市的华界中国本来是可以驻军的，但是从《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之后，中国政府便在事实上失去了在上海市区派驻军队的可能。

从1932年夏季19路军调走之后，五年间再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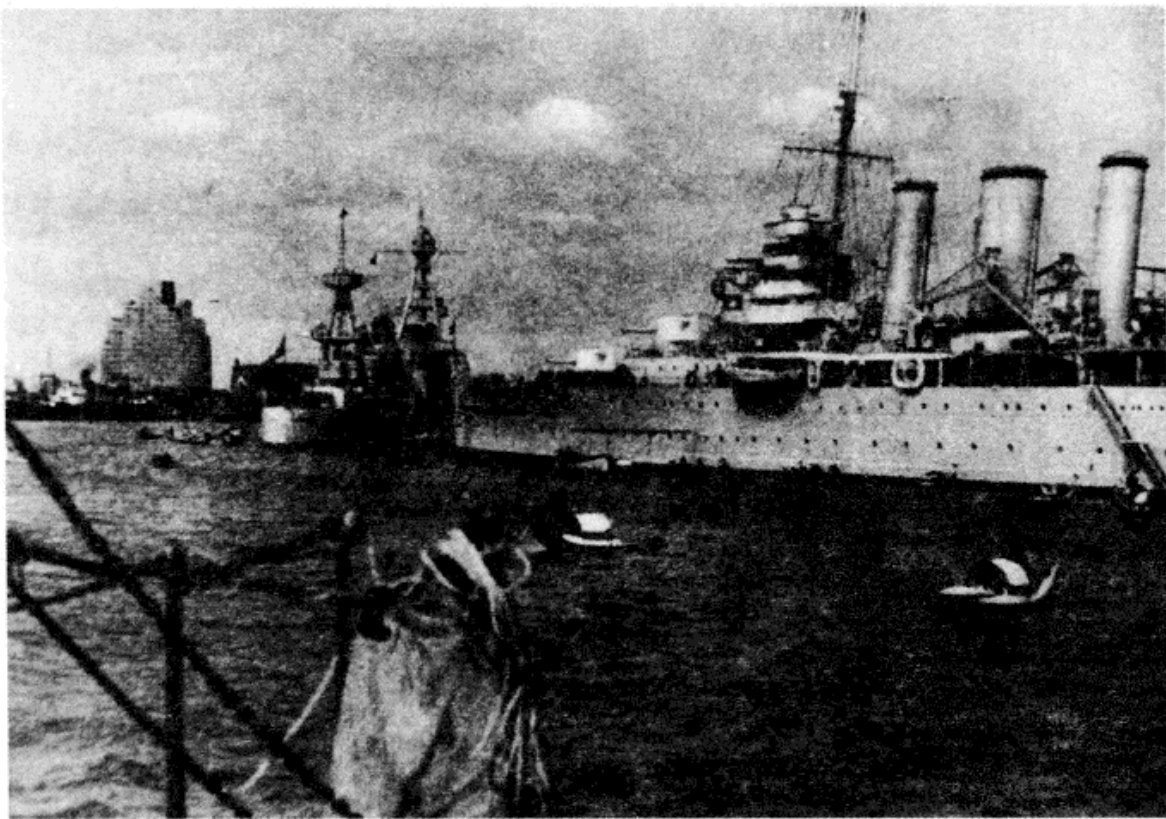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中国正规军队的一兵一卒进驻过上海。在这里的中国武装力量，就只有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的上海警察总队（约相当于1个团）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属的保安总团2个团的兵力。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说，几千名只配备有轻武器的保安队、警察用于维持治安大概还凑合，指望担负起真正意义的防务显然绝无可能。

事情的糟糕之处还远不止如此。作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和长江的入海口，强有力的海防御对于上海的安全有什么样的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然而，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的海防建设却不是强不强，而是

有没有的问题。从地图上看，上海和淞沪地区背靠江苏、浙江两省，面临东海，形成了一道被长江口和杭州湾夹在中间的凸形海岸线。自北向南，从江苏太仓到宝山县境内的小川沙的这一段长江岸线，是上海对海防御的左翼。从宝山狮子林到吴淞口和白龙港，正对着长江口的南岸，居于上海对海防御的中间地带。从白龙港经金山卫再到浙江的乍浦，为上海对海防御的右翼。连接这左中右三翼的海岸、江岸线总长度约350公里，其中乍浦、金山卫、白龙港、吴淞口、川沙口、浏河口等地的地形都相当适合海上来犯之敌登陆和战役展开。中日两国海军实力对比极



■ 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列强军舰。



■ 位于北四川路与东江湾路之间的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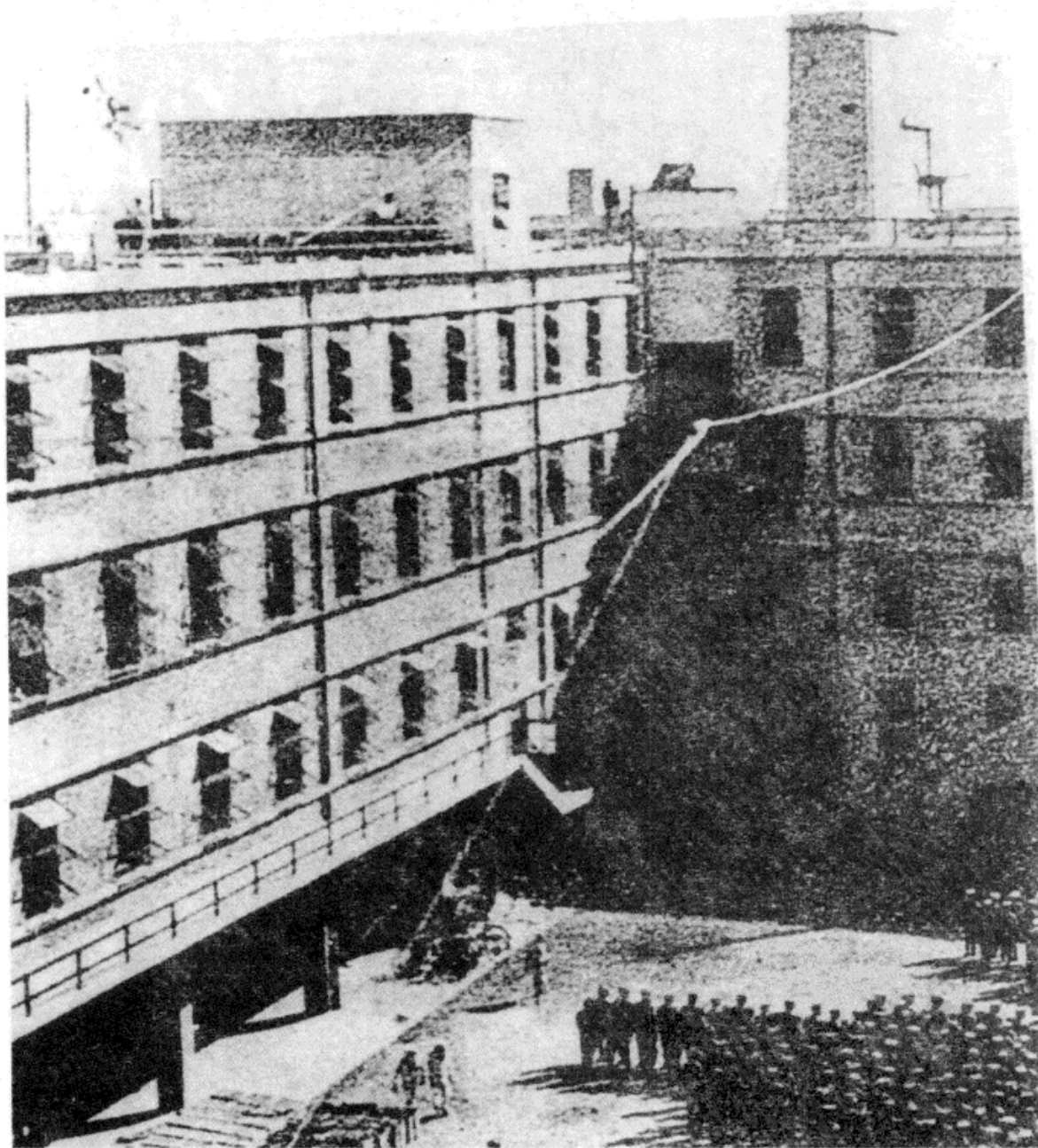
为悬殊，中国军队没有任何可能在海上阻止日军的登陆企图。一旦中日两军在上海地区爆发战事，日军必然会凭借其压倒优势的海军为其提供的机动性在他们喜欢的任何地点实施登陆。对此，中国唯一的对策大概就是在这些关键地段如天女散花般零星构筑岸上防御工事体系和部署海防火器。用这些笨办法来拖延日军的登陆，为主力投入反击作战争取时间。然而在这些对上海的安危极为重要的方位地段，中国不能构筑任何形式的防御工事体系，甚至连小规模步兵的观察哨位都没有。至于位于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的吴淞要塞区，尤其是吴淞狮子林炮台，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就已经遭到日军的破坏。以后虽然有重新整修的打算，但因

客观条件限制直到1937年上海战事再起也一直未能恢复。

与防御极为薄弱的中国方面相比，日本在上海反而有齐全完备的军事设施和相当规模的兵力。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日军在上海部署有海军第3舰队指挥下的上海特别陆战队约2500人。日军的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部设在北四川路终点与东江湾路之间。这是一座钢筋水泥建筑，高大坚固，集兵营、炮兵阵地、观察所和军火库于一体，成为日军在沪防御体系的一个中心要塞。以这个司令部为核心，日军在整个上海地区辐射出80余处据点和军事设施。这些据点和军事设施广泛分布于虹口、杨树浦、沪西和浦东地区，构成了一个完备、坚固的防御体系。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 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内景。

除了几千名海军陆战队以外，日本海军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上的兵力也同样不容小视。日本驻华海军舰艇统一编成第3舰队。由于中国海军实力薄弱，日军并不需要在中国境内部署较大较强的主力舰艇，以日俄战

争时期的老式装甲巡洋舰“出云”号为旗舰的第3舰队所属的舰艇大多是些老旧的非主力舰和适合在长江内巡航的浅水炮舰。当时在长江上活动的日军舰艇主要是其第11战队所属的12艘内河炮舰。可悲的是，就是这些并

不能算很强大的舰艇，却可以沿着长江航道从上海到宜昌到重庆，自由往来通行无阻。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的话，那大概就是属于中国却又不完全属于中国的最大城市。

作为1937年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军政领

袖和实际的最强大武装集团的所有者，年轻时代曾经在上海打拼过多年的蒋介石对于上海危如累卵的形势当然不至于不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眠！于是在1937年的这个多事之夏，蒋介石便把他精心打造的利剑在上海出鞘亮剑。

淞沪之称的由来

淞者，吴淞；沪者，上海。淞沪之称最早见于1876年3月建成通车的淞沪铁路，这也是中国第一条商业铁路，从天后宫北（河南北路、塘沽路口）到江湾，全长14500米，是英商怡和洋行以欺骗手法擅自修建，因此清政府于1877年8月以28.5万两白银赎回，并于同年10月拆除。

1897年，清政府重修淞沪铁路，线路大体循原来走向，终点延至河南北路，设有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三民路、高境庙、何家湾、蕴藻浜、吴淞、炮台湾9个车站，全长16900米，1898年9月1日通车。1908年沪宁铁路建成后，淞沪铁路改为沪宁铁路淞沪支线。淞沪铁路在“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中，都遭战火损毁。

新中国成立后，淞沪铁路经政府多次改造。1963年，淞沪线停止客运，纯为货运支线，只设江湾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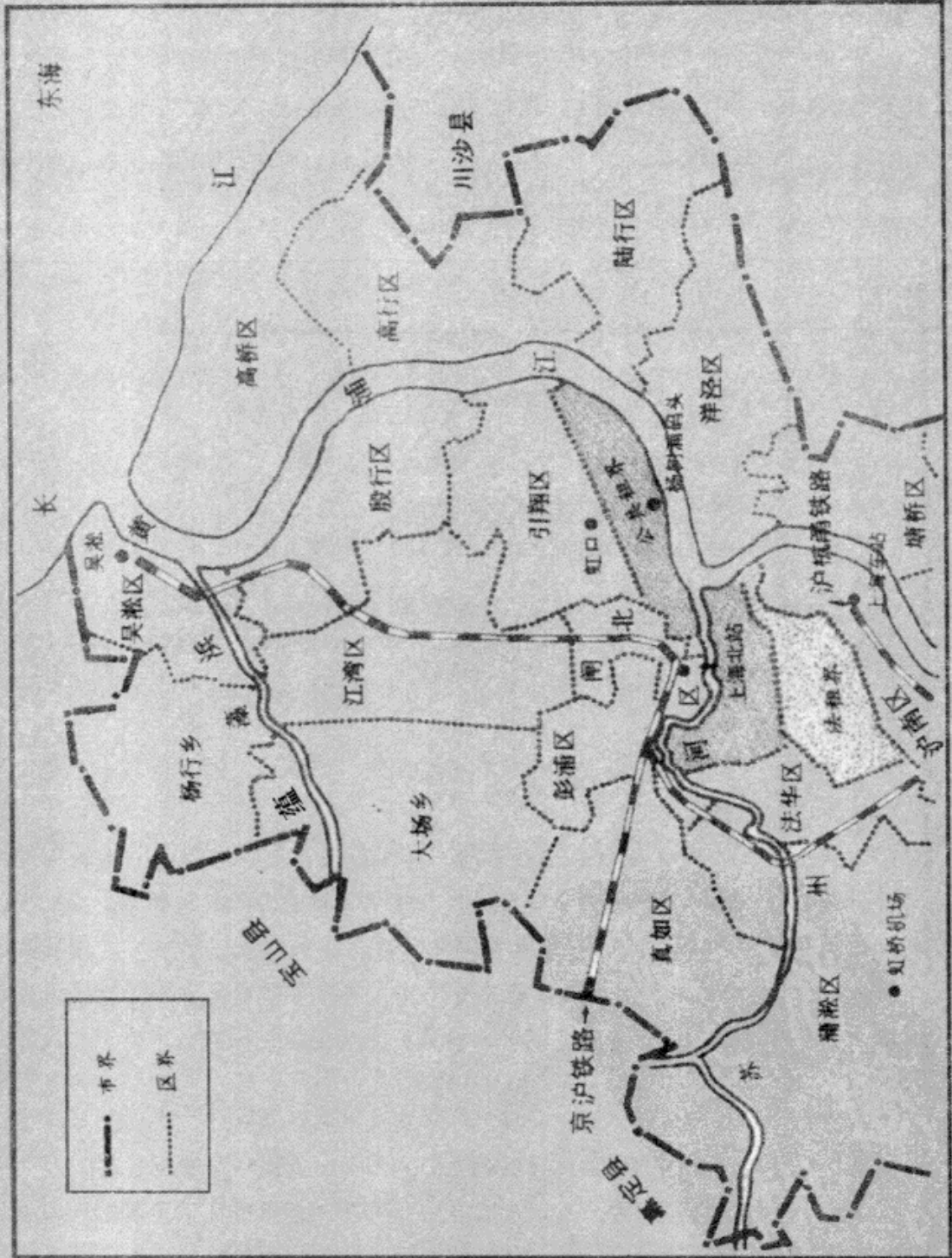
1999年，淞沪铁路南段（老北站—江湾）和北段（何家湾—吴淞大桥）拆除，拆下的一段旧钢轨成为上海铁路博物馆中资格最老的实物展品。路址于2000年建成了上海乃至全国第一条城市高架轨道交通明珠线（一期），后定名为上海轨道交通3号线，北端终点设在江湾镇站。江湾镇的老火车站悄然退出历史舞台。2003年，吴淞古镇改造，淞沪铁路吴淞镇站旧址改建为以中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为背景设计的大型公共绿地。2005年3月，上海市宝山区政府在绿地中树起了一座金字塔状的石刻纪念碑，碑的一面图文并茂地叙说了上海与吴淞间铁路的沧桑巨变，碑的基座一侧象征性地铺设了一段自淞沪铁路拆来的老钢轨。

淞沪铁路作为中国第一条铁路，其兴衰荣辱也折射出现代中国的风雨历程。而在这段铁路所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曾经浸透着中国军队抗击外侮所流淌的热血，或许这条铁路的名称与八年抗战中最为惨烈的一场大战役同名，也正是历史的选择。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图一 开战前的上海特别市（1937年）





■ 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接受德式训练和装备的第87、88师，首批开赴上海。

用德国芯铸造一支新军

用一句话来评价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军队，那大概就是“数量惊人，质量更惊人”。从数字看，到1937年上半年，中国陆军共有191个步、骑兵师，56个独立步、骑、炮兵旅，按编制来说，拥兵200万之众。这个规模大大超过了同期的苏联陆军（1935年苏联全军为93万人，到1938年也不过153万人），以数量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属于顶级水平。不过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之参差不齐更是惊人。其中固然有如19路军这样的能打出令一向眼

高于顶的西洋人都惊叹不已的辉煌战绩的百战劲旅，抗敌不足扰民有余的鸡鸣狗盗之辈也并不稀罕。

这个时期中国陆军的第一个特点是杂，人员杂、装备杂。

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笔者没当过铁匠，好铁为什么不能用来打成钉子笔者是不懂的，但是这前半句话“好男不当兵”放在民国时期还真是非常有道理。民国时期流行的一句俗语给这句话下了个不错的注解，那就是：“不当胡子不当将军。”从北洋政府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时期，中国处于一个空前混乱的环境下，于是信奉“有枪便成王，有奶便是娘”这十字真言的“乱世英豪”辈出。在那个时代，各派势力之间反复搏杀，社会混乱不堪，这些武装首领们也随之而朝秦暮楚、朝三暮四。今天可以和你拜把子称兄道弟，明天就可以和你匕首和勃朗宁相见，后天又可以再和你拜把子称兄道弟，当然前提是你还没被他算计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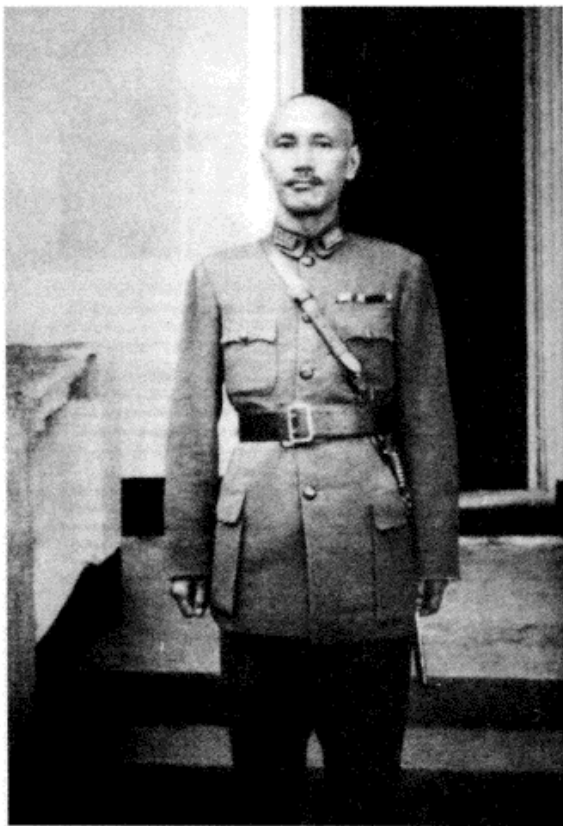
众所周知，中国国民革命军起源于1924年在广州建立的黄埔军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被称为黄埔系原因也就在于此。但是黄埔系军队却又不是国民革命军的全部。早在当年北伐战争开始时，构成北伐军的就包括了

湘、粤、桂等地方系统军队。以后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大批的原北洋军系统的部队被收编和改编进了国民革命军的队伍，本来就不够纯正的国民革命军由此更是成为了一锅大杂烩。

北伐战争以后，蒋桂战争、蒋唐战争、中原大战，蒋介石又先后与当年的战友们几次大打出手，收编了各系武装无数，他的这一锅陆军大杂烩煮得越发热闹了。据统计，在当时名义上归属于南京政府的大约200万的陆军中，大体上由北伐战争初期蒋系基干部队发展起来的和以后由黄埔军校师生先后主持组建起来的军队，即一般所说的“中央嫡系部队”大约只有70个师，约略超过全军



■ 黄埔军校的校门，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摇篮。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的三分之一。其他部队，便是在蒋介石与其他派系的反复搏杀中陆陆续续归入其名下的各类杂牌军。各种不同系统的军队有着来历不同的军官队伍，有着五花八门的军需制度和装备体系，连编制都各不相同。仅仅以陆军的步兵师的编制来说，就有3团制、2旅4团制、3旅6团制、3旅9团制等等，琢磨那个时期的部队的作战序列表实在是一件令人头疼的差事。更有趣的是，甚至连部队的番号都可能是重复的，同番号的军、同番号的师，在那个时期实在不算是一件很稀罕的东西。

部队杂武器更杂。任何军阀人物对于枪杆子的重要性都是心知肚明的，在外购和自

制武器方面，他们是绝对舍得花钱的。不同系统的武装有着不同的武器来源，这也就造成了当时中国军队武器装备一个异常混乱的局面，当然也没办法实现制式化。仅仅以陆军最基本的武器——步枪为例，除了国产的汉阳造以外，德国的新老各种毛瑟步枪及其在捷克、比利时等国的仿制型，苏制的水连珠，日本的金钩枪和三八大盖等等在中国都属于相当常见的武器。再加上国内的无数种自制步枪，中国士兵手里的武器自然也就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抛开性能好坏不说，战时的后勤保障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这个时期中国军队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差。装备差人员素质也差。

20世纪上半叶，军事技术发展极为迅速，新型的武器装备不断涌现，战争的形式也开始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在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艇、飞机、坦克等新式装备陆陆续续投入战场，战争的形态开始由传统的平面战争向立体战争转化，畜力战争向机械化战争转化。到十几年以后，一些目光敏锐的军事家如利德尔·哈特、富勒、图哈切夫斯基、杜黑、戴高乐等人就已经断言，未来的战争形式必将是地面到海底到空中的立体化、机械化的全方位的战争。只有在了一支由现代化的军事思想和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才能够在未来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这一切对于中国来说，却只能是满足于看看、听听，最多只能在报刊杂志上惊羡于军事强国的战场魔术，亲身体验的资格是没有的。中国是个工业弱国，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除了能够勉强生产一些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的火炮以外，飞机、坦克、舰艇和大中口径火炮中国的制造能力都接近于零。体现到中国军队自身来说就是，中国军队的步兵武器虽然杂但是数量、性能一般还勉强可以满足要求，而在现代战争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火炮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非常之差。据统计，到1935年初，国民政府所能控制的军队中所拥有的各种火炮只有457门（一说为567门，由于原资料均未提供具体的统计口径，笔者估计这个差异可能就是出在统计的标准上），这个数字应该是不包括步兵部队中的中小口径迫击炮的，而且受具体情况限制，可能某些系统的军队的装备量也没有统计进去。不过即便如此，这个数字也是十分可怜。把这个数字平摊到近200个师的庞大军队中，则每个师连1个4门制的炮兵连都摊不到。至于坦克、飞机和舰艇，中国军队所拥有的那点数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也不必指望能起多大作用。如此低劣的装备水平，不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先进国家无法相比，就是与20年前一战时期的德法英美等国所表现出的火力密度相比，也实在难望其项背。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与东西方强国可能

的战争中，中国不得不以士兵的血肉之躯来直接面对敌人的来自地面、空中和海上的钢海和火海，战斗的困难可以想象。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军事格言：“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与此相对应，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格言，“如果你的剑不够长，那就向前跨一步”，这都是说的在器不如人的情况下，就要求人能够多想点办法，用人员素质、战略战术方面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抵消敌人的武器优势。偏偏那个时代有很大一部分的中国军队的人员素质也很低劣。

我们先看看军官。中国军队的军官构成基本上是保定军校毕业生、黄埔军校毕业生和其他各地方系统军校毕业生以及行伍出身再加上少量国外军校毕业生的组合。民国初年，中国学制最完整、教育水平最高的军官学校莫过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民国时期的历次大小战事中，无不活跃着保定生的身影。1924年，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开办，相当一部分保定生投身到黄埔，成为新一代军官的师长。从军事教育的角度来说，保定军校毕业生所受的教育时间较长也比较完整，理论水平是不错的。但是大体上说，保定军校的授课内容大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对于一战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理论、新兵器、新战法则基本上没有涉猎。黄埔军校成立初期曾经得到具有丰富近

现代战争经验的苏联红军的大力支援，在学科设置上比较先进。但是前几期的黄埔生实际在校时间只有区区六个月，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还无非是一群新兵蛋子，勉强可以算是接受了一些初步的下级军官的养成教育。当然，军人可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但是，军阀混战时期的国内战争的战术水平相当低，怎么打都只是些彼此间低水平的重复，军官的真正的军事理论水平、指挥能力提高很少。

军官不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士兵也没好到哪儿去。现在很多朋友都提倡军队职业化，认为这是保留部队骨干、提高整体军事素质的好办法。不过说来很讽刺，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国民党军实际上就是一支相当“职业化”的军队呢。吃粮当兵、发饷养家算是那个时代破产农民、失业青年等从军的直接动机。谁给钱就给谁干，不发饷就闹饷、就哗变，就拖枪上山当土匪。这类事情比比皆是，差不多也是那个时期中国各系统



■ 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德式师部队。

军队的一道相当独特的风景线。中央嫡系部队还是比较好些，在其他地方系统军队中，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的“双枪兵”、手里端钢枪、嘴里叼着白面烟卷的“高射炮兵”决计不算是稀罕事物。反过来对于军官来说，如果能招来多少兵就有多大的官儿可做的话，那就尽管在自己的亲属、街坊四邻、同乡中玩大撒把，管他阿猫阿狗的只要招进来就是兵。这在相当程度上又重蹈了从晚清起便出现的兵为将有的覆辙。在对内对外战争中，国民党军屡屡出现指挥不灵、保存实力、见死不救的现象与此有很大的关系。有兵就有官做，就可以发财赚袁大头，没兵就只能坐冷板凳，那谁还要去卖命打仗？从晚清到民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职业化军队造就的并不是一支高素质的百战精锐，而只是造就了成堆的兵痞、兵油子和大大小小的军阀。

带了一辈子兵的蒋介石对于自己军队的弱点当然是心知肚明，所以从1935年开始，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蒋介石开始了认真地全面整理他的这支军队。关于在这次整理中中正式、捷克式、马克沁的故事无论是网络上还是报刊杂志上都已经谈得够多了，这里就不再赘述，这一次笔者打算简单谈谈在军队编制方面的整理。

国民党军的整理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调整人事安排，师长以上军官都必

须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下同）统一任命。二是调整部队的编制，全国所有的军队都必须按照军委会颁布的编制表统一编成。

从1936年起，国民党军开始了全军整编。整编以“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加强特种兵（即今天所说的技术兵种）为原则，最终目标是参照各国陆军师的编制，用上三四年的时间将全国陆军统一编成60个步兵师，每个步兵师下辖2个旅4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补充团再加上工兵营、通信兵营、辎重兵营、骑兵连各1个。齐装满员的话1个步兵师的编制员额约1.7万人，共装备有马步枪大约9400支、驳壳枪2940支、手枪108支、重机枪92挺、轻机枪294挺、步兵炮30门、小炮20门、山野炮36门，某些部队还可能配备150毫米榴弹炮4门。约略来说，经过整理的各野战步兵师将形成师有1个装备山野炮和榴弹炮的炮兵团并具备有完整的工兵、通信、侦察等分队；各团有步兵榴弹炮连和战防炮连各1个；各营有1个9挺制的机枪连和1个4门制迫击炮排。考虑到购入装备需要时间，所以第一步就是先把现有的部队在编制、装备上进行适当的调整，把全军整编成用于第一线作战的60个调整师和用作二线兵团的60个整理师，待武器装备到位后再进行增补。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实施的话，那么

大概到1938年前后，中国就将拥有60个基本上接近于欧洲国家二流水准的步兵师。按照蒋介石的想法，当时日本陆军共有17个常设师团，扣除用来守备本土、朝鲜、台湾和满洲的部队以外，能投入到中国战场的军队将不会超过10个师团。如果中国的2个师可以与日军的1个师团相对抗的话，那么中国陆军将可以在未来战争中对可能的入侵日军形成3对1的优势，以这样的优势当然“可操胜算”。

据蒋纬国回忆，多年后蒋介石曾经亲口告诉过他，这个计划由德国军事顾问参与协助，并且准备从德国购买40个师的全套武器装备，只可惜受到某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扰而未能实现。蒋介石没有明言这个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到底是哪一家，但是大致上推测一下，再用排除法选择的话也就可以猜出个究竟。英、法等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而且也与此事无关。日本倒是新兴的，而且只要有可能就必然会干扰中国的军事建设，但是如果是日本的话蒋介石就实在没必要为之含糊其辞。基于同样的理由，苏联也不在此列，何况苏联也没有理由和能力来干扰中国明显针对日本的军事建设。那么结论出来了，这个国家显然指的是美国。相对于英法那样的老牌帝国来说，美国的确是新兴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那个损人不利己的《白银法案》也确实给中国的货币改革造成了相当大的干扰，客观上削弱了中国进行战争准



■ 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汉斯·冯·塞克特。

备的能力。而且也只有这个令蒋介石多年来一直是又爱又恨的美利坚帝国老蒋才需要“姑隐其名”。

从这个小故事看，蒋介石本人对于实现他的这个整军计划确实是信心满满。但是笔者读史至此时却忍不住想问一句：“真的吗？”

蒋介石的整军计划中，最好解决的大概是兵员的数量。60个师按照每个师1.7万人的标准，总计需要大约100万兵员，这个数字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当然不会造成很大困难。而装备问题却是个天大的麻烦。以装备下级军官的毛瑟手枪一项而论，要编配足60个师的装备数，总计需要176400支，扣除掉

原有的数量中可以继续使用的部分，光这一项就需要新购141717支。师炮兵团所装备的105毫米以下口径的野战炮，编足60个师需要装备1812门，而国内原有的数量是138门，扣除超龄服役的老家伙，需要新购1716门。150毫米一级的重炮，计划中需要240门。国内一门也没有（原资料如此，实际上当时东北军中有一些仿制的日式150毫米榴弹炮），全部需要新购，而且基本上是从德国采购。当时的德国自身也在忙于重建武装力量，以德国的制造能力来说，能否在满足自身军队的同时兼顾这份60个师的大订单？即便德国人有这份余力，以中国的经济实力，就算人家可以接受钨砂、桐油之类的易货贸易，就算没有美国人捣乱对中国金融环境的影响，中国能不能付得清这份账单？令人怀疑。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照一下清末的36镇（师）的编练计划。清政府从1904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编练新式陆军36个镇，然而到7年以后清王朝灭亡时实际上也只编练成了11个镇（师）又16个协（旅）又4个标（团），约略可以算作20个步兵师。当然，1935年蒋介石手里掌握的资源明显不同于1911年的宣统小皇帝，不过笔者还是认为他的这个计划未免乐观得过火了。

事实也是如此。按照整军计划，从1934年起，国民党军需要在5年内分10期采购德国生产的现代化150毫米榴弹炮共计240门。每

期购入装备1个团所需的24门。而实际上，1935年中国采购了第一批24门装备了1个团之后，便暂时无以为继。一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勉强采购了第二批。

各步兵师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把整个陆军整编成60个现代化步兵师的计划固然是遥遥无期，而整理和调整现有的军队也进行得相当不顺。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只调整了15个师，整理了24个师，仅仅是第一步的计划完成的也不到三分之一。即使按照调整师和整理师的标准，上述这39个师的编制和装备也没有完成。以精锐的德械标杆部队87师为例，到1936年8月，这个师编制内还缺少1个炮兵营、4个步兵炮连和1个高炮营，等于说是重武器基本没有到位。实际上在这个时候，真正已经完成了调整的步兵师一级单位只有一个作为德式装备、训练的样板部队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就笔者个人的看法，蒋介石计划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打造一支接近于西方标准的又有着相当大规模的现代化陆军，这个动机当然是好的。但是考虑到中国当时的物力和财力，蒋介石的计划明显超出了中国的国力，可以认为从一开始实现的可能就微乎其微。不过经过整编后的调整师、整理师倒是挺合用的，也大体上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后多年，中国的陆军步兵师除了由2旅4团制变更为更便于指挥的3团制以外，其他方面变化

不算太大。

不管怎么说吧，经过整理后的国民党军至少显得整齐了许多。原有的五花八门的编制形式被调整师（甲种编制）和整理师（乙种编制）所取代。南京国民政府至少在理论上统一了全国军队的组织形式。不仅在番号上实现了全军的统一，而且部队的编制、装备、人事制度、指挥体系、后勤保障等方面也初步实现了统一。理论上中央嫡系的军事长官可以指挥非中央嫡系的部队，非中央嫡系的军事长官也具备了指挥建制内的中央嫡系部队的可能。虽然说由于种种原因，这次大整编没有取得完全的效果，不过整体而言，对于中国军队整体战斗力的提高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一二八”老将回来了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因为奋勇杀敌屡挫日军而名扬天下的是广东地方系统军队第19路军，19路军的统帅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也因此役而成为名震一时的抗日英雄。实际上，作为南京政府的援兵，还有一位中央嫡系名将也率部参加了这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他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中央系与地方系的门户之见，而是把自己置身于战场最高指挥官——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的指挥之下，与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密切配合奋

勇杀敌，立下了累累战功。尽管世事变迁，数年以后他又与蒋光鼐、蔡廷锴在战场上相见，但是几十年后蔡廷锴在回忆“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对他也无任何指责之处。他便是张治中。

在国民党军系统中，张治中算得上是一位相当特殊的人物。按照其履历来说，保定军校毕业生加上黄埔军校教官，这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军中央嫡系核心骨干将领的标准经历，足以与刘峙、陈诚等黄埔名将相比肩。有此经历又未与蒋介石决裂的将领一般都能混得不错，张治中也不例外。在蒋介石的亲信将领中，张治中被公认为忠耿无私、肯负责、敢担当、敢说话、干实事、不贪图禄位、擅长调和各系将领的关系的一代直臣。在民国时期，作为军人不能独掌部队，便被视为坐冷板凳，既无权更无利。谁都希望当部队主官，当作战部队的参谋人员都没人愿意，更不用说办教育、搞研究。偏偏就有个张治中，当了十年的中央军校教育长主掌教务却乐此不疲。在十年间，张治中没少作为军事主官参加第一线作战，但是他每一次仗打完以后都主动交出指挥职务，回南京继续当他的教头。尤其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他指挥第5军参战，表现不俗。蒋介石有意让他继续担任军长之职，而他却表示军长可以给别人干，他更愿意带学生。所以在民国军界，张治中被誉为“打仗就领令，打完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仗就缴令”的模范军人。

对于这样一位人格、才干都很令人信得过的将领，从黄埔时期起，蒋介石就对他相当倚重。党军第2师成立，蒋介石亲自兼任师长，张治中便是蒋介石的参谋长。由黄埔军校发展而来的中央陆军军官军校是蒋介石的起家根本，多年来一直由蒋介石亲任校长之职，由军校教育长实际负责，而张治中就当了整整十年的军校教育长。“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张治中凭着他的优异的表现，与蒋光鼐、蔡廷锴一起获得了代表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抗战中张治中因为著名的长沙大火辞去湖南省主席的职务，蒋介石便委

任他当了自己的侍从室主任，成为蒋介石的最贴身的军事参谋人员。如果张治中的特点只有这些话，那么当然谈不上很特殊。但是张治中却又偏偏是黄埔系将领中最特殊的一位，他的特殊性就特殊在他多年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从

黄埔时期起，张治中就与中共的关系相当密切。1925年，张治中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周恩来考虑国共合作时中共曾经有过不在国民党高层人员中发展党员的承诺而只能予以婉拒。由于张治中的思想比较贴近中共，而被军校的某些学员列为“军校四凶”之一。

1936年2月，仍在中央军校教育长任上的张治中在他的教育长办公室旁边开设了一个高级教官室，从军校的教官中选调了一批人入室办公。不久，随着这个教官室的人员日益增加，张治中又把教官室迁移到了苏州，招牌也改成了“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高级



■ “一·二八”老将张治中。

教官室也好，办事处也好，这都属于主持军 字！

校事务的张治中的职责范围，并没有什么太新鲜的。但是这个教官室从一设立起就显得极为神秘，主持此事的张治中严令所有的参与者，对于所从事的作业不许对外泄露一个

原来，在1935年秋，南京参谋本部为了筹备未来的对日作战，将出于对日作战第一线的各地区划分为作战区，其中位于华东第一线的无锡、江阴、上海一带划为京沪区，

张治中

张治中（1890—1969），原名本尧，字警魄、文白或文伯。安徽省巢县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步兵科，1924年加入黄埔军校担任军事研究委员。以后历任军校三期入伍生副总队长、代理总队长，军校四期步兵军官团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2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后曾一度到欧美进行考察。1928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2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1932年1月兼任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抗战，曾予日军以沉重打击。1933年12月任国民党第4军总指挥，率军入闽，参与围攻福建人民政府。

抗战爆发后，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同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张治中回忆录》等。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张治中既是蒋介石最信赖的高级将领之一，又有过曾经在上海作战的经历，加上当时配属于京沪地区的国民党军精锐主力第36、87、88师正好也是当年张治中当年曾经指挥过的老部队，所以自然而然他也就成为京沪地区的军事负责长官。换句话说，一旦中日两军再战上海，张治中将责无旁贷地再次出现在对日作战的第一线。而这个所谓的教官处或者办事处，实际上也就是张治中的司令部。

淞沪警备机关成立以后，张治中即忙于主持战备工作。一批批的人员被派往淞沪地区、苏福线（苏州到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一带勘察地形、绘制地图。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淞沪警备机关与上海市政府合作，在上海的华界秘密构筑了各种掩体105座。由于在上海设防“违反”停战协定，张治中为了保密而费尽了心血。在此期间，张治中还参与组织了多次军事演习和部队开进演习，组织军事参谋人员到苏州、常熟、太仓、吴淞一带进行战场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淞沪停战协定》之后被动局面当然一清二楚。想当年，淞沪战起，南京震动。一时间，国民政府一口气搬到了洛阳以暂时避战。当年好歹还有19路军撑着，而现在如果日军有意从上海下手的话，海军可以沿江西进，陆军则可以由上海附近和杭州湾北侧登陆，然后分两路沿太湖



■ 京沪地区实际上的最高军事指挥张治中。

南北地区进攻南京。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事，这一次南京政府可能连搬家都来不及。对此，1936年秋季，张治中正式向南京军政当局提出了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争取初战胜利的设计。他认为：

1. 上海为我经济重心，系世界视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替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苏福线或锡澄线，亦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二八”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

2. 为达成上述任务，须有兵力6、7个师，以4至5个师任淞沪正面，2个师控制浏河、福山、常熟一带。如此，在淞沪附近作战当可支持3个月以上。除现有第36师、第87师、第88师三个师外，请再调3至4个师来沪。

3. 大局至此，无论外交加何，似应以决心抗战积极准备。

从张治中的作战设想看，他的思路大体上起源于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而没有预见到战事有扩大成两国都投入主力参战的大规模战役的可能，这是他的设想的一个不足。对于日军在我军侧后方实施登陆的可能，张治中虽然有所预见，但是对于日军可能的登陆地点考虑也有所不足。不过从整体来说，张治中以积极防御的战略，主动出兵，先敌动手，在被动中求主动，化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无疑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张治中正因病在青岛休养。接到事变爆发的消

息后，张治中立即返回南京，接受了京沪警备司令官这个他实际上已经干了一年多的职务。这位“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英雄终于又回到了淞沪前线。

虹桥机场事件

与华北一样，从1935年起，上海的火药味便一天比一天浓。

1935年11月9日，日本海军士兵中山秀雄被来历不明的人射杀。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立即出动部队，在虹口北四川路一带进行示威。

1936年1月，驻沪日军借口一名日侨遭到枪击和有水兵遇袭，在闸北一带布设岗哨、搜查行人，俨然一副在别国的土地上实施戒严的架势。

1936年9月23日，驻沪日军故伎重施，再次以水兵遇袭为借口，在闸北实施戒严。

1937年7月23日，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参谋长本田辅借口中国空军飞机飞越上海上空，并向日军舰艇做出攻击的姿态，违反停战协定为由，向中方提出抗议。7月24日，驻沪日军以一名士兵被中国人绑架为借口（实际为逃兵），出动了配属有坦克的部队，在上海街头实施戒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最高统帅部对上海的形势相当警觉。7月14日，南京最高

统帅部决定立即封锁长江，撤除长江上的灯塔、航标，加强江阴要塞的岸炮配置。

7月下旬，由钟松担任旅长的第2师补充旅一部以保安队的名义秘密开往上海，进驻上海虹桥机场。

上海的形势日渐紧张，为此，1937年7月30日，张治中再次致电军委会，提出：“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左（下）列征候之一，如1.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轮施送时；2.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3.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4.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即断定敌发动无疑。则因我主力军远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必需时，且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诸种关系，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对此，南京军政当局予以认可，但要求开战时机需要由最高军政机关决定。至此，中国军事当局正式确立以先发制人的攻势发起淞沪一线的对日作战，夺取战场主动权的决心。

就像历史上的许多战争一样，1937年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固然是中日两国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军事矛盾的必然结果，但是引燃大火却又往往是几颗小火星。卢沟桥事变是如此，八一三淞沪会战也是如此。

虹桥机场位于上海的西郊，是上海周围最大的一个机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鉴于上海的局势日益紧张，南京最高统帅部注意

到了加强机场警戒的重要性，但是又考虑到根据《淞沪停战协定》，中国的正规军队不能进入上海，所以才命令钟松所部换装进驻。

尽管打着保安团的招牌，但是钟松的第2师补充旅（后改番号为独立第20旅）一进驻虹桥机场，情报极为灵敏的驻沪日军还是通过一些在租界的密探获得了消息。

1937年8月9日下午5点左右，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驻日商丰田纱厂的西部派遣队队长（中队长）、海军中尉大山勇夫与一等水兵斋藤与藏，驾驶一辆军用小汽车由虹桥路向虹桥机场疾驶，行至机场大门时仍未减速。虹桥路是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其西端就是虹桥机场的大门口。南北走向的碑坊路在此与虹桥路相交叉。沿虹桥路行驶的车辆，如果不是要直接冲进机场大门的话就必须减速转弯。机场门口的卫兵见此情景立即示警阻拦。大山便从车内向外射击，中方卫兵便立即开枪还击。遭到射击后，日军的汽车便向右转弯，沿着机场铁丝网向北行驶。在铁丝网内值勤的航空委员会特务团8连士兵听到枪声后也向日军汽车开火，将汽车击毁于碑坊路上，车内的大山勇夫被当场击毙。斋藤与藏跳车后也被在附近构筑工事的中国士兵打死。这便是1937年淞沪会战的导火索——大山勇夫事件。

事件发生后，驻沪日军当局的表现开始相当奇怪。大山和斋藤两人被击毙后，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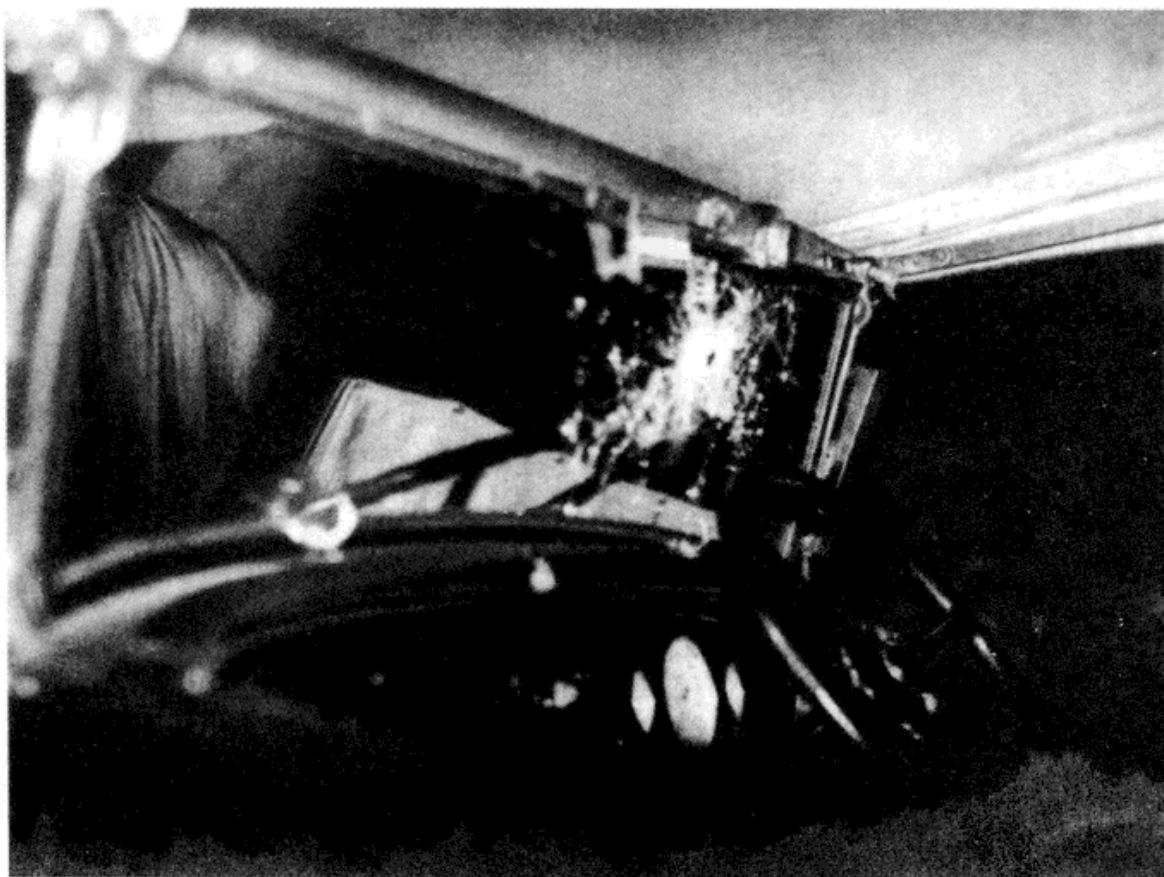
当局从二人所穿着的日本海军军服和从大山勇夫的尸体上搜出的名片确认了其身份。据此上海市长俞鸿钧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打了紧急电话进行查询。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政在向驻沪日军查询后却声称“当日并无陆战队士兵外出，定系谣言”。直到中方具体质询日军中无大山勇夫其人存在时，日军还在装糊涂，称大山嗜酒，可能是酒后私自驾车外出云云。可惜当时没有那个技术，不然的话可能还真是有必要测测日本帝国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的血液酒精浓度。

当日晚间，驻沪日军海军陆战队派出

参谋人员与领事馆的秘书、武官一道前往事发现场，对案情进行了调查。虽然双方对于案情的判断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日军方面仍然表示愿意继续以外交的方式解决此次事件。

当日夜间，俞鸿钧市长亲自前往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会见了冈本季政总领事和日本驻华大使馆副武官本田辅少将，将事情的前因后果通知日方。本田少将也并未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

事发后的第二天，中日双方就此事进行了谈判，日军的表现仍然是“理性而又真



■ 虹桥机场事件中两名日军所乘坐的汽车。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 虹桥机场事件的当事人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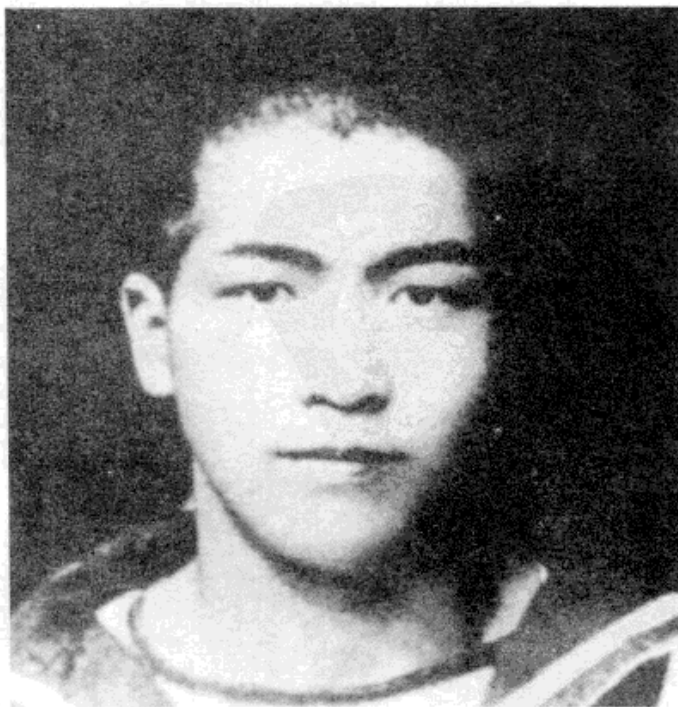
“诚”，表示愿意以外交手段交涉解决纠纷，日海

8月11日，日方的态度却发生了急剧转变。当日下午，冈本总领事到上海市政府面见俞鸿钧市长，表示虹桥机场案发生后，日方着海军制服的军官及水兵为华人惨杀，这是对皇军的重大侮辱，全国愤激。要求中方“1.撤退保安队；2.所有保安队之构筑工事应拆除”。冈本还强调：中日两军的冲突完全是由于中国保安队的军事准备所造成的，而对于大山、斋藤二人擅闯军事禁区一事绝口不提，将事件的责任全部推给了中方。

实际上，从事件一爆发，日本人

以外交途径解决纠纷的和平诚意就从来没有过。事发当晚，正在台湾海峡组织演习的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海军中将就立即命令正在日本本土佐世保港待命的海军第8战队、第1水雷队、第1航空队、佐世保镇守府第1特别陆战队、吴镇守府第2特别陆战队立即作好出动准备。他本人则搭乘第3舰队旗舰返回上海。10日下午13时15分，长谷川电令上述部队立即向上海开进。11日晚上到夜间，日军各部陆续抵达上海，大约2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上海登陆，纳入驻沪日本

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少将的指挥之下。



■ 虹桥机场事件的当事人日本海军一等水兵斋藤与藏。

日军的这个外松内紧，表面虽然谈不上是一团火，背后却绝对是一把大刀的态度不难理解。8月10日12时，日本海军军令部致电长谷川清海军中将，认为“尽管最终解决事态，除诉诸武力别无他途，但应考虑陆军派兵不仅需要相当时日，且据监听情报得知中央政府之意向是，只要我方不主动攻击，中方不予攻击”。

话说得够明白了，日本军方并非不想打仗，不过仅凭着驻沪海军陆战队的地面兵力实在是很有些不足。实际上，在8月10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据说很有些绅士名声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就提出了向上海派遣陆军部队的要求，陆军大臣杉山元原则上表示同意，

但强调陆军的动员、集结和输送需要时间，在20天以后才能发起攻击。8月12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制定了派遣陆军的方案，准备以陆军第3师团和第11师团组成一个军派往上海方面作战，动员的开始日期为8月15日。从8月15日算起，20天后也就是9月5日，到那个时候日军才有足够的地面部队投入淞沪战场。以谈判作为掩护增兵的手段，这也算是日本军方的老套路了。从上海玩到卢沟桥，所以这一次打算再玩一次。不过中国军人也不是笨蛋，吃一堑长一智还是懂的，何况这一套把戏中国人已经看了不止一次了，张治中的主动出击的战略设想也就是针对日军的这老一套。中日两军在上海的第二次大战已



■ 中日双方人员在事件现场进行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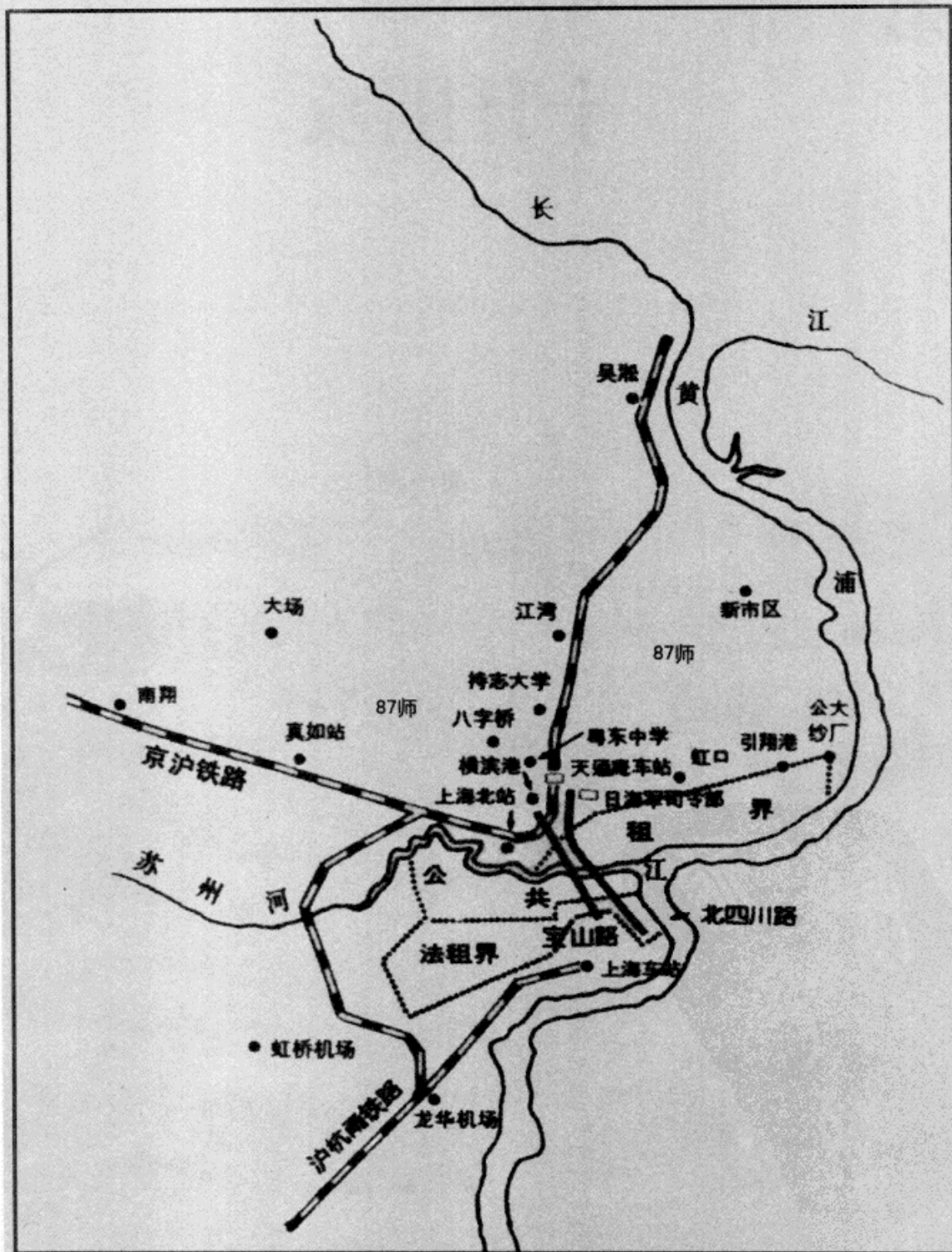
经进入了倒计时。

回过头来再看看淞沪会战的导火索——虹口大山勇夫事件的话，有些内容也确实令人有些困惑。不同于多年来日本国内对于卢沟桥事变的无数的调查和论述以及种种花样百出的结论，近70年来日方从来没有提供过对于大山事件的确切调查结果。大山勇夫死在虹桥机场门口前到底干了什么，他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离开日本军营，至今还是个谜。因为如果是要侦察机场内的中国军队的话，穿着日军军服，实在有些匪夷所思的味道，这样的话，哪里是侦察，简直就是挑衅甚至是找死。要是真的想进行侦察，至少得要换套衣服吧。所以近年坊间还有流传新的观点，虹桥机场的事发地点不过是第二现场，是被刻意安排到这个敏感地点的。事实到底怎样，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只能是作为一个历史之谜了。



■ 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海军中将。

图二 淞沪会战战斗前状况要图 (1937. 8. 13)



第二章

十日围攻



战幕开启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就已经定下了在上海大打出手的决心。但是，基于“一二八”事变时的经验教训，日本海军对于在上海迅速获胜并无任何把握，尽管日本海陆军的关系是出了名的差，日本海军方面还是拉下脸皮直截了当地要求陆军支援。日本陆军对于出兵华东战场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只不过陆军要完成动员、集结调动，再输送到上海前线参战怎么估计也得是8月底、9月初的事了，所以日本海军当局便要求第一

线的第3舰队暂时“慎重行事”。

不过长谷川清显然不是个甘于寂寞的角色。从11日起，他的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员便开始在上海街头全副武装进行巡逻。12日，日军开始在中国保安队的前沿阵地前构筑工事、运送武器弹药。当日中午，中国警察逮捕了数名刺探中国军情的日本特务。据中国的情报来源显示，到这一天，日本海军集中在上海附近江面的各种舰艇已经有27艘之多。日军将在上海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征候已经十分明显，这一切完全符合张治中事前的判断。



■ 最早进入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是中央军德式装备的精锐部队。

据此，中国最高统帅部决定立即依照“后发先至”的方针，利用日军陆军地面部队还不能马上投入战场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自身本土作战的优势，先发制敌，先声夺人，攻歼部署于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11日，蒋介石电令张治中，命令他“立即率87、88两师于今晚向预定之围攻线推进”。张治中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并且对此早有部署。接令后张治中的反应很快，他立即发布命令：1.87师一部进驻吴淞，主力推进至市中心；2.88师前进至北站及江湾间；3.炮10团第1营及炮8团进至真如、大场；4.独立第20旅在松江的1个团进驻南翔；5.令炮3团第2营及56师自南京、嘉兴各地向上海输送。

当时在张治中京沪警备司令部指挥下的部队中，第87和第88师的前身是南京卫戍部队，首都警卫军的第1师和第2师，从番号上看也猜得出这是属于中央军的精锐嫡系主力。1932年，这2个师合编为第5军，在军长张治中的指挥下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可惜世事无常，短短3年以后，1935年，又是在张治中的指挥下，这2个师参加了对发动“福建事变”的19路军的进攻。当年的老战友转眼变成了刀兵相见的对手。1936年，87、88师改为调整师，接受了比较完整的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军事素质，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都属上乘，堪称中国陆军中的最精锐部队。56师前身是

北伐战争后期收编的北洋军阀部队，战斗力较87、88师明显为逊。炮兵部队中炮10团是1934年新组建的重炮部队，为当时全中国唯一的机械化炮兵团。装备从德国莱茵金属公司购买的32倍径150毫米火炮性能相当先进，不但国内已有的火炮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即便与日军最新型的96式150毫米榴弹炮相比，也绝无逊色之处。

张治中的开进计划组织得相当完善，他在事前便已经控制了火车并征用了300多辆汽车用于运送部队，第87师在江阴、苏州地区搭乘所征用300余辆汽车，连夜开赴上海。第88师在无锡、苏州一带上火车，直驶上海。8月12日上午，张治中及其指挥部已从苏州市内的留园进驻南翔；87师主力2个旅分别进入上海新市区、张华浜和吴淞镇一带；88师主力则到达真如、暨南新村、大场一线；炮10团1营已在大场、真如进入阵地。至此，京沪警备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预定阵地，对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形成围攻之势。从1932年夏季算起，上海的市民已经有5年没见过祖国的军队了，当他们在清晨醒来看到全城到处都是中国军人时，不由得惊喜交加，纷纷追问：“你们是哪来的？怎么这么快？”

张治中的计划是趁日军尚未完成战争攻击准备前，先发制敌，一举歼灭驻沪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在本土的日军部队增

援到达前先清除掉上海日军这个对南京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巨大隐患。部队部署到位后，张治中立即致电蒋介石，要求于13日拂晓前发起攻击，陆空配合作战，先给驻沪日军一个下马威。可惜的是，就在这一天，驻沪日军又唱起了“不扩大”的老调子，还撺掇驻上海的各国领事团提出要求，希望中日两军能够在24小时之内不要开战。外交方面的压力干扰了蒋介石的决心，他电令张治中继续待命，于是本应在13日拂晓打响的战斗被推迟了。这种时候的每一分钟都比钻石更宝贵，在中国军队的开战意图已经完全暴露的情况下，日军抓紧这难得的喘息时机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战斗准备。

当时，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共有如下兵力：上海特别陆战队2500人，新增调的2个特别陆战队共1000人，还有从江面舰艇上调来的陆战队1500人，以上合计共7个步兵大队，约5000人。这支部队兵力不少而且拥有坦克和各种口径的火炮，实力不容小看。8月12日下午起，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少将便下令所属各部全部进入阵地待战，中国方面13日推迟攻击，无疑是相当可惜的。

此时，日军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部署情况如下：

八字桥警备部队：特别陆战队第3大队，配属有150毫米重迫击炮4门，步兵炮2门，坦克、装甲车共5辆。



■ 87师紧急征用300余辆汽车，连夜开赴上海。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 中国军队进入攻击位置。

北部警备部队：特别陆战队第1大队，附有速射炮2门，坦克和装甲车共7辆。

东北警备部队：特别陆战队第5大队（原佐世保镇守府第1特别陆战队），附山炮4门，配属有坦克和装甲车共6辆。

西部警备部队：特别陆战队第1大队1中队，防守丰田纱厂。

中部警备部队：特别陆战队第6大队（原吴镇守府第2特别陆战队）、特别陆战队第2大队，附150毫米迫击炮4门、速射炮2门。

虹口警备部队：“出云”号巡洋舰舰上陆战队和汉口特别陆战队（从汉口撤出），附山炮4门。

兵营地区警备部队：特别陆战队司令部

大队，防守陆战队兵营和附近地区。

预备队：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特别陆战队第4大队、舰上陆战队（除“出云”号之外）。第4大队为炮兵部队，共装备有150毫米榴弹炮4门、120毫米榴弹炮4门、山炮4门、高射炮4门。

出于外交的考虑，蒋介石对于开战的时机发生了一点犹豫，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会因为蒋介石的犹豫不决而有所改变，1937年8月13日下午，震惊中外的淞沪大会战的第一枪还是打响了，仅仅比张治中的原定计划晚了半天。

这一天的15时50分，驻守八字桥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第3大队（大队长伊藤茂海军

大尉，当时实际兵力为2个中队另1个小队，并配属有150毫米重迫击炮4门、步兵炮2门，坦克和装甲车6辆）向推进至附近的88师523团1营部队发起火力急袭，中国军队予以坚决的反击。战斗至当夜21时，两军未分胜负，战斗暂时停息。一场持续了四个月之久，交战双方合计将有上百万部队参加的空前大战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这场大会战也因为爆发于这一天而被命名为“八一三淞沪抗战”。八字桥也因为打响淞沪第一枪而载入了史册。

关于这一天，其实还有些小事需要说明。国内的战史资料中一般都把八字桥战斗列为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第一枪，不过事实是否真的是这样呢？实际上，据当时担任上海保安总团团长的吉章简回忆，早在当日上午9时15分，日军就曾经向上海市保安总团的阵地进行射击，双方交火约20分钟。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也据此向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提出抗议。

而按照日方的战史，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编著的《日本海军在中国作



■ 紧张调动中的日军部队。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战》一书中所载，八字桥战斗打响于8月13日下午16时50分，比中国方面的说法略晚。不过这也说明上午的冲突日军是一概不承认的。按照日方资料所述，当时中国军队引爆了九个事先埋设的地雷后，在山炮的火力支援下，以2000人左右的兵力向八字桥日军第6中队阵地发起攻击。日军立即以迫击炮、坦克、装甲车等轻重火力进行还击。由于中国军队兵力占优势，日军还焚毁了附近的民房向中国军队实施火攻。双方激战至当夜，没有分出明显胜负。

就笔者个人的看法，8月13日上午的冲

突应该的确是有的，否则俞鸿钧市长也没有理由在如此微妙的时刻向日本领事馆提出抗议，但是考虑到战斗的规模和烈度都远不如下午的八字桥战斗，将八字桥战斗作为淞沪会战第一枪的标志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张治中本人在8月14日发表的声明中也采用了战斗爆发于当日下午16时的说法。至于日方的战史中，则有相当多的地方令人无法理解。中国军队用爆破的方式破坏日军工事不是不可能，但是88师从进驻上海到八字桥战斗打响只有一天的时间，中国军队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日军火力齐全、强大，设



■ 正从日军司令部开出的装甲车。

防坚固的据点前埋设地雷进行爆破，怎么看难度也太高了些。而日军所说的有爆破、有炮兵支援的2000多人的主动攻击至少也是团一级的，不属于擦枪走火的范畴。在蒋介石明令发起攻击的时间由最高当局掌握的情况下，无论是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还是88师师长孙元良恐怕都没有这么大胆子。他二人的回忆录中也从未发起过这次攻击的记载。反倒是日军，按照其一贯轻视中国军队的骄狂作风看，看到当面有大批中国军人在准备战斗，仗着手里的坦克和重炮的厉害，打算先给中国军队点颜色看看不是不可能。

8月13日夜，在南京的蒋介石获知上海战事爆发，他随即电令前线部队：“1.京沪警备军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为总司令，于明（14）日攻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2.苏浙边区军改编为第8集团军，张发奎为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炮击浦西汇山码头及公大纱厂。3.空军于明（14）日出动，协同陆军作战，并任要地防空。”

张治中决定在次日午后发起进攻。事实上，8月13日这天，前线虽然冲突频发，但还只是双方步哨以步枪、迫击炮互射的零星战斗，是大战的前哨战，真正的战役作战是到14日才展开的。正如张治中追述的：“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正式的开战是在8月14日。”

8月15日，张治中代表全军将士，向全国发出抗战通电：“治中奉命统帅所部，星驰援应，保卫我先祖烈宗筮路蓝缕辛苦经营之国土，争取我四万万五千万炎黄华胄之生存，誓不与倭奴共载一天。今日之事为甲午以来40多年之最后清算，彼曲我直，彼怯我壮，彼为发挥野心之侵略，我为决死求生之自卫，无论暴敌如何披猖，最终胜利，必属于我。愿我举国同胞武装袍泽……以百折不挠抗战到底之决心、求得最后光荣之胜利。”

除了已经部署到位的第87和88师以外，国民政府又向上海前线增调了更多的部队。8月13日，钟松的独立第20旅在南翔、北新泾、虹桥完成集结。刘和鼎任师长的第56师进抵太仓、浏河一线。夏楚中任师长的第98师于8月14日由南京车运上海，15日抵达南翔后，当即开赴杨树浦地区。原属京沪警备军建制，西安事变发生后调往西安的宋希濂第36师，奉令东调，在8月16日开抵上海北郊。以上各部均归张治中统一指挥。上述各师中第56师是北伐战争中被收编的原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的余部。第98师则是中央嫡系中的嫡系——陈诚“土木系”的骨干部队之一，淞沪会战后期扩编为第79军，战斗力较强。宋希濂的第36师由87、88师的4个补充团扩编而来，与87、88师同宗同源，一样是德械标杆部队，为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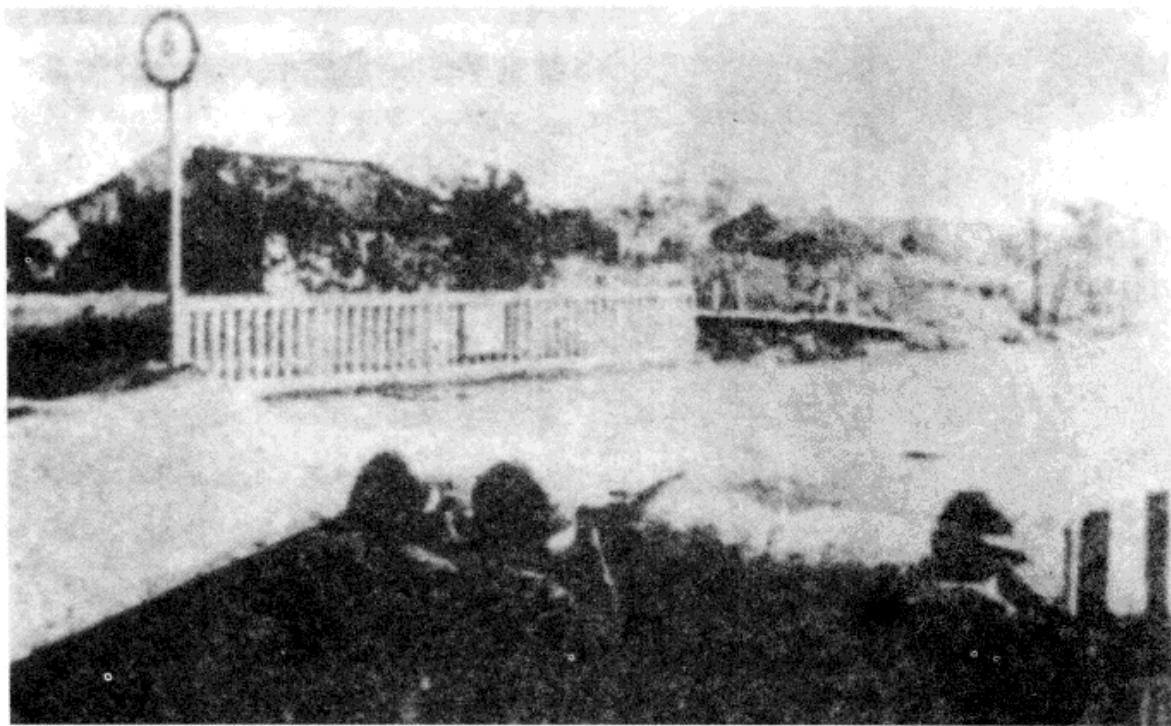
由粤系老将张发奎指挥的第8集团军，

血肉磨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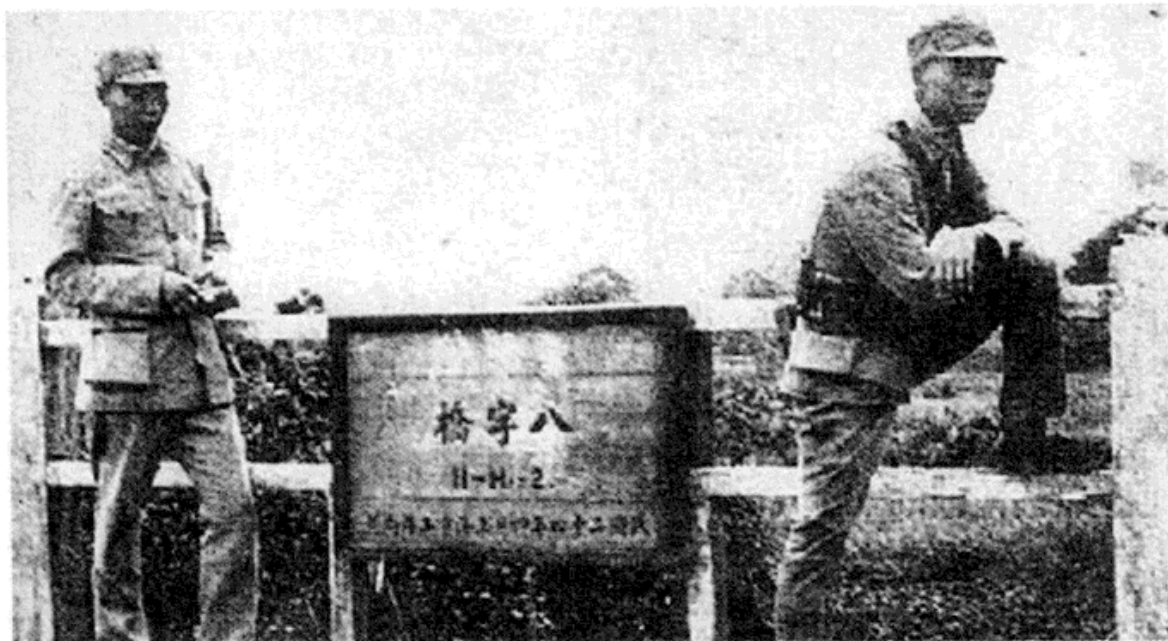
淞沪会战

由沪杭线进至上海浦东地区。其中李松山任师长的第55师自8月13日起，由奉贤前进至周浦、塘桥之线，向黄浦江沿岸开进。阮肇昌任师长的第57师由浙江平湖向上海开进，于17日进至浦东塘桥一带，并警备川沙白龙港。陶广任师长的第62师守备杭州湾北岸乍浦、全公亭、金山卫之线。张銓基为旅长的独立第45旅，主力由浙赣线、沪杭线车运到嘉兴，一部于8月17日进抵海盐硖石附近。张发奎将他的集团军总司令部设在嘉兴。第8集团军的任务，一方面为警戒杭州湾北岸，随时准备抗击日军可能的登陆，另一方面是扫荡浦东之敌，以炮兵隔江轰击浦西日军码头和兵营，配合张治中部围歼日军。

继卢沟桥事变后，8月13日在上海的枪声表明华东战场的对日作战也正式拉开序幕。从中方的角度来说，这是图存救亡的决战；从日本的角度来说，也是要靠一场大战彻底打服中国，一劳永逸地消灭掉中国国内日益激烈的反日倾向，中日之间的战事再也不是局部冲突，而是两国之间不死不休的全面战争。为了协调指挥全国范围内的作战，南京军事当局将全国战场划分为四个战区，其中战事最为激烈的淞沪地区和苏南、浙江为第三战区。8月14日，南京政府任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陆军一级上将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15日，冯玉祥由南京抵苏州，设立司令长官部。这项任命也很



■ 八字桥畔的中国军队阵地。



■ 守卫在八字桥的中国军队。

有些微妙。冯玉祥本人是被蒋介石打垮的旧西北军统帅。虽然他本人眼下已经不直接掌握实权，不过他的旧部如宋哲元、韩复榘、庞炳勋、石友三等部都集中在华北战场，作为老长官的冯玉祥肯定仍然会有相当号召力。再加上冯玉祥本人曾经在河北、河南活动多年，对当地的情况十分熟悉。任命冯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主持华北作战才算是人尽其用。不过对于蒋介石来说，将这个反蒋多年的老资格对手放回到老部队老地盘，他恐怕会睡不着觉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宁可自己兼任也不可能交给冯玉祥。把冯玉祥放在第三战区，面子上很好看，华东战场的中国军队以黄埔嫡系主力为主，前西北军统帅冯玉祥只能当个牌位，根本不可能指挥得动。8月18日，蒋介石任命军政部次长陈诚为

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8月26日，又任命时任西安行营主任的顾祝同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陈诚和顾祝同都是地地道道的黄埔出身的嫡系爱将，忠诚度没得说。有此二人主持前线作战，蒋介石就很放心。

全力围攻

从8月14日起的10天，这是中国军队全力出击的阶段。在这10天里，以第9集团军为主的中国军队集中了一批最精锐的部队猛烈攻击盘踞在虹口与杨树浦地区的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力求在日本陆军的增援部队进抵上海之前，歼灭驻沪日军，摧毁日军在上海经营多年的陆上根据地，并为以后进一步的作战创建一个比较理想的局面。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 今天车水马龙的八字桥。



■ 中国军队开入上海市区。



■ 八一三淞沪战争前夕在北四川路上全副武装的日军。

前面提到过，1937年8月，日军在上海还没有成建制的陆军部队，地面部队为数千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驻沪陆战队司令官是大川内传七海军少将。在上海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则是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海军中将。不知道是真心真意地信任部下呢还是怎么着，眼看大战将临，长谷川清中将将地面上的事完全交给了第一线的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少将，自己则在停泊在黄浦江面上的“出云”号上一门心思地等待援兵。

大出内传七（1886—1958），日本佐贺县人，日本海军兵学校37期期生，海军炮术学校高等科16期生，海军大学第20期生。曾任轻巡洋舰“球磨”号炮术长，轻巡洋舰“木曾”号舰长、舰队炮术参谋，海防舰“浅见”号舰长，战列舰“比睿”号舰长，海军炮术学校校长，第一南遣舰队司令长官，舞

鹤镇守府司令长官，海军省电波本部长，海军兵学校校长，西南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等职务，1940年晋升为海军中将军衔。按照大川内的履历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海军炮术专家和海军教育专家，算起来还是一位19世纪的东洋“80后”。那年头类似于他的日本海军军人，可以说是闻着对马海战的硝烟味儿成长起来的，当兵几十年的最大的梦想大概就是在大海战中也来露个脸，奇怪的是他这么标准的一位海战专家在海上始终没多大露脸的机会，连当主力舰舰长的机会都不多，却因为陆战而出名。在上海这回正好赶上当海军陆战队司令也就算了，若干年后总算当上了期待已久的舰队司令长官，可惜到他上任的时候，那些曾经威震世界的铁甲舰都已经美国佬打发到海底下改善环境去了，于是这位舰队司令长官又是指挥陆战队在菲律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宾和麦克阿瑟比试了一场，最后因为有虐待战俘的嫌疑差点儿给自己混来个二级战犯的头衔。

当然，在1937年8月，大川内少将头脑里还完全不会出现9年后漂浮在头上的绞索，在中国军队精锐主力的攻击面前，这个时候他能够考虑的就是怎么在陆军的援兵到来之前守住他的这块地盘。他的背后，有着中国军队所望尘莫及的强大舰队，可以为他提供充足的炮火支援。他的几千名海军陆战队相当于1个加强旅的兵力，称得上装备精良、火力充足、兵强马壮。依托经营多年的坚固防御体系，足以为一战。对他来说，最麻烦的是

和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无穷无尽的中国军队相比，他的部队数量太少了，地盘也小，没有什么可以周旋的空间，就像是海啸面前的一块顽石，虽然可以顶住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但是到底能够顶上多久呢？

日军在虹口、杨树浦的驻地，背靠黄浦江，前方直指上海市区华界闸北和江湾地区，横跨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北地区和越界筑路地带。其阵地以汇山码头为起点，沿吴淞路、北四川路、江湾路，迄虹口公园及其附近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摆成一条一字长蛇阵。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为首、汇山码头为尾，而位于军工路的公大纱厂，则为其



■ 日军核心阵地汇山码头。



■ 正待命出击的中国空军机群。

外线的主要军事基点。陆战队司令部大楼和汇山码头是两个核心阵地，因为前者为其部队指挥中心之所在，后者为其陆上与江上舰队连接的主要通道。开战前夕，日军在上述核心阵地之外线，已建立有一批据点式外围阵地，在虹口方面，有虹口公园等，在杨树浦方面，有公大纱厂、日本海军操场、日本海军俱乐部、精版印刷厂、泰康面粉厂，以及百老汇路(今大名路)等地的街垒。中国军队的进攻，首先必须扫除日军各个外围据点，进而摧毁其核心阵地，把其驱逐至黄浦江边予以歼灭。

10天围攻战的战线，呈现为东西向的态势，西起闸北的北站，东至黄浦江边的虬江码头和沪江大学，其长度仅为十余公里。张治中以第88师配置于战线之右翼，而以第87师置于左翼。第88师开战时主力位于北站周围及鸿兴路东、钱塘江之线，一部兵力沿宝山路、八字桥、江湾路一线与日军阵地对

峙。王敬久第88师，主力集结于江湾两江女子体育学校周围，并沿虬江前出虬江桥之线，主力一部位于吴淞。日军为在其陆战队司令部大楼外围巩固与扩大作战阵地，于大战开始的前一天，即8月13日，其第6大队以部分兵力在闸北方面抢占了持志大学、粤东中学、爱国女校、五卅公墓和八字桥等据点。在杨树浦方面，以公大纱厂为出发点，抢占了沪江大学。88师于当日下午夺回了八字桥，但其他据点仍在日军手中。

8月14日上午，中国军队对虹口、杨树浦地区的日军之围攻战正式揭开战幕，首次攻击，87师和88师这两支中国军队的最精锐部队并肩作战，攻势从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在这一天，中国空军利用此时日军既无岸上机场，航空母舰也暂时远离战区的有利时机，对日军的地面和水上目标，包括陆战队司令部大楼、日军旗舰“出云”号、公大纱厂等处，进行轰炸和扫射。同日，南京政府也宣布长江自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镇江以下江面、南至黄浦江和吴淞口，一律予以封闭，所有航行一律禁止。

第88师以262旅位于北站周围，向虬江路、横滨路一带当面之敌发起进攻，以牵制虹口公园方面敌之攻势；另一方面，以264旅为主攻部队，集中兵力攻击日军陆战队司令部之外围据点持志大学、五卅公墓、爱国女校等地。在旅长黄梅兴少将的指挥下，从14日拂晓开始，264旅以所属的527、528团“向江湾路推进”，然后沿水电路由北向南攻击前进。“我攻击部队由爱国女校方面，向左翼旋回压迫敌军，逐次前进，敌军节节后退，

利用特制的钢板防盾沿江湾路顽抗。晌午时分，我英勇的攻击部队前仆后继，已接近敌海军司令部附近，敌兵遗尸遍地，一部分退入其司令部，其余狼狈沿北四川路南窜。”

这一天的进攻中264旅冒着敌军的猛烈炮火，奋不顾身，表现不俗。当日下午，中国军队终于从日军手中夺回了持志大学和五卅公墓两处要点，把攻势直指日军司令部边沿。下午近4时，在爱国女校争夺战进行之际，旅长黄梅兴正以电话向师长孙元良报告战况时，一发日军的炮弹落下，黄梅兴腹部中弹当场牺牲，这是整个华东战场上，中国



■ 在上海市区的日军阵地。



■ 日军依托街垒工事抵抗中国军队的进攻。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军队阵亡的第一名将级指挥官。在第一天战斗中，264旅共伤亡黄梅兴以下共千余人，其中仅527团即有7个连长阵亡，战事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第87师主力以江湾体育场一带的新市区为出击地，沿军工路、黄兴路等各线由北向南推展攻势。作战的目标，首先在于攻占日军占据的沪江大学、海军操场、海军俱乐部等要点，然后集中兵力攻夺公大纱厂日军根据地，彻



■ 264旅旅长黄梅兴是淞沪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队第一位将级军官。

底拔除沪东的这个日军最重要的据点。8月14日晨开始，游弋在黄浦江中的日军舰艇向沿岸驻守的87师部队和上海市警察总队阵地进行猛烈炮击，吴淞镇成为日军炮火集中轰击的目标。日军从第3舰队的巡洋舰上起飞数架水上侦察机，对我岸上目标数次实施轰炸。87师除一部坚守吴淞一带，大部主力冒着敌人的炮火从新市区向杨树浦方向攻击前进。坐落在军工路上的沪江大学，校园已于日前被敌占据。259旅的官兵奋勇突击，在当日下午把日军逐出沪江大学校园。

8月15、16两日，张治中奉蒋介石之命作攻击准备，并未实行全线进攻，但实际上

前线部队的战斗仍在进行。日军为夺回14日丧失的据点，不断发起反扑，中国军队寸步不让，力争扩大战果。虹口方面，88师与日军为控制八字桥、持志大学、五卅公墓和爱国女校，展开了反复争夺。杨树浦方面，87师与日军在沪江大学、日海军操场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激战中日军江上舰队不断炮击我军阵地，陆地上的坦克部队多次用于救急作战，表现活跃。

战役的前两天，中日两军殊死战斗互有胜负。整体而言，中国军队略占上风。87师沪江大学阵地得而复失，然后于15日又从日军手中夺回。88师也在16日攻占了粤东中学

和爱国女校两个据点。但在关键的虹口公园和日军陆战队司令部这两处据点，中国军队的攻势则没有明显进展，两军在江湾路、南北铁路一线打成对峙。中国军队冲不进去，日本军队也打不出来。8月15日夜，夏楚中师长的第98师进入前线参战。该师第294旅到达杨树浦马玉山路（今双阳路南段、营口路北段），在虬江路码头至公大纱厂之线的进攻阵地；第292旅在马玉山路以西地区集结。在虹口方面，以钟松为旅长的独立第20旅也在15日进入闸北水电路第一线阵地。

经过两天的调整补充之后，8月17日，第9集团军再次发起全面进攻。凌晨5时30分，战斗打响。第87师首先对日海军俱乐部、海

军操场发起进攻。双方战斗十分激烈，战至上午9时许，日海军俱乐部和海军操场终于被我259旅攻克。日军虽已显得有些不支，但仍在俱乐部旁的油漆公司四层大楼顽强抵抗，并连续发起反冲击。两军激战竟日，中国军队仍未能突破日军在公大纱厂的防御。与此同时第88师以主力由北侧向日本坟山、八字桥、上海法学院、虹口公园进行攻击。两军反复争夺，迭进迭退。上午11时，88师一部攻入日本坟山阵地，日军的反冲击也被击退，但其他几处虽激战终日皆无进展。此战双方伤亡甚重，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一书中记载，这一期间日军战死中队长以下106名，



■ 日军经常利用民房建筑为依托，进行逐楼逐屋的巷战，并使用焚烧或摧毁民房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军队的防御。图为日军趴在乍浦路的一处民房屋顶射击。

轻重伤337名。而中国军队的伤亡更加惨重，日军估计中国军队战死约600名，负伤约3000名。考虑到中国军队的装备、军事素质均较日军有相当的差距，攻坚作战的经验训练和技术手段尤缺，面对日军经营已久的坚固据点，中国军队的攻势经常显得勇气有余而毫无章法，伤亡远大于日军则是事实。在进攻日本坟山的战斗中，17日上午11时中国军队攻入日军阵地，随即遭到日军侧射火力的拦击，死伤颇重。

经过17日一天的激战，日军苦于兵力严重不足，反攻无力。大川内少将也意识到日军的兵力严重不足，遂主动缩短战线，主力退守虹口公园与陆战队司令部。中国军队斗志仍然相当旺盛，可惜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都有严重不足，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仍无力突破日军的核心阵地。

从14日战役全面打响到17日，对日军来说无疑是非常难熬的四天。在日军战史中，充满了“苦战”、“屡陷危境”的字样。日军承认，中国军队的攻势凶猛顽强，空中打击也异常活跃。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眼看东京要其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坚守待援的任务难以完成，乃于8月16日连续向军令部发出两份急电，表示“……持续奋战，持续一周实感极为困难。因此，一日也不能等待动员，系在尽速派遣特别陆战队的同时，至少再急派1个联队以上的步兵”。

海军接到这份告急电报后，于当日晚上下达了大海令第20号，命令在中国东北旅顺口待命，原计划在青岛登陆的横须贺镇守府第1特别陆战队、吴镇守府第1特别陆战队2个大队约1400人搭乘海军第1水雷舰队舰只立即向上海增援。

这样，加上已经先期到达的吴镇守府第2特别陆战队和佐世保第1特别陆战队，到8月19日，日军在上海陆上的兵力达到了10个大队约6300人。有了这些本钱，日军得以增强江湾路、北四川路、吴淞路的防守，并新设从东长治路、长阳路至黄浦江边的公大纱厂、沪江大学的防御连线，企图固守虹口、杨树浦，等待国内陆军主力的到来。

虹口和杨树浦围攻战经过5天的激战，战局总的趋势是对中国军队还算可以。不过日军并未受到决定性的打击，在得到援兵之后，实力还有了相当的增强。同样，日军的防御体系也仍未受到太大的破坏。至8月18日夜，中国军队先后攻占了日军一批外围据点，压缩了日军的占领地区，战斗逐步推移到租界区域以内。

这时，日军的阵地，最北面是北四川路日军陆战队司令部和虹口公园，凭其坚固的建筑和严密防御，孤军困斗。缺乏重武器和攻坚力量的中国军队，对上述两个坚固据点久攻不克。然而，中国军队自攻克中间地带的要隘日海军操场后，经18日的猛烈攻击，



■ 日军在装甲车掩护下负隅顽抗。

已楔入杨树浦租界区，将日军阵地分割成曲尺形，将日军左右两翼切开。日军阵地，东西狭长，计为8000米左右，南北最宽处为北四川路，约为2500米；杨树浦地区，日军阵地南北纵深约2000米、纵深最狭窄之处则不足1000米。由于战场日益狭小，敌我双方已在杨树浦租界区进入巷战。

蒋介石在8月18日下令张治中暂停攻击。这天，第9集团军调整部署，准备在次日再度发动全线攻势。这时，中国军队也有新的生力军到来。这就是由宋希濂师长指挥下的第36师。该师原部署于陕西西安，战事爆发前后奉命东调上海参战。17日晚，全师进抵南

翔，随即于次日到达江湾新市区一带。增加了1个精锐师，张治中在18日下达下一步进攻作战的命令：“1.第88师（附独立第20旅、炮兵第3团之1营）对虹口准备攻击。2.第36师于19日拂晓前接替第87师右翼，自日本海军操场左翼至黄兴路之阵地，对杨树浦港以西、沙泾港以东之敌准备攻击。3.第98师归第36师宋师长指挥，19日拂晓，以一部对日本海军司令部攻击。”

除了步兵以外，中国的装甲兵部队也出现在上海的进攻作战中。当时，在拥兵200万之众的庞大中国陆军中，现代化的装甲兵部队却只有区区1个团，下辖战车营、战防

炮营、高射炮营、搜索营、准备营、补充营以及通信连、特务排等团直属队。战车营辖3个战车连1个补给连，全营编制内共有官兵约850名。其中第1、2连装备英制维克斯轻型坦克约30辆，第3连装备德制克虏伯轻型坦克（即德国的PzKpfw-I号坦克）16辆。中国装甲部队投入到上海战场的时间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8月14日，装甲兵团所属战车营即在团长杜聿明的率领下开赴南翔参战。然而蒋介石致当时在石家庄主持作战的徐永昌将军的电文又表明此时战车营尚在北调华北战场途中，到8月19日才进入淞沪战场参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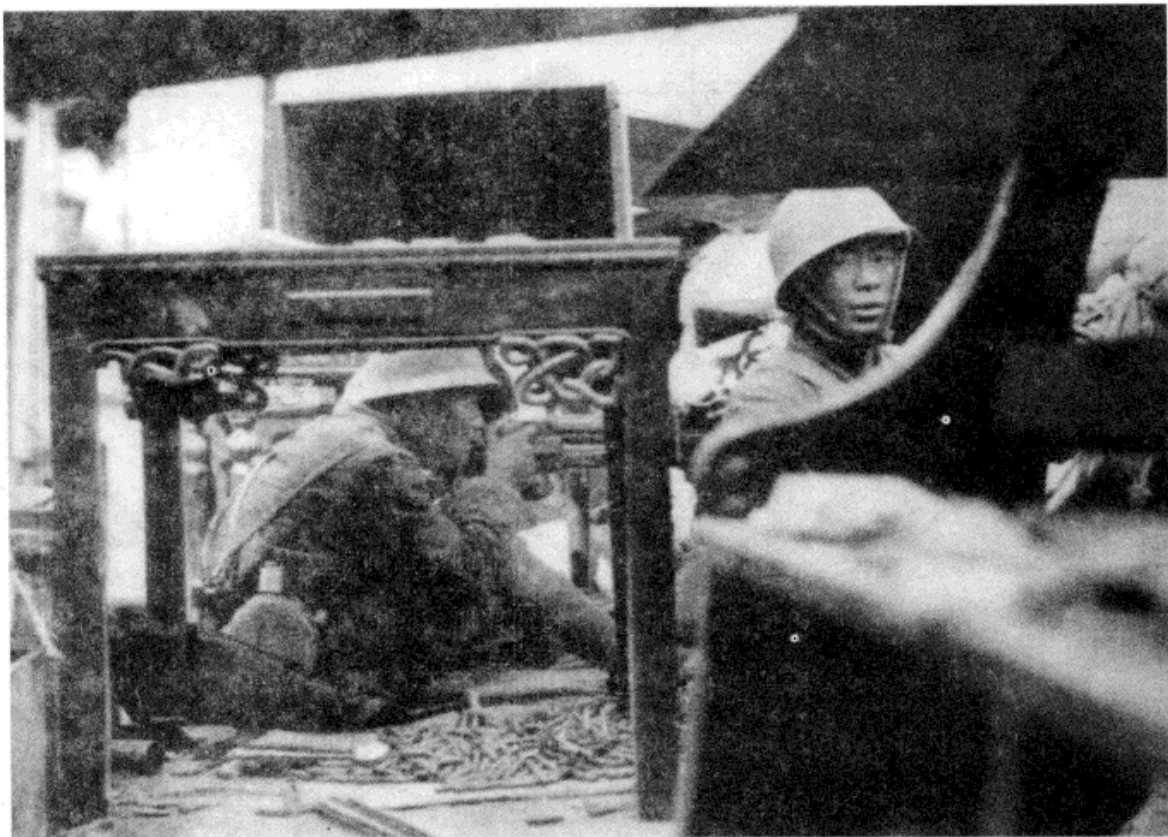
87师由北向南，对日军占领的杨树浦租界地区攻击前进，其左翼在19日下午5时攻占唐山路、公平路交叉口，前方部队已突入岳州路附近，续向百老汇路（今大名路）进击。同日傍晚，第36师2个团由杨树浦地区北缘，向沙泾港与保定路之间的地带南进，攻势直指百老汇路之敌。该师其余部队向翔殷路以南推进，向引翔港镇和杨树浦路进击。当天晚间，日军以坦克支援步兵，在海军俱乐部附近和杨树浦反复出击，均被中国军队击退。这时，张治中认为机不可失，“决心即刻扩张战果，突入贯穿杨树浦租界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两翼的联络，向东西压迫，一举而歼灭之”。也就是说，张治中决心利用日军防御体系东西宽、南北窄而且从开战起就受到一定程度的压缩的有利条件，投

入生力军彻底地割裂日军的防御体系，将日军的阵地切割成两块然后分而歼之。这一作战计划，被称为“突贯攻击”。这场突贯攻击作战，便成为战役前的最精彩一幕。

张治中于19日晚率指挥部进驻第87师司令部所在地江湾叶家花园，部署实施这一战斗计划。20日1时，第36师106旅继续向南前进，天明时进抵沙泾港、岳州路、昆明路之线，其左翼与大连湾路之87师一部打通联系。第98师的1个旅，当即向沪江大学、公大纱厂一带日军发起攻击。该师另1个旅则与36师主力协同，由沙泾港至保定路之间的正面，向百老汇路推进。

突贯攻击的作战计划，关键在于实现对敌军防线的中间突破，在沙泾港与杨树浦港之间的地带，由北向南进行突击，从其美路（今四平路）以南将攻势直指黄浦江边的敌核心阵地汇山码头，从而切断日军虹口与杨树浦两个基地之间的联系，然后加以各个击破。实现这一作战计划，是上海进攻作战阶段的最后一个重大行动。

8月20日拂晓前，中国军队左翼战线，西面进至欧嘉路，东面抵达大连湾路，南至昆明路、唐山路。日军从昆明路方面多次发动反扑，都被击退。同日下午16时，中国空军出动飞机轰炸了虹口敌司令部。同日下午，张治中下达命令，以第36师向梧州路以西席卷沙泾港以东之敌，第87师主力向大连



■ 日军以民房为掩体射击。

湾路以东进攻杨树浦区之敌，第98师主力对沙泾港以西之敌警戒。旋又决定：在21日夜开始，由第87师协同第36师，向当面之敌进行强袭，突贯至黄浦江边汇山码头一带。21日晚21时，张治中下令前线准备发动进攻，并令第88师在虹口进行佯攻，以作牵制。战车1连配属36师108旅216团引导步兵沿兆丰路（今高阳路）与公平路攻击前进，2连配属87师216旅522团向杨树浦日租界攻击前进。

宋希濂以211团强攻沙泾港左岸之敌，216和215团分沿邓脱路（今丹徒路）和兆丰路向南强攻，212团分沿舟山路、爱尔考克路（今安国路）攻击前进，并以战车部队沿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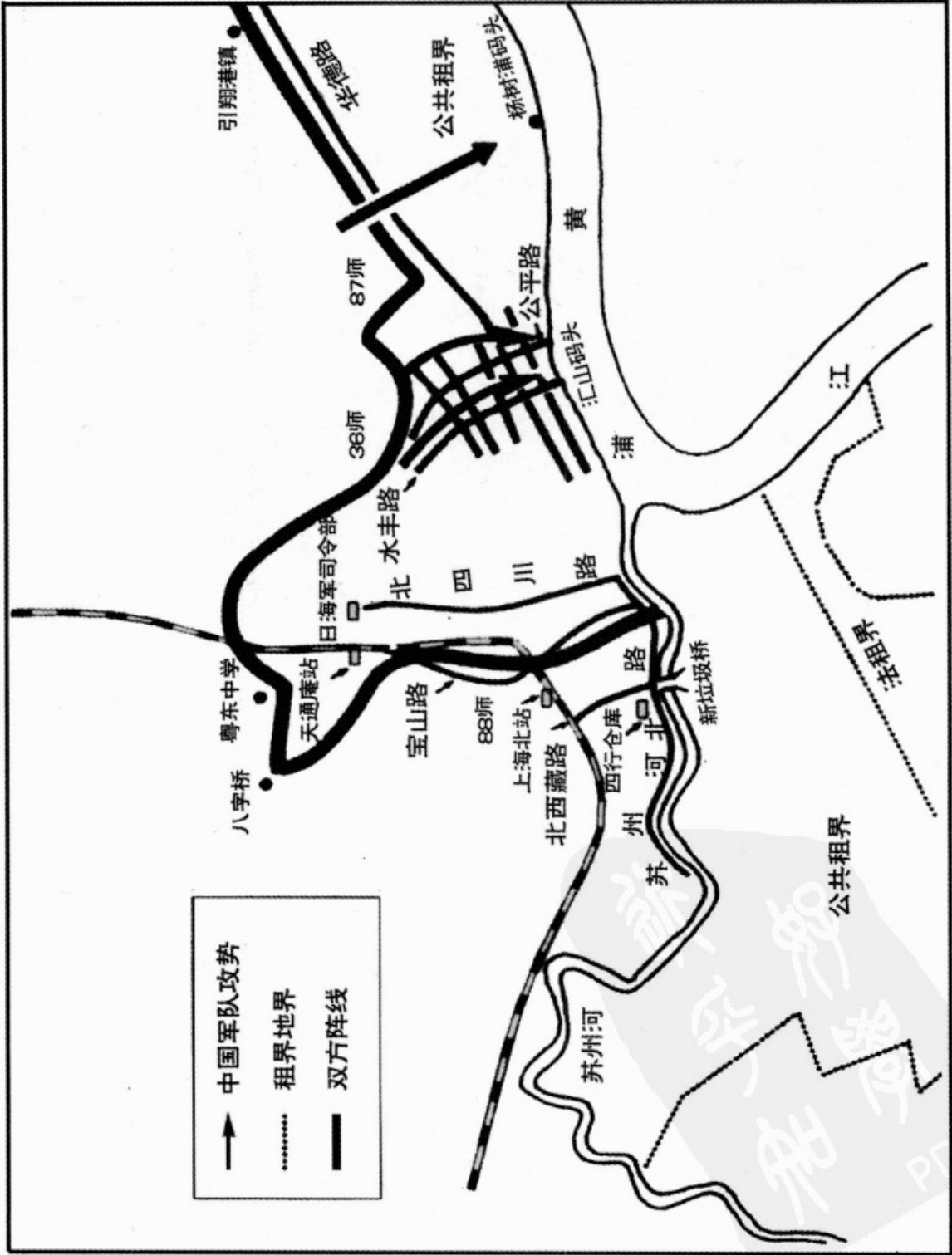
丰路与公平路突进，为步兵之先导，师炮兵队以火力支援前方作战。宋希濂的师指挥所设在新港，直接指挥战斗。

21日夜24时，攻击开始。战车第1、2连首先开进，引导步兵向日军阵地发起冲击。中国步兵缺少步坦协同的经验，导致坦克部队与步兵部队推进脱节，在日军准确猛烈的反坦克火力拦击下，战车连所装备的英式维克斯轻型坦克有多辆被击毁，2名连长先后阵亡。但步兵部队仍然奋不顾身地攻击前进。由兆丰路向汇山码头前进，中途必须冲破唐山路和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口的日军防御工事。日军据守两旁4、5层的高楼进行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图三 汇山码头攻势 (1937.8.19-22)



俯射，并以坦克部队实施反冲击。212团1营冲至舟山路与华德路的交叉口时，也遭两旁高楼的日军猛烈射击，营长身负重伤，忍痛指挥作战。106旅旅长陈瑞河亲临指挥，也中弹负伤。宋希濂师长急调215团增援，继续猛攻。在日军的坦克与步兵的反击下，215团2营损失惨重，伤亡营长以下300余人。

215团的进攻受挫，216团跟上，以前仆后继之势冲过百老汇路，终于打到了汇山码头大门的外面。部队士气为之一振。然而，抵达汇山码头的部队，无法摧毁坚固的码头铁栅门，难以攻入码头。这时，该团团长率先攀登铁门，士兵相继跟进。侧面的日军以火炮猛烈轰击，216团遭到大量伤亡，遂奉令撤回。前线形成对峙局面。在第36师首次突击汇山码头稍后，第87师在右翼展开进攻，8月22日午后，攻占了日军据守的位于东熙华德路与杨树浦港交叉口的两个日商工厂：精版印刷厂和康泰面粉厂，拔除了沪东的敌方一大据点。据中方资料记载，在这一期间的进攻作战中，有大约200名日军后撤时进入租界而被英军缴械。然而，对日军核心据点公大纱厂的战斗，却屡攻不克，至22日仍呈现胶着状态。日军将来赖以作战的地面机场就在公大纱厂内，中国军队对公大纱厂的攻击屡屡不能得手，无疑给未来的战事造成了相当大的不利影响。

8月23日凌晨，36师经过整理再次发起突

击汇山码头之战。这一次战斗比前次更为激烈。《大公报》记者曾作过真实的报道：

“23日上午3时，我军以战车5辆为前导，步兵3个营跟进，分头向汇山码头突击。战车发其精锐之平射炮，连毁敌人机枪阵地数地。步兵尤为英勇，以血肉之躯，吸收其重机枪弹，向百老汇路敌阵猛攻，终将其枪手射杀。5时前确进汇山码头阵地，将该处敌人肃清。旋泊驻浦江敌舰，向我攻入部队猛轰。同时，百老汇路两端之敌，以杨树浦及北四川路为基地，向汇山码头两面反击，敌舰以烧夷弹射来，敌机投弹。我战车2辆被毁，连长2名阵亡，步兵一营生还者仅几十人。”

这次突击汇山码头之战，功败垂成，最后在日军猛烈炮火下，又被迫退回唐山路一带。

在中国军队连日来勇猛突击之下，日军连日失利，左右两翼阵线已濒临被切断，主力龟缩至陆战队司令部和公大纱厂等几个据点之内，困守待援。虹口狄斯威路一带之敌，已陷绝境。杨树浦之敌，在极度恐慌下在街道上放火，企图阻挡中国军队进攻。百老汇路、公平路、兆丰路等处大火冲天而起，烟头相接，长度达于数里，从20日延烧至23日为止，3天而未熄。

这一阶段的淞沪战场上，第9集团军担负主攻的任务，进击虹口和杨树浦之敌，第8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集团军则执行警备浦东和浦西苏州河以南地区，并策应张治中部作战。

8月14日，第8集团军以第57师337团和炮兵第2旅2团的1个营，由炮兵旅长蔡忠笏指挥，从上海龙华一带出动，横渡黄浦江，扫荡浦东之敌。日军在浦东建有若干军事据点，主要有日华纱厂、日清公司、邮船会社、新三井码头和老三井码头等5处，为海军的粮库、煤库、弹药库和材料库，每处都设有碉堡驻守。当日，337团和炮兵营发起进攻，将日军驱压至三井码头和日华纱厂，残敌依靠舰艇支援，盘踞顽抗。日军其他据点悉被攻下，煤油库被摧毁，燃烧3天3夜。8月15日以后，第55师和第57师一部陆续渡江进入浦东，警戒白龙港一带海岸。8月20日，张发奎为协同杨树浦方面对日军的进攻，下令进击新三井码头及其附近之日军。55师的337团和炮兵营于21日午夜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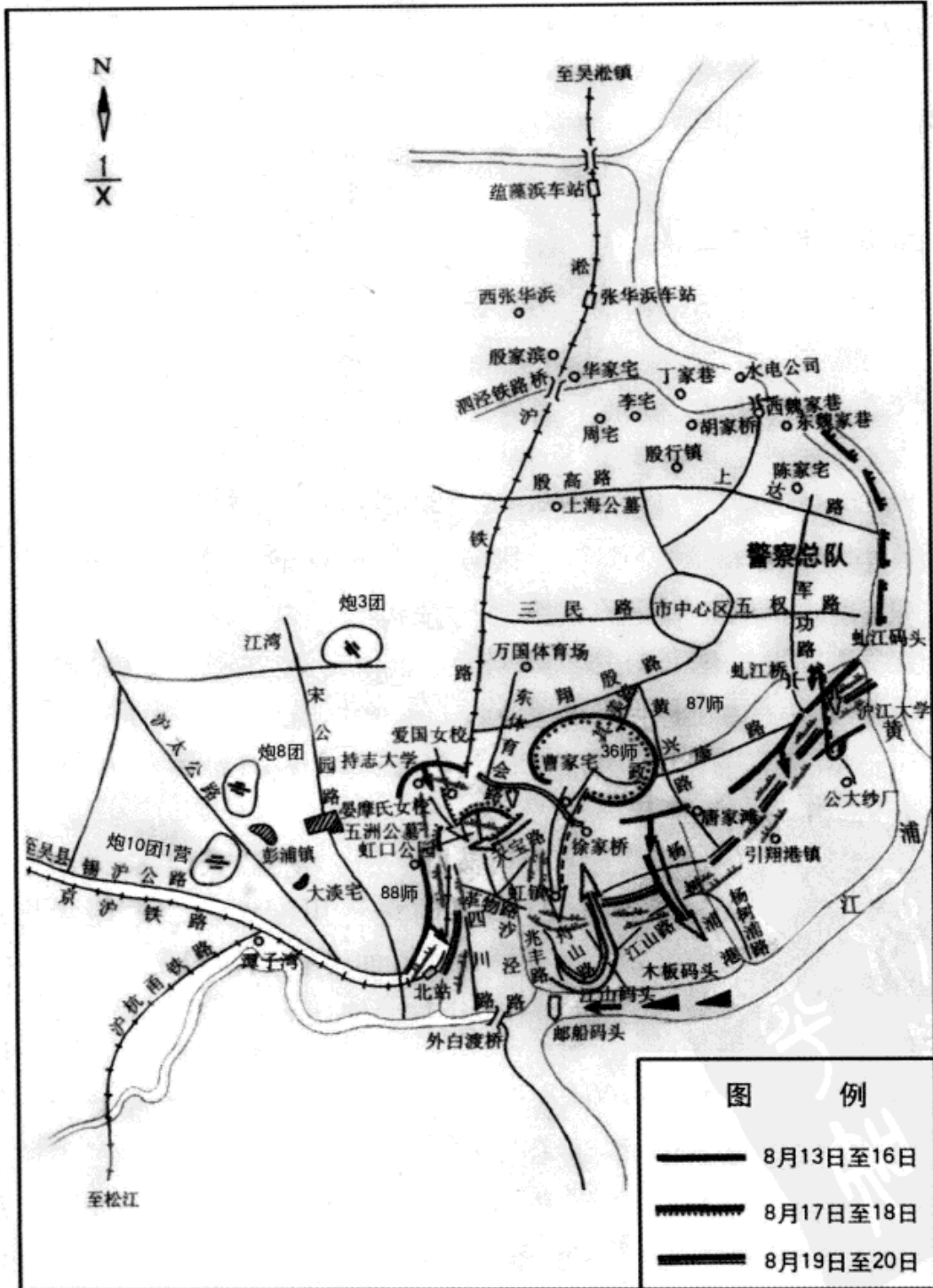
起战斗，22日凌晨4时，将该地攻占，残敌退往浦江上之日舰。此外，在浦东长江口沿岸，第57师和55师1个团进入守备。在柘林、南桥、闵行之线，由55师主力构工警戒。金山卫至海宁一带杭州湾北岸，不久由新开来的第28军等部担任守卫。

从8月14日到8月23日的十天时间里，中国军队以4个精锐师的兵力向日军发动连续攻击，到23日，中国军队终于接近于完成对日军防御体系的割裂。日军虽然兵力还不少，抵抗也依然顽强凶猛，不过疲态已显，中国官兵们终于第一次看到了进攻作战的胜利曙光。如果能够再有一段时间，再投入几个师的地面部队，中国军队或许真的可以打出近现代史上少有的一次对列强军队的大歼灭战。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天也是整个上海大会战期间，中国军队最接近于胜利的一瞬。



■ 日本陆军投入淞沪战场，意味着战役将进一步扩大。

图四 淞沪会战攻势作战时期中国军队
进攻日海军陆战队经过要图
(1937年8月13-22日)



在这之后，中日两军投入的部队越来越多，仗越打越大，中国军队却将不得不由主动出击转变为被动应战，胜利离中国将士们越来越远了。改变了战场天平的事件发生在8月22日至23日，就在这一天多时间里，日本陆军终于投入到了上海战场。

血肉磨坊之罗店、宝山、月浦

早在上海战事打响前，日本陆军当局就已经定下了出兵的决心。大山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这位被公认为日本海军内部的“良知派”就向陆军当局提出了出兵的请求。经过考虑后，8月12日，日本陆军定下了以第3和第11师团编成1个军，投入到上海战场的方案，并决心动员兵员30万人，军马8.7万匹。顺便提一下，海军所谓的“良知派”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决心扩大上海战事，不久以后，另一位著名的“良知派”海军大将井上成美在担任中国派遣舰队参谋长期间，不遗余力地积极推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不过若干年后，日本国民对于“无差别轰炸”却变得谈虎色变深恶痛绝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不知当日后美军B-29轰炸机在东京上空降下火雨时，井上成美该作何感想？反倒是九一八事变的首席祸首石原莞尔陆军中将坚决反对扩大上海战事。对于那个时代的日本军政人物的良知到底是怎



■ 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

样的概念，似乎还真是有些值得推敲的地方。

8月14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向第3、第11、第14师团下达了动员令。算起来，从7月11日开始，这已经是日本陆军第四次动员了。8月15日，下达了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已经退出现役的陆军大将松井石根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新编成的上海派遣军首批部队由第3、11师团和独立飞行第6中队组成，并配备有坦

克、炮兵、工兵、辎重、骑兵等特种部队。8月16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上海派遣军作战要点》，规定其作战任务是：“以1个精锐师团在浏河镇、川沙河口地区登陆，以主力在吴淞方面登陆，击败当面之敌人，尔后占领上海及其北面的重要地带。”具体来说，

“以第11师团的主力从浏河镇方面登陆，以第3师团及军直属部队在吴淞方面登陆，歼灭上海周围之敌。”随后，上海派遣军应“占领上海及北面重要地带”。

8月17日，松井以即将出征的新任军司令官的身份拜谒了裕仁天皇。裕仁向松井赐予敕语，并就派遣军的作战方针问题询问松井石根，松井作了回答。裕仁天皇在侵华战争中扮演的角色由此可见一斑。

8月18日，第11师团紧急动员完毕，第3师团的动员大约完成了一半。据此，日军决定把这2个师团的现有部队分成两批由海军舰艇运往上海战场。18日，第3师团先遣队约1个大队的兵力从热田港起运，次日，师团主力起运。20日和21日，第11师团分成两个批次从多渡津起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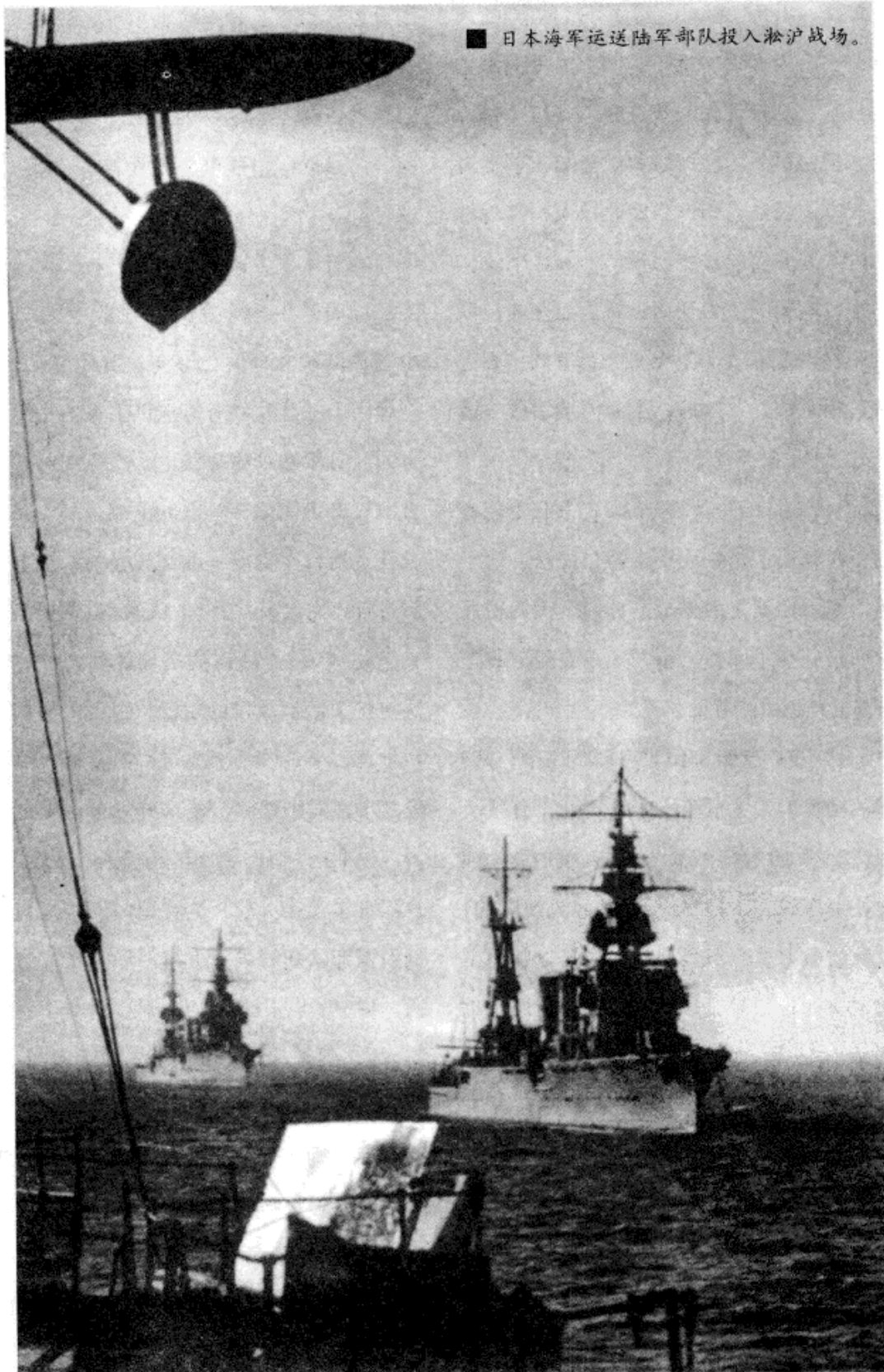
22日，松井石根本人乘舰到达马鞍群岛与部队主力会合。松井石根在这里发布登陆作战和进攻上海市区以北地带的命令，规定于23日黎明起开始登陆，第11师团从宝山川沙口上陆，攻向罗店，然后进袭嘉定，第3师团在吴淞上陆，占领吴淞一带后，向大场方

面进攻。当夜，日军换乘小艇，分别驶向各登陆点江面。日军为掩护登陆部队上陆，摧毁陆上障碍，在8月21日和22日，以舰艇约30艘，向吴淞、川沙口、浏河等地沿岸进行持续炮击。

在日本军方调兵遣将准备在上海大打出手的同时，中国军方也没闲着。8月15日，中国最高统帅部就已经知道日军新动员了3个师团，并且非常有可能以上海为主要作战方向。日军在具体战法上，最高统帅部判断日军极有可能循第一次淞沪战争的老路，自长江浏河口至吴淞一线实施登陆，从上海左翼进行迂回包围。为此，最高统帅部在8月20日下达《第3战区作战指导计划》等命令，决定扩大淞沪战役的规模，保卫上海和京沪杭地区，最高统帅部决定，抽调第15集团军等部增援淞沪前线，集结的方向主要是上海市区以北的宝山、嘉定、浏河等地区准备与登陆日军实施决战。从8月20日至9月初，大批新调部队陆续进抵上海战场。在黄浦江以西，集中了以下部队：第1师，师长李铁军；第6师，师长周岳；第11师，师长彭善；第14师，师长霍揆彰；第51师，师长王耀武；第56师，师长刘和鼎；第58师，师长俞济时；第61师，师长杨步飞；第67师，师长李树森；第78师，师长李文；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独立第37旅，旅长陈德法；以及炮兵第16团等。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上面列举的各部队中，第1和第78师系由胡宗南担任过师长的第1师扩编而来，为中央嫡系的起家部队之一。第11、14、67师则是陈诚的土木系的基本部队，陈诚本人就曾经担任第11和第14师的师长。其中第11师又是土木系的起家部队。该师素以内部坚强能打硬仗闻名，在中原大战中屡有表现。第51师和第58师此时的名声还不算很响亮，不过在不久以后，由这2个师再加上第57师合编而成的第74军却成为中国军队最为骁勇善战和极

富传奇色彩的精锐主力之一。而桂永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更是全军的样板部队，装备训练冠绝全军。总的来说，最高统帅部这一次抽调的大多是中央嫡系中的富有战斗经验的精锐部队，而且全部在战前完成了整编。蒋介石这一次是下决心要把上海战役彻底玩大。

从8月23日中国军队开始进行抗登陆作战起，除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继续卫戍浦东地区外，在黄浦江以西，逐步形成两个战场。



■ 中国军队也在源源不断投入淞沪战场。

蕴藻浜以南地区，第9集团军张治中部主力继续向虹口、杨树浦之敌施加压力，并在张华浜、南泗塘河地区抗击登陆之敌。蕴藻浜以北地区，以陈诚统率的第15集团军为主力，沿江阻击日军第3、第11师团上陆部队。

8月23日下午，陈诚向蒋介石提出关于淞沪作战部署的5项计划，其要点是：1.淞沪围攻军由张治中指挥，仍继续对虹口、杨树浦之敌实行攻击，同时在原攻击阵地作固守准备；2.第18军之第11师之一部、第14、第56师一部由陈诚直接指挥，担任对长江南岸沿江已登陆之敌的歼击战；3.第11师主力、第67师、第98师、炮兵第16团，由18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对狮子林、川沙口登陆之敌进行阻击；4.第56师、第14师一部，由第39军军长刘和鼎指挥，协助陈诚所部作战，并担任浏河口以西沿江要点之守备，阻击敌之登陆；5.第6师、第51师于苏州东西一带待命，为总预备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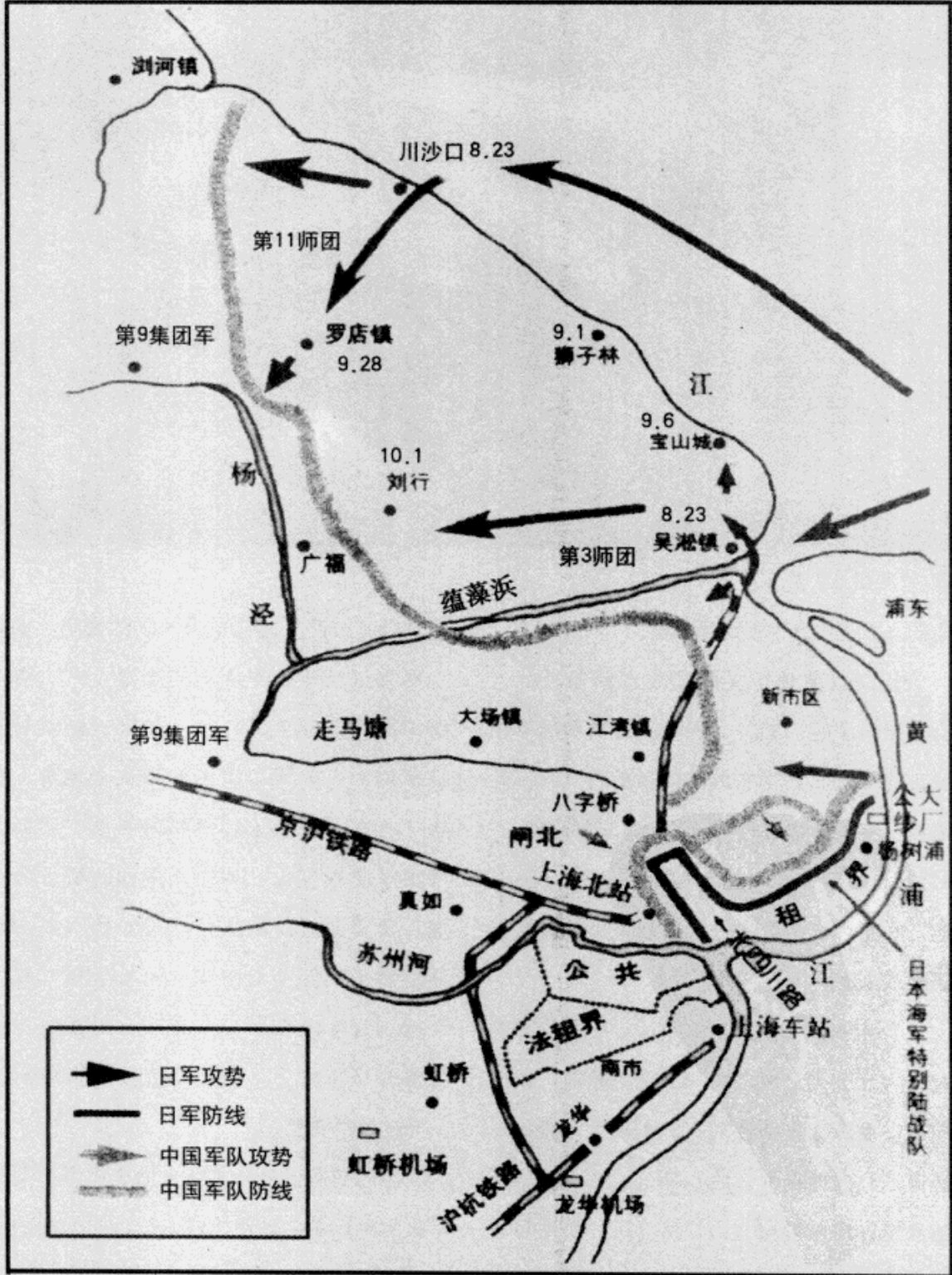
对陈诚的战役构想，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第一，张治中的第9集团军对上海日本驻军的攻击已经宣告失败。尽管双方的战事还在继续，不过在规模更大的日军集团已经登陆成功之后，中国方面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抽调更多更强的部队用于进攻作战，以第9集团军现有兵力歼灭驻沪日军基本上已无可能。上海市区的作战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牵制作战。张治中所指挥的第9集团军的核

心任务已经从进攻转为防御。第二，中日两国海上实力差距实在太过悬殊，中国军方完全不具备在海上阻止日军登陆作战的可能，中国军队只能依靠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的陆军，在陆地上节节阻击，尽可能地迫使日军大出血，为以后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到此时，淞沪大会战的重心已经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沿江抗登陆作战。

8月23日零时，日军第11师团到达了川沙河口，5时许在川沙镇（今属宝山县）北面地区强行登陆成功，并巩固了登陆场。当地的中国守军只有区区1个连，在压倒优势的日军面前，根本无力作出有效抵抗，很快便大部伤亡，被日军轻易击溃。至23日午后，川沙镇及其周围地区沦入敌手。日军第11师团主力上陆后，以一部兵力向宝山、浏河两个方面进行警戒，主力则指向罗店镇。

与此同时，日军第3师团也开始在吴淞镇南的张华浜登陆。第3师团的前卫部队由海军的第1特别陆战队和步兵1个中队组成。日军登陆兵在驱逐舰的掩护下，利用夜暗条件的掩护向吴淞镇以南的张华浜进发。在驱逐舰炮火对登陆地点的吴淞码头一带进行炮击之后，这支登陆掩护队在吴淞镇南不足两公里的铁路码头一带上岸。随之第3师团主力由此处登陆，向以南的船坞、海关码头一带发起进攻。因登陆中和登陆后连续遭到守军的抵抗，经23日一天的陆上激战到傍晚在海空火

图五 反登陆及罗店之战 (1937. 8. 23—9月底)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 日军在川沙登陆。

力的支援下推进了不到两公里。

宝山县城位于吴淞之北，紧邻长江，有公路与罗店、刘行、杨行、月浦和吴淞相联，为第15集团军右翼的防御重点。日军登陆前，宝山县城内的守军仅有第56师2个连。8月23日午后，日军突袭宝山城，守军猝不及防，在仓促应战后，被迫撤出城外，转移至杨行以东地区。

罗店镇位于沪太公路中段，居淞沪之侧背，为江苏与上海之间一个交通枢纽。罗店向南，循沪太公路经刘行、大场，可直趋上海市区；向西循罗（店）嘉（定）公路，直达嘉定；向东沿宝（山）罗（店）公路可直抵宝山。如果日军攻占罗店，则可以切断沪

太（仓）公路，直接危及大场的安全。如果日军再进一步由罗店进击嘉定，则上海前线中国军队的生命线——沪宁铁路就将被日军切断。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就意味着整个上海前线战事的崩溃。然而，中国军队在宝山、罗店周围的防御十分空虚。负责此线防御任务的第56师只以少量兵力用于沿江要点防御，而处于第二线的罗店则完全没有一兵一卒！宝山县城和罗店镇的迅速失守，使整个抗登陆作战面临极为危急的形势。

当时负责沿江防御任务的是由罗卓英任军长的第18军，如前所述，第18军为淞沪前线总指挥陈诚的起家部队，下辖第11、14、

67和98师均属中央嫡系主力，又大多经过战前的整理，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其中又以第11和第14师为最强。日军登陆时，18军所属各师除第98师已经在上海前线参加进攻作战以外，第14和第67师尚远在苏州、常熟和无锡，均不可能立即投入到反击宝山、罗店的战斗中。幸好第11师已经开进到宝山县境内，可以投入战斗。

22日晚，11师31旅进抵江湾镇以北之南陶家湾，33旅正在大场镇宿营。张治中获知宝山、罗店两地失守后，立即命令11师师长彭善率全师主力和炮兵第16团夺回罗店。第98师夏楚中部立即解除现有的攻击任务，归还第15集团军建制，参加反攻作战。军长罗

卓英在23日下午14时向11师发出收复罗店的命令。该师即以第33旅全部，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由大场经刘行向罗店急进。当日16时许，前锋部队进至罗店镇东南的长浜车站，经简单侦察后，立即发起进攻。第66团为突击部队，突入镇内，与日军展开巷战。盘踞罗店镇内的日军有近500人，因占领不久立足未稳，在66团的反击之下，阵线大乱，虽全力顽抗，然已全线动摇，伤亡不小。余敌败退至罗店镇北面陆家村一带村落。入夜后，66团乘胜进击陆家村，将占领该村日军逐退。

这是中日两军围绕罗店的第一次拉锯争夺战。张治中对第一次夺回罗店的战斗在



■ 刚刚登陆的日军就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23日夜，我冒着万分危险，从南翔赶到江湾。决定不顾任何困难，抽调11师、98师迎击登陆的敌人。那时由正面抽出这些部队真不容易，且因敌机狂炸、扫射，部队简直无法行动。11师师长彭善在初接到调动命令时对我说：‘简直炸得不能抬头，怎么办呢？’我说：‘不能抬头也得走，难道我能从南翔冒轰炸走到江湾，你们就不能从江湾走到罗店吗？’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局势下，抽调两师迎敌。由于这样一个迅速的部署，才把已经失去的罗店收复。”

罗店虽然失而复得，然而被逐出镇子的日军仍在罗店镇以北与11师一部处在对峙之中。而敌军登陆部队也在不断上陆，前方形势仍全线告急。24日早晨，罗卓英军长决定从当日晚上开始，“以广正面攻击登陆之敌，压迫于江岸而歼灭之”。命令98师由杨行出击，对杨行—宝山之线以左地区之敌进行攻击；11师由罗店出击，向新镇—月浦—狮子林之线以左的敌军发动进攻；67师以主力一部从嘉定东进，对罗店—聚源桥—东王庙之线以左地区之敌进攻。当晚罗卓英亲临罗店镇11师33旅旅部，召开各师师长、参谋长会议，部署作战事宜。

这时，第98师已经在8月24日悉数转移至杨行附近。上午，该师获悉从狮子林、张华浜等地上陆之敌，正向驻吴淞的上海市保安

团进攻，而宝山城也已被日军攻占。师长夏楚中鉴于吴淞、宝山两处之敌，对于上海市区和罗店方面两战场中国军队的侧背威胁甚大，遂决心不待规定的攻击时间的到来，独断先行，于当日上午9时下令发动进攻。下午17时，该师第294旅588团主力增援吴淞镇保安团，将一度攻入吴淞之敌逐至江边，并收复了吴淞镇。该团第3营于吴淞激战之际，乘敌未备，由八字桥向宝山城急袭。这时，据守宝山城的日军约为300人，立足未稳，经激战约1小时，即向狮子林逃窜。宝山城遂被中国军队收复。当晚，292旅583团一部由月浦向狮子林攻击前进，战至25日12时，狮子林亦告收复。

张华浜、吴淞镇的抗登陆作战，几乎是同宝山、罗店方面的战斗同时展开的。日军第3师团一部刚刚在张华浜铁路码头实施登陆，驻守在这里的上海市警察总队顽强抵抗，吴淞镇、张华浜一线的抗登陆作战打响了。

张华浜与吴淞镇夹蕴藻浜河口之南北，遥遥相对，东面是黄浦江与长江的交汇处，水道运输频繁快捷，为著名的水路咽喉。张华浜火车站始建于1898年，是淞沪铁路的终点站。从这里南下，由铁路可直通江湾、闸北，沿公路则直趋上海新市区和杨树浦。由此北上，可直接与宝山、杨行、月浦相连。蕴藻浜由西而东，在这里注入黄浦江，如沿

水路西进，则可直达南翔镇和嘉定城。在淞沪会战前期，这里是第9和第15集团军的结合部。松井石根的确是找到了中国军队的一个软肋。

8月23日上午，日军飞机和舰炮猛烈轰击了张华浜陆上阵地，掩护登陆部队继续上陆。日军先锋部队攻入张华浜火车站附近，直逼蕴藻浜。上海市警察总队兵力不足火力有限，在抵抗了一阵以后无力再战而退却。接着，日军第3师团主力在这里陆续登陆，向西南方向的泗塘河一线攻击前进。为确保张华浜的安全，第15集团军司令张治中决定抽

调兵力增援。然而他手里的预备队第98师已经投入罗店和宝山方面的作战，张治中只好下令调暂归87师指挥的第11师31旅，以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2团急赴张华浜参战。

31旅于23日上午抵达张华浜车站。这时，原来守卫该处的警察总队已在日军重压下被迫后退。31旅先头部队62团3营立即投入战斗，冒着日军海空火力，与日军反复争夺，伤亡惨重，被迫退回张华浜车站附近占领阵地，继续拼死抵抗。正危急间，62团团

长余子温率领该团1营、2营赶到。在余团长的指挥下，62团官兵冒着日军的猛烈海空火力奋力进攻。当日11时许，终于将进犯日军击退。下午15时，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1个团也赶到张华浜。参战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刚刚从南京开来的生力军，8月21日抵达上海江湾新市区待命。教导总队领受命令后，立即从上海新市区的集结地向张华浜方向奔袭。教导总队第2团的行军路线紧靠黄浦江，正好在江上日军舰艇的严密监视下。再加上这一带地势平坦，难



■ 日军飞机、军舰全力出动掩护地面部队作战。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 满载陆军部队的日军登陆舰艇编队。

以隐蔽前进。教导总队所属的第2团在赴援路上就遭到日军舰炮的拦阻射击，未到达战场就遭到严重伤亡。全团官兵冒着日军炮火奋勇前进，冲过日军炮火封锁线，于23日下午16时后进入泗塘河畔。官兵们不怕牺牲、奋勇冲杀，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21时。第二天，战斗更趋激烈，在日军舰炮和地面火力的轰击下，“全团官兵伤亡约近半数”，已难以继续坚持了。

当教导总队2团从泗塘河前线撤下之时，张治中已命令第36师和第87师各以1个团的

兵力组成突击集团，统一由第36师师长宋希濂指挥，前出泗塘河一线，于8月24日夜间和25日夜间向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连续进行反击，以恢复泗塘河之线的防御。突击集团凭借优势兵力，经过数次突击之后终于对进犯张华浜之敌形成合围。天亮后，日军以海空火力向中国军队猛袭，造成突击集团的严重伤亡，再无力将当面之敌彻底歼灭。战至此刻，两军在泗塘河以东一带阵地上形成对峙。至26日，从后方新调来的第61师到达前线。考虑到在当时的条件下，继续进攻除了

扩大伤亡以外很难有多大收获，张治中遂于次日作出决定：“以第87师、第61师、保安总团为左翼军，围攻张华浜之敌，并警戒虬江码头及固守。”实际上是稳定阵地徐图再举。同时，日军第3师团主力也把攻击的重点指向吴淞镇，暂时停止了对张华浜方面的攻势，张华浜战场战况转缓，暂时陷入胶着状态。

吴淞镇是日军第3师团的另一个重要目标，这里与张华浜仅一江之隔，有蕴藻浜大桥把两地连成一片。日军对吴淞的攻势，也是在8月23日开始的。在这一天，日军先以

十几艘舰艇的炮火向吴淞发起炮击，持续一个小时的猛烈炮击，将全镇轰得火光冲天硝烟弥漫。24日晨，日军第3师团一部开始在此登陆。驻守吴淞镇的上海市保安总团部队虽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轻装备的保安部队根本无法与拥有舰炮支援的日军主力师团相对抗。战至下午17时许，保安总团被迫退至三官堂站附近。看到局势危急，第98师当即派出294旅1个团前往增援。该团从吴淞镇西北方向发起反击，奋勇进攻。保安总团的士气也为之一振。两部协同进攻，占领吴淞镇的日军不支，在海军炮火掩护下退至江边。中



■ 日军占领吴淞炮台。

国军队收复了吴淞镇。

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认为中国军队在吴淞镇的阵地对江上日军威胁严重，遂命令第11师团抽调第43联队主力（步兵2个大队，炮兵1个中队为基干）组成1个支队，由联队长浅见义臣大佐为支队长，转用于吴淞方面的进攻作战。27日，日军在张华浜再次发起攻势，张华浜终于落入敌手。日军在张华浜得手以后，第3师团以一部兵力突破蕴藻浜大桥，从张华浜过江攻击吴淞镇。上海市保安团竭力阻击，歼敌一部，但自身伤亡惨重，无力再战。当夜，第61师一部接防吴淞至炮台湾阵地。31日，日第3师团第68联队在飞机、舰艇的火力支援下，天亮前在吴淞、炮台湾之线实施登陆。至下午15时，吴淞镇轮渡码头阵地陷落，守军第61师的1个团遭严重伤亡，保安团1个团右翼被围，团长负伤。守军败退吴淞以西。吴淞镇遂被日军占领。同日，敌浅见支队占领了狮子林炮台。

吴淞镇第二次陷落后，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与第9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协商后决定立即实施反击。反击的任务交给了此时正集结于广福、刘行间的第6师。第6师于当晚出动，进抵自蕴藻浜经沈家宅、三官堂火药局至宝山城之线。可是，9月1日天明以后，日军舰炮和飞机猛烈轰击，使第6师遭到严重伤亡。9月2日至4日，该师与吴淞方面日

军反复争夺，终未攻下吴淞。9月5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称日军“以密集炮火向我三官堂火药局、北泗塘各路桥梁施行破坏，射击弹达千四五百发，继以步兵向我突击……火药局附近被敌机炸平，守兵一连殆尽。”第6师经数日战斗，部队伤亡减员相当严重，已无力恢复吴淞，不得不调往第二线进行休整。原守卫吴淞的保安总团已退据镇北方向，守卫炮台湾的1个连。在日军攻击下，战至9月2日，全连只生还一人，炮台湾也陷于敌手。至此，收复吴淞之战以失败而告终。

从8月24日至9月1日的一个星期时间里，中国军队奋勇冲杀，前仆后继，与登陆的日军展开了反复的拼杀。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军迅速向内陆推进的势头。可是，参战各部队从远道赶来，仓促应战，既来不及构筑有效的防御工事体系，又缺乏后勤保障。空有优势兵力，但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上却难以形成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反攻作战屡屡受挫。尤其是日军的舰炮和空军的攻击，给中国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伤亡、疲惫和饥饿有增无减，导致战斗力日益下降。然而，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激励和鼓舞下，广大官兵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旺盛的士气，继续拼搏。

经过双方的反复争夺，到1937年8月底前，中国军队在蕴藻浜以北、长江南岸的吴淞、宝山、月浦、杨行4点之间，构成一个菱形防御地带。整个中国守军就以坚守上述四

个要点作为阻击作战的重心。这个菱形四边形的右侧，是吴淞—宝山一线，阻击日军第3师团之西进；四边形的左侧是月浦—杨行一线，在这条线上，中国军队阻击日军第11师团南下。宝山—月浦一线为防御的正面，抗击从川沙口上陆南下的日军部队。而罗店至刘行一线，则是这个菱形防御地带后面藉以依托的基轴，是作战形势转换的重要枢纽。以后一个时期，两军的大规模激战就将围绕着这四个点展开。

淞沪战场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这里地势平坦水网纵横，地近长江口，土质疏松，缺少守军用作依托的制高点。守军仓促上阵，连像样的工事也来不及构建，几乎全

凭血肉之躯和简陋的步兵装备，步步为营，阻挡敌阵。日军则凭借其坚船利炮和掌握着制空权，每每在进攻前，先以舰炮、空袭夷平守军阵地，再掩护步兵发起冲锋。中国军队的第一线上阵的部队，往往整连、整营地战死沙场，然后增援部队再冒死进入火线，反击敌军。双方短兵相接，反复交锋，许多村落无不经过多次争夺，常常白天被日军攻下，夜晚一到，中国军队发动反击夺回，第二天敌军又来进攻。中国各部队在敌之优势火力下，无不伤亡惨重。电影《血战台儿庄》中，借胡宗南之口抱怨一个师拉上战场往往几天就残废了，这就是此时淞沪战场的真实写照。



■ 日军登陆后向纵深推进。

罗店争夺战

登陆日军经过激战后终于在沿江地段上站稳了脚跟，从张华浜到吴淞镇、狮子林、石洞口、川沙口一带以西的狭长地带建立了登陆场，并分兵向宝山城、月浦镇、新镇、罗店镇攻击前进，企图迅速袭取上述各要点，把占领地从沿江地带向内陆扩展。

中国军队在积极抽调部队向张华浜、吴淞镇反击的同时，为遏制日军的攻势，以第98师防守宝山至月浦镇之线，第11师据守新镇以西至罗店镇之线，第67师固守罗店镇以及周家宅之线，第61师控制于刘家行地区待命，第14师除以2个团分别守备福山镇和浏河镇之外，以主力集结于嘉定。

8月25日，第11师和第67师首先发起战斗，向进犯罗店之敌进击。11师以33旅和31旅分别为左、右两翼，附以炮兵第16团，在马家宅附近进入阵地，逐次向五斗泾、新镇、月浦之线推进，力图将敌驱压于江岸而歼灭之。25日3时30分，11师各部开始行动，推进到了月浦、周宅一线，33旅以一部向狮子林炮台和石洞口搜索前进，师预备队和炮兵推进至新镇附近。当日上午7时许，日军一部在新镇向第31旅发动进攻。日军来势凶猛，双方展开激战。第33旅闻讯赶来参加战斗。开始，日军将31旅62团包围，61团又将

日军予以反包围。自上午8时至10时，“双方白刃格斗，反复冲杀，互进互退，达七八次，情况严重达于极点”。中午，33旅以66团由月浦向西钱桥攻击敌之左侧背，65团向新镇转进，进行两面夹击，终于将日军击退。经此一战，第31旅伤亡非常惨重，再无力继续进攻，遂转为固守新镇附近之线。中日两军在这里打成对峙。

随后，李树森师长指挥下的第67师于同日接替11师罗店守备任务。为协同11师的战斗，该师一部向罗店聚源桥、东王庙一线以东，向急谋袭占罗店的日军发起进攻。25日凌晨3时，201旅展开于张家宅、钱宅、马家楼之线，向尤家楼方向进击前进，与占据陆家村、沈宅一带日军交火。在日军的火力拦阻下，全团连长以下军官伤亡过半，攻击受挫。上午9时许，日军向罗店以西进行包围，威胁守军左翼。201旅旅长蔡炳炎看到战况紧急，遂亲自率领199旅398团的1个营投入左翼方面的战斗。中国军队不顾伤亡，与日军反复展开白刃争夺，战况更趋激烈。两军战至上午11时许，日军已逼近罗嘉公路。激战中蔡旅长亲临一线指挥战斗，不幸中弹牺牲。

这时，398团主力也进入了罗店镇内，增强了罗店守卫力量。日军自身也因为伤亡惨重，无力进一步攻击，两军暂时相持于罗店以北地区。当夜，第67师199旅由浏河前来增援，占领施相公庙亘蒲家庙间阵地。

8月27日晚，罗卓英鉴于日军连日来攻势猛烈，其一部已在罗店以北越过马路塘南岸，占据周家宅、龚家宅等村落，威胁罗店镇之侧背，乃决定于当晚从月浦镇—新镇—罗店发起反击。第67师师长李树森率4个营冒着暴雨猛攻罗店以南日军。日军据墙垣顽抗，67师部队冒着火力冲锋，团附汪兆霖阵亡，进攻受阻。天明后，日军飞机扫射，炮火猛轰，李树森负伤，所部伤亡惨重，仍坚持至当晚，于次日撤往嘉定。67师反攻罗店遭到失败。

在67师在罗店镇外与日军展开激战的同时，第14师的79、83团在师长霍揆彰的率领下，由常熟经嘉定前出罗店正面。师参谋长郭汝瑰鉴于我军奔袭而来，敌并未发现，可乘其立足未稳、不察我方增援之际，进行突击，提出以1个团从西面直攻罗店正面，另1个团迂回敌之侧背进行夹击；由67师在罗店南面发起佯攻，牵制敌军。霍揆彰同意了这个建议，命令高魁元的83团由西向东攻击罗店正面，阙汉騫的79团进行迂回，67师亦协同作战。

14师反攻罗店之战打响后。83团前进至罗店镇西，不料却被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面上的一座桥被日军机枪火力严密封锁。面临这紧急关头，全团官兵毫无畏惧，冒着炽热的炮火冲向桥头。第83团虽数度向这座桥发起冲击，但因缺乏战斗经验，加之山炮

营尚未到达，没有炮兵支援，几百名士兵在桥头壮烈牺牲，进攻受挫。与此同时，79团迂回至罗店镇南，其第3营由长桥方面乘虚突入镇内，日军措手不及，阵线大乱。第3营勇往直前，一举捣毁日军在罗店的指挥部，歼敌100余人，缴获服装和一批食物。然而，79团其余的2个营没能及时跟上，3营力量不足，也不敢贸然前进，遂隐蔽在一个竹林里。天亮后，3营被日军发现，随即遭到日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大部战死，营长负伤投河牺牲。8月30日，83团和79团撤回施相公庙亘曹王庙原阵地。第14师反攻罗店的作战也以失败告终。

罗店失陷，对南翔、嘉定和刘行形成严重威胁，南京统帅机关为挽救淞沪左翼之危局，竭力要求收复罗店。这时，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在淞沪战场进行考察后，也强烈要求收复罗店。8月29日，他在苏州向蒋介石提出一份报告，综合分析日军之企图，认为“敌之目标，为驱逐我军远离上海，截断我与政治、财政、经济策源中心之联络，且我方与上海之联络，军事上亦有莫大意义”。因此，他力主：“长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而要保住上海，“目前最要害地点莫如罗店。宜绝对在该处阻止敌人，使其不能犯刘行，更不能趋嘉定，稳固由南翔经嘉定至太仓之联络，极关重要”。蒋介石对这一建议甚为赞同。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第15集团军决心乘日军阵线未固，分兵进攻月浦、宝山、杨行之际，继续向罗店发动进攻，以夺回该镇。从9月1日起，第18军和第74军主力连续组织突击罗店之战。8月30日，陈诚发布《淞、沪、浏、嘉、宝附近围攻计划》，其中确定由11师、14师、67师、98师等部围攻罗店。9月上旬，争夺罗店之战在这里日夜不停地展开。

9月1日至5日，第18军乘日军攻势重点指向月浦之时，发起第3次反攻罗店的战斗，虽然未能收复罗店，但缩小了对该镇的包围圈。9月6日起，中国军队再次发起进攻，第四次反攻罗店。这次反攻战，除仍以18军各师为主攻部队外，又增调第51、第56、第58师参战。9月6日14时，陈诚发出进攻罗店的命令，要求从当晚起“确实包围罗店而占领之”。同日，蒋介石亦先后两次电示第15集团军，再三强调“罗店关系重要，须要限期攻下”。当天晚上至7日凌晨，第14师和第11师已完成对罗店镇的包围，罗卓英立即下令，由67师201旅出击，向罗店镇进攻。当该旅赶到金家宅、高家宅之线准备攻击时，天色渐明。白天的到来，对中国军队作战极为不利。在日军猛烈炮击下，201旅前进受阻，攻势陷于停顿。这时，由98师一部守卫的宝山城已在6日完全陷入敌手，日军已经全面打通了吴淞、狮子林、宝山之间的联系。至此，包围罗店的14师侧背反而受敌威胁，且该师

连日苦战，伤亡奇重，无力两面作战。18军军部不得不下令变更部署。第四次反攻罗店之战，在中途被迫结束。罗店争夺战归于彻底失败。

争夺罗店之战，是以“血肉磨坊”闻名于抗日战场。整个罗店地区地势平坦，缺少建立有效防御的制高点。而日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其火力优势，用侦察气球引导地面炮火准确轰击中国军队的阵地。

日复一日的罗店争夺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日军依靠技术装备的优势在白天攻击，中国军队就在夜里实施反击。中日两军的反复拉锯作战，活生生地把一座江南小



■ 第五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认为坚守罗店是战役的关键。



■ 在宝山地区的农田里与中国军队激战的日军。

镇打成了一座“血肉磨坊”。如此死拼，中国军队的第一流劲旅，最多也只能顶住五六天。如胡宗南部第1师，9月10日进入罗店、月浦间接防，由于轻敌，结果上阵不到1天，就几乎被打垮了。有的部队上去，更是一触即垮。撤下来换防时，1个师的兵力只剩下不足1个团，比比皆是，有的团甚至只能缩成为1个连。部队伤亡之惨重，由此可以想见。然而，在如此惨烈的战斗下，不管伤亡何等惨重，参战部队的士气始终是高昂不衰的。爱

国精神在这里显示出了无比强大的威力。

宝山争夺战

日军在石洞口、川沙口和张华浜方面登陆成功，攻占罗店、吴淞后，即企图夺占宝山、直趋月浦，先打通吴淞、罗店间联系，然后进窥南翔、嘉定。8月底9月初，日海军舰只麇集于宝山、狮子林一带江面，飞机不断进行侦察和轰炸，袭占宝山的意图昭然若

揭。中国军队担负宝山、月浦一带守卫的是第98师。该师583团以第3营守备宝山城，主力集结于月浦镇；588团以1个连守备狮子林炮台，主力控置于宝山、狮子林、月浦之间。其余2个团分布在罗店以东一带。

8月31日拂晓开始，日军飞机向狮子林炮台一带守军阵地狂轰滥炸，江面上的日舰则猛烈轰击沿岸阵地。次日上午9时，日舰20余艘、飞机10余架对狮子林、月浦阵地实施集中轰炸。半小时后，日军千余人在烟幕掩护下登陆狮子林。守卫该地的1个连在日军陆海空火力的攻击下伤亡殆尽。588团增援部队分两批出击，反复激战达4小时之久，亦遭严重伤亡，未能挽回战局。至9月1日下午14时许，日军浅见支队占领了狮子林炮台。

日军占领狮子林之后，即与从吴淞方面调来的部队合力向伍家宅、柯宅猛扑。9月2日，588团和583团在这一带与进犯日军展开激战，自拂晓至夜幕降临，战斗仍未停止。当晚22时后，守军退往月浦、新镇以及罗店以东。9月3日拂晓，日军向98师在杨家桥、月浦间阵地全线进攻。日军先以猛烈炮火轰击守军在杨家桥和顾三房的阵地，然后步兵发动猛攻。顾三房阵地首先被日军突破，588团3营与突入日军激战3个小时，大部伤亡。587团以1个连的兵力前来增援，亦伤亡过半。至当日黄昏，守军被迫转移顾家宅、周家宅。

9月5日，日军为打通吴淞与狮子林之间交通，倾全力猛攻。这天攻击的重点，是在宝山城南面。上午日军以30余辆坦克作为突击力量，沿军工路向中国第6师三官堂一带阵地猛冲。宝山城南面的三官堂，地处宝山、月浦、杨行、吴淞4点之中心，北枕宝山城西南，西北和西南各通月浦、杨行，为交通要点。9月2日起，日军进攻三官堂，并强渡泗塘河，被守军击退。3日至4日，日军连续向三官堂一带进犯。第6师18旅奋勇阻击，18旅伤亡甚众，旅长翁国华和团长朱福星负伤。5日晨，日军分由吴淞、张华浜和沙龙口夹击宝山至三官堂阵地。第6师腹背受敌，火药局守军全部牺牲，第17旅旅长丁友松以下伤亡过半，相持至午后，该师退守泗塘河。日军越过泗塘河桥向西侵犯，于是，狮子林、吴淞间联系通道被日军打通，而宝山城的守军由此陷入重围。

日军攻击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宝山城。以姚子青为营长的98师583团3营，自8月24日进驻宝山城以后，日夜加固城防工事和防空掩蔽部，储备粮弹，进行战斗动员，枕戈以待。姚子青率全营立下誓言：“日军强盗是我们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我们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宁愿死在战场，决不偷生做亡国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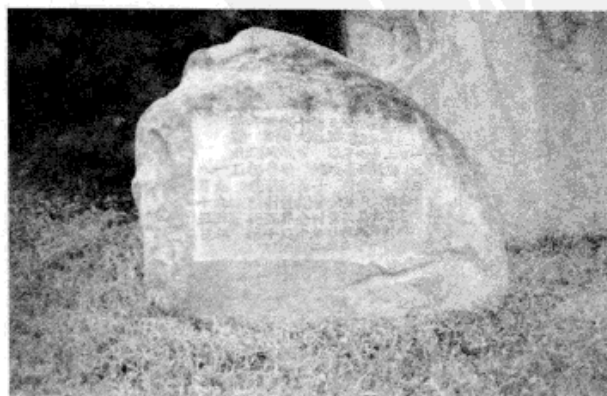
9月5日中午，日军对宝山城发起进攻。日空军战机10余架轮番扫射投弹，舰炮同时

向宝山城猛烈轰击，城内10多处起火燃烧。至下午13时，日军地面部队以坦克10余辆、步兵近千人，直扑宝山城，妄图一鼓而下。98师294旅旅长方靖闻报后，令姚子青将城郊部队收缩至城边，集中兵力抗击日军进攻，同时急调587团的1个营奔赴宝山增援。姚子青营主力在宝山城外与进攻之敌奋战达2个小时，城郊阵地全被夷为一片平地。至午后15时后，东北方向之敌已近城门，并分兵向西门和南门实行迂回包围，城外守军遂撤入城内死守。587团在增援宝山途中，由于遭到日军飞机的空袭，行军大受延误。

战至5日下午15时许，日军已将宝山城四面包围。姚子青营在孤军无援之下，准备与敌展开巷战。是夜，姚子青先后向师长夏楚中发出2份报告。头一份报告再次表达了全营誓死为国献身的决心：“职等誓本与敌偕亡之旨，固守城垣，一息尚存，奋斗到底。”另一份除表示战斗到底的决心外，还提出了派兵增援的要求：

“职营官兵均抱与敌偕亡之决心，惟孤城无援，日久难支，恐人城俱亡于大局无补，仍恳速援解围。”师部虽在复电中告以第1军已到达杨行，正向宝山急进之中，然而在事实上，宝山城当时已被日军

- (上) 98师583团3营营长姚子青。
- (中) 姚子青营殉国纪念碑。
- (下) 姚子青营殉国纪念碑。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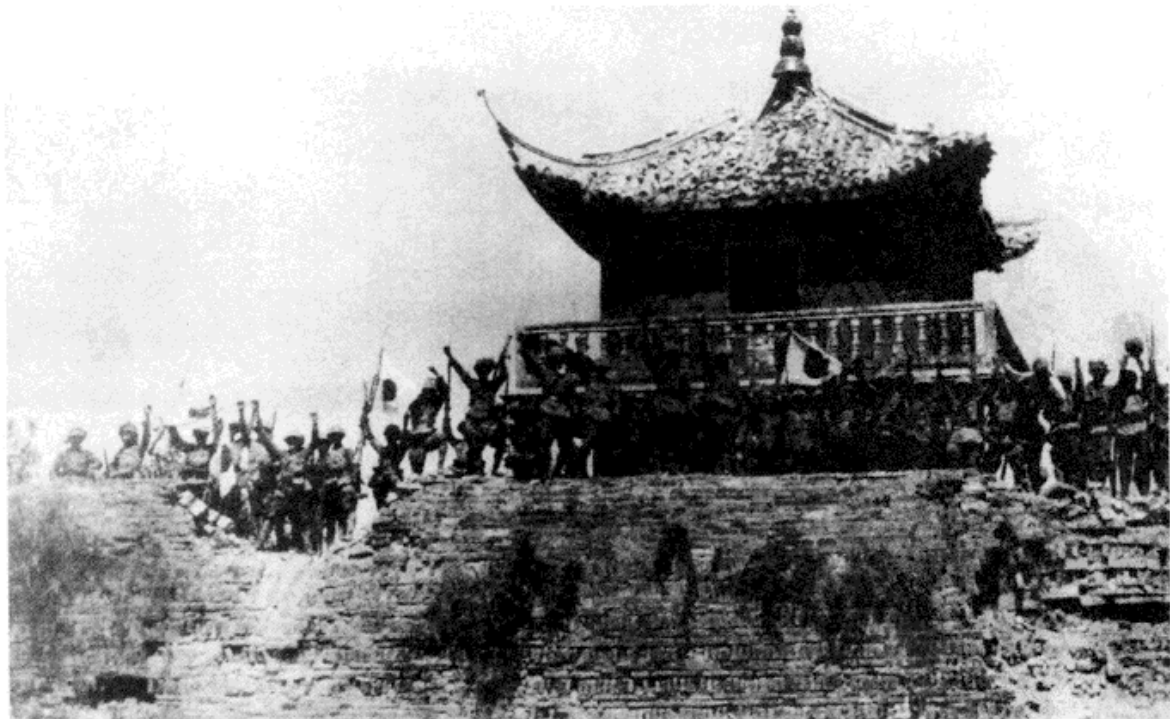
四面隔绝，难以赴援了。

6日天亮后，日军向城内施放硫磺弹，满城火光冲天。日军以坦克堵塞四门，接着步兵冲入城内。姚子青营在一片硝烟中，与攻入城内的日军展开巷战。在最后的拼搏中，仅城内金家巷一地，被姚营击毙的日军就有200余人。在数小时的最惨烈的血战中，营长姚子青在东门阵亡，全营官兵，除二等兵魏建臣1人乘隙越城得以生还外，全部壮烈殉国。当天上午10时，宝山城终于陷落。当旅长方靖获悉宝山城陷落，第3营全部战死，热泪不禁滚滚而下，悲痛万分地说：“第3营官兵全部牺牲了，真正为国效忠，可歌可泣！”

日军在9月6日攻陷宝山，打通张华浜、吴淞、狮子林之间的联系后，遂沿宝（山）

罗（店）公路西犯，月浦成为其主攻的目标。这时，罗店方面的中国第11、第14、第51师等各部，正倾注全力于攻击罗店的战斗。月浦方面守军兵力不足，98师自宝山失陷后，又遭到来自吴淞方面日军的进攻。6日下午，已越过北泗塘河的日军继续西犯，威胁98师的侧背。该师乃转移阵地于月浦以东、马路河北岸一带至月浦新镇豆顾家角之线。9月7日以后，日军新到的部队陆续在宝山、狮子林、石洞口登陆，矛头集中指向月浦镇，企图实现其打通吴淞与罗店间联系的计划。

日军进攻月浦的战斗于9月9日开始。这天，日军地面部队在空军和舰炮的掩护下，向月浦附近猛攻，战况激烈。日军第11师团



■ 日军占领宝山城后在城楼上欢呼。

天谷支队会同浅见支队连连发动攻势。第98师坚守月浦镇及其东南方各村，左侧与第1师阵地相联结。2个师并肩战斗，顽强抵击，整日血战不停。9月10日上午，日军海军舰艇从石洞口、狮子林、宝山三方面向月浦进行密集轰击，同时坦克8辆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向月浦以东孙宅、周宅98师588团阵地冲击。周宅失而复得3次。当周宅第二次失守时，588团团长沙集合仅留在团部的少量部队及勤务人员前往增援阻击，虽伤亡重大，终将阵地收复。当日16时，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周宅阵地又濒危险。师部又调584团全力发起反冲击，终于将日军击退。同日，日军对月浦镇北端也发动多次冲击。守军583团奋力抵抗，团长路景荣、团附李馨远先后阵亡。

月浦保卫战，是阵地战的一个突出例证。当年月浦战斗的亲历者，时任第98师294旅旅长的方靖将军在几十年后写的回忆文章读起来仍然是字字血泪：日军“利用海军炮击我阵地，每分钟发射炮弹百余，并用系留气球升空观测，命中相当准确。敌步兵前进缓慢，每进一小段必构筑机枪掩体工事。”中国第98师部队对敌之步炮空联合作战“……则以步枪、机枪、迫击炮应战。有时派出逆袭部队与敌激战，利用村落构成据点工事，逐村防守，约坚持一星期之久，所有村落阵地都被敌机敌炮击毁，我官兵伤亡很大，但士气旺盛”。

9月11日，日军对月浦发动总攻。这天拂晓开始，日军先以地面和江上的火炮进行猛烈轰击，月浦镇东端阵地工事悉被摧毁，守军伤亡累累，阵地遂被日军突破。守军退入镇内，与日军展开巷战。正当危急间，第14师79团的1个营，奉令赶来增援，中国军队内外夹击，终于将攻入镇内的日军逐出，夺回月浦。可是，因为日军的坦克和炮火异常猛烈，终难稳住阵地。月浦右侧至杨行间第1师的阵地，于同日15时被突破，其第3团后撤至杨行以南。至此，月浦镇守军侧翼暴露，已经很难继续坚持。11日深夜，经过6日6夜的血战之后，日军终于突破了在中国军队在月浦以东的防御体系，至此月浦和杨行两地均告陷落。

9月12日凌晨开始，第15集团军等部开始调整战线，构筑以刘行、广福为重点的防御阵线。至此，中国左翼作战集团抗登陆作战遂告结束，全军退守浏河、罗店以西、施相公庙、广福、南翔、蕴藻浜一线。

杨树浦沿江阻击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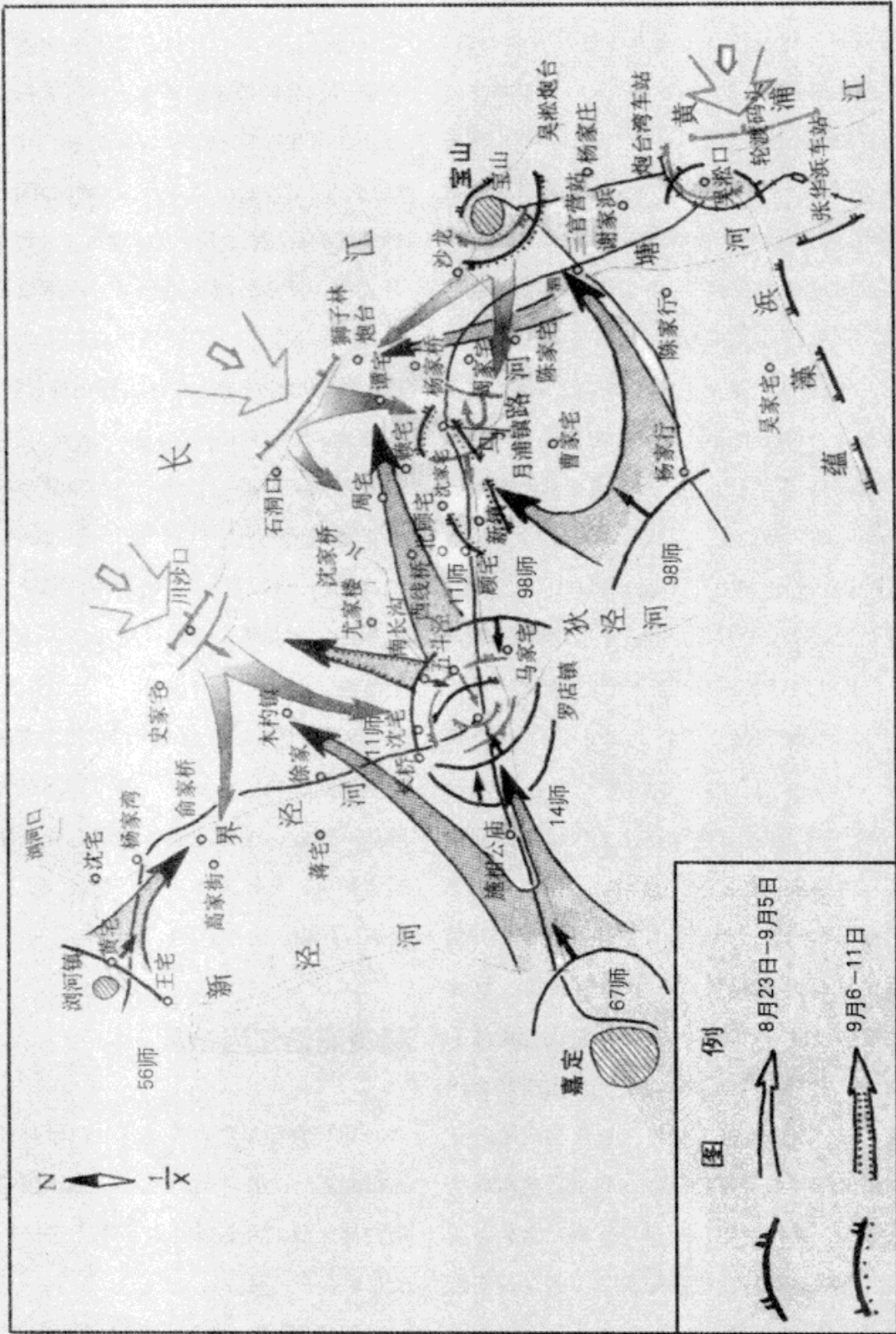
第15集团军等各部在长江南岸对日军浴血奋战之际，第9集团军主力继续围困虹口和杨树浦之敌，并在虬江口至军工路一带对登陆日军展开了阻击战。

8月23日夜，第36师和第87师各以2个团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图六 淞沪会战攻势作战时期中国军队抗击日“上海派遣军”登陆作战经过要图
(1937年8月23日-9月11日)





■ 日军在虬江码头及其附近地区实施登陆。

突击由张华浜上陆的日军，在杨树浦正面阵线只剩兵力4个团。当时，对杨树浦日本海军俱乐部屡攻不下，乃于8月24日夜撤出围攻部队，退至沿租界边缘路口固守。27日，张治中下令调整部署，以第88师和独立20旅的1个团为右翼军，位置于北站、横浜河、五卅公墓、爱国女校之线；以第36师和独立20旅另1个团为中央军，固守狄家浜、引翔港镇、沪江大学北端之线；以第87师和新到的第61师

以及保安总团为左翼军，阻击张华浜之敌，并警戒虬江码头，固守吴淞镇。

日军在罗店、宝山与中国军队展开激战之际，为牵制守军兵力，切断第9、第15集团军之间的联系，发动进攻上海江湾新市区之战。9月初，黄浦江上的日舰向杨树浦虬江口一带猛烈轰击，为虬江码头登陆进行炮火准备。一旦登陆成功，就可直接进攻江湾新市区，而攻占江湾新市区，一方面可以威胁江

湾，重振日军在沪东的攻势，另一方面则可以策应吴淞、张华浜一线日军，向蕴藻浜南岸推进。于是，新市区之争夺战遂在9月初以日军在虬江码头的登陆而揭开战幕。

9月5日和6日，日军在虬江码头及其两侧地区实施登陆。5日晚至6日晨，日军分数次冲击虬江码头，守卫码头的第61师所部在日军猛烈炮火下伤亡严重，无力抗击日军的登陆，虬江码头失守，守军残部退守史家宅、陆家宅之线。6日拂晓，日军以2个大队的兵力、在十余辆坦克的支援下，由公大纱厂、沪江大学向独立20旅虬江左岸阵地发动进攻。午后，日军又增兵千余人和坦克20余辆，在飞机和舰炮支援下扩大攻势，守军在炮兵掩护下殊死抗击，激战至晚，歼敌一部，双方呈相持状态。

第9集团军为加强虬江码头方面的兵力，将原驻守浦东的第57师转用于杨树浦。该师171旅342团于9月6日到达江湾新市区，随即担任五权路阵地的作战。当晚该团之一部乘夜攻击虬江码头之敌，但未能突破日军防线。

在此期间，日军为确保杨树浦公大纱厂内的野战机场不受中国地面部队的威胁，发动了对纱厂以北中国军队阵地的进攻。9月2日，日军第3师团后续部队1个联队在吴淞上陆，其一部包括步兵1个大队、坦克1个小队、炮兵1个中队，向军工路南段进犯，旨

在清除公大纱厂以北的中国军队。9月6日，战斗打响。36师奋力抗击，日军支队长坂田七郎少佐被击毙。不过日军的攻势未能被阻止。日军继续猛攻，进入军工路一线。9月8日起，日军飞机开始使用公大纱厂临时机场。

在虬江口方面，日军于9月7日由虬江码头向五权路方向进攻，到达军工路与五权路交叉口处。同时，日军一部猛攻王家宅、史家宅和观音堂路。独立20旅冯家宅阵线被日军攻破，守兵1个连大多阵亡。57师342团一部前来增援，经白刃肉搏，才将阵地恢复。次日，日军再次向观音堂路、五权路进攻。上午10时突破独立20旅军工路阵地，迫近张家宅。342团的2个连拼死阻击，全部阵亡。随后独立20旅以更多部队投入战斗，才将日军击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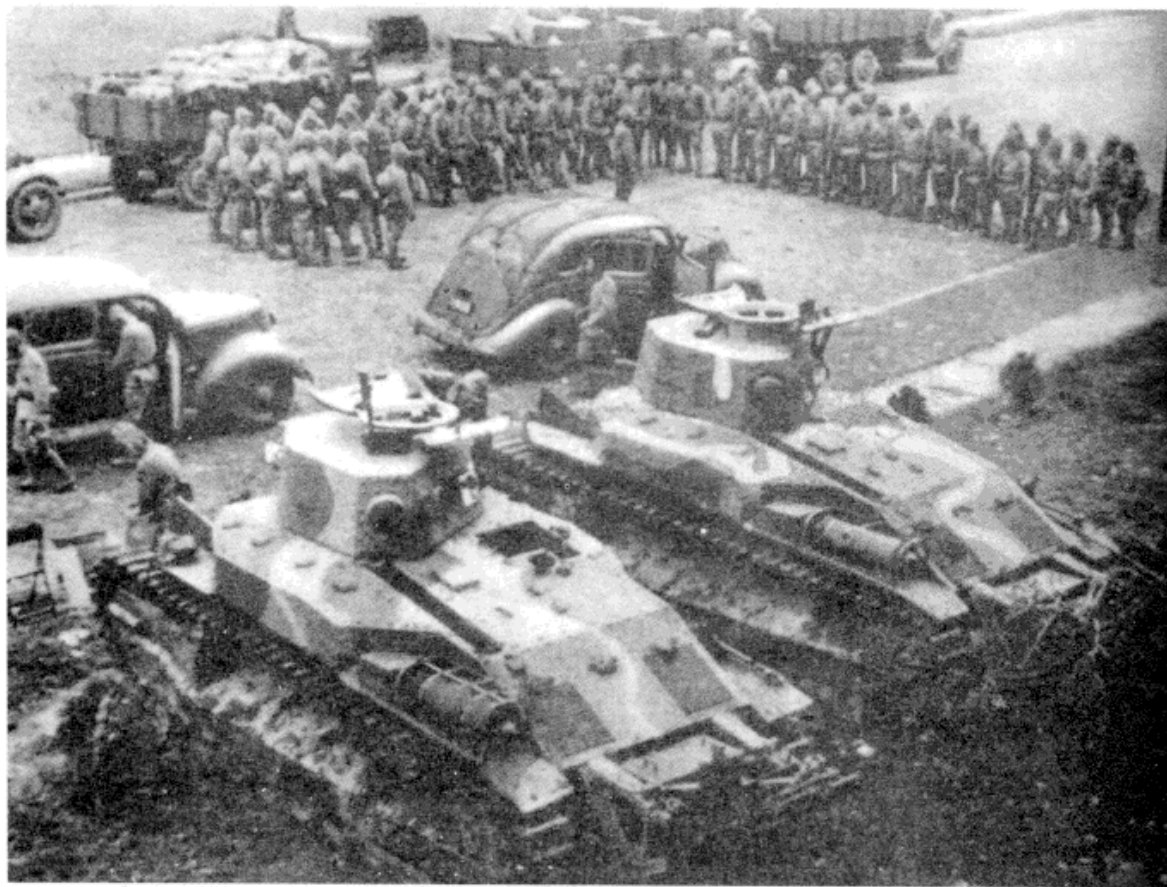
日军在虬江码头站稳脚跟后，由东向西，向军工路一线推进，矛头直指新市区。9月9日晨，日军飞机20余架、军舰20余艘，向军工路猛轰。8时，日军3000余人在烟幕下，攻击沈家巷、陆家宅的342团阵地，双方反复冲杀。直至中午，57师340团来援，始将阵地暂时稳定了下来。下午，日军再度发起进攻，守军伤亡惨重，战至黄昏，两军打成胶着状态。在这一天的战斗中，57师171旅共伤亡军官43人、士兵580余人。

战至9月11日，月浦、杨行继吴淞、宝

山之后终于陷落，江湾、庙行和新市区一带遂成为中国军队战线的突出部，侧背受蕴藻浜北岸日军的威胁。第9集团军奉令留置少许部队于原阵地，主力于11日夜后移至蕴藻浜、庙行、江湾、北站之线。此后，敌我双方在这一战线形成相当长一个时间的对峙状态。

中国军队9月上旬反攻罗店未获成功，张华浜、吴淞、宝山、月浦和杨行又陷于敌手，历时20天的抗登陆作战最后在节节后退中落下帷幕。9月11日，第9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退守北站、江湾、大场、刘行、罗店以

西、浏河镇一线。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由攻势作战转为守势作战。至此，日军占领了上述之线以东、南北约50公里、东西纵深约20公里的沿江地带，控制了长江口和黄浦江口，以及江岸各个码头和登陆场。登陆日军与据守市区杨树浦、虹口的日军，在军工路、新市区一带已打通联系，连成一气。随着滩头阵地的步步延伸，陆上容兵量日益扩大，后继兵团投入战场的条件和时机趋于成熟。这一切，预示着日军将以更大的规模投入新兵团和发动新攻势。



■ 日军后续兵团陆续投入淞沪战场。

第三章

血肉磨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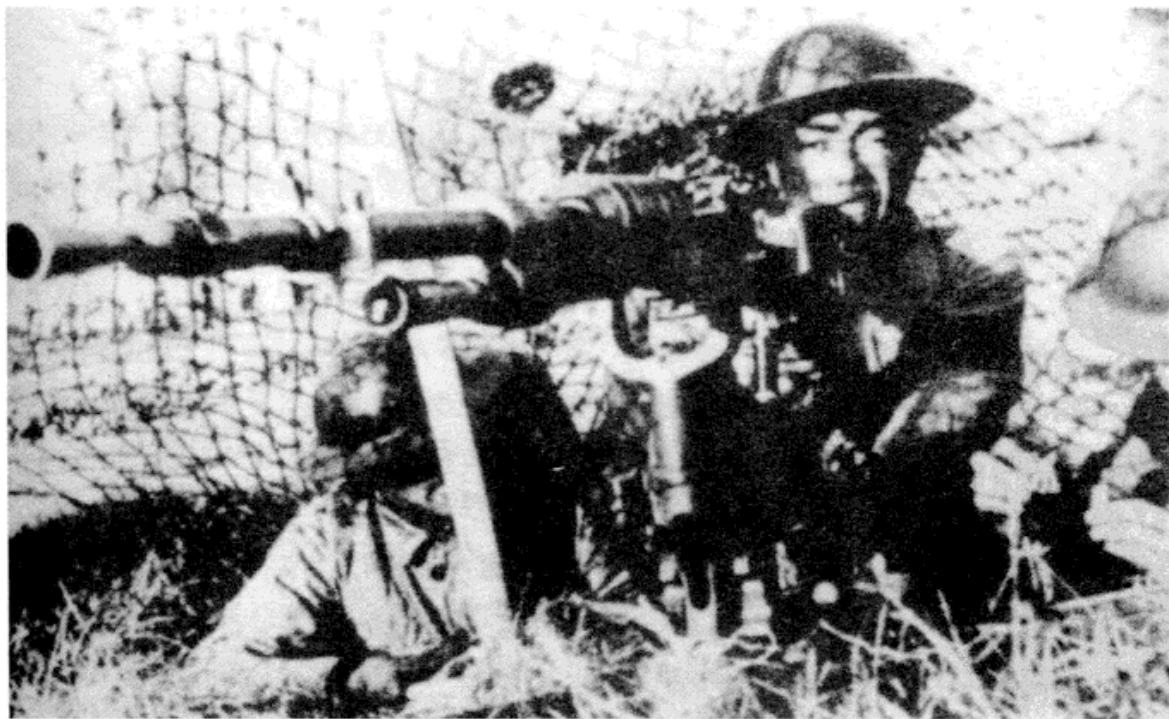


进一步扩大的战事

日军在1937年9月11日之前的20天里，登陆长江南岸淞沪战场的左翼，抢占了正面约50公里、纵深约20公里的滩头阵地，击败了中国军队的抗击，初步巩固了陆上的前进基地。但迄至9月上旬，其登陆部队仍处于大规模进攻前的准备阶段，仅仅依靠已上陆的2个师团和原有的驻沪海军陆战队总共不足5万的部队，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击败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队，占领上海，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军事当局眼前的企图，就在于继续大规模地从国内增调部队，巩固和扩大沿江阵地，集结足够的兵力，创造全面进攻所需要的战役、战术条件。

在所有的因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增派成建制的陆军师团进入淞沪战场。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一个时期，日军的战略重点置于华北战场，在那里集中了6个师团的兵力。反之，在淞沪战场初期只投入2个师团的兵力，这反映了日本军部低估了淞沪战役的艰巨性，并未预计到中国军队会以如此大的决心在这里举行一场如此大规模的会战。

经过八九月间最初20天的交战，日军发现中国军队的精锐部队，特别是中央军主力纷纷进入淞沪战场，而且中国军队士气高昂、作战异乎寻常地勇敢，决非可以轻易地战而胜之的。而且，日军的伤亡之惨重也大出东京军部的意料。至9月9日，第3师团已战死589人、负伤1539人；第11师团战死616



■ 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

日军上海派遣军序列（一）

司令官 松井石根大将 参谋长 饭沼守少将

第3师团 师团长 藤田进中将 参谋长 田尻利雄大佐

第5旅团 旅团长 片山理一郎少将

第6联队

第68联队

第29旅团 旅团长 上野堪一郎少将

第18联队

第34联队

野炮兵第3联队

骑兵第3联队

工兵第3联队

辎重兵第3联队

师团通信队、卫生队、野战医院等

第11师团 师团长 山室宗武中将 参谋长 片村四八大佐

第10旅团 旅团长 天谷次郎少将

第12联队

第22联队

该旅团主力原定编为天谷支队调往青岛参战，在青岛登陆作战取消后，于9月1日回归上海派遣军建制

第22旅团 旅团长 黑岩义胜少将

第43联队

第44联队

骑兵第11联队

山炮兵第11联队

工兵第11联队

辎重兵第11联队

师团通信队、卫生队、野战医院等

派遣军直辖部队：

独立飞行第6中队（侦察）

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150毫米榴弹炮24门）

野战第5、6、7、8、9、10高射炮队

日军上海派遣军序列（二）

独立攻城重炮兵第5大队（240毫米榴弹炮24门）

迫击炮第4大队（迫击炮36门）

战车第5大队（中、轻型坦克共60辆）

独立轻装甲车第8中队（装甲车17辆）

独立机枪第7大队（九二式7.7毫米重机枪24挺）

独立工兵第8联队

架桥设备2个中队

渡河设备2个中队

野战毒气第7小队

野战军用鸽第18小队

人、负伤1336人。这时，日本参谋本部派赴上海视察战局的西村敏雄在9月10日回到东京，他提出的报告反映了战地日军的一般认识：“1.敌人的抵抗实在顽强，无论是被炮击还是被包围，决不后退；2.估计敌人的第一线兵力约19万，第二线的停战区内有27至28万；3.中国居民对敌人有极其强烈的敌忾心；4.由于调军舰运送紧急动员的部队，派遣军后方接济不上，2个师团陷于严重的苦战中。”

其实，关于向上海增兵的问题，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早在8月底就已提出，因为参谋本部内部存有不同意见，一时未能作出决定。松井石根8月31日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呈报意见：鉴于上海的“敌情及地形，军要给当面的南京军以大的打击，因此判断我军的兵力最小限度要5个师团”。同

日，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也向海军军令部提出给上海派遣军增兵的报告。9月1日，军令部第一部部长近藤信竹向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提出尽快向上海增兵的意见。石原从日本准备对苏联作战的战略计划考虑，不主张向上海大规模增兵，他认为上海派遣军的全部兵力登陆，至多也不应超过六七万人。然而，在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内，占压倒优势的意见是要增兵上海，尽快解决战局问题。9月4日，陆军省、参谋本部、海军省和军令部的有关部门人员举行会商，一致同意：“在上海附近，以击退敌人的胜利，结束战局，其时间大概是10月下旬至11月初。”为此，必须向上海增调足够数量的部队。

大规模增兵上海的决定，是由日本参谋

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作出的，而其最后决策权在于天皇裕仁。9月6日上午，军令部总长为海军用兵问题上奏天皇时，提出“上海陆上的战斗迟迟无进展，必须增强陆军兵力”。为此，裕仁立即召见参谋总长。同日下午15时，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进谒裕仁，上奏称：“内定增派第9、第13、第101师团及台湾守备队（用以占领崇明岛飞机场）到上海，派后备步兵4个大队到上海。”当即获得裕仁的批准。这样，日本军部在9月中旬至10月初的约20天时间里，继8月下旬的第一次增兵以后，实行第二次向淞沪战场大规模增兵。

这时，日本近卫内阁急剧迈向扩大对华战争之路，悍然放弃七七事变之初宣称的所谓“不扩大”方针，全面转入战时体制。为动员全国进入战时体制，向“举国圣战”开进，日本第72届（临时）议会在9月4日召开历时5天的会议。议会开幕当天，发布了具有对中国宣战布告性质的敕语。9月5日，近卫文磨首相在日本议会发表演说扬言：“中国方面利用帝国之忍让，侮日抗日之势愈加高涨，战局终于波及华中。至此，政府认为采取从来消极、局部之手段已不能收拾局面，终于不得不积极全面对中国军断然给予一大打击。”“今日帝国可能采取之手段，只有彻底打击中国军，使之丧失战斗意志。倘中国方面仍不反省，继续顽抗，即使进行长期作战，帝国也在所不辞。”日本议会批准了

超过20亿日元的临时军费。9月9日，发布了内阁告谕，宣布转向举国战时体制。

日本是一个小国，常备兵力不足以适应其侵略扩张野心的需要。但日本帝国主义具有很强的战争动员力和组织力，它当时拥有预备役兵员约200万人，可以逐步使用于组建新的师团。为加强淞沪战场的兵力，除了从国内组建新的师团外，又从华北战场抽调一部分部队转用于淞沪方面。

9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发出“临参命”第916号令，调原属华北方面军的后备步兵10个大队、炮兵3个大队、工兵2个大队，转隶上海派遣军。这支部队自9月12日起陆续进入淞沪战场。同日，日本参谋本部又决定紧急抽调台湾守备队5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中队，组成以重藤千秋为支队长的重藤支队，列入上海派遣军序列。重藤支队于9月14日到达宝山川沙镇，投入淞沪战场。在此前的9月1日，早已将待机于大连、原定用于青岛作战的由天谷直次郎为支队长的天谷支队调来淞沪参战。这支原属于第11师团的天谷支队，于9月3日在吴淞登陆。

上述3支部队的参战，对淞沪战局的影响很有限，难以改变整个形势。于是，日本参谋本部于9月11日以“临参命”第919号令，下令派遣第9、第13、第101师团，以及野战重炮兵1个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1个联队、迫击炮兵1个大队和飞行团等部队，增援淞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沪。第9师团于9月23日自大阪起航，27日在杨树浦至吴淞间登陆。第13师团于9月27日自神户起航，10月1日在张华浜、虬江口一带登陆。第101师团于9月18日自神户起航，22日在吴淞、杨树浦间登陆。此外，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和第3飞行团，也先后在9月中、下旬到达上海。

至9月下旬、10月初，日军在长江南岸和黄浦江口一带已集结了第3、第9、第11、第13、第101共5个师团，再加上15个步兵大

队，重炮兵1个旅团以及其他特种部队，连同原有驻沪部队，总兵力达12万人左右。此时的参战日军共拥有火炮约300门、坦克200余辆、飞机200余架。日军的后方供应线也日益稳定和加强，临时机场在泗洲岛、沙窝、公大纱厂等处建成，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条件逐渐形成，大规模野战所需要的各种条件都日益具备。总之，淞沪战场上日军的优势已经形成了。



■ 至9月下旬，日军已在淞沪战场上集结了约12万人。

新的作战方案

上海围攻战和长江沿岸抗登陆作战未达预期目标，敌我两军在前线形成僵持状态。战争形势显示：淞沪战役的艰巨性和持久性将远远超过南京统帅部原先的设想。于是，在中国军队转到浏河、罗店以西、刘行、庙行、江湾、新市区、北站一线的前夕，南京统帅部制订了《淞沪抗战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以下简称《作战计划》），在9月6日正式下达给冯玉祥、顾祝同、张治中、陈诚等人。

《作战计划》分析日军的进攻企图，将力图形成两个包围圈：一是北面由罗店向南突进，威胁我方围攻部队之左侧背，形成大包围；二是南面向江湾方面攻击，吸引围攻部队的兵力于其包围圈内，并对围攻虹口、杨树浦之敌形成小包围。日军的目的是“迅速击破我军……完全占领上海”，并“以此为其扩大侵略之根据地，再由其国内增加兵力，继续分向昆山、吴县及松江方面发展，以图威胁我首都”。计划对于日军从国内增兵的可能，完全占领上海和进窥首都南京的战略企图，作出了较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关于下一阶段淞沪抗战的作战方针和战役意图，《作战计划》提出以下三项：

1.本战区为保持经济重心，巩固首都，并有利于全局之持久作战起见，务就现已形

成之包围态势，对于上海及各处上陆之敌，运用优势兵力断绝其联系，限制其发展，并努力围攻由狮子林及川沙口方面上陆之敌，打破其包围企图，而收各个击破之效。

2.如各个围攻之目的不能达到，则依状况逐次于后方占领阵地，采取攻势防御，乘其海陆火力不能协调之际，发扬我之精神与物质威力，一举而击破之。

3.于万不得已，则退守后方既设阵地，作顽强之抵抗，以待后方部队之到达，再行决战，以期获得最后胜利。

《作战计划》规定的方针，将尔后的作战分为3步走，首先是力争在上海围攻区和登陆之滩头阵地上，将日军予以“各个击破”；如果围攻不成，则逐步转移到第二线，即敌军“海、陆火力不能协调”的地带，占领阵地，采取攻势防御，击破敌之进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撤退至上海后方的既设阵地，即在吴福线、锡澄线等国防线既设阵地，“再行决战”。上述作战方针和规划，不失为一个既积极又稳妥的方案，它要求力争在第一线或第二线粉碎日军的进攻，并强调了集中优势兵力、攻势防御、各个击破等作战原则；同时，并不主张在上海孤注一掷，不顾一切地死守硬拼。战役决战的地域也并非选在濒临长江的上海近郊，而是在“后方既设阵地”。这与战前国防线的构筑，没有选在上海近郊，而选在苏、常一带，是完全相

一致的。可是，后来淞沪会战的实际进程，却并未按照上述构想来实施。

南京统帅部为贯彻实施淞沪抗战第二期作战计划，击败上海当面之敌，在9月至10月初继续从全国抽调部队，增援淞沪战场。9月12日至20日进入淞沪战场的，有以王东原为师长的第15师、以彭位仁为师长的第16师、以王修身为师长的第32师、以罗霖为师长的第77师、以谭邃为师长的第159师、以叶肇为师长的第160师，以及第66军教导旅等。9月21日至10月5日抵达淞沪战场的，有以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以陈永为师长的第44师、以韩汉英为师长的第59师、以欧震为师长的第90师、以李延年为师长的第9师、以万耀煌为师长的第13师、以陈沛为师长的第60师等。这些新调入的部队不再局限于中央嫡系，而是包括了其他多个地方系统的部队。

这时，全国范围的抗日高潮已经出现，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前所未有的全国抗日高潮，有力地推动着蒋介石和国民党以更为积极的态度进行对日抗战。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公布了中共中央早在7月15日已交付国民党中央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继8月2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颁发了特派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命令后，10月12日，

军委会又颁布了改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部队，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的命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走上抗战之路的大道上又前进了一大步。这对于淞沪抗战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淞沪战争的现实状况，推动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以更大的决心、投入更多的力量，去进行这场决难中途收缩的淞沪之战。9月中旬，南京最高统帅部决定重组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并对淞沪战场的全部军事力量进行重新编组，按作战方向和不同任务，组成左、中、右三大作战集团。9月21日起，蒋介石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继续担任战区副司令长官，陈诚仍为前敌总指挥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9月21日，张治中调任军委会管理部部长，朱绍良继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自1937年8月15日就职以来，至9月17日卸任，在苏州的司令长官部度过了整整1个月。在名义上，他是淞沪会战在前线的最高指挥官。然而，蒋介石之所以把其推上这个位置，主要意图在于向全国显示举国一致、抗日御侮的政治姿态，以冯玉祥的再度与他合作，来展示地方派系的一致拥蒋，从而有利于巩固和加强蒋介石自身所竭力维护的领袖地位。蒋介石始终未把第三战区的实际指挥权交给冯玉祥，中央系的高级将领如顾祝同、陈诚、张治中、

罗卓英以及胡宗南、孙元良、宋希濂、王敬久、俞济时、彭善、霍揆彰、李延年等人，从来也未视冯玉祥为实际指挥者，他们都直接听命于蒋介石。

尽管实际上只是个牌位，冯玉祥并不能负责作战指挥，然却运用自身的特殊身份，向南京统帅部及时反映前方军情，转达前线将领的报告，指陈一些前线将领不便提出的意见。如在8月28日，他向蒋介石转报了张发奎关于杭州湾北岸防区“兵力不敷……防线过广，部署容有未周，倘一隅疏防，牵动全局”等意见，并向蒋建议，对杭州湾北岸和浦东要“增厚兵力”，“以固边防”。后来战局的发展，说明冯的这一建议是十分重要和正

确的。

9月22日，蒋介石发布关于规定淞沪会战战斗序列的命令：“黄浦江以西、蕴藻浜以南部队，划为中央军”；“左翼军以第19、第15集团军编成之”；“右翼军仍以第8、第10集团军编成之”。参战部队编组为左翼作战军、中央作战军和右翼作战军三大作战集团，陈诚指挥的左翼作战军，部署于沪太公路以东，蕴藻浜以北，浏河、罗店西面、广福、刘行至顾家宅（今顾村）一线东西地区，主要打击由川沙口、狮子林、宝山、吴淞镇等处登陆西进和南下的日军。朱绍良统率的中央作战军，部署于沪太公路以东，蕴藻浜以南，沪宁铁路南北之间的地区，主力分布在



■ 中国军队的军官正在观察对面的日军阵地。

塘桥、大场、庙行、江湾至北站一线，重点抗击由吴淞、张华浜、虬江口等处登陆西进之敌，并阻击虹口、杨树浦之敌军。张发奎统率的右翼作战军，继续守卫浦东地区，防止和打击由杭州湾北岸登陆进犯之敌，并一部兵力担负杭州湾南岸，浙东的宁波、镇海、余姚、慈溪等地的守卫。

从潘泾到杨泾

中国左翼作战军于9月12日晨撤入潘泾河之线预定阵地，置第一线主力于蕴藻浜以北，潘泾、狄泾两河东西地区。这时，日军第3师团沿宝（山）刘（行）公路西进，企图突破潘泾和狄泾中国军队阵线，进占刘行和顾家宅两大要点，随后南渡蕴藻浜。日军第11师团会同新到的重藤支队，沿月（浦）罗（店）公路南北之线由东向西，企图在潘泾、狄泾与杨泾三条河流之间地带，肃清中国军队，重点打击的目标是罗店周围地区，以图确保南下日军侧背之安全，尔后南下协同第3师团向大场、南翔间地带进攻。从9月12日起的20余天时间里，在潘泾、狄泾和杨泾间地区，中国军队由西向东进行节节抗击，日军由东向西步步进攻，敌我两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拉锯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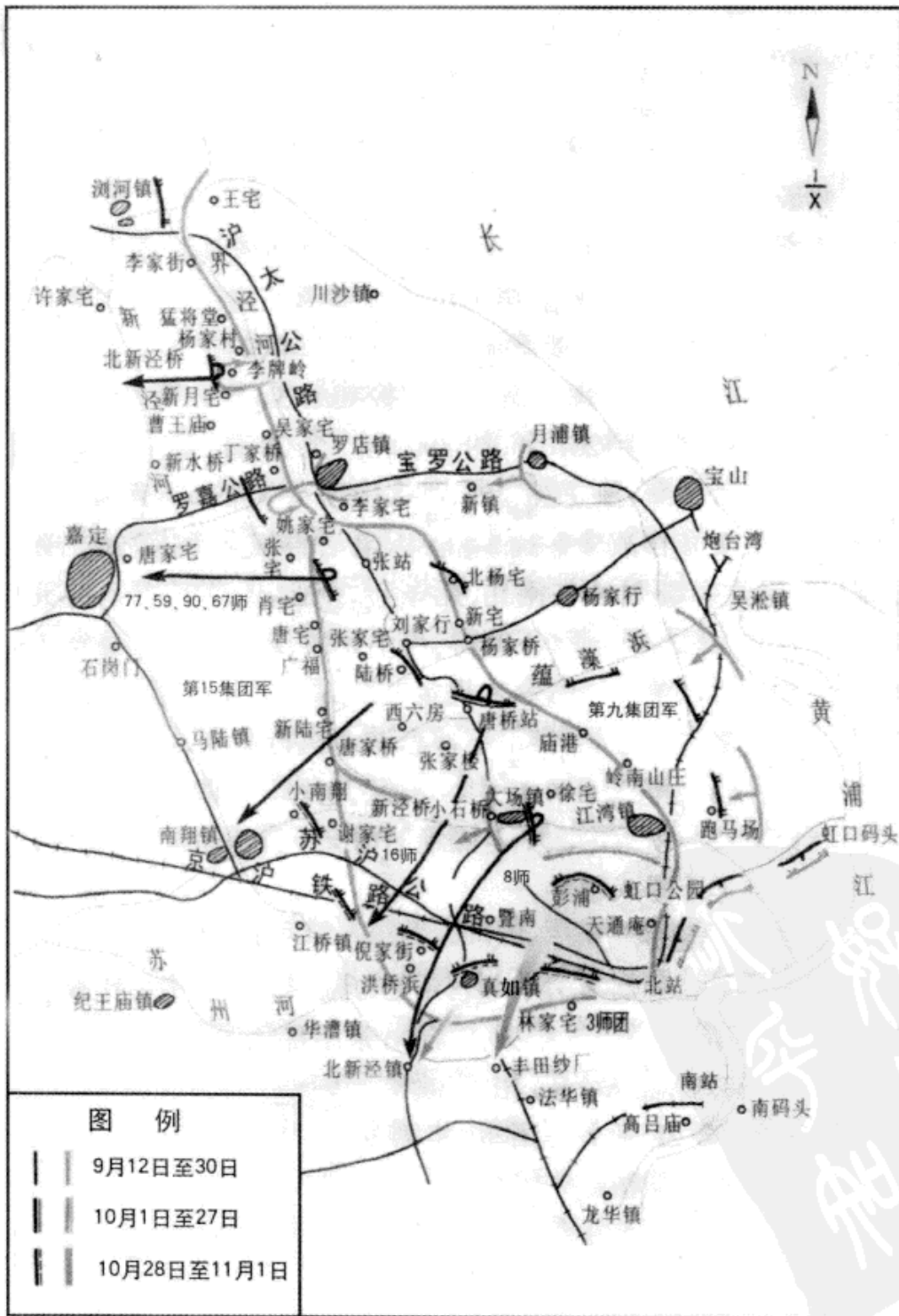
9月12日起，日军向第15集团军正面发起进攻，其重点沿宝刘公路指向第1军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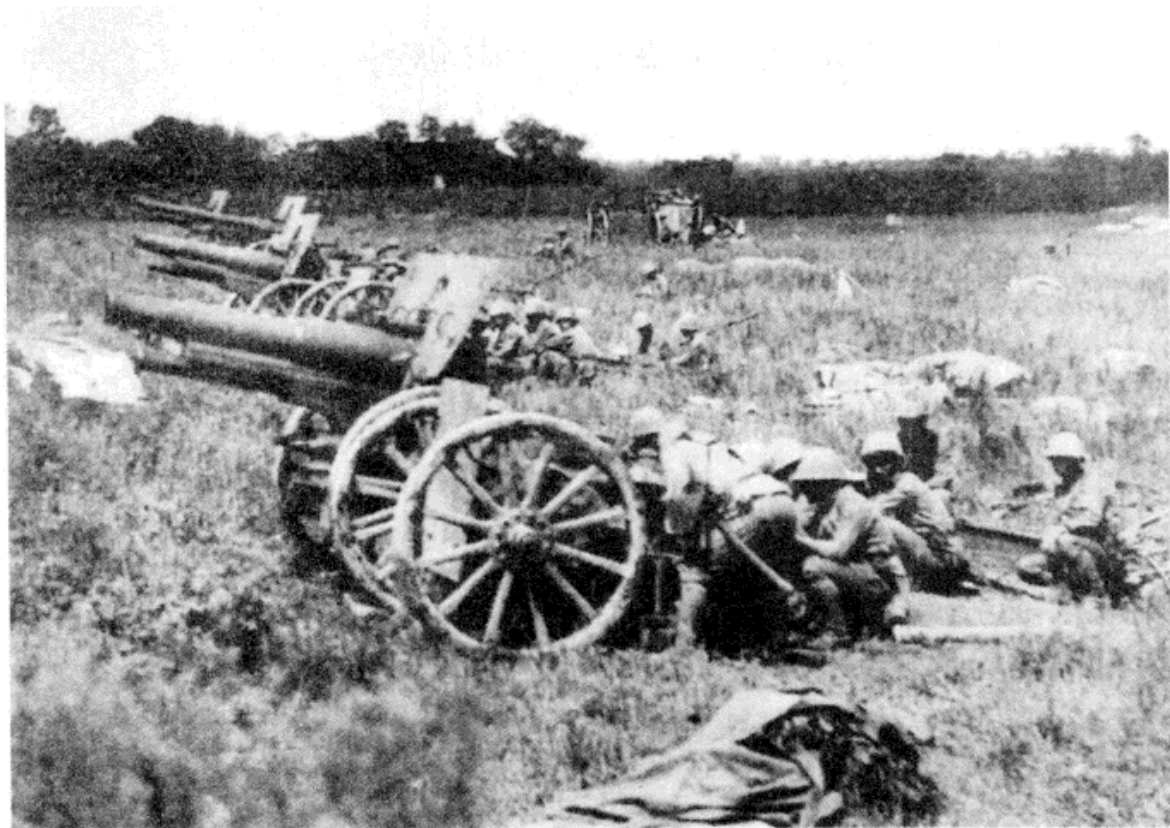
先以优势空军和炮火轰击守军工事，随后以步兵跟随坦克突袭守军阵地。中国军队前仆后继，以手榴弹、刺刀与日军展开拼搏，不断组织逆袭，一次次将日军击退。然守军伤亡众多，后继部队不断增兵和换防。第32师、第15师、第77师、第66军和第4军等多支部队，逐次增援，并转用第57师于蕴藻浜北岸，与日军周旋。战至9月21日，敌我双方均遭严重消耗，仍相持于潘泾河畔一带。

9月22日以后，日军第101师团和第9师团陆续进入战场，连日发起更为猛烈的攻势。日军凭借其火力优势，每日炮击2万余发，潘泾河畔中国军队阵地硝烟弥漫，一片火海。随后日军步兵伴随坦克发动冲锋。中国第66军、第4军等部冒着日军猛烈炮火顽强抗击，第一线部队伤亡已达十之七八。第二线部队一批批增援逆袭，反复拼搏，虽迟滞了日军攻势，但无力将日军击退。至9月25日，中国左翼作战军由潘泾河西移狄泾河之线，并留置一部兵力在原阵线掩护主力西撤。

9月26日，左翼作战军前方掩护部队被日军压迫，后退至狄泾河主阵地。次日起，日军继续向守军狄泾河一线的主阵地发起进攻。在顾家镇、刘行、太平桥、陶家宅等地，双方逐村逐地展开激烈的争夺。同时，罗店以西的施相公庙一带亦发生激战。这时，日军第9师团重点指向顾家镇，第3师团攻击的重点则指向刘行，第11师团在施相公

图七 淞沪会战守势作战时期作战经过要图 (1937年9月12日-11月4日)





■ 日军的炮兵阵地。

庙南北一线进行攻击。双方在狄泾河主阵地一带反复拼搏，死伤遍野，日以数千计。日军新到部队源源增援，中国第8师、第9师和税警总团赶来参战，仍未挡住日军的凶猛进攻。第15集团军之右翼阵地，后移至杨家宅、顾家镇、刘行、罗店以西、施相公庙迄于浏河之线，转攻为守。

这时，刘行及其邻近的顾家镇成为敌我两军交战的焦点，这是因为该地是淞沪战场左翼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枢纽地带。曾在刘行、顾家镇保卫战进行之时，亲赴顾家镇作过实地考察的炮兵总指挥邹作华回忆道：“对于顾家镇这一个地方，在9月16日，本人曾

到该处视察，无论在图上或实地，确系非常重要。本人曾建议，敌人主攻方向，一定自顾家镇经唐桥镇，攻取大场，决不会由刘行到广福。根据的理由，是以敌军作战，向来利用公路，如果脱离公路，其炮兵及机械化部队，即不易活动，无由发挥其优越装备之特长。顾家镇至大场有良好的公路，可以利用，而刘行至广福后，便没有公路了，此为在地形上判断的一点。其次在心理上判断敌人急欲解决者，就是想从大场，至第9集团军后方，迫使第9集团军脱离上海。根据此两点理由，判断敌人由顾家镇经唐桥镇，攻取大场，必无疑义。”

前期阵地战之高潮，参战兵员之众多，战斗之激烈，伤亡之惨重，为开战以来所未见。

在潘泾河、狄泾河至杨泾河之间，南北狭长不到30公里，东西跨度不足10公里的一片平坦的农田和村落地带，敌我两军投入的作战部队不下20万人，日军方面除了投入近4个师团的地面部队外，数百架飞机的直接参战，完全掌握了战场的制空权。中国军队则投入了当时能够调用的全部精锐部队，中央军的第一流部队，除了汤恩伯和卫立煌两部在华北战场、张治中（后为朱绍良）部之一部担任上海市区围攻战之外，基本上都投入了这次作战，特别是陈诚指挥的第15集团军，在这场作战中自始至终担当了主力军的角色。

潘泾、杨泾间之战，再次说明了在中日两军的武器装备、部队素质的差距十分悬殊，制空权又完全操之于日军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上海附近的近海平原地区，采取阵地战的方针对中国军队是完全不适宜的，更不应当进行旷日持久的拼消耗的战役和战斗的持久战。蒋介石和军事统帅机关的指导方针和作战指挥上的失误，导致中国军队不应有的过多的损失，贻误了战机。然而，中国抗日官兵们为民族独立和尊严而战的崇高精神，为保卫国土而浴血奋战的献身精神，则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正是抗日官兵们的许许多多的生命与鲜血，才使气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尽管拥有装

备和火力上的绝对优势，却仍然进展缓慢。

松井石根的中央突破计划

日本上海派遣军自1937年9月10日前后至10月5日之间，前后约20天之久，以其主力猛攻潘泾河至杨泾河之间中国军队的阵地，由东向西推进约5至10公里。这一阶段，淞沪会战已进入阵地战高潮的时期，在敌我两军的武器装备、兵种构成、部队素质等等各方面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以极大的牺牲和惨重的伤亡为代价，阻滞日军攻势，使日军平均每日只能向前推进半公里左右。至10月初，中国左翼作战军的前方阵线，南起杨家宅、唐桥、沿蕴藻浜南岸，经陈家行、广福、王家宅、施相公庙、曹王庙、双草墩，直至浏河镇，主力则集结于浏河—嘉定—广福—南翔之线的东西两侧地区，守卫杨泾河西岸。中央作战军位于蕴藻浜以南，东起江湾、庙行，中经大场，西至南翔，南抵闸北淞沪铁路沿线，直至北站和苏州河北岸一线。这时，中央作战军和左翼作战军在蕴藻浜沿岸的战线，已直接互相联结，形成一个北起浏河，南经南翔以东，经蕴藻浜与走马塘之间的地带，东至江湾地区的一个直角形的防线，与从宝山、罗店、刘行、吴淞西进和南下的日军，隔杨泾河、蕴藻浜对阵。

作为东北军的老资格炮兵指挥官，邹作华的军事理论水平相当不低。战局的发展，未出邹作华之预料。9月25日前后开始，刘行、顾家镇成为日军的主要目标。9月27日拂晓，日军以坦克9辆，掩护步兵向顾家镇守军第16师阵地进攻，交战甚烈。至上午10时许，日军以飞机8架轰击守军阵地。守军虽遭惨重伤亡，仍坚守阵地，迄未动摇，战至下午16时，仍在对峙之中。28日和29日，战斗更趋激烈。

9月30日当天，在日军陆、空联合的猛烈攻击下，顾家镇、刘行防线的右翼，守军第15师与第57师之间的结合部被突破。57师平时训练有素、编制健全，士气旺盛，战斗

力强，当即奋起反击，将缺口堵住，日军遂不能得逞。可是，在15师与77师之间的太平桥阵线，不久亦被日军突破，77师无力反击而全线溃退。日军遂在突破点扩张攻势，席卷而入，从而影响及于全盘战局。顾祝同闻讯后上报南京统帅部，蒋介石下令死守顾家镇。但在事实上，死守已不能挽回颓势。顾家镇仅留57师2个营、刘行则留15师1个团，阻敌前进，掩护主力西移。9月30日当夜，已变成一片残墙断壁和满地焦土的刘行和顾家镇陷落了。这时，左翼作战军主力后撤至唐桥以北，沿蕴藻浜经陈家行至广福，北沿杨泾河两岸至施相公庙、浏河之线。

潘泾与杨泾间20天鏖战，是淞沪会战中



■ 坚守在上海市区的中国军队。

从9月初至10月初的作战，日军主力的进攻方向是由东向西，在长江沿岸的滩头阵地站稳脚跟后，越过沪太公路，西出杨泾河两岸。日军下一步攻势，是继续向西发展，越过广福南北至施相公庙一线西进，攻略嘉定、南翔等地；还是转移攻势，以主力由北向南，沿沪太公路南下，进攻大场、闸北。

当时，中国军队的前线指挥机关中，对日军下一步进攻的方向，有两种判断。一种意见认为，日军下一步的“主攻方向，将自顾家镇经唐桥镇，攻取大场，而不会由刘行向广福前进”。这一判断的根据，主要有2点：一是日军作战向来利用公路，如果脱离公路，其炮兵及机械化部队即不易活动。顾家镇至大场有良好的公路，而刘行至广福后，便没有公路了。二是从日军的战略企图方面分析，敌方急欲攻夺江湾、大场、闸北，使之与虹口、杨树浦联成一片，完全占领上海市区华界，并彻底肃清蕴藻浜与苏州河之间地带的中国军队，以扫除尔后西向进攻沪宁沿线地区时，来自右侧的威胁。因而，“在心理上判断敌人急欲解决者，就是想从大场，至第9集团军后方，使第9集团军脱离上海”。他们认为，“根据此两点理由，判断敌人由顾家镇经唐桥镇，攻取大场，必无疑义”。

另外有一种判断，却与上述意见不同。认为日军一定会由刘行西进，重点进攻广福

南北地区，突破杨泾河，企图击灭中国左翼作战军。这一见解颇为前线指挥机关所重视，于是左翼作战集团的防御计划，一度把重点置于广福南北至浏河之间一线，而忽略了南翔至大场一线。而在9月30日以后，日军果然一天一天地加紧向广福进攻，似乎给这种观点提供了不少佐证。而实际上，这完全是日军的佯动，松井石根的进攻方向正是大场。

以陈诚为总司令的左翼作战军，当时是淞沪战场上一个规模最大、最具实力的作战集团。9月下旬，该作战集团组成3个作战军：第一区作战军，由胡宗南、王东原为正副指挥官，下辖第1师、第78师、第16师、第15师、第311师，炮兵第16团3营；第二区作战军，由罗卓英、霍揆彰为正副指挥官，下辖第11师、第14师、第67师、第98师，迫击炮第1营；第三区作战军，由刘和鼎、俞济时为正副指挥官，下辖第51师、第56师、第58师，迫击炮第2营、战防炮1个连。此外，还直属有炮兵第16团（欠1个营）和高射炮兵2个连。这十余个师的作战部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全国堪称一流的，第1、第11、第14、第98、第67、第58等师，在国民党军队中都系精锐之师。上述部队全部部署于南翔以北，杨泾河以西，北至浏河之线，主要是用以防敌西进的。以后，至10月中旬，以廖磊为总司令的广西部队第21集团军进入淞沪



■ 由于日军事先进行了充分准备，江南水网纵横的地形并未给日军的机动造成多大的影响。

战场，先后到达的主力4个师，即第171师、共有4条：

第173师、第174师、第176师，虽划归中央作战军朱绍良指挥，但却部署于南翔以东左翼与中央两大集团的结合部。显然，第三战区指挥机关当时的作战重点是阻敌西进。

从上海北面，以沪太公路为主轴，由北向南，在中国左翼军和中央军两大作战集团之间实行突击，在南翔与江湾间突破，直取大场和苏州河北岸的作战计划，在这次淞沪战史上被称为“中央突破计划”。日本上海派遣军是在9月底确定了这一计划的。松井石根在9月29日正式发布关于今后的作战指导方针的决定，开始实施中央突破计划。这一决定

“1.不是攻占杨泾西岸的敌阵地，而是以主力从左边回旋到南面，从右面以第9、第3、第101师团为第一线，准备对大场镇附近进行攻击。2.使第11师团进入杨泾一线，回旋掩护右侧面。3.以第13师团作为第二线兵团，保持在（派遣）军主力的右翼后面。4.以上述部署的兵力，攻击大场镇附近的敌人，进入苏州河一线。在此期间，随着（派遣）军主力的南进，第11师团主力尽可能向南面移动，面向西掩护军主力的侧面。”

松井石根集中3个师团的兵力，使用于突击大场至苏州河一带，为中央突破计划之重

心；只配置1个师团兵力于杨泾河一线，掩护主力部队之右侧；另以1个师团兵力作为总预备队，为实行中央突破的第二线兵团。

上海派遣军的中央突破计划，除了适应淞沪战场上日军在新阶段的战役进攻的需要外，还有着更广泛的战略背景。日本政府和军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把“华北事变”扩大为“中国事变”，妄图以战争手段迫使中国全面接受其侵略扩张要求，然而，它的战略企图和战略计划却是立足于速战速决，力图尽快结束这场战争。10月1日，日本政府首相近卫文磨、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和海相米内光政作出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正是反映了东京决策当局对8月和9月的对华战局，尤其是上海战局无重大进展而产生的焦急。正如日本军方在战后编写的战史所指出的，提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真正目的在于尽快结束此次事变”。“纲要”规定：“这次事变的目的，在于以军事行动之成果结合适当之外交措施，使之尽速结束，并使中国放弃抗日及容共政策，在日华间建立真正明朗持久之邦交，以期日满华和睦共荣之实现。”上海派遣军的中央突破计划，正是为贯彻日本政府“尽速结束事变”而采取的军事行动。

这时，东京军部内部主张大大地增强在上海的攻势，迅速解决上海问题的论调有空前强烈之势。日本参谋本部从对苏联战备的要求

出发，认为虽然“只要情况无特殊重大变化，苏联或将不以武力介入远东。但是，在不致引起对日全面冲突限度内可能加强对华援助，并为牵制日本对华作战，有时也可能以部分兵力采取行动”。为此，9月20日参谋本部在上奏天皇的军事作战计划大纲中提出：“对苏参战大致毋庸置疑，最好能尽快解决中国问题。11月左右，苏联或将采取行动。希望能在以前积极解决事变。”“上海方面仍以5个师团击溃上海周围之中国军。”在军部决定向上海派遣5个师团兵力后，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宣布下台。石原只是在侵华战争的缓急和规模问题上与军部的决策者存有歧见，而被迫辞职。继任作战部长的下村定，一方面继续增强上海派遣军，另一方面加速组建第十军，准备在杭州湾北岸实施登陆。10月2日，参谋本部增派独立野战重炮兵1个大队前来上海。10月16日，又由华北抽调独立攻城重炮兵2个大队、坦克1个大队、独立轻装甲车3个中队，加入上海派遣军。

蕴藻浜、走马塘中间地带激战

日军为实施中央突破计划，首先选择在南翔以东之陈家行、吴淞以西之唐家宅两地之间，突破蕴藻浜防线，进入蕴藻浜与走马塘之间的地带。蕴藻浜以南地区，原是由朱绍良统率的中央作战军担任守卫的，在刘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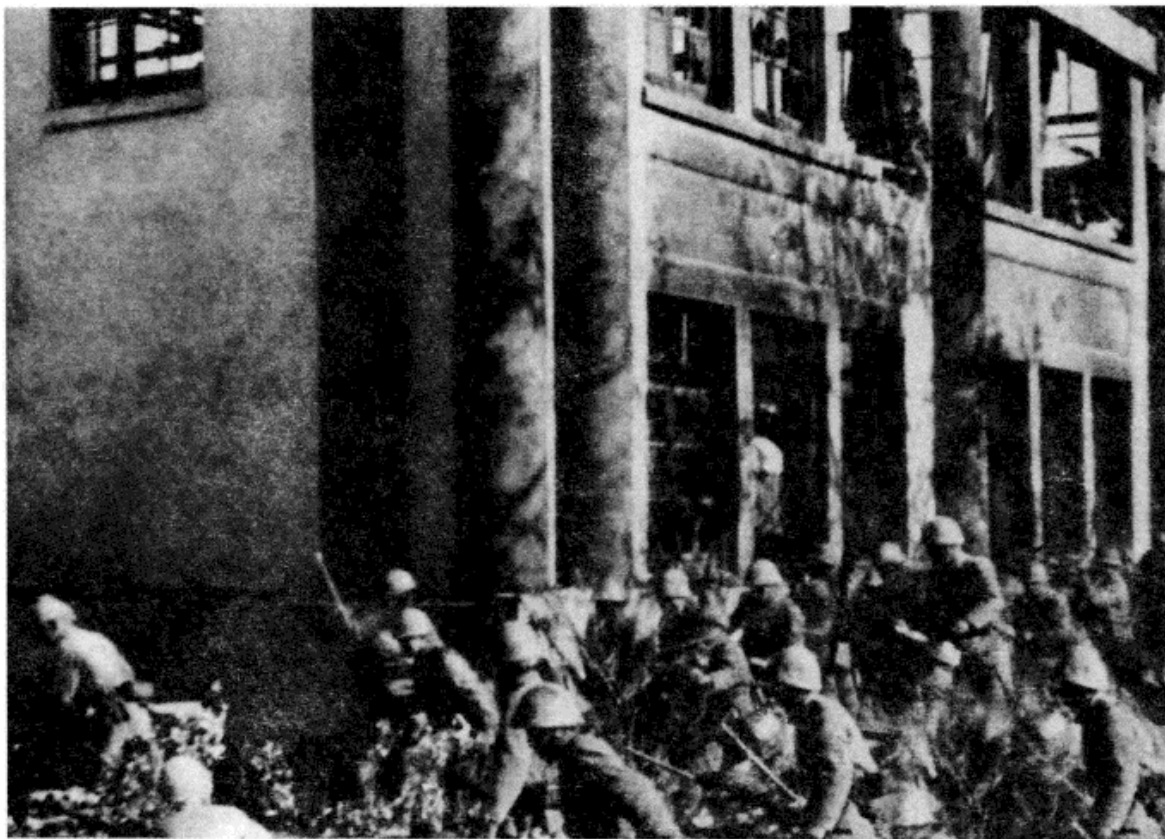
行、顾家镇等地相继陷敌后，陈诚的左翼作战军之一部分已退守蕴藻浜以南。中央和左翼两军在这里的部队共同进行了阻击南下日军的作战。

10月初，中国军队在蕴藻浜南岸集结部队，准备阻击渡河南下的敌军。部署于第一线的部队有6个师。从东向西，首先是由王敬久兼师长的87师，位于庙行镇以北、蕴藻浜南唐家宅一带。其次是由钟松为师长的61师，位于沈家湾宅东西一线。再是以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在唐桥站以西、蕴藻浜南岸由黑大黄宅至陈家行之线占领阵地。其左翼与以万耀煌为师长的第13师连接，右翼与以彭松龄为师长的第16师相接。16师的主力位于唐桥站西南、西塘桥附近。以黄杰为军长的第8军则在走马塘以北，第8、第16师的后方。由阮肇昌兼师长的第57师，以一部驻守陆家桥附近，主力部署于谈家头、唐家桥、孟家宅一带。

日军强渡蕴藻浜之战的序战，是10月初进攻陈家行和唐桥站的战斗。10月2日，日第9师团在航空兵的支援下，由坦克部队为先导，由北南犯，进攻第9集团军在蕴藻浜沿岸的陈家行至塘桥站之间的既设阵地。这时，黄杰率领的，由税警总团和第61师组成的第8军从南翔地区推进至陈家行地区，奉命接替原来第87师阵地，阻击日军第9师团的进攻。激战两日，双方损失均重。日军复以第3师

团增援，猛攻第8军左侧的第1军防线，在陈家行至黑大黄宅之间取得突破，并渡过蕴藻浜。这时，税警总团的阵地陷于三面受敌，孤军苦战的险境。但全军官兵抱寸土必争之决心，艰苦支撑，确保了唐桥站阵地。10月3日，日军强大部队继续向南压迫，固守严家宅、曹家宅的税警总团，牺牲惨重，两地遂相继失守。第8军调动一切可用部队，在炮兵配合下，奋勇逆袭。当日14时，将日军攻势遏制，并夺回严家宅和曹家宅两处阵地。日军复以火炮进行集中轰击，继以步兵进行反扑，双方展开白刃肉搏，税警总团在严家宅的守军，全部牺牲，阵地再度失陷。10月4日上午，日军从北、东、西三面对唐桥站守军进行围攻。激战至当日19时，唐桥站守军已无力再战，遂奉令撤回蕴藻浜右岸。

10月6日，日军由蕴藻浜北岸向第1军第8师正面的黑大黄宅和第8军正面的西六房阵地发起进攻。以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此时已在前线奋战了15个昼夜，部队大量减员，武器损失极为严重。6日晚间，第8师左翼黑大黄宅附近蒋宅的阵地首先被日军突破，日军渡过蕴藻浜，向墙头门进攻。同时，日军又向陈家行东面的顿悟寺发动进攻，守军第16师作战勇猛，与来犯之敌展开反复争夺。16师在一夜之间组织反击就达10次，日军第9师团遭到严重的伤亡，被迫数次增调部队支援，才在10月7日攻陷第16师顿悟寺阵地。接



■ 日军进入复旦大学。

着日军南渡蕴藻浜，攻击第8师左侧，第8师死伤甚重，只得退守姚家弄、王家边。至10月10日，第8师奉命撤下火线，转到后方整休时，全师已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至只剩700余人。当日军向第8师猛攻时，第36师和税警总团各一部前往增援，杀伤敌千余人，但自身牺牲极为惨重。

当日军在黑大黄宅一带突破守军阵地，开始强渡时，第8师、第61师、第36师、税警总团各部，虽经奋勇阻击，但仍难以抗击日军的强力猛攻，激战连日，未能遏制日军攻势。这时，日军在蕴藻浜南岸逐渐扩张，战

局于中国军队十分危急。此时中国军队在蕴藻浜的每一支部队，都是伤亡惨重，战斗力急剧下降，于是不得将已撤至昆山整理的第1军，又调至黑大黄宅、蕴藻浜、唐桥镇一带投入作战。第1军主力于10月7日，展开于西塘桥、赵家角、乔亭宅之线，一度阻止了日军进攻。第16师也于7日当晚一度收复顿悟寺阵地。但是，中国军队在阵地战中无以发挥自己的优势，自然也无能力将日军驱逐到蕴藻浜以北去了。

10月8日，日军由唐桥站强渡蕴藻浜，攻击第61师左侧。第36师108旅前来增援，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与日军相持于黑大黄宅之东侧。税警总团据守俞家、葛家桥、张家楼之线，拒敌南下。至此，日军在黑大黄宅至东西赵家角之线，构成宽约2公里的桥头堡阵地。10月9日起，日军主力继续向蕴藻浜南岸进击，中国军队采取阵地固守与不断发起逆袭的战术与日军展开苦战。日军由赵家角、盛家宅守军第61师正面，向前扩张到桃源浜、盛家宅，由架桥掩护队渡河架桥，保障机械化部队渡河。10月11日以后，日军部队陆续南渡，企图扩张战果，一举突破守军阵地，进占大场、南翔，切断闸北、江湾、庙行方面中央军后路。正因为该处为全局之锁钥，所以争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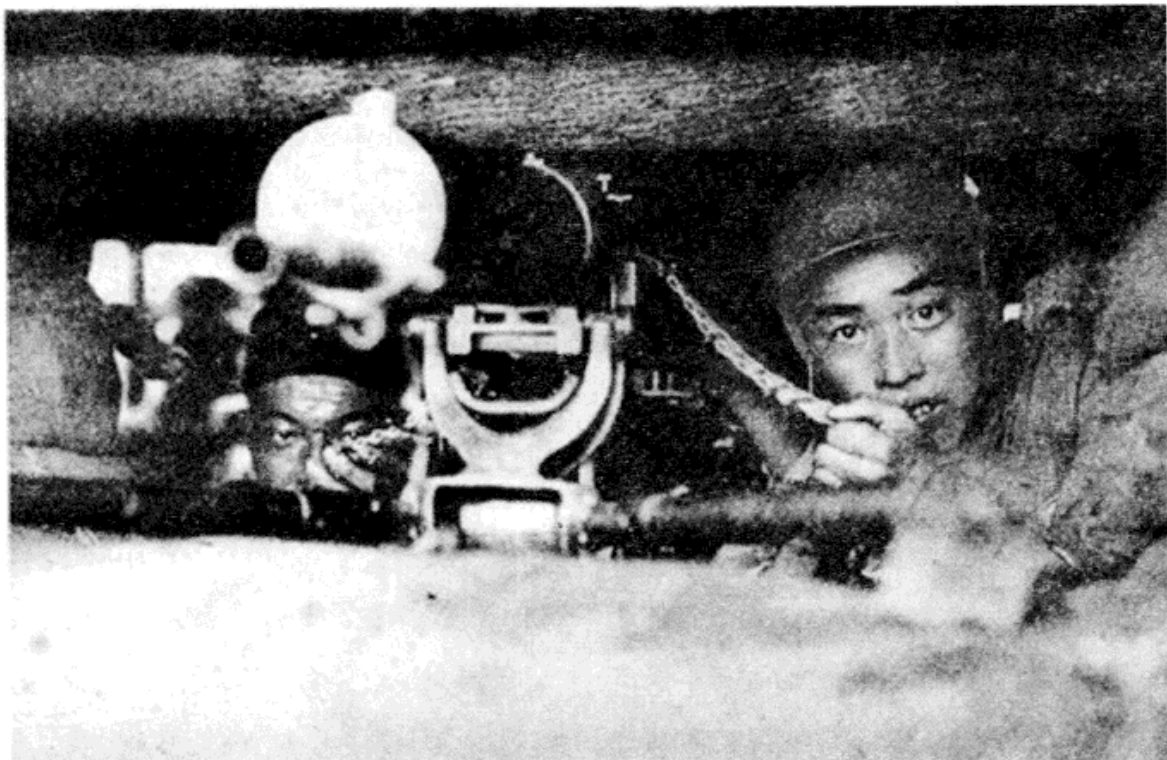
激烈较前尤甚。

10月15日，第三战区司令部鉴于10月6日日军南渡蕴藻浜以后，经连续10天激战，部队伤亡严重，乃调整部署，一方面等待广西的第21集团军等部队的增援，以准备发动反击战，另一方面，下令加强江湾、大场、新泾桥、陈家行和南翔、嘉定及浏河镇一线的第二道阵地。

15日至18日之间，日军继续进行南攻。15日，日军向陈家行发射大量燃烧弹，复以飞机空袭，并施放毒气，另向南陆宅守军阵地猛攻。17日前后，塘北宅、盛宅、桥亭宅、顿悟寺、陈家行之线，激战不断，阵地



■ 巷战中的日军。



■ 中国军队的重机枪阵地。

终陷敌手。葛家神楼、张家楼、新陆宅等地亦展开了反复争夺。在日军优势炮火的轰击下，第32师、第134师、第135师、税警总团等部伤亡过重，不得不调至后方整补。第20军在盛桥、顿悟寺的部队全部殉国，仅仅从13日至17日，伤亡就达7000余人。第三战区司令部遂急调第26师、第173师前来接防，并令新到的第171、第174、第176师推进至走马塘之线，构筑预备阵地。

蕴藻浜、走马塘中间地带，西起南翔，东至庙行、江湾，北枕蕴藻浜，南沿走马塘南北。这里是一片东西向狭长地带，南北纵深只有10余公里，东西跨度约30公里。境内河渠纵横、农田密布、地势平坦，全无要险

可守。蕴藻浜、走马塘河幅不宽，难以构成作战之屏障。沪太公路纵贯其间，却为日军机械化部队提供了一条便利的通道。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带，中国军队把淞沪会战中的阵地战推到了顶峰，与日军血战25天。在完全丧失制空权，日军炮兵和装甲部队又占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此时此地的坚守作战无异于把部队放在日军的炮火面前当靶子。

其实，在此前的9月间，在宝山、罗店、月浦、杨行和刘行的阵地战的惨败，数万官兵的生命和鲜血已经充分说明：在敌我双方的各方面条件之下，在上海郊区这样的地域，阵地战和消耗战对于中国军队是完全不合适的、是十分有害的。可是，南京统帅部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和第三战区司令部并未总结失败的教训，更未改弦更张；相反，却在10月会战中继续推行这种错误战法，并将其推向高峰。

在阵地战方针之下，“死守”成了作战的唯一目的，部队完全困守在阵地里，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部队一上火线，除了重伤或战死，无论将校士兵，都不得稍离，除非上级指挥机关下令调防，否则必须与阵地共存亡。这样的战法，实际上是把千千万万有生力量禁锢于阵地或战壕里，遭受日军火力的猛烈轰击。如此死守，即便是第一流劲旅，最多也只能顶住五六天。黄杰的税警总团，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在唐桥站一带进行阵地阻击战，作战只有3天，便遭严重伤亡，撤回主阵地。第78师467团10月初

在蕴藻浜南岸之塘北宅、塘西宅抗击渡河南下之敌，只历时半天，1个营伤亡过半，营长阵亡，另1个营派出1个连前去增援，不到10分钟全连全部阵亡。杨森担任军长的第20军在川军中公认为有较强战斗力，10月上旬参加蕴藻浜战役，不到7天，伤亡营、团长10余名，连、排长280余名，士兵伤亡达7000余人。这个军原有2个师，撤出阵地至嘉定整编，缩编为2个旅。换防时，1个师兵力剩下1个团撤下火线，是常有的事，有的团甚至只剩下1个连。

蕴藻浜、走马塘中间地带方圆不过30平方公里，前后进入这个地带作战的中国军队达25个师上下。然而，如此庞大的兵力并不是集中使用的，却是采取“填充式”方法。



■ 依托河岸阻击日军的中国军队。

一个师打垮了，撤下去，再补上第二个师；第二个师打得差不多，再补上第三个师。哪支部队支持不下去了，就把刚从后方调来的部队换上去。每天伤亡又很大，往往1个师只打了几天，就减员大部，无力再战。死守的结果只能是守死。

因为这样添油式地使用兵力，中国军队虽在总体上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在分兵把守、轮番使用兵力的情况下，始终形成不了具体战斗中的优势，加之在武器装备上的绝对劣势，战斗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这20余天的阵地战也是一场高度的消耗战，中国军队的消耗极为惊人。但消耗战的意义，从战斗的层面而言，乃是以战斗手段来消耗敌人，使日军因被消耗而受重大打击；虽然在战斗中自己一方亦难免有牺牲，但必须使敌方遭到更多的消耗，如此方能值得消耗战的代价。从战役的层面而言，中国军队应力争战役的歼灭战，避免战役的消耗战；以战役上的歼灭战和速决战，去实现战略上的消耗战和持久战。可是，蕴藻浜、走马塘中间地带之战，与潘泾河至杨泾河之间的战斗相似，即以我方的大量消耗只换得敌方的少量消耗，而使自己遭受惨重的损失。据一般估算，在这20多天里，中国军队平均每天伤亡接近5000人。如西北军第32师进入阵地时，有8000人上下。上阵才2天，营长以下军官牺牲殆尽，伤亡兵员达3500人左右。

南翔以东反击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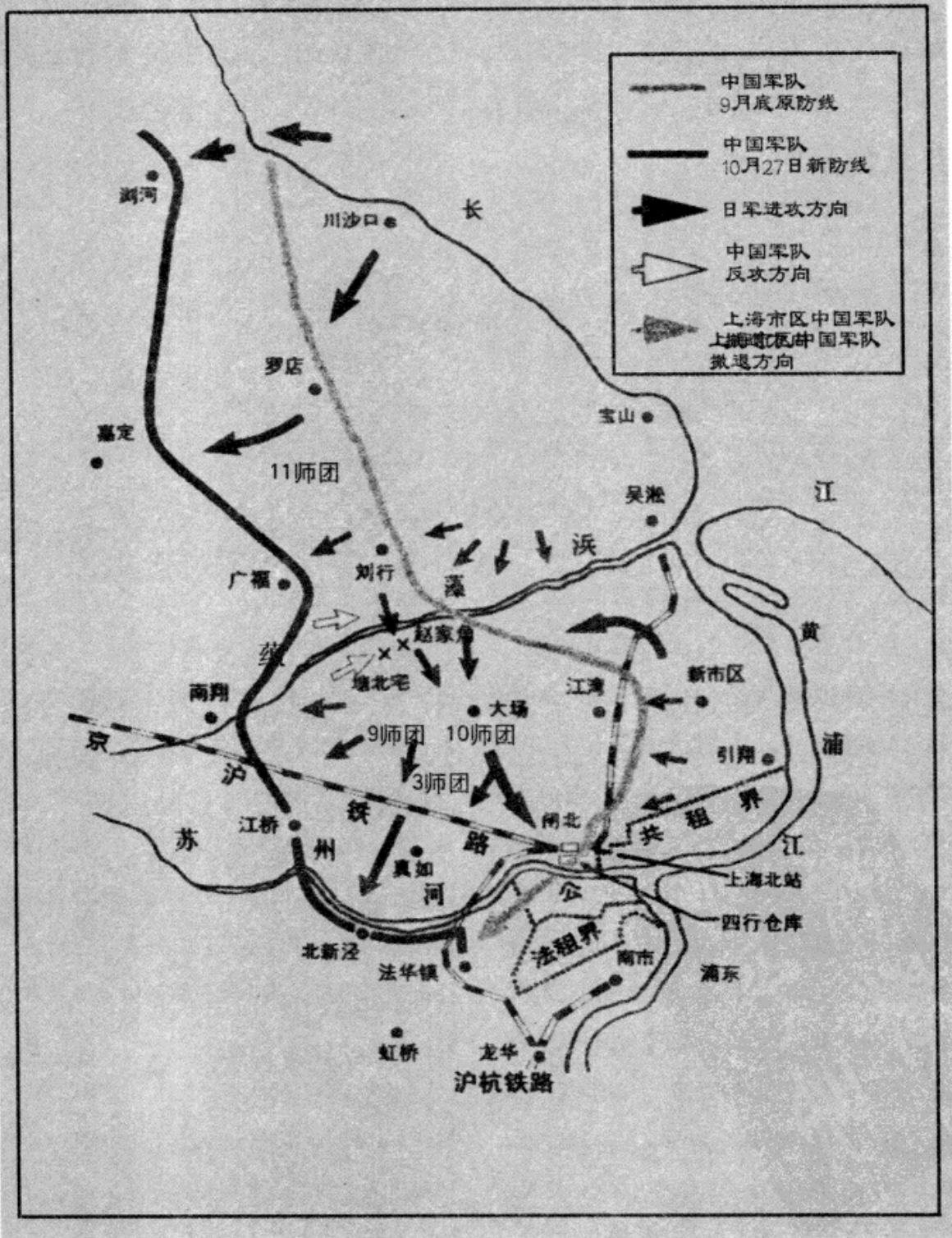
淞沪会战发展至1937年10月中旬，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战局已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日军自10月6日突破蕴藻浜以后，连日南进，攻势凌厉。中国第三战区司令部先后增调十余个师参加阻击，虽延缓了日军前进的速度，然而仍不能遏制其攻势。至18日前后，日军不仅在蕴藻浜南岸建立了比较巩固的阵地，而且大有突破走马塘一线，席卷江湾、大场、闸北，尽占苏州河以北之势。

南京统帅部和第三战区司令部面临空前危急的局面，遂于10月11日前后紧急筹划新的作战方案，以图挽救战局。鉴于蕴藻浜以南的防线已岌岌可危，而近半个月来陆续增援若干个师的兵力专事防守的办法，难以击破敌之攻势，白崇禧、陈诚、顾祝同等人乃准备发动一次集中性的大规模的反击战，给予日军已歼灭性的打击，借以扭转战局。10月11日，在苏州召开的第3战区司令部参谋会议上，已知悉广西部队4个师将从陇海线东段调入淞沪战场的大本营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出使用广西部队在蕴藻浜两岸发动反击战的计划。

不久，广西部队第21集团军所属的第7、第48军共4个师经过长途跋涉，在10月14日至18日之间，陆续进入南翔以东至大场以西的地区。这支生力军的到来，被最高统帅部视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图八 中国军队蕴藻浜反攻及市区撤退 (1937. 10. 1—27)



作组织实施大规模反击战的可以运用的新锐力量。于是，陈诚向蒋介石和南京统帅部提出反击战役的3个方案，第一方案是以蕴藻浜北岸地区为反攻之重点，“以第五路军（即第21集团军）由蕴藻浜北岸，同时以2个师由蕴藻浜南岸，各以一部由南岸及罗（店）嘉（定）公路以北转取攻势，对敌行歼灭战”。第二方案是以蕴藻浜南岸为反攻重点，“以第五路军据守蕴藻浜南岸，以第16军团及第66军之一部，再由另外抽出几个师，由蕴藻浜北岸出击，将突过蕴藻浜南岸之敌包围歼灭”。第3方案是“暂取守势，待集中后，再

相机出击”。蒋介石和统帅部极为赞成进行一次大规模反攻的设想，对于反攻的主要方向和发动的时机，则以为需待担任反攻的力量完成集结和敌人疲惫之时，再行决定。最后决定采用第二方案。10月中旬，在昆山召开的军事会议，鉴于形势的紧迫，认为反攻之战不应久延，“乃决心乘敌攻击疲惫之时，突予猛击，以求突破渡过蕴藻浜南岸之敌”。反攻开始的时间，原决定在10月19日，后来因为广西部队远道而来，需要稍事休整，乃改为10月21日实施。

在这次反攻战中担任主力的是第21集



■ 日军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攻击。

团军的4个师。这支部队是广西部队参加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分别隶属于2个军：第7军，军长廖磊，辖第171师，师长杨俊昌；第48军，军长韦云淞，辖第173师，师长贺维珍，第174师，师长王赞斌，第176师，师长区寿年。北上参战时，这支部队编入第11集团军，隶属第五战区。10月上旬，各师大部到达陇海线徐州至海州间，一部正由武汉沿平汉线北上。10月11日，蒋介石下令由第7、第48军组成第21集团军，归属第三战区，任命廖磊为集团军总司令，立即开赴淞沪战场参战。10月14日至17日，第48军各师先后进入蕴藻浜南岸陈家行、谈家头、沈宅、北侯宅至大场以西走马塘南岸洛河桥、老人桥之线。

从北伐战争时期起，广西部队就以善于野战而著称，内部的团结性和战斗意志也都很高。桂系军事集团能长期与蒋介石的中央嫡系对抗，整体实力虽远逊于中央嫡系，但仍能屡挫屡战，始终没有垮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着这样一支强悍的军队。不过广西部队的缺点也很明显：武器陈旧、新兵不少，对现代战争的领会还相当浅。不过，广西部队的领军人物之一，时任南京大本营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对广西部队的作战抱有充分的信心。早在9月间已与张治中商议过调动广西部队前来上海参战的设想。然而，被人誉称为“小诸葛”的白崇禧，似乎轻敌了一

点，因为对于广西部队而言，如何对付拥有陆、空优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完全是一个未知数。

第三战区司令部于10月18日发布《第三战区作战命令第五号》，正式决定举行蕴藻浜两岸反击战。左翼作战军和中央作战军，分别由陈诚和朱绍良在19日下达进行反击战的命令和作战部署。这次大规模反击战分为3个方面展开，置重点于蕴藻浜南岸：“第21集团军应以步兵6团为基干，编为第一路攻击军……由谈家头、陈家行正面攻击前进，保持重点于左翼。第一攻击目标为盛宅、桥亭宅、顿悟寺之线。第二攻击目标为西塘桥、东赵家角、西六房之线。第19集团军应以第66军编为第二路攻击军，由孟家宅、马家宅正面攻击前进，保持重点于右翼。其第一攻击目标，为杨家宅、徐宅、唐桥头及以北之线。第二攻击目标，为田都、孙家头之线。第15集团军，应以第98师编为第三路攻击军，由广福、费家宅正面攻击前进，应保持攻击重点于右翼。第一攻击目标，为彭家宅、张家宅、倪家宅之线。第二攻击目标为老宅、张家宅（张宅东侧）之线。除以上三路攻击军以外，其他第一线正面各师，除守备阵地部队外，应各编成数个突击队，向敌阵地要点出击，以策应攻击军之战斗。邻接攻击军之各师，应抽调预备队联系攻击军前进，掩护其侧背。”这次反攻战还调集了在

前线能够使用的炮兵部队，包括炮兵第2、第3、第4、第10、第16团，以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营和中央炮兵学校练习队。如此集中地使用炮兵于一个反击战役之中，在整个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次大规模反击战的原定计划中，作战目标包含有以下3项：1.“击破渡过蕴藻浜南岸之敌”，恢复蕴藻浜、走马塘中间地带的阵地，以解除江湾、大场、闸北所受的日益严重的威胁，这是这次反击战的主要目的。2.进击蕴藻浜北岸日军阵地，截断刘（行）罗（店）公路和宝（山）刘（行）公路，“恢

复刘行”。3.“迫敌江边”，即把日军向东驱压至长江沿岸，这是反击战役要争取的最后目标。为统一这次反击战的指挥，顾祝同、陈诚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指定第19集团军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从作战计划和作战目标的规定而论，第三战区统帅机关对这次反击战的企图是很为积极和广大的，如果这些目标果能实现，则淞沪会战的形势将为之一变，敌攻我防的战场态势就会易位。然而，以战场的实际状况分析，中国军队并无取胜的把握，相反却存在遭受失败的很大可能。

在中国军队准备发起反攻的前夕，日军



■ 展开反击的中国军队。

在10月19日至21日继续向蕴藻浜南岸发动攻势，其炮火威力日盛，后继的战车亦相继渡过河浜，直冲守军。中国第1军伤亡过重，后调第二线整补，所遗张家楼一带阵地，由第171师、第174师接防。这时，从后方调来的第18师、第33师、第53师进入战场，配置于大场、小南翔之间走马塘一线，筑阵守卫，构成拱卫走马塘的第二道防线。

正在日军的攻势十分凌厉的情况下，10月21日晚，中国军队发起了大规模反击战。当晚19时，炮兵开始火力准备，向日军阵地进行破坏性射击。20时，各路担任反攻的步兵部队开始出击。第21集团军分为左翼和右翼同时揭开战幕。左翼在176师师长区寿年指挥下，以谢鼎新团为前导，从陈家行向顿悟寺、桥亭宅进击。匍行越出本阵地，即与攻击前进的日军对仗。经奋勇冲锋，几次发动突击，将日军击退，遂将顿悟寺收复。但前进途中，因河流交错，后续部队通过不易，先头部队未敢孤军深入，而经通宵战斗，天色将明，难以继续前进，仅留1个营守卫陈家行前方新收复之阵地，将主力撤回。右翼在第48军副军长兼174师师长王赞斌指挥下，以黎式谷团为前导，从丁家桥以南向桃园浜进攻，企图收复被敌匍行攻占的丁家桥、桃园浜、北侯宅。但攻击部队对渡河未有准备，因敌军凭河顽抗，终未越过。为避免天明后遭敌炮击和空袭，遂撤回原阵地。21集团军

反击战的首次作战，收效甚微。

10月22日，21集团军继续展开反击，而日军也在这天发动大规模进攻，一场惨烈的激战在这里展开。

在陈家行方面，第176师谢鼎新团前锋部队1个营，坚守留守阵地，阻敌前进至当日午前，被敌包围，经反复搏击，营长刘玉池以下全部壮烈牺牲。陈家行小镇被日军炮火夷为一片焦土，原在该地守卫的173师1个营伤亡过重，被迫后退，阵地遂告陷落。当夜19时，173师519旅旅长庞汉祯率1个团进行夜袭，又将陈家行收复，但团附1人阵亡，营长1死2伤，连长以下伤亡更多。当晚该师师部和517旅与敌相持于孟家宅至陈家行一线。

在张家楼、湾宅方面，第171师阵地受到日军坦克部队攻击，几经交战，阵地失而复得，然该师损失甚重，团长1人负伤，营、连指挥系统在战斗中被打乱，已难以发动反击，仅能死守原阵地待援。

在谈家头方面，176师除以一部支援173师，其余部队向日军反攻，双方伤亡均极惨重，日军遭受痛击后，攻势顿挫。

在丁家桥、桃园浜、北侯宅方面，174师经连日战斗，其2个团损失殆尽，不堪再战。师部于22日调513旅的2个团接防。日军炮兵、空军的火力极猛，并以坦克助战，攻击异常激烈。513旅伤亡营长3人，团长和团附各1人负伤，无力突破敌之火力网发展攻势，



■ 日军的步兵炮阵地。

经奋力支持，阵地才未失陷。

10月23日，反击战进入第3天，也是最为关键的一天。21集团军的《战斗详报》以异常沉重的语言概括了这天的战斗：“本日敌之陆空步炮、战车、毒瓦斯等诸种火器，如狂风骤雨急剧向我阵地进攻，亦为本集团军参战以来最为惨烈的抗战之日。”担任反击的4个师，这天与进攻日军展开全线激战，伤亡空前严重，反击战被迫停止。

这天的激战，成为这次反攻战终于失败的一战。21集团军战至这天下午，在第一线参战的广西部队4个师，兵力损失在五分之三以上，已无继续作战的力量。朱绍良和陈诚于当日下午先后电令廖磊，将前线防务交由

第32、第14、第53师等部接替，将部队撤回京沪铁路以南、苏州河北岸进行整理。当晚20时以后，第7军和第48军的4个师开始撤出战场，从而结束了这一场历时3天的反击战。

在中央集团进行反击的同时，左翼集团也在10月21日至23日之间向广福南北一线日军举行反击。20日15时，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6军团军团长罗卓英发布命令，部署对“广福南北两侧地区及蕴藻浜南岸侧击，转移攻势”，规定上述地区各部队除守备阵地以外，以强大部队各编成数个突击队，向当面之敌进行攻击，并占领预定的阵线。左翼作战集团参加反攻的，有第98、第44、第60、第31、第58、第56师等各部。从21日晚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开始，各部突击队纷纷出击，当夜歼敌1000余人，攻占前进据点多处，98师进至南北梅宅，66军进至老陆宅，但战局未获大的进展。次日，日军在广福附近倾力进行攻击，敌我双方相与遭遇，战况激烈，第16军团部队攻势被阻。至23日，左翼军的反击战也陷于停顿。

大场的陷落

中国军队在蕴藻浜南北的大规模反击战遭到失利后，淞沪战局急剧恶化。日军陆空协同，向走马塘南北之线疾进。日军右翼第11师团从刘行南下，对大场中国守军的左翼实施打击。同时，日军主攻部队第9师团和第3师团，向大场阵地的右侧进行包抄。第101师团则从泗塘河两岸和新市区一带，向庙行、江湾进击，从中国中央集团的右翼发动攻势。从10月23日起，日军倾其全力，向走马塘南北一线发动决定性的进攻，而把攻击的主要方向指向大场。

大场位于上海市区闸北北郊边缘，走马塘由西向东流经其间；沪太公路自北而南，在这里与走马塘相交，进入上海市区，为上海市东北郊的一大交通枢纽。大场四周公路纵横，北至蕴藻浜仅4000米，西通南翔为9000米，南抵真如仅4000米，绕赴闸北亦只6000米，位居江湾与闸北的锐角点，为南

翔、真如之通道。如敌据大场，可为用兵之轴，而威胁中国中央军队的前方和后方。因而，大场是从上海北翼进攻市区的必争之地。当时，大场又是中国中央集团和左翼集团两大方面军的结合部。松井石根的“中央突破”计划，主要目标正在于攻占大场，割断中国中央与左翼两大集团之间的联系，围歼第9集团军等部，占领苏州河以北地区。上海派遣军早在10月4日就已制定了攻占大场的计划，“其方针是：主攻保持在第3师团右翼方面，即在顾家村—大场镇公路西面地区，10月8日或12日前后开始攻击，击败大场镇附近敌人，迅速进入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北面地区的敌人”。日军的10月间作战，正是为实施此项计划。

这时，从江湾、庙行向西，中经大场，西至南翔的阵地，已成为中国军队守卫苏州河以北市区的最后一条防线，如果此线失守，淞沪战场的北线就将崩溃，战局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已是非常严峻。为稳住大场东西走马塘之线，中央作战集团在23日晚调整部署，以第87、第3、第18、第33师共4个师退守庙行、许巷、大场、小石桥、郁公庙之线，作为第一线部队，另调第36师之1个旅于大场南侧待命。同时，左翼作战集团亦调第14师和第11师之一部，部署于南翔至新泾桥以南地区，协同中央集团防守走马塘西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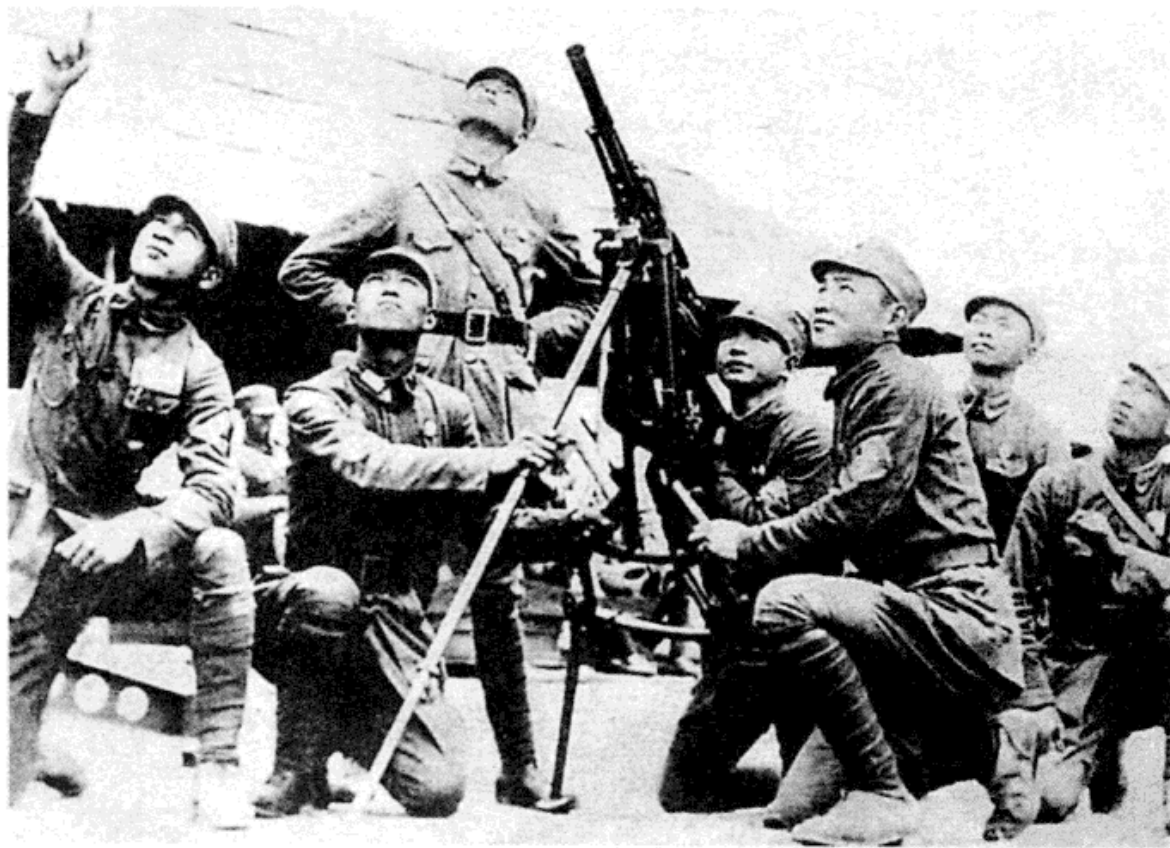
进攻大场的日军，在炮兵、坦克和空军

的支援下，连续发动强攻。中国军队在大场外围利用工事，组织火力，不断进行英勇的反击。日军第9师团和第101师团付出重大的伤亡，才得以逐步向大场镇左右两翼逼近。10月20日起，日军以重兵猛扑大(场)南(翔)公路，直趋大场之左翼，中国军队与之连日血战，阻滞其进攻。从刘行南下的日军，直扑大场以西的塔河桥宅，也遭到守军的顽强抗击。

10月24日至25日，双方继续展开激战。第87师主力在冯宅、庙行、李家楼之线，第3师在李家楼、许巷之线，第18师在大场、小石桥及胡宅至小石桥之线，第53师在新泾

桥、孟家桥之线，第33师在老人桥、凉泾桥之线，处处炮火连天，杀声震地，展开生死搏斗。24日，沪太公路上的马桥宅和季项宅阵地被日军突破，第18师和33师被迫后退。

25日凌晨，日军以20余辆坦克为前锋，掩护步兵数千人向第18师和第33师阵地进攻。战至拂晓，33师老人桥阵地被攻破。第33师苦战至当日15时，师长冯兴贤负伤，全师伤亡过半，无力再战，撤至安亭。第18师的小石桥阵地亦于同日黄昏被突破。第3师和第14师在小石桥南面之王家屯、老宅、谢家宅一带奋力抗击，战至薄暮，老宅和仙师庙



■ 正在对空射击的中国军队。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阵地也告失陷。至此，大场东西两面已被敌军包围，形势岌岌可危。

10月26日，日军继续猛攻大场。这时，中国军队的防线，从大场西面，经大场向东北而成一半圆形，绕于江湾之北。日军数次从正面进攻，均不得逞。最后才集中兵力，以40辆坦克作前导，从大场以西胡家宅、塔河桥等处强力突击，阵地才告失守。守军第18师和第87师之1个团抗击至当日午后，阵地全被摧毁，部队伤亡大半，一部分突围转移。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一片火海的大场镇。当日17时大场终于陷于敌手。守卫大场的第18师师长朱耀华将军，对于死守多日的大场镇的失陷，愤慨万分，怀着与镇共存亡的悲愤心情，于28日举枪自杀，枪响瞬间幸亏卫士手一拉子弹穿过右胸而未死。

大场失守，使得守卫庙行的87师、守卫江湾的36师、守卫闸北的88师等部，面临被日军包抄的危险，遂不得不向苏州河以南撤退。第三战区司令部以及左翼和中央两作战集团司令部，鉴于走马塘阵地被敌突破，大场失守，江湾、闸北的中央作战集团有陷入日军包围之危险，遂决定将在南翔以东、苏州河以北的作战部队，向苏州河以南转移。26日23时许，分别下令：“除一部据守京沪铁道沿线各要点外，将南翔以东阵地，逐次转移于吴淞江（苏州河）南岸。”

大场、江湾和闸北的陷落，中国军队退

守苏州河南岸，标志着蕴藻浜、走马塘中间地带之战，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淞沪会战中的阵地战高潮也由此宣告终结。

在蕴藻浜、走马塘中间地带进行的10月鏖战，把阵地战推向了高潮，出现了淞沪会战中空前壮烈的一幕。中国军队浴血奋战20余天，虽然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日军所受的打击也是沉重的，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而且，从蕴藻浜至走马塘南北不足20公里的距离，日军用了整整25天时间，平均每天向前推进不到1公里。在部队素质、武器装备、火力、空中保障等等各方面条件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军队抗击时间如此之久，充分说明了中国军队奋战之英勇。

许多官兵负伤不下火线，宁死不退，表现了中华儿女不怕牺牲的精神。当时担任第1军第1师4团1营营长的贾亦斌，回忆蕴藻浜战斗的情景道：“一天我带着刘光前营附和一名传令兵到阵地前沿侦察。我正带着望远镜向前瞭望，日军发现了，立即打来了一阵炮火，传令兵当场被炸死，刘营附负重伤。我的帽子被气浪掀掉，上身军服被炮弹片炸破，头部负伤，鲜血不停地流了下来，一时昏倒在战壕里。当时不少人还以为我被打死了。苏醒过来后，我继续带领全营官兵坚守原阵地，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在20多天的战斗中，每天我营都有许多官兵牺牲在阵地上，连尸体也运不下来。白天难以活动，



■ 连日鏖战日军进展迟缓。

我就在晚上带着官兵爬进战壕，搬开官兵的尸体，腾出地方，连夜抢修战壕，以便第二天继续与日军对抗。我对官兵们说：‘弟兄们，要趁着夜晚，赶快挖好战壕。我们胜利了，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复兴地；如果我们牺牲了，也是为自己准备好坟墓！’大家都抱有必死的决心。”

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上将之一的陶峙岳将军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敌我双方不断增兵，敌人势在必得，我军志在死守。我知道任何局部的挫折，都会牵动全局，我们必须与阵地共存亡。无论官兵，思

想上只有国家民族，个人安危已置之度外。因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在蕴藻浜与敌人周旋了21个日日夜夜，阵地安如磐石。部队每天处在战火硝烟之中……战斗之频繁激烈为前所未见。……后来有人问我，在当时那种艰苦的条件下，怎么能坚守21个日夜的？我说：‘就是两个字：死守。’”

尽管广大官兵英勇奋战，数以万计的官兵为国捐躯，但中国军队仍未能够守住蕴藻浜和走马塘两条防线。10月恶战，中国军队损失了在前线参战的全部兵力的约一半。淞沪前线70万部队，11月初撤到新阵地后，只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剩下不足40万人了，几乎每个师都已遍体鳞伤，精疲力竭，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

这一失败，从战争指导上来说，除了中国军队进击上海市区和长江沿岸阻击战的贻误，造成的消极后果外，10月之战在战略战役指导上也有严重失误。在战役上违反了速决战和歼灭战的原则，企图以战役战斗上的持久和消耗战来达到战略上的持久和消耗，以致造成中国军队丧失主动权，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10月之战，不仅没有接受9月间潘泾至杨泾之间进行阵地战的教训，而且把阵地战推到了高峰。这个错误的作战方针，完全违背中日两军各个基本条件的对比状况，也完全不适合淞沪地区的地理等各方面的自然条件；正是在阵地战中，中国军队遭到了不应有的惨重损失。

10月之战，前方指挥机关除继续采取以往惯用的“车轮战”方法外，特别是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战，企图以反突击来扭转战局，这是与9月作战不同的。这次反击战，是3个多月淞沪会战中唯一的一次较大的反突击战役。蒋介石、白崇禧、陈诚、顾祝同等人曾寄以厚望的这场反击战，却短短3天多就遭严重失败。这一挫折，从战役指导而论，实际上是10月之战指导方针和作战指挥失误的一个集中表现。

这次反击战，事先未有周密的论证和充分的准备，是为挽救危局而仓促采取，带

有很大的冒险性。其作战企图，一方面是为了挽救大场以北，走马塘一带的濒于危急的战局，另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在国际联盟的外交活动，以军事上的反攻造成中国在九国公约会议开会时的有利地位。广西部队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部队，但面对拥有强大炮兵和坦克，掌握完全的制空权，训练有素的日军，却是毫无经验。曾率部参加南翔反击作战的第14师参谋长郭汝瑰回忆道：“两广部队战士确实勇敢，但不熟悉阵地进攻方法，不知压制敌人火力点，只凭血肉之躯猛冲，故伤亡甚大，不得不撤退。”当时，在大本营第一部任作战组组长的刘斐，对白崇禧策划这次反击战的失误颇不以为然，后来指责说：“这些人不知道现代战法，只凭一股勇气，拿着刺刀向坦克冲锋，自招死亡，不败何待，今后训练部队，指挥作战，应当切戒。”

此外，10月之战在作战部署上也有失误。日军在10月初把主攻方向由杨泾河一线，转到蕴藻浜一线，集中第3、第9和第101师团，由北而南，向大场为中心的地区实施“中央突破”计划时，战局重心开始南移。这时中国左翼作战集团受到的压力明显减轻，而中央作战集团则急需加强，但第三战区司令部未能按敌情的变化而调整兵力部署。10月下旬反击战的部署也有失误，未将反突击的重点指向敌军的侧翼和薄弱部位，

而是以主力指向敌军重兵集结的主攻方向。郭汝瑰在回顾此战的得失时指出：“如果不只在南翔以东对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实施反突击，而是保持主要突击于广福前线，由南翔到罗店全面反攻，敌人侧背到处有弱点，给敌人以一定打击是可能的。事后有人告诉我，原来也准备由广福方面反击，但南翔以东正面坚持不住了，故匆匆忙忙对着敌人主攻方向反击。这是以主力对主力的顶牛，不要说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即便对等装备也会失败的。”

在大场、江湾和闸北陷落后，淞沪战局形势骤变，中国中央作战集团和左翼作战集团在南翔以东、苏州河以北的防御体制已告崩溃，再也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了；而且，中央集团的归路将被敌截断，面临全军被歼的危险。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为解除中央作战集团侧面所受威胁，摆脱危境，决定对战线进行重大的调整，实行局部性的战略撤退。

10月26日午夜，顾祝同、陈诚先后下达命令，中央和左翼两大作战集团将小南翔以东阵地逐次转移于苏州河南岸。中央作战集团留一部兵力守卫沪宁铁道沿线附近的北站、彭浦、真如车站、暨南新村、真如镇、倪家弄等要点，迟滞敌军南进，掩护主力撤向苏州河以南。在河南岸的上海西站、丰田纱厂、北新泾镇、姚家渡一线占领阵地。左

翼作战集团，除以少量兵力在南翔东面附近各据点阻敌前进，浏河、广福、南翔之线固守现有阵地外，其南翔以东主力转移至苏州河以南之姚家渡、江桥镇、小南翔、唐家桥之线，建立新的阵地，阻敌南下。其所属第19集团军，则在洪桥浜、陈家宅、洛阳桥、新泾桥西端各要点，抗击敌军的前进。26日深夜至27日，中央和左翼两大集团实施撤退计划，迅速转移到苏州河南岸。

这时，蒋介石为试图争取国际联盟和西方英美等列强干预，对日本施加压力，仍拒绝命令淞沪前线大军后撤吴（县）福（山）线和苏（州）嘉（兴）线等既设国防线，力主在苏州河南岸和浏河至嘉定和南翔之线坚守，以配合外交战略的需要。为此，南京统帅部一方面继续从四川、湖南、河南等地调集部队，日夜不停地赶赴淞沪战场，另一方面，根据战局的重大变化，调整和重组战略作战集团和指挥系统。还在蕴藻浜、走马塘中间地带战役进行之时，四川部队的2个军团，唐式遵率领的第24军团的3个师和潘文华率领的第25军团2个师，正按照南京统帅部的命令，日夜兼程向上海输送，至10月底以前出河南新乡南下。东北军第67军，在军长吴克仁的率领下，也正由河南由陇海线东运，奔赴上海增援。此外，第79师陈宝安部正从河南新乡调至沪杭线上的嘉兴，贵州部队第102师柏辉章部也从江苏江阴长江防线调至沪

西苏州河南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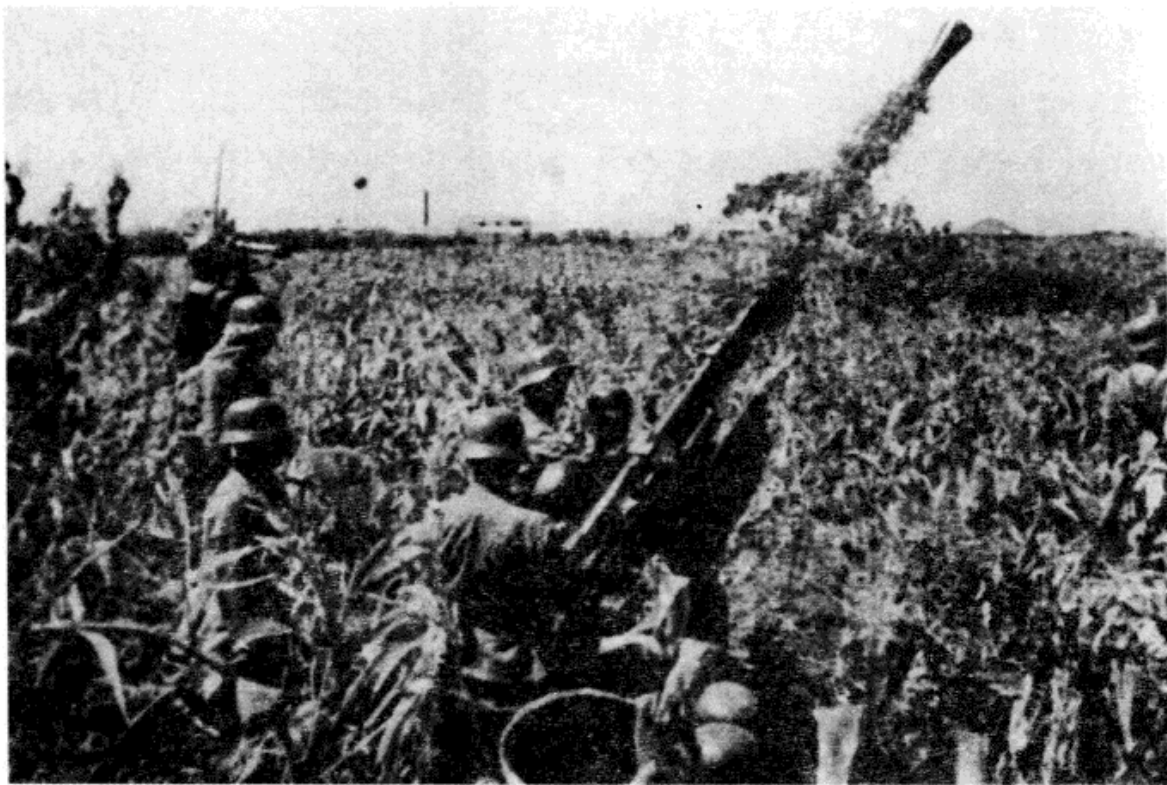
第三战区以淞沪前线作战线的正面缩小，乃决定撤销中央作战集团，改为左、右两个作战集团。左翼作战集团辖第15、第19、第21等3个集团军，主要担任沪宁线方向的作战，由陈诚统率；右翼作战集团辖第8、第9、第10等3个集团军，担任上海市区、浦东和沪杭线方向的作战，由张发奎统率。同时，将淞沪前线的炮兵部队集中统一使用，并将长江在江阴以东的江防、杭州湾南北两岸及太湖的水上警备，统一纳入上海防御作战的体系。11月4日，正式组成左、右两大作战集团。

苏州河南岸阻击战

10月26日晚至27日，中央作战集团主力和左翼集团一部南撤至沪西苏州河以南，至江桥镇、小南翔之线。南下的日军因连续作战，兵员与武器耗损甚大，后续力量不及，已无力发起强大的追击。27日和28日两天，前线并无大的战斗。然而，退至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也已下降到空前低落的地步。

在日军大举压境之下，中国军队秩序井然地向沪西苏州河南岸转移。

中国军队在苏州河南岸的防线是在非常仓促和紧张的情况下构筑起来的。从沪西的



■ 正在对空射击的中国军队高射炮部队。

淞沪会战第二期战斗序列

左翼作战军 总司令 陈诚
 第15集团军 总司令 陈诚 (兼)
 第18军 军长 罗卓英
 第11师 师长 彭善
 第13师 师长 万耀煌
 第14师 师长 霍揆彰
 第44师 师长 陈永
 第60师 师长 陈沛
 第67师 师长 黄维
 第74军 军长 俞济时
 第51师 师长 王耀武
 第58师 师长 俞济时 (兼)
 第1军 军长 胡宗南
 第1师 师长 李铁军
 第78师 师长 李文
 第39军 军长 刘和鼎
 第56师 师长 刘尚志
 第19集团军 总司令 薛岳
 第4军 军长 吴奇伟
 第59师 师长 韩汉英
 第90师 师长 欧震
 第66军 军长 叶肇
 第77师 师长 罗霖
 第159师 师长 谭邃
 第160师 师长 叶肇 (兼)
 教导旅
 第75军 军长 周岳
 第6师 师长 周岳 (兼)
 独立第314旅 旅长 罗启疆
 第69军 军长 阮肇昌
 第8师 师长 陶峙岳
 第15师 师长 王东原
 第16师 师长 彭松龄
 第57师 师长 阮肇昌 (兼)
 第32师 师长 王修身

中央作战军 总司令 朱绍良
 第9集团军左翼指挥官王敬久
 第71军 军长 王敬久
 第87师 师长 王敬久 (兼)
 第78军 军长 宋希濂
 第36师 师长 宋希濂 (兼)
 直属部队 第61师 师长 钟松
 独立第20旅 旅长 陈勉吾
 炮兵第3团 1个营 团长 卢蔚云
 重迫击炮 第3营
 战防炮 第1营
 第9集团军右翼指挥官 孙元良
 第72军 军长 孙元良
 第88师 师长 孙元良 (兼)
 直属部队
 第18师 师长 朱耀华
 上海市保安总团 总团长 吉章简
 炮兵第3团 1个营 团长 卢蔚云
 战防炮 第1营1连
 步兵学校 小炮排
 右翼作战军 总司令 张发奎
 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 (兼)
 第28军 军长 陶广
 第62师 师长 陶柳
 第63师 师长 陈光中
 直属部队
 第55师 师长 李松山
 独立第45旅 旅长 张奎基
 炮兵第2旅 (第2团) 旅长 蔡忠笏
 第10集团军 总司令 刘建绪
 第70军 军长 李觉
 第19师 师长 李觉 (兼)
 直属部队
 第45师 师长 戴民权
 第52师 师长 卢兴

法华镇、曹家渡、沪杭铁路上海西站一带，经北新泾西迄姚家渡，沿苏州河北至江桥镇，从东向西，依次由第88师、税警总团、第36师、第1军、第46师等部担任守卫。在虹桥地区集结待命的，有第3师、第61师和第87师。从姚家渡西向江桥镇直至南翔一线，则由左翼作战集团的第16师、第19师、第6军、第53师、第14师、第11师和第57师等部担任守卫。

苏州河在南翔以东至沪西这一段，河面较阔，很少有桥，只有沪西有沪杭铁路桥和中山西路公路桥，南翔附近有一座可通汽车的大木桥，其他过渡全靠船只。中国军队南渡后，沪西的铁路桥和公路桥被工兵炸毁。沪西市郊一片旷野，既无地形可作屏障，也无建筑物可以依托，唯一可资阻敌的障碍是苏州河。这段河面虽较阔，但河幅约100米，愈向西愈狭窄，周家桥、姚家渡一带只有40米不到。南岸的工事仓促构筑，甚为简陋。敌方空军又极为猖獗，守军在白天的活动极为困难。苏州河南岸阻击战，又是一场极为艰苦的而无胜利把握的战斗。为了配合国际方面的对日外交斗争，南京最高统帅部仍然决定要在这一战线上再坚持一段时间。

正当战局发生重大变动之际，南京最高统帅部在重组左右两翼作战集团的过程中，却下令由张发奎接替朱绍良，指挥原中央作战集团所辖各部队。这对于危急时刻的作战

指挥是非常不利的。张发奎在战后忆述这段往事时，仍不免怀有深深的遗憾：大场失守后，“以当时的情况判断，敌人似有从大场以西向左右席卷的行动，朱绍良将军这时忽奉命调任甘肃省主席，所遗中央兵团的任务，最高统帅部即令我去接任，并将右翼方面的指挥责任交给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将军接替。这时刘集团军的部队方从杭州向前推进，我一面担忧沿海地带的侧面和刘集团军能否确实接防，一面又感于上海方面的紧张状况，将如何去挽救这危殆的局面。我此时陷入了无限的焦虑，以沉重的决心，担当这残破而没有把握挽救的局面，这在我的生命中最痛苦的记忆”。

苏州河畔的阻击战，以88师谢晋元团在河北岸四行仓库的孤军奋战为序幕。在“四行孤军”英勇奋战的同时，苏州河南岸的阻击战也随之展开。10月27日，敌军南下的先头部队渡过虬江。28日至29日，掩护全军后撤的中国军队第36师，在虬江南岸与敌军接战不久，随即南移。28日，日军进抵苏州河北岸。在西线，日军在28日攻占了真如镇，越过京沪铁路，南下到达苏州河北岸。29日，日军开始发起强渡苏州河之战。攻击重点指向北新泾及其东西两面，在北新泾以东着重进攻刘家宅和周家桥，在北新泾以西则以主力猛攻姚家渡和姚家宝。日军以第3、第9两个师团为渡河的第一线部队，第101师团

随后跟进，同时，以第11师团从蕴藻浜沿岸向西进窥，攻击南翔中国守军。

10月29日，松井石根对苏州河沿岸战斗计划，作出如下部署：“主攻保持在北新泾—陈家桥公路两侧地区，以第3、第9师团11月2日前渡河，第101师团集结在上海西北侧，准备继第3师团渡河，第11师团面对南翔方面的敌人，掩护（派遣）军主力的右侧。”日军投入苏州河作战的地面部队，约为5万人。

10月30日，日军在光复西路向苏州河南岸第88师防地发动进攻，企图突过苏州河，但被守军击退。同日，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向苏州河南岸的丰田纱厂、北新泾镇、屈家桥等地实施集中轰击。中午12时，日军主力

借炮兵的弹幕及烟幕掩护，强行渡河。河南岸的周家桥村因地形利于日军隐蔽接近，被日军乘隙攻入，当即与驻守的税警总团一部发生激战。另一股渡河之日军，同时向刘家宅税警总团阵地猛攻。总团长黄杰赴前线直接指挥部队发起逆袭，经数度冲杀，逐屋争夺，双方死伤惨重。在日军后续部队的增援下，刘家宅终于失守。接着，日军又攻入周家桥村。31日，36师前来增援，协同税警总团，反攻刘家宅，但未能将其收复。当日黄昏，日军在88师与税警总团两部阵线之间建立一个桥头堡。

11月2日，日军一部在周家桥方向渡过苏州河，在河之西南岸立下一处据点。3日拂



■ 正在苏州河南岸英勇奋战的中国军队。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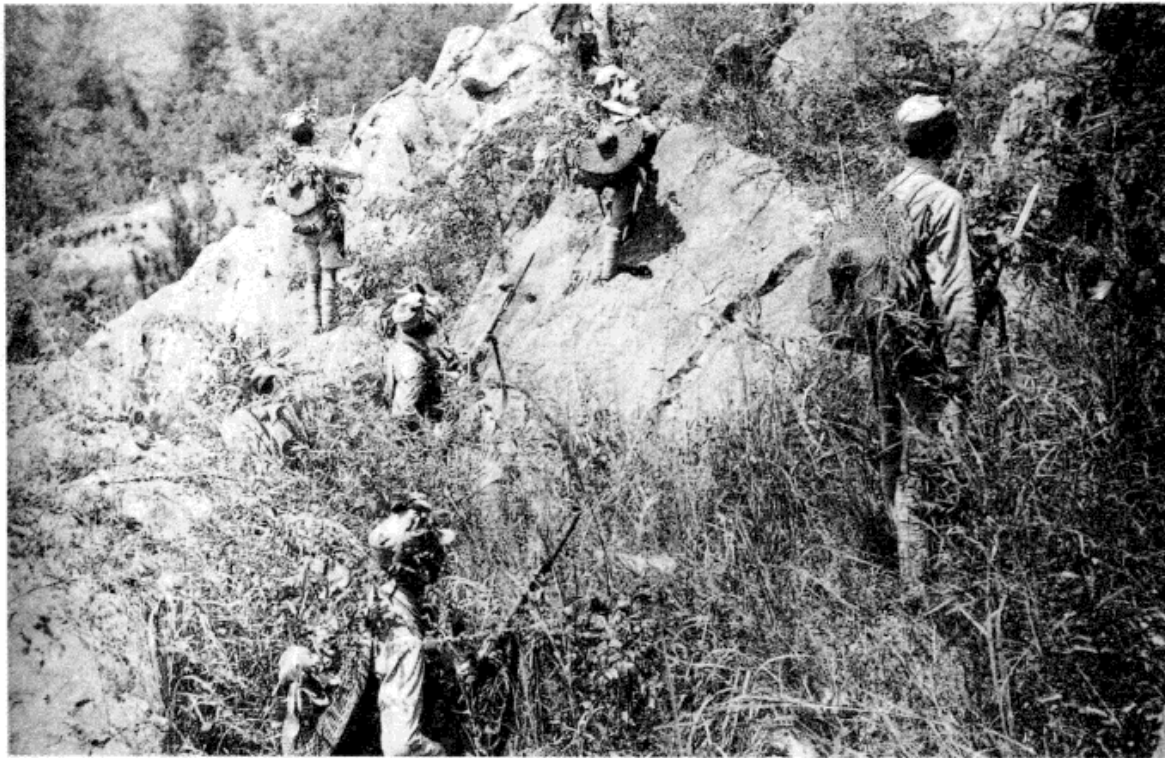
晓起，日军以空军掩护渡河部队，向税警第5团阵地猛攻，该团奋勇抗击，团长丘之纪阵亡，官兵伤亡过半。税警第4团当即发起进攻，攻占刘家宅南部，日军占据北部村落顽抗。双方遂演变为逐屋逐室的争夺战。同日下午18时，第36师开始接防税警总团在周家桥一带的阵地。在姚家宝(姚家渡之北)方面，11月1日，日军千余人攻陷姚家宝第46师阵地。3日，第46师发动反攻，将姚家宝收复，但该师遭受严重伤亡。第67师随后由南翔附近赶来苏州河南岸增援。11月5日，67师3个团进入北新泾、厅头镇一带，另以1个团控制于八字桥。该师与据守姚家宝的46师并肩战斗，抗击敌军对北新泾的进攻。11月6日，46

师在日军的猛攻下向后溃退，67师在厅头等地与日军展开反复争夺，前赴后继，逐屋拼搏，迟滞了日军攻势。这时，教导总队奉调由南京前来增援，接替67师的阵地防务。在八字桥附近，教导总队连续血战4天。此外，第1师、第40师、第102师、第78师等部队也都参加了战斗。

不到10天的苏州河南岸阻击战，中国军队从全局上说，始终是处在被动挨打的状态之下，从未组织过有效的反击。从个别部队而言，也有些灵活机动的作战，收到歼敌制胜的效果。第1师4团在北新泾公路桥附近，沿河岸深掘战壕，在低于河平面之处掏出射击孔，士兵隐蔽在战壕里，既有利于防空，



■ 正向日军猛烈射击的中国军队轻机枪手。



■ 苏州河南岸阻击战，中国军队始终处在被动局面。

又能监视对岸日军的动静。当日军乘汽艇、木船渡河时，由于双方短兵相接，日军的优势火力无从发挥，日军的几次渡河企图都被击退。第102师在北新泾以西作战，采取主动出击、以多胜少的战法，以2个团向敌1小股实行包围，取得了击退当面敌军的战果。

至11月3日前后，日军在刘家宅、吴家库、厅头镇、北新泾、姚家渡等地建立桥头堡，在苏州河南岸开辟了若干个前进阵地。其第9师团一部从蕴藻浜、陈家行一带南下，已于11月1日进占北新泾之部分阵地。从杨树浦、虬江方面西犯的第3师团，在10月28日攻占真如后，于31日至11月1日间前出真如以南苏州河南北沿岸，并于11月9日攻陷龙华。第

101师团在攻入大场后，其主力一部编为佐藤支队，在11月11日渡过黄浦江，进占浦东。至此，中国军队在南翔以东的苏州河阵线已被敌突破，呈现全线动摇之势。

正当10月底日军开始攻击苏州河河防时，蒋介石于10月28日在顾祝同等人的陪同下来前线视察。当时，即将卸职的朱绍良提出增调炮兵，除原已参战的炮兵第3团2个营和教导总队炮兵营之外，增加重炮兵和野战炮兵各1个营，共组成5个营的炮兵部队，得到蒋介石和顾祝同的准许。其时，炮兵总指挥邹作华也力主集中炮兵主力对付敌人，他“认为那时情况，步兵既不能解决，非用炮兵不可……以五营炮兵的力量，威力很大，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对过河之敌，必可歼灭”。然而，调集炮兵的命令发出后，炮兵仍迟迟未进阵地。11月2日，邹作华赶到北新泾直接察看炮兵集结情形，发现不但炮兵并未入阵，就连那个由蒋介石亲自指定，担任统一指挥5个炮兵营的炮兵团长，也并未上前线，而是待在方家窑车站。后来，当炮兵各营调集就绪后，邹作华与张发奎、朱绍良之间，又因步炮两军如何协同的问题争论不休，以致直到日军在金山卫登陆，这一计划迄未付诸实施！

苏州河南岸阻击战的失利，从军事上来说，乃是10月间蕴藻浜、走马塘战役失败直接导致的结果。10月之战，中国军队在阵地战高潮中损失巨大，元气大伤，这是作战

实力上的原因，同时，在作战指挥上也有失误。统帅机关对于苏州河作战在事先并无预案，直到10月会战高潮时，对下一步作战仍未进行准备，直到10余万大军匆匆撤到河之南岸，才临时组成阻击阵线。前线指挥机关“临阵换将”，朱绍良与张发奎临时交接，难免会给指挥造成相当的混乱。作战的战术上，各部队几乎都沿袭苏州河以北作战的陈规，在河南岸构筑简单的工事，消极地待敌来攻，较少对使用船艇和架桥过河的日军采取有效的歼灭手段。步兵和炮兵之间又缺乏协调一致的行动。从政治上观察，苏州河作战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属于政略层面的。蒋介石之所以要在苏州河南岸特别是在沪西



■ 中国军队的炮兵阵地，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始终未能将有限的炮兵部队集中起来使用。

进行一段时间的阻击战，其着眼点，主要是为了配合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上的外交斗争，同时也是为了守住沪西和南市这2块市区地域，以保持与上海租界之间的最后一个联系纽带。由此而来的是作战指导上走一步看一步，带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

蒋介石的犹豫不决

从八一三揭开战幕的淞沪会战，经过上海市区围攻战、长江南岸抗登陆战、狄泾至杨泾间阻击战、蕴藻浜至走马塘中间地带会战，以迄苏州河南岸阻击战，至1937年11月初，已历时近80个日日夜夜。中国军队从最初在市区举行战役进攻作战，到日军在长江沿岸实行登陆后一段时间战役相持阶段，再转到以后的战役防御作战，又发展到苏州河以北阵线的崩溃和大规模向南撤退。在这近80天时间里，中国军队歼灭了相当数量的日军，吸引了5到6个师团的日军于淞沪战场，相应地减轻了华北战场中国军队所受的压力；而且，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气壮山河、同仇敌忾地英勇奋战，对全国抗战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国际上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言，中国军队在这场规模巨大的旷日持久的会战中，伤亡实在惊人，付出的代价也确实太大了，而且，

如此打法显然难以持久。站在战略的高度来审视，作为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具体战役，是否应当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这符合持久消耗敌人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总方针吗？在淞沪地区这样一个特定的具体环境里，中国军队应当选择在这里与日军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持久战，还是应当知己知彼，权衡轻重，着眼全局，适时地调整战略计划，把几十万大军转移到对中国军队有利的地方，保存力量，以利再战。从10月上旬以来，这些有关淞沪会战的战略问题，在南京大本营里，在国民政府一些高层军事决策人物中，已逐步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尽管这些问题的最高和最终的决策权，是操之于蒋介石一人之手，但不同的意见依然不时地被提了出来。

本来，在八一三事变前夕于南京召开的，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参加的国防会议上，国民政府已确定了“持久消耗”为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即战略总方针。针对日本采取的速战速决战略，决定中国应实行持久消耗战略，因为中国军备虽处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国家潜力大；并且中国是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有哀兵必胜、得道多助等有利条件。因而，中国应当采取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消耗战。当时，在国民党的高层军事将领中，多数人都认识到，“应利用我地大物博、人口

众多的有利条件，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消耗战略”。据当时在南京大本营第一部（作战部）担任作战组组长的刘斐的回忆，上述“这些意见，在当时大本营得到许多人的同意，就成为当时指导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思想”。

其实，淞沪战役的原本的战略战役构想，是按照上述“持久消耗”的总战略而设计的。据战时在第9集团军司令部担任作战科长的史说回忆，“原先在京沪地区抗战计划内，预定淞沪抵抗后，逐次撤退至吴福线、锡澄线，作持久作战”。

以淞沪战争的实际进程而论，在10月初的敌我两军态势，已足以引起中国统帅机关下决心调整战线，将淞沪前线四五十个师的部队主动转移到预设的第一道国防线，即吴（县）福（山）线和乍（浦）平（湖）嘉（兴）线，待机歼敌。因为，中国军队在上海市区的围攻战陷于僵持状态已达40余日，绝无可能出现突破局面；而自8月下旬以来，吴淞、宝山、罗店、月浦都已失守，先后4次反攻罗店均未得手，蕴藻浜北面的重要据点刘行和顾家镇接着也被日军攻占。同时，战场作战的实际状况，也已无可争辩地表明，根据中日两军的各方面基本要素和条件，中国军队绝不适宜在利于日军陆海空三方面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平原地带，进行没有胜利把握的战役决战，更不宜打一场旷日持久的

孤注一掷的战役持久战和消耗战。

对于淞沪战局的上述态势和利弊得失，在第三战区的前线高级指挥官中和南京大本营的高级幕僚中，已有一些人早有察觉，并向蒋介石提出将淞沪前线部队适时向京沪、沪杭间之既设国防线转移，避免旷日持久的阵地防御和战役决战的建议。

在9月间于松江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等人主张沪战应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以逐次抵抗消耗敌人兵力而保存国军实力，以利以后之长期作战”。这一建议在当时提出，其实是很及时的。但据张发奎回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最高统帅部否定了这个建议，他（指蒋介石）的意见以为上海是军事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来确保这个地区”。

陈诚9月20日前在指挥刘行保卫战期间，曾向蒋介石提出过类似建议，他在1946年关于淞沪会战的忆述中说道，9月14日，“到刘行指挥，为要长期抗战，须转移阵地，逐次抵抗”。但蒋介石也未采纳此议，他对陈诚的答复是：“为要取得国际同情与认识，尚欲死守刘行。”

在南京，大本营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和作战组组长刘斐在10月初向蒋介石陈述建议，主张“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及时向吴福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护自己的战斗力”。李宗仁也在10月中旬当面向蒋介石提出类似的建议。他是于10月12日

从武昌抵达南京的，过了几天，就面陈蒋介石：“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同时他也主张中国军队宜从淞沪前线先后撤至苏州、嘉兴一带国防线上既设阵地，凭险固守。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其上述建议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刘斐和白崇禧提出的建议，开始时同样未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后来又再次提出，终于“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对前线各部队向吴福线转移的命令都已下达，前线已开始执行”。

在下达前线部队转移的命令后的第二天，蒋介石突然召集一次紧急会议。据刘斐的回忆，蒋在会上说，九国公约正在开会，只要中国军队在上海能够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可能会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要收回撤退成命，要各部队仍在原阵地死守。当时，白崇禧、刘斐表示反对，认为既然已下达转移阵地的命令，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如要再返回原阵

地，定会引起混乱。蒋介石坚持己见，并决定亲自去前线召集会议进行说服和部署。10月28日晚，蒋介石到沪西苏州河前线巡视，面对前线将领，他反复重申苏州河防线必须“死力固守”：“现在我们右翼阵地已移到苏州河的南岸，这是我们沪战最后的一线，也是我们保护上海最后一条生命线。我们要保存上海，以保持东南唯一的门户，就要抱定最后牺牲的决心，死守这一线阵地。”

11月1日晚22时左右，蒋介石到南翔附



正在研究战局的蒋介石和高级将领。

近，召集前线师长以上的将领会议，宣布上海之战要再坚持一个时期。据会议的参加者之一、时任78军军长的宋希濂回忆，蒋介石说明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时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根据南翔会议上宣布的上述决定，如果不是日军在11月5日于金山卫一带登陆，蒋介石原定的意图，是打算在苏州河以南到南翔南北这一阵线上，至少坚持到11月10日至15日之间，然后再定夺退守之策。

蒋介石不断扩大淞沪战役规模，迟迟不愿调整战线、主动后撤至京沪间既设国防线，其意图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因素，牵涉内外远近。在这里，有两个意图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军事上，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日军于淞沪战场，打乱日军的预定计划，减轻华北战场中国军队所受的压力。对此，淞沪战争结束不久，蒋介石在开封军事会议上曾作过说明：“我们这次为什么要在上海作战呢？就是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同时，也包含有以江南地区为主要战场，在兵力集结、交通运输、后勤供应、作战环境等方面，比之于在华北作战，对中国军队较为有

利等种种考虑。当然，从历史的眼光予以评析，上述作战指导思想，也是得失互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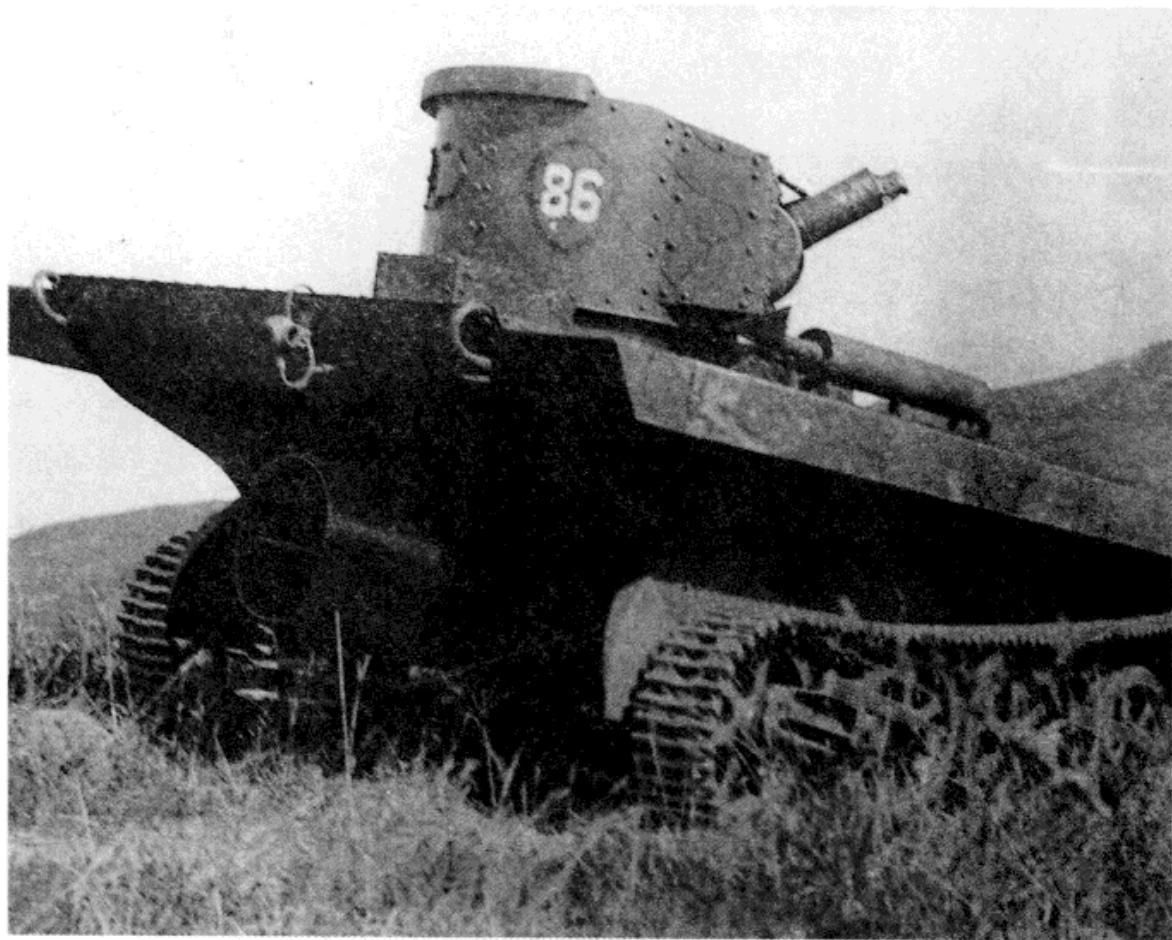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蒋介石对淞沪战争始终抱有这样的企图：即以淞沪之战促使美、英、苏等大国出面干预中日战事，使中日事变国际化，推动国际联盟方面进行和平调停，甚至制裁日本，至少也要造成日本在外交关系上陷于孤立地位。这就是所谓的“以战略促政略”的策略。在9月间的松江军事会议上，针对张发奎等将领主张沪战应适可而止的建议，蒋介石当场说明他的上述主张，在会上说道：“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

当战局发展至10月下旬，淞沪前线已是出现反攻无效、增援已穷、无力再守的态势，蒋介石遂不得不接受建议，决定下令部队转移。但是，因为对国际干预的期望始终不灭，当他看到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召开在即，于是又改变主意，收回部队撤退的命令，下令要坚守苏州河以南一个时期。9月下旬刘行失守时，未适时转移，反而引来10月阵地战高潮，已是得不偿失。迨至10月下旬大场陷敌时，他出尔反尔，未当机立断，未主动地向吴淞线和苏嘉线退兵，仍固执己见地要在苏州河南岸硬拼，从而直接种下了11月8日以后一场大溃退的惨重恶果。

退与守之间的反复徘徊，正反映了蒋介石

石对国际干预中日战争的一厢情愿。诚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外战线上，包括在国际联盟内外，为争取友国、孤立日本所作的种种努力，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但是，把淞沪作战直接服从于外交斗争上的某些具体举措，而不顾战争的实际情况，屡屡作出违反“持久消耗”战略总方针的作战部署，则对淞沪抗战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严重损失。这正如陈诚1938年2月在武昌回顾

这场会战时，不无痛惜地指出的：“这次战略受政略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那么，这里所谓的“政略”在当时又是指的什么具体含义呢？简要归结起来，可列为2项：一是企图以九国公约会议为契机，推动美、英、苏等大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二是推动九国公约出面对日本实行制裁。在蒋介石看来，为达到这两项目标，中国军队都必须在上海固守一个时期。



■ 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的坦克和飞机大炮。

第四章

惨烈决战



从华北到华东：作战重心的转移

淞沪战场上的10月鏖战，是这次会战中的决战高潮。在这一决战的胜负尚未见分晓之时，日本军部且在1937年10月上旬至下旬，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策定将对华作战的主战场由华北转到华东，并且迅速组建第十军，完成了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作战的准备。

这一新的重大的侵华战争的举措，是由日本参谋本部提出和策划，得到海军军令部的积极配合，最后获日本天皇裕仁的亲自批准。从10月4日起，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

长下村定召集会议，就今后对华作战方针问题进行谋划，着重讨论的问题是：今后“是把华北方面的作战扩大、进行山东作战呢，还是适可而止把华北作战停止在一定地带，而把兵团调到上海方面？”会上，以下村定为代表的，主张将主要战场由华北转移到淞沪、向上海再次大规模增兵的意见占了上风，在参谋本部内获得通过。10月5日，参谋本部决定从华北调用兵力，把主要战场转移到上海方面。10月6日，日本参谋总长将下一步作战计划上报天皇裕仁，其中强调用兵重点要置于上海，以求迅速结束上海战局。这一计划当即获裕仁批准。



■ 日军高级军官与西方列强的驻华武官在一起。

淞沪会战中中国的外交努力

淞沪会战中，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企图征服中国，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声讨其侵略罪行，寻求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谴责和制裁，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是当时中国外交努力的主要目标。

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单靠中国是很难打败日本，必须争取和依靠西方列强的支援，才能最终战胜日本。这一观点日后便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外交战略，而淞沪会战期间的外交正是这种外交战略的初期实践。因为在西方列强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上海发生战争，势必引起各国的关注，并从各国的利益出发，介入这场战争。南京政府也非常重视外交努力，寄予了极大希望，并不惜为此在军事上全力配合，甚至为此错过了在日军登陆后主动进行全线调整以改变不利态势的良机。

8月13日，即战争爆发的当天，英、美、法、意、德五国驻沪领事提出了第一个调停计划，提议日本撤回派往上海的增援部队，只留下一支警备队保护侨民。中国也将正规军撤至战前的驻地，保安团也撤至租界2英里外，只留驻警察。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拒绝，中国则以西方列强必须先保证日本履行协议，否则不予接受。因此这一调停失败。

8月18日英国提出在上海设立中立区的建议，中国表示在保证日本从中立区撤军停战，并不妨害中国自卫立场的前提下接受这一建议，日本则拒绝了这一建议。

8月25日，日本宣布对从上海至汕头之间的中国海岸实行封锁。9月5日宣布除青岛和第三国租界地以外的全部中国沿海进行封锁，同时对中国领水内一切船只保留查验之权。中国驻英、美、法的外交官努力使三国联合抵制日本的这一封锁，但英国9月11日宣布英国商船在两个条件下接受日本的检查：1.如果英国军舰通过，必须被允许通行；2.对英国军舰以外的英国船只的检查必须马上通知英国海军。9月14日美国宣布在另行通知前，美国政府所属船只将不向中国或日本运送1937年5月1日总统声明中所列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悬挂美国国旗的其他船只运送上述物资到中国或日本的，风险自负。这样英国、美国等于认可了日本的封锁行为。

8月21日，在南京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不但声明不与中国为敌，还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这是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

8月30日，中国向国际联盟理事会提交了关于日本侵华事件的声明，提请国际联盟审议。9月7日又提交了关于日本侵华的补充声明。9月12日提交了中国政

府的申诉书。9月13日国联大会开幕，16日讨论了中国的申诉书，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查明日本犯有破坏条约的罪责，正式以文字形式指责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声明大会对于中国予以精神上的援助，建议成员国应避免采取一切结果足以减少中国抵抗能力，致增加中国在现时冲突中困难的行动，各国单独协助中国抵抗日本。同时决定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来讨论中日冲突。国联大会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只是给了中国道义上的支持和声援，但毕竟还是对中国有了积极的意义。

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防疫隔离演说》，指出目前国际上毫无法纪的瘟疫正在蔓延，他将战争比喻为传染性的瘟疫，因此当出现战争瘟疫时，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坚持表达和平的愿望，以使那些图谋破坏彼此间协定和他国权利的国家停止其行为。这篇措辞强硬的演说，大大鼓舞了中国的抗战。

11月3日，九国公约国家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幕。11月24日宣告休会。这次会议，无论是对日本进行制裁，还是对中国提供援助，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结果，但在道义上支持和声援了中国，谴责了日本，使中日问题“国际化”，打击了日本企图将中日冲突“孤立化”的图谋。同时使国际社会更清楚地了解了中日冲突的真相，更倾向于支持中国。这对于中国以后开展抗战外交，争取国际援助和孤立日本，都具有积极意义。

接着，在10月9日至12日之间，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确定了调兵增援上海的基本方案：“新派遣到上海方面的兵团，不作为给上海派遣军增派部队，而以之作为另一个军使用”；“在杭州湾北岸进行登陆作战”；“登陆点为金山卫附近”；“登陆时间定为10月30日”。

10月12日，日本参谋本部下令在国内进行开战以来的第11次动员，被动员的部队是第114师团、独立机关枪第8大队、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独立工兵3个联队和后备步兵12

个大队等。

这时，日军已投入淞沪战场的部队，陆军已达5个师团多，包括第3、第9、第11、第13、第101师团和其他特种部队和空军部队；海军方面，集结在长江口和淞沪附近海面的有第3舰队和航空部队，以及在陆上的驻沪海军特别陆战队。日军总兵力达15万人上下，有飞机200余架、坦克200余辆、火炮400余门、兵舰70余艘。在华北战场，其时日军投入的兵力共计为8个师团，包括第5、第6、第10、第14、第16、第20、第108、第109

师团，以及其他特种部队等。日本军部用兵的重点，直至10月初旬仍然是置于华北战场的。这本来是与日本原定的战略计划相一致的。那么，日军统帅机关为什么要在这时决定向上海再次大规模增兵，从而把作战重心转移到淞沪战场呢？

首先，因为日军在淞沪战场上遭到中国军队强有力的持续不断的抗击，以致其速战速决的计划迟迟未能顺利实现。日本参谋本部在七七事变前制订的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设想以2个师团的兵力与海军协同，一举击败上海中国守军、解决上海问题。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未及到达上海，中国军队先发制敌，对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围攻战，这为日本统帅部意料所不及。至8月下旬，日军派出2个师团登陆宝山至吴淞一带，又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进展缓慢，如日本方面所说的：“因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极为坚固而且集中了大量兵力，所以陷入了苦战状态。”为迅速推进战局，日本统帅机关又于9月下半月派出3个师团兵力，第二次大规模增兵淞沪。与此同时，中国统帅机关在9、10月间的40天上下时间里，也调动了40多个师的部队进入淞沪战场。9月至10月间，中国军队进行阵地抗击战，其规模之巨大、战斗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再次出于日本军部之意料，而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动。

日本军部根据淞沪战场日军伤亡情况，认为上海战局不容乐观。8月份，华北战场的伤亡人数约为淞沪战场的3倍。9月份，淞沪战场日军的伤亡人数急剧上升，共达12334名，而华北战场少于前者，为8562名。到10月23日，淞沪战场日军伤亡数累计已达25323名，远远超过了华北战场的伤亡数。以几个主力师团的伤亡情况来看，也确实使东京军部震惊。号称精锐的第9师团，到10月18日伤亡已达6000余人，占师团原有人数的一半以上。第101师团的伤亡更大，已接近9000人。战至大场作战结束、越过苏州河之前，第9师团伤亡总数已上升到9500余人。

同时，日本军部认为淞沪战场的进展不如华北战场，“一方面，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与第5师团作战积极性很高，华北方面军也是如此，颇有超越规定作战线之势；另一方面，上海方面战斗则处于胶着状态”。此时华北方面军已占领了保定、石家庄、沧县、德州等地，而上海派遣军却对一个大场镇还久攻不下。因此，东京参谋本部认为：“为了打开这种局面，有必要采取新的措施。”

同时，日本参谋本部之所以要转换作战重心，在战略上的着眼点，则是在于要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并企图在经济上置中国当局于死地，从而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下村定在解释其转移作战重心于华东的主张时，说

出了其中的意图：“上海方面作战的着眼点不是救援上海的危急，而是出于和上海派遣军面前多达75个师的敌军主力交战将其击破这样的积极想法。也是因为要迫使中国方面在经济上屈服，就要迅速切断上海和周围的联系。”显然，在军事上，是企图一举击灭集中于淞沪战场的中国70多个师的部队；在经济上，是要通过夺占经济中心的上海，从经济上打压中国，迫使其停止抵抗。

在上述各项意图被日本参谋本部所确认后，10月12日拟定了《关于今后的作战事项》。其中规定了“迅速在上海方面获得所期的战果”的作战方针，为此提出确保上项方针实现的2项主要措施：“1.上海派遣军继续执行现在的任务；2.以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以利于上海派遣军完成任务。”此前不久，组建第十军的各项事项已经在秘密地进行了。

日本第三次大规模增兵淞沪

日本参谋本部从10月上旬开始，即着手为第三次大规模向淞沪增兵进行准备。首先是组建新的兵团。10月4日，发出临参命第555号命令，指令在中国东北待机的第18师团，为准备在杭州湾方面登陆进行训练。次日，参谋本部命令华北方面军，在石家庄附近会战结束后，约以2个师团兵力集结于平津

地区，准备转用于其他战场。这就是准备将第6、第16师团转用于华东战场。10月23日，又命令华北方面军以1个师团的兵力在平津地区集结，准备转用于其他方面。

10月20日，参谋本部发出临参命第119号命令，正式下达组建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会同上海派遣军攻略上海的命令。同时，以临参命第120号发布关于第十军战斗序列的命令。第十军以柳川平助为司令官、田边盛武为参谋长。下辖第6师团、第18师团、第114师团和国崎支队，以及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第1、第2后备歩兵团等部队。10月30日，临参命第134号令，又将第16师团编入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至此，使用在华东战场的日军共有2个军9个师团又2个独立旅团，在华北战场的为2个军7个师团；前者的总兵力大大地超过了后者。海军方面，军令部于10月20日新编成第4舰队，与第3舰队共同编成中国方面舰队，由长谷川清任司令长官，仍兼第3舰队司令。同时，决定以第4舰队担任连云港以南中国沿海的作战，并协助第十军实施登陆战。日本军部显然已将主战场转移到华东。这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已是倾巢而出，留在国内的地面部队，只剩下近卫师团和第7师团这2个常设师团的兵力了。

10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以临参命第575号命令，下达第十军和上海派遣军，规定杭

血肉磨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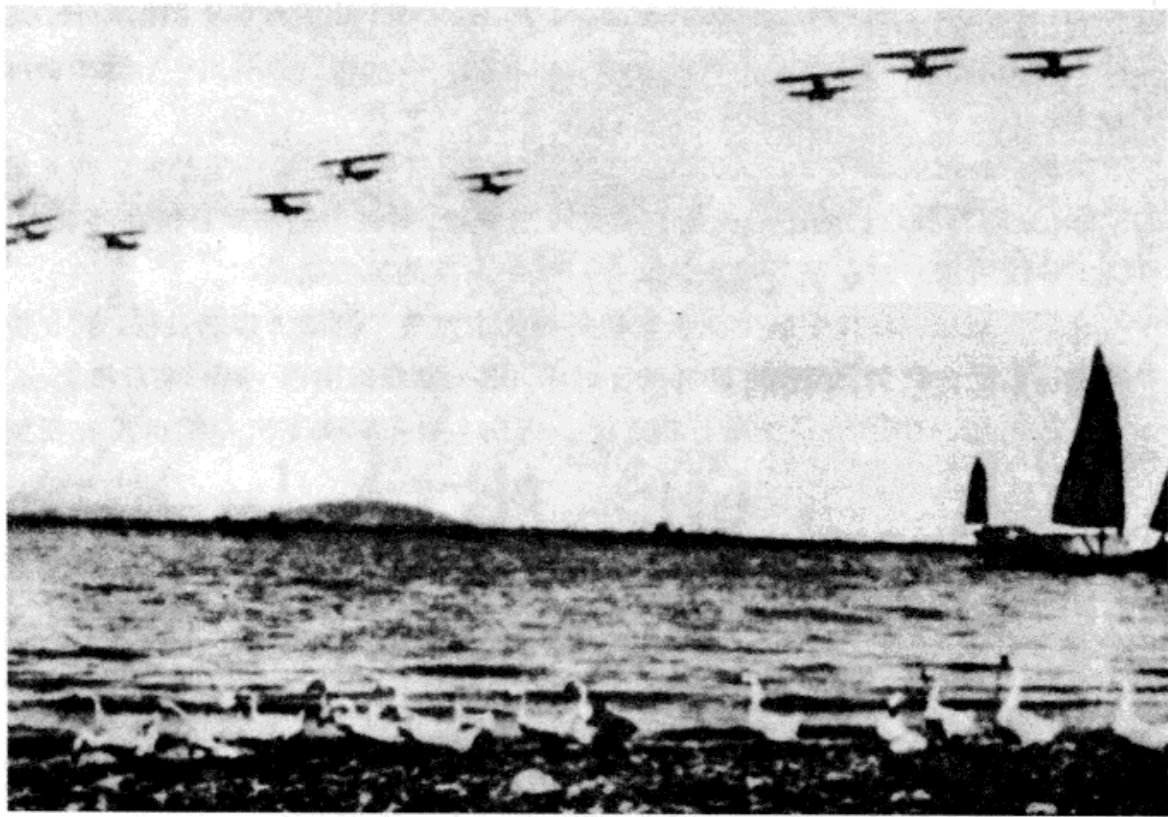
淞沪会战

州湾北岸作战中陆军与海军、空军之间的协同事项，并命令“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为了援助第十军的登陆，须在登陆前进行必要的侦察，以航空部队在登陆时进行登陆掩护”。

同日，参谋本部制定了《第十军作战要领方案》，其中规定的作战方针是：“第十军须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尽速前进到上海市西南地区，同上海派遣军一起消灭上海周围的敌人。”作战部署是以第18师团、第6师团和国崎支队为第一线部队，在金山卫东西两侧地区实施登陆，随后第114师团和第1、第2后备歩兵团等第二线部队接连登陆。要求以急袭式的作战推进至黄浦江一线，

然后越过黄浦江，向上海市区南面和西面前进，截断沪杭铁路，与从上海市区北面南下的上海派遣军合力围歼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

日本统帅机关孤注一掷出动第十军，视其为打开久拖不决的上海战局的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参谋次长多田骏在《第十军作战要领方案》颁发后，与第十军参谋长田边盛武的谈话，透露了统帅部的真实意图。多田骏“明确地表示了中央对该军的期待和该军的性质”，认为出动该军“是为了打开目前时局，在上海附近夺取一个大的战果乃是迫切而绝对必要的”，要求该军“在全世界注视的



■ 日军第三次大规模增兵，企图一举打破战场上的僵持局面。

战场上发扬我军武威”。多田骏特别强调，第十军虽然须与上海派遣军密切协同，但它是由统帅机关直接指挥的一支独立部队；即使尔后两军组为华中方面军，第十军“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属于天皇直接统帅之性质”。作为日本又一次投入淞沪战场的—个主力兵团，第十军是奉着日本天皇裕仁这个侵华军队最高统帅的命令，走上这血腥的自掘坟墓的侵略战争之路的。

以善于打迂回战而著称于日本军界的柳川平助，野心勃勃，侵略劲头十足。第十军制订的作战计划，超越参谋本部原先下达的计划。在10月22日至24日之间拟订的《第十军作战计划》，比之于参谋本部的《第十军作战要领方案》，在作战进程和进占的地域这两点上，要求速度更快和前进的方向更远。“不同处在于前者将渡黄浦江作为第二期作战，第十军作战计划则作为第一期作战；还有，在第二期作战中，参谋本部的意图为使第十军主力向上海南面和西面前进，而第十军则企图进入苏州河以北大规模地包围敌军主力。”尽管第十军的作战计划把参谋本部的计划置于被修正的地位，因为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满足了日本统帅部从速解决上海战局的意图，仍然获得参谋本部的默认。

根据参谋本部和第十军的作战计划，原定的各个师团的进攻方向，大体上是：第18师团在金山卫东侧地区登陆，随后以主力直

插松江西南方向，越过黄浦江，占领松江，切断沪杭路，前出青浦至苏州河—线；第6师团在金山卫西侧地区登陆，以国崎支队袭占金山卫，以师团主力攻占金山城，经松江西南，越沪杭路，前出淀山湖以东—带；第114师团尾随18师团登陆，以主力—部前出闵行黄浦江渡口，另—部主力向浦东地区前进，策应上海派遣军进行浦东作战。

这时，大场地区的会战正处于关键时刻，参谋本部万分焦急，要求第十军迅速出动，但由于部队集结、运输和气候等等条件的限制，登陆时间—再被延后，至10月25日才最后决定从11月5日起，开始进行登陆作战。正在这时，淞沪战场形势突变，10月25日傍晚，日军攻入大场；接着于30日开始，日军向上海市区苏州河南岸发动进攻。战局的这个重大变化，使跃跃欲试的第十军利令智昏，当即修改其作战计划，把进攻的目标从淀山湖东面—带延伸到常州附近。“11月2日改变第二期作战指导要领为：‘军进入松江附近后，乘敌准备未完，先进入平望镇—嘉兴—线，尔后在太湖及其以西地区水陆并进杀到常州附近，深入到较远的距离切断敌的退路，—举围歼上海方面的敌主力军。’”

调动第十军准备向杭州湾北岸登陆的同时，日本参谋本部又加紧从华北战场抽调第16师团转用于淞沪战场。这个师团列入上海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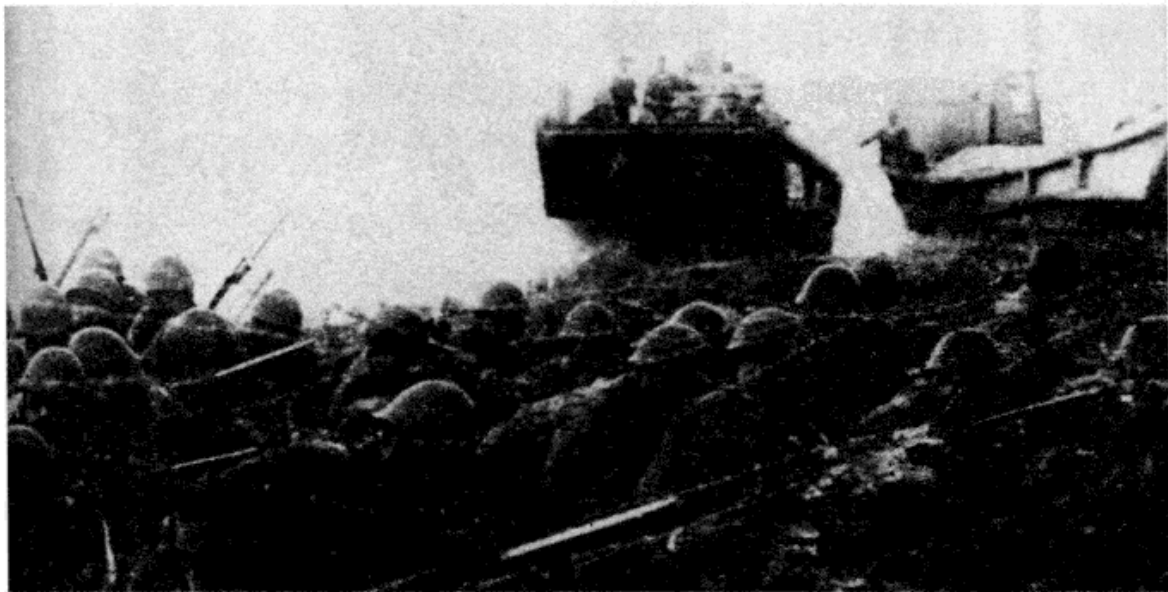
派遣军序列，企图从淞沪北线策应从南线上陆的第十军，从南北两翼包抄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为此，第16师团计划在江苏常熟东北方向的长江白茆口实行登陆，与先期上陆的台湾旅团一起，向常熟、无锡攻击前进，切断沿沪宁线南北西撤的中国军队的退路。这个师团10月下旬集结于石家庄东南地区。10月30日按东京参谋本部的命令调往上海，先由铁路输送至辽宁大连。11月9日起，由大连港分批起运，至11月12日其先头部队已抵达吴淞口。

登陆金山卫

第十军的登陆方向与上海派遣军南下的方向，为南北对进，分别从淞沪战场的左右两翼展开。在淞沪战场左翼，早先由长江

南岸上陆的上海派遣军当时正由北而南、向苏州河一线攻击前进。第十军则选择在淞沪战场的右翼，从南向北进攻中国军队的右侧背。经过日本军部长期谋划的这一两翼迂回战略，其目的正在于从南北两面实行迂回包抄，把东临大海的淞沪战场中国军队置于三面受敌的包围圈内，加以歼灭。

日军登陆点的选择，主要从两个因素中确定：一是选择在适宜于大兵团登岸并便于向纵深发展的地带；二是选择在中国军队防线的薄弱环节上。金山卫一带是兼具上述两个条件的。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东端，东濒东海，北枕长江，南临杭州湾，三面倚水，便于进攻军队的登陆。从杭州湾的澈浦到长江浏河口，全部海岸和江岸线，大致分为8个地段，其登陆的条件是大有区别的。杭州湾的新仓到澈浦段，不适于登陆。海盐到



■ 正在金山卫登陆的日军。

日军第十军作战序列

第十军 军司令官 柳川平助中将

第6师团 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参谋长下野一霍大佐：

第11旅团 旅团长坂井德太郎少将

第13联队 联队长冈本保之大佐

第47联队 联队长长谷川正宪大佐

第316旅团 旅团长牛岛满少将

第23联队 联队长冈本镇臣大佐

第45联队 联队长神田正种大佐

骑兵第6联队 联队长猪木近太大佐

野炮兵第6联队 联队长藤村谦中佐

工兵第6联队 联队长中村诚一大佐

辎重兵第6联队 联队长川真田国卫大佐

第18师团 师团长牛岛贞雄中将 参谋长小藤惠大佐

第23旅团 旅团长小野龟甫少将

第55联队 联队长野副昌德大佐

第56联队 联队长藤山三郎中佐

第35旅团 旅团长平冢省三少将

第116联队 联队长片冈角次中佐 第124联队 联队长小界芳松中佐

骑兵第22大队 大队长小池昌次中佐

野炮兵第12联队 联队长浅野末吉中佐

工兵第12联队 联队长井泽新大佐

辎重兵第12联队 联队长川内益实大佐

第114师团 师团长末松茂治中将 参谋长 矶田三郎大佐

第127旅团 旅团长秋山充三郎少将

第102联队 联队长千叶小太郎大佐

第66联队 联队长山田常太中佐

第128旅团 旅团长奥保夫少将

第115联队 联队长矢崎节三中佐

第150联队 联队长山本重省中佐

骑兵第18大队 大队长天城干七郎少佐

野炮兵第120联队 联队长大冢升中佐
 工兵第114联队 联队长野口胜之助少佐
 辎重兵第114联队 联队长中岛秀次少佐
 国崎支队（步兵第9旅团）旅团长国崎登少将
 第41联队 联队长山田铁二郎大佐
 独立山炮兵第3联队（欠第2大队）
 骑兵1小队，工兵2个小队，辎重兵1个中队
 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 旅团长澄田昧四郎少将
 野战重炮兵第13联队 联队长桥本欣五郎大佐
 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 联队长井手龙男大佐
 第16师团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 参谋长 中泽三夫大佐
 步兵第19旅团 旅团长草场辰巳少将
 第9联队 联队长片桐护郎大佐
 第20联队 联队长大野宣明大佐
 步兵第30旅团 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
 第33联队 联队长野田谦吾大佐
 第318联队 联队长助川静二大佐
 骑兵第20联队 联队长笠井敏松中佐
 野炮兵第22联队 联队长三国直福大佐
 工兵第16联队 联队长今中武义大佐
 辎重兵第16联队 联队长柄泽畔夫中佐

乍浦段，可容1个师上下兵力上陆，但不便于向纵深发展。全公亭到柘林的金山卫地区，可容3个师左右的兵力登陆，且上陆后便于战役展开，向纵深推进。这里有3条公路、1条铁路通往上海和杭州，同时又有经太湖南面通往苏皖边境和南京的交通要道。奉贤的柘林以东以北到南汇老港，暗礁和浅滩较多，岸上又无通往内陆的良好道路，不适于联合兵团上陆作战。川沙的白龙江，可供登

陆兵实行战术性登陆。白龙江到吴淞口，海岸水深，但沙滩很多，航道狭窄，不易于大兵团实行展开。吴淞口，在黄浦江与长江交汇处，水深港阔便于重兵上陆和展开。吴淞口到浏河口，有多处登陆点，便于上岸和展开。

由此可见，在上海的北面，吴淞口到浏河口沿岸是最适于登陆的地段，日军8、9月间正是先后从这里登陆的。在上海的南面，

■ 从金山卫登陆的日军一路烧杀前行。



最适宜于大兵团登陆和展开的是在金山卫地区，而且这一地区中国军队的防守力量十分薄弱。日本军部于是命令第十军在这里实行登陆战。

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及其东西地区，南距上海市区约40公里，为淞沪战场右翼的海防要地。可是，南京统帅部和第三战区司令部都未对这里的警戒和防卫问题引起重视。早在七七事变前，南京军事当局在规划、建筑京沪杭国防工程时，由于认识上的失误，金山卫设防事宜并未被纳入计划之中。1933年时，南京陆军大学第十期学员到金山卫进行野外战术实习和调查，误认为这里水浅涂深，大小船只靠岸困难，向内又是水网地带，河港纵横，登陆后活动困难，就被排除在设防视线之外。1935年唐生智担任全国警卫执行部主任时，曾带领参谋人员到金山卫进行实地考察。他们视察后，也认为登陆不利，就未筑工事，不设防，反认为乍浦重要，选筑乍浦至嘉兴线据点工事。因此淞沪警备司令部也未在这一带设监视哨或瞭望哨，这是事先犯下的错误。及至淞沪会战开始后，蒋介石、顾祝同、陈诚等人的注意力集中于对付从长江南岸登陆的日军，对杭州湾北岸的防备未加注意，又错误地以为日军先后两次大规模增兵都在长江沿岸上陆，再要登陆大致也在长江方面，如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也必在乍浦，以致对金山卫一带更疏

于防备。

以张发奎为总司令的右翼作战军，只配备第28军2个师，守卫杭州湾北岸从澉浦到柘林长达90公里的海岸线。以陈光中为师长的第63师，担任乍浦至澉浦的守备，以陶柳师长的第62师担任全公亭、金山嘴之间的守卫。浦东方面，李松山第55师和张銓基第45独立旅任川沙、南汇地区的防守。以上各部都是战斗力很差的地方部队，62师、63师系从湘军改编而来，45旅系由旧直鲁联军演变而成的。至大场失守，苏州河南岸战局危急之时，为加强浦东兵力，又挖肉补疮，于11月3日抽调第62师主力到浦东驻防，以致守卫全公亭至柘林之线的仅剩63师，如此海岸防线，形同虚设。而且，在金山卫登陆战发生前，南京统帅机关并非全无所悉。10月22日，中国方面即已获知日军有很大可能会在上海战场增加投入3个师团左右的兵力。但此项情报并未引起南京统帅部和第三战区的重视，更谈不到迅速作出对应的部署了。蒋介石在一年后的南岳军事会议上总结沪战教训时，也不能不承认金山卫未予设防是统帅部的“最大的挫失”：“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

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的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

由于中国军事当局的疏忽和失误,日本第十军金山卫登陆战出乎意料地顺利,并未受到有力的阻击,这与上海派遣军在长江南岸宝山境内遭到中国左翼作战军强烈持久的抗击,形成鲜明的对照。日军原来估计,第十军“作战上的各种条件并非有利”,而且这次“作战将是极端困难的”,预计上陆后将会迅速遭遇10个师之多的中国军队的迎头抗击。为此,日军作了登陆作战的各方面周密、充分的准备,并且采取了“隐避企图、陆海军密切协同、登陆后大胆地机动作战”的作战方针。日军登陆作战的准备充分、对对方的情形了如指掌、作战方针合适。反观中国军队方面,对敌情不明,对即将揭开的敌军一场大规模登陆行动还蒙在鼓里,更无任何进行大规模抗登陆战的准备和明确的作战方针,完全处在被动地位。更不必说日军这次不但在火力上,而且在兵力上也占有优势。这一切,预示着中国军队在杭州湾北岸的作战将会是必败无疑。

日军第十军第一梯队为第6师团和第18师团。11月2日,这2个师团分别在日本八口浦和五岛列岛出发,在第4舰队的输送下,于朝鲜济州岛附近的海面上集结,经舟山群岛东面的马鞍群岛附近,在4日夜进入杭州湾大小金山海域。11月5日拂晓,金山卫海岸一带

大雾迷漫,大潮汹涌,天空下着蒙蒙细雨。

上午5时半,日军利用海潮和雾幕发起登陆行动。在舰炮和航空火力掩护下,第6师团在金丝娘桥、漕泾登陆;第18师团主力在全公亭、金山嘴一带登陆;第18师团的第35旅团则在第6师团的左侧上陆;国崎支队在金山卫登陆,当日上午袭占了金山卫镇。日军在金山卫东西一线约15公里的沿海登陆后,在岸上开辟登陆场,迅速分兵两路:北路为第6师团主力,急速向北进犯,企图经张堰、松隐,直扑黄浦江米市渡,进袭松江,一部向闵行进攻;南路为第18师团主力,向亭林、金山(朱泾)和虹桥攻击前进,其一部则向广陈方向进袭。第十军登陆部队的第二梯队是第114师团,因海上运输船队不足和气候原因,该师团的主力在11月10日前后才从金山卫以西全公亭一带陆续登陆,然后把进攻矛头指向平湖、嘉兴方向。

迅速瓦解的淞沪南线

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的登陆,迅速打开了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南线的大门,不但使淞沪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而且其影响所及,直接危及到苏州、嘉兴、杭州、无锡、常州和南京的安全。

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地区,不但适宜于战役登陆兵团上岸,而且在陆上有通往上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 在一片废墟中匍匐前进的日军。

海的三条公路，并有通往杭州的水陆交通；同时，有穿越苏、皖边境通向芜湖、南京的便利通道。在金山卫上陆的日军，不但在战役上直接对上海中国军队的侧背形成严重威胁，而且也使南京陷入日军的战略迂回之中。日军登陆金山卫，不仅是为了从右后方迂回淞沪战场，包围中国军队，而且又有从太湖南面直插苏皖边境，迂回和包抄南京的战略企图。显然，日军是要沿着当年明朝倭寇从杭州湾登陆，进而骚扰苏皖的路线进军。中国军队如果不能阻挡，至少是迟滞、延缓日军登陆部队的进攻，那么，淞沪会战的失败就在眼前；而且，南京也就会过早地

陷入日军迂回之中，影响十分重大。

这时，淞沪战场已出现日军两大集团实行南北合围之势。与第十军从杭州湾沿岸南下的同时，上海派遣军主力在南翔以东一线已陆续渡过苏州河，与第十军相呼应。南北两支日军，企图打通北自浏河、嘉定、昆山，经青浦、松江、金山、嘉善、平湖，直至金山卫这一线阵地，把中国军队围歼于淀山湖以东地区。面对这一严峻态势，中国军队唯一可以选择的正确方针，一方面是迅速调集足够的兵力，阻击杭州湾方向的日军，迟滞其南下；另一方面是立即组织在南翔以东、京沪线南北的部队，主动向西转移，后



■ 中国军队紧急调整部署，但却无法挽回战局。

撤吴福线和苏嘉线，准备抗击来犯之敌。当时，第三战区司令部的处置，基本上是从这两方面进行的，但迅速组织西撤这一项却未获蒋介石批准。据陈诚后来的回忆，蒋介石获悉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即以电话问陈诚如何处置，陈答以须调整战线，意即主动后撤既设国防线，蒋命令陈“再支持三日”。这是因为，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刚于11月3日开幕，蒋介石依然想在上海再坚持几天，以利于争取会议有一好结果。

对于阻击杭州湾上陆之敌，顾祝同、陈诚作了以下一些部署：第63师和第62师分别从乍浦、南桥两个方面对登陆之敌实行夹击；以守备浦东的独立第45旅向杭州湾方向攻击前进；以集结于青浦的第62师余部进占松江；以集结于青浦、白鹤港之间的第67军，速经松江向金山方向前进，迎头堵击日军；以第61师占领闵行，警戒黄浦江之左岸；命令原拟开往苏州河前线的第79师，中途在嘉兴下车，开往平湖广陈镇，增援新棣、新仓之线。

第三战区的这些部署可谓尚属得当，但在实际上却收效甚微，无力挽救淞沪南线的危局。第一，上述部队大都战斗力薄弱，其中第62师和61师以前作战伤亡甚大，部队武器和兵员均严重不足。第二，部队大都系仓促上阵，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临时被调往担任阻击任务。第79师系湖北部队，甫由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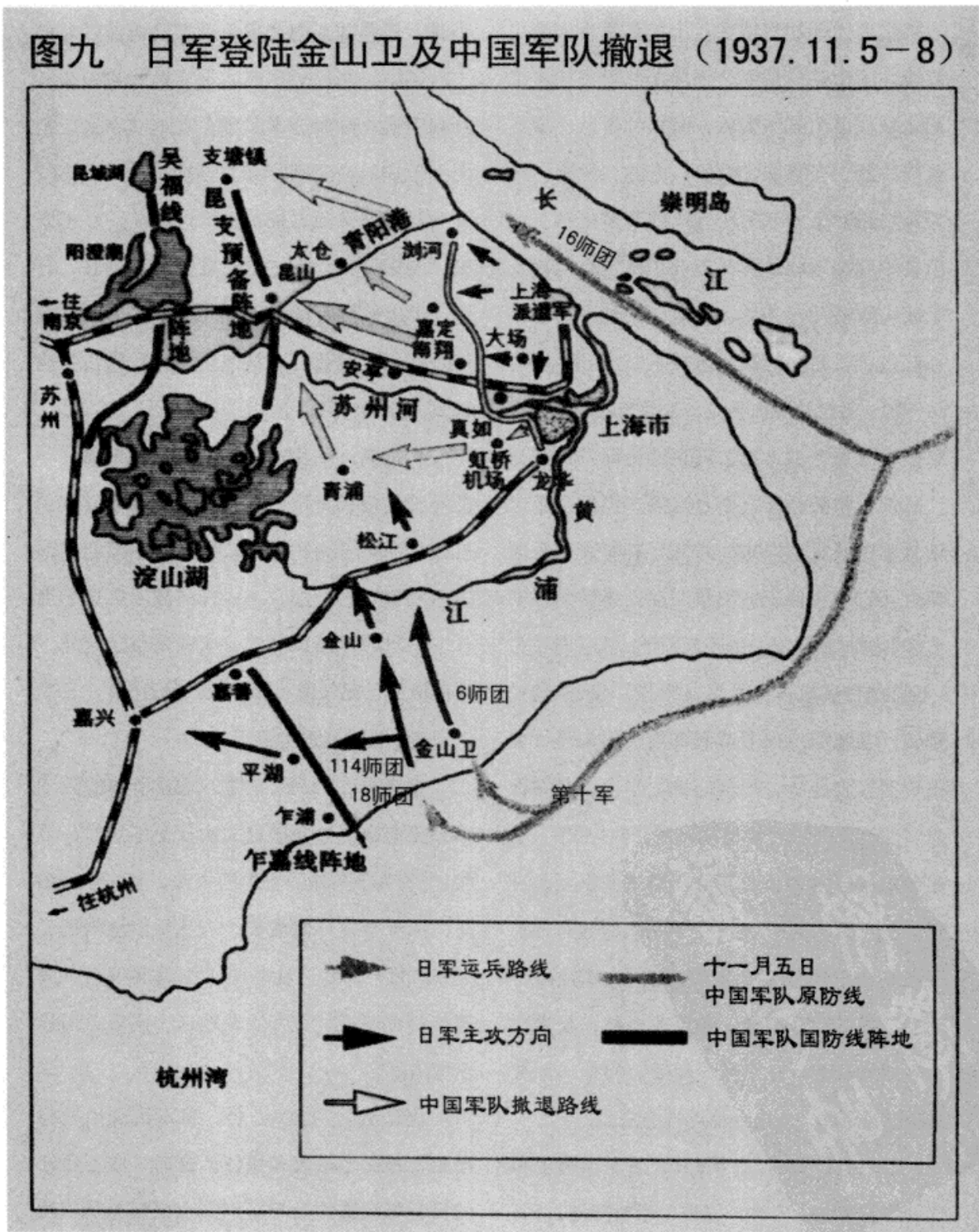
新乡南调，经沪杭线增援沪西，中途被改用于平湖方面。吴克仁统率的东北军第67军的2个师，不久前刚从豫北调来，在前赴上海途中临时被转用于松江方面。在匆忙中上阵的各部，行动失序、指挥紊乱、情况不明，无法组织有效的阻击战。第三，各部“行动迂缓”，大都“未能如期实施攻击”，难以阻挡快速南下的敌第十军的凌厉攻势。第四，部队士气趋于低落，已远远不如前几个月那样高昂，这对战斗力的影响甚大。凡此种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南线阻击战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归于失败。

日军第6师团于11月5日夜进至金山城、松隐镇、亭林镇以南一线。当时，这一线全无守备部队。从奉贤赶来阻敌的62师367团进抵亭林镇附近，与日军展开遭遇战。6日中午，日军袭占米市渡，至傍晚小股日军已渡过黄浦江。同时，另一部日军进占广陈镇。6日晚，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黄琪翔到青浦指挥，命令第79师、第11预备师、第67军、第26师、第61师等部，在新棣镇、孙家角、闵行一线，固守各渡口，拒止日军越过黄浦江。但是，黄浦江一线既未有工事，又无险可守，更缺炮兵的支援，又何言拒敌渡河，更不必说浦东的奉贤、南汇、川沙等地了。

11月5日至9日，淞沪南线各县在短短的四五天里纷纷陷于敌手。

金山县。11月5日拂晓，守卫金山卫的第

图九 日军登陆金山卫及中国军队撤退 (1937. 11. 5-8)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62师的不足1个营的官兵，虽兵力单薄，仍奋力抗击，大部壮烈牺牲。上午日军攻入金山县境，金山县内虽无一正规部队可资抗击来犯之敌，但全县保安队、义勇壮丁队、警察队等武装，在张堰、廊下、亭林、松隐、朱泾等地进行了分散的小规模的节节抵抗。金山县政府在朱泾集合义勇壮丁队，会同保安警察，准备死守县城，同时向松江专员公署和驻奉贤、嘉兴的部队求援。6日上午4时，第79师一部抵达金山县城，未及布防即接第10集团军总司令部来电，着该部迅即开往平湖广陈镇，增援新埭、新仓之线。虽经县长电话恳求留县免调未果。未几，日军袭占张堰镇。县府下令保安队反攻。冲入张堰的保安队60名被日军包围，生还者不足10人。日军另一股在6日晨攻占离县城（朱泾）仅9里的松隐镇。县政府率保安队和警察退出朱泾，焚毁黄浦江公路桥，扼河防御。当夜，日军渡过黄浦江，地方武装退往兴塔。7日上午，金山城陷落。随即，日军分三路进犯枫泾。在松（江）枫（泾）公路上，108师1个连与日军展开血战，全部战死。下午15时，枫泾陷于敌手。同日晚，63师一部反攻亭林，夜半攻入亭林镇东街，日军纵火焚镇，63师一部被迫撤退。至此，金山全境遂告沦陷。

奉贤县。11月3日至5日，日军从海上和空中轰击奉城、柘林、钱桥、南桥等地。5日早晨，日军一部在胡桥朱家村登陆。6日下

午19时，驻军第62师一部撤离县城南桥镇。当晚，该师师长陶柳率余部撤往黄浦江北面上海县境。7日凌晨4时，独立第45旅由川沙开到南桥，62师亦奉紧急命令返防奉贤。但至下午19时，62师和45旅均撤离县境。第62师为浦东地区最后掩护退却的军队，该部既去，浦东境内已无中国正规部队。同日，日军一部由柘林入侵奉贤内陆。11月8日，县政府及保安队退往上海县北桥镇，敌军占领南桥镇。12日，全县沦陷。

南汇县。11月6日中午，独立第45旅之一部开抵县内祝桥镇，但未加布防即自动向南开拔，向奉贤南桥撤退。原驻南汇周浦一带的第55师李松山部，未经任何战斗，也于当日下午21时西渡黄浦江，撤向南市。至此，南汇境内已无任何正规部队。11月8日，日军占领南汇县城（惠南镇）。

川沙县。11月5日晚，原驻川沙的独立第45旅向南汇方向撤退。次日上午10时，该旅1个营为掩护撤退复返回川沙，未作任何布防，即于当晚18时撤离。自此川沙境内已无驻军。11月10日，日军101师团佐藤支队从浦西渡过黄浦江，占领浦东地区。同日，川沙全境陷落。

松江县。11月6日晨，日军由金山松隐南犯，指向米市渡和松江。这时，守卫松江的只有郭汝栋的第43军残部和松江专区以及县的保安队，形势岌岌可危。代理张发奎指

挥右翼作战的黄琪翔，急调已到达青浦的第67军迅速增援松江；同时下令郭汝栋与松江专署专员王公屿，协同67军“死守松江县城三日”。当晚，67军军长吴克仁率107师和108师进入松江城内外。吴克仁当即以107师出东门，向北阻击南犯日军，重点指向米市渡，108师守卫城防及至李塔汇沿江一线。7日，107师在米市渡痛击日军，迫敌后退。7日下午，增援日军进行反扑，战况激烈。吴克仁亲自到前线指挥部队，在南门外与日军展开血战。8日，日军攻势更猛，直扑松江城下。吴克仁再次走出指挥所，率部冲入敌阵，将日军击退。同时，108师在松江城西阻击另一股日军，在李塔汇一带，双方拼杀竟日，阵地三失三复。8日傍晚，日军逼近松江西门，67军下令向青浦撤退。这时，松江城之东、南、西三门均被日军封锁，仅剩北门尚可通

行。吴克仁率107师等部在日军的猛烈炮火和空袭下，从北门撤退。9日凌晨，松江陷于日军铁蹄之下。沪杭铁路遂被截断。

接着，日军第6师团一部直扑青浦，企图拊苏州河南岸中国右翼军之侧背，切断中国右翼作战集团向平嘉线的退路。吴克仁率部在佘山附近与追击之敌交战，并向青浦境内转移。11月9日傍晚，67军主力进至白鹤港附近。吴克仁在指挥部队渡河时，被南来的一股日军便衣队偷袭，不幸中弹牺牲。吴克仁将军是在淞沪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唯一的一位军长。

在苏州河战线，这时战局已呈崩溃之势。右翼作战集团总司令张发奎临危受命，已接替朱绍良负责指挥整个淞沪南线的作战。事实上，近一周来的苏州河南岸阻击战完全是在非常艰难的状况下，勉力维持着



■ 笼罩在战火硝烟中的上海。

的，到这时已难以为继了。自11月2日日军在姚家宅、厅头村、吴家库南渡占领阵地后，从5日以来，日军不断向池圈和张港一带发动猛攻，渡河南下，与金山卫方向登陆之敌相呼应。次日，日军在强大炮兵与飞机的掩护下，对苏州河以南第36师和教导总队防卫的池圈一带进攻。守军伤亡甚重，102师、58师和税警总团各一部增援反击未果，日军又在河南岸建立了1个新的桥头堡。张港守军第67师在5日晚与突入之敌发生激战，遭到严重伤亡，被后调整理。教导总队前来接防，继续与日军反复夺争。7日晨，日军再次在姚家渡强渡苏州河，守军第105师虽奋力阻击，但未能遏制日军的进攻。至此，从中山路桥、北新泾、刘家宅、吴家库等处渡河的日军，与在屈家桥、姚家渡等处渡河的日军，已在南岸建立联系，而把前进的目标指向虹桥地区。

“黑色双十一”：南市的陷落

淞沪南线的崩溃，浦东川沙、南汇的陷落，以及苏州河南岸中国军队主力的全线西撤，上海市区的南市成为抗击日军的最后一个城市堡垒。南市位于上海市区东南部，东濒黄浦江，北与法租界毗邻，西达日晖港两岸。从沪西和浦东中国军队撤退起，南市即为日军在上海市区进攻的最后目标。南市的最后防线，是从日晖港，沿法租界南首，直

到黄浦江沿岸。防守南市的部队，为由浦东转移而来的第55师的1个旅、上海市警察总队等部，由上海市警察局长蔡劲军负责指挥。

如果从战场作战的观点而言，当时黄浦江、高昌庙一带江面已被日海军舰艇控制，沪西苏州河南岸中国守军阵地已濒于崩溃，孤悬于上海市区东南角的南市，在军事上已丧失死守的价值。南京统帅部出于政治上和外交战略上的考虑，要求死守南市，似乎期待出现第二个“四行孤军”之战。

日军对南市的进攻，首先是从空袭开始的。从沪战以来，日本空军先后19次对南市进行轰炸和扫射。11月7日起，日军狂轰滥炸空前猛烈，南市连日遭到毁灭性的空袭，高昌庙、南码头、外马路、制造局路以及日晖港一带，黑烟冲天，大火数日不停。8日凌晨，沪西苏州河南岸中国军队放弃丰田纱厂和周家桥2处据点，退至光华大学以西，沿东西杜宅，迄北新泾、南马沟桥一线。接着，朱家桥一线亦沿庇亚斯路（今北翟路）向南后退。当天下午17时，退至龙华、虹桥一带。南市守军与右翼集团之间的联系线，从此被日军截断，形势迅速恶化。11月9日，日军又出动飞机轰炸，南市惨遭空前的浩劫，高昌庙江南造船厂附近即投弹22枚，弹落火起，至晚未熄。制造局路的特利医院中弹，损毁严重。火车南站再次被炸，夷为一片废墟。日晖港、斜土路一线，大批民房被炸，

11月中国军队作战序列

左翼作战军 总司令 陈诚

第15集团军 总司令 陈诚(兼)

第26军 军长 萧之楚

第44师 师长 陈永

第706师 师长 王凌云

第60师 师长 陈沛

第98师 师长 夏楚中

第74军 军长 俞济时

第51师 师长 王耀武

第58师 师长 俞济时(兼)

第19集团军 总司令 薛岳

第73军 军长 王东原

第19师 师长 李觉

第16师 师长 彭松龄

第15师 师长 王东原(兼)

第2军 军长 李延年

第9师 师长 李延年(兼)

第105师 师长 高鹏云

第75军 军长 周岳

第6师 师长 周岳(兼)

第53师 师长 李韬珩

第11师 师长 彭善

第32师 师长 王修身

第33师 师长 冯兴贤

第69军 军长 阮肇昌

第57师 师长 阮肇昌(兼)

第4军 军长 吴奇伟

第59师 师长 张德能

第90师 师长 欧震

第66军 军长 叶肇

第159师 师长 谭邃

第160师 师长 叶肇(兼)

第49军 军长 刘多荃

第109师 师长 赵毅

第54军 军长 霍揆彰

第14师 师长 陈烈

第21集团军 总司令 廖磊

第48军 军长 韦云淞

第173师 师长 贺维珍

第174师 师长 王赞斌

第176师 师长 区寿年

第171师 师长 杨俊昌

第135师 师长 苏祖馨

第39军 军长 刘和鼎

第56师 师长 刘尚志

独立第314旅 旅长 罗启疆

右翼作战军 总司令 张发奎

第8集团军 总司令 张发奎(兼)

第28军 军长 陶广

第62师 师长 陶柳

第63师 师长 陈光中

第55师 师长 李松山

独立第45旅 旅长 张奎基

炮兵第2团 团长 孙生芝

第9集团军 总司令 张发奎(兼)

第72军 军长 孙元良

第88师 师长 孙元良(兼)

上海保安总团 总团长 吉章简

独立第20旅 旅长 陈勉吾
 第78军 军长 宋希濂
 第36师 师长 宋希濂 (兼)
 税警总团 总团长 黄杰
 第17军团兼第1军 军团长 胡宗南
 第1师 师长 李铁军
 第78师 师长 李文
 第71军 军长 王敬久
 第87师 师长 王敬久 (兼)
 第61师 师长 钟松
 第67师 师长 黄维
 第46师 师长 戴嗣夏
 第154师 师长 巫剑雄
 第20军 军长 杨森
 第133师 师长 杨汉域
 第134师 师长 杨汉忠
 第3师 师长 李玉堂
 第18师 师长 萧文铎
 教导总队 总队长 桂永清
 第26师 师长 刘雨卿
 第10集团军 总司令 刘建绪
 第45师 师长 戴民权
 第52师 师长 卢兴荣
 第128师 师长 顾家齐
 独立第37旅 旅长 陈德法
 暂编第11旅 旅长 周燮卿
 暂编第12旅 旅长 李国钧
 暂编第13旅 旅长 杨永清

此外, 第三战区所辖的下列部队, 亦列入淞沪战斗序列。
 江防军 总司令 刘兴
 第102师 师长 柏辉章
 第103师 师长 何知重
 第111师 师长 常思多
 第112师 师长 霍守义
 海军部队 司令 曾以鼎
 江阴江防部队 司令 欧阳格
 江阴要塞部队 司令 许康
 江苏保安第2团 团长 曹滂
 炮兵第8团1营
 炮兵第10团1个营 团长 彭孟緝
 第11军团 军团长 上官云相
 第40师 师长 刘培绪
 太湖警备指挥部 指挥官 邢震南
 炮兵部队 指挥官 刘翰东
 炮兵第3团 团长 卢蔚云
 炮兵第4团 团长 孔庆桂
 炮兵第16团 团长 王若卿
 炮兵第10团1个营 团长 彭孟緝
 教导总队炮兵营炮兵学校练习队

击。黄浦江上的日军舰炮亦齐向南市轰击，落弹千余发，十六铺至董家渡一带之南市繁华地区顿成一片火海，大批商店和民居被毁，到处都是断墙残壁。当日中午，日军施放烟幕弹，掩护步兵进攻，袭击平阴桥、康衢桥两阵地，守军工事被毁，阵地被突破，遂退守第二道防线。日军在坦克掩护下，沿龙华路、斜土路和斜徐路攻击前进，分三路强渡日晖港，向南市发动总攻。中国军队和警察在局门路各街道展开巷战，阻敌前进。

11月11日，是敌我双方在南市进行交战的最后一天。中国军队在后退中继续战斗，从早晨至中午，战斗转移至南市核心地带和与法租界交界边沿地区。同日，日军一部进攻高昌庙中国海军驻沪机关，海军警卫营进行了英勇的抗击，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同时，日军一部由浦东渡黄浦江，在十六铺上岸，企图配合西线日军进入南市城厢，当即遭到南市外滩守军的猛烈反击，过江日军被迫退回浦东。在南市巷战中，第165旅旅长张彬在作战中阵亡。330团在团长焦长富的率领下，步步为营，逐街争夺，且战且退，只剩40余人，仍坚持不屈，与敌人展开血战。战斗至傍晚，团长负伤，大部壮烈牺牲。“当夜幕初降时，尚闻枪声，后来渐趋稀落，下半夜枪声全部停止。”

11日午夜，南市巷战终止。守卫南市的最后一批中国军队，在征得法租界当局同

意后，于11月12日下午14时半，解除武装退入法租界。同日16时半，日军占领南市。至此，上海市全境（除租界外）完全沦落在日军的铁蹄之下。淞沪会战至此基本结束。

上海市长俞鸿钧于11月11日上海陷落的当天发表《告上海市民书》，热烈赞扬3个月来的上海抗战，指出“在此九十日中，予敌人以巨大之损耗，博友邦真诚之赞扬”。以上海抗战的精神而共勉：“沪市民众抗战之精神，足以为全民族抗战之精神……沪市民众抗战之经验，足以为全民族抗战之经验。”

国民政府军委会政训处也发表《告上海同胞书》，以抗战必胜的信念与上海民众共勉：“上海是我们民族精神所集中发扬的中心，上海的同胞要立志作国家精神上的长城！……抗战一定胜利，复兴一定成功，我们军队一定在最短期内收复淞沪！”





■ 占领上海市政府的日军在墙上留字

大火冲天，从上午延烧至下午未熄。南市为原上海县城厢所在地，建筑鳞次栉比，居民密集，加之从八一三开战以来，从市区苏州河以北战区逃难来南市的人为数不少，日机连日轰炸，居民一片恐慌，数万人纷纷向租界逃避，人群如潮水般涌动，在方浜桥一带，途为之塞。

防守南市的部队和警察，在主力西撤、强敌压境的险恶态势下，毫无畏惧，准备决一死战。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蔡劲军在8日向报界发表谈话，表达守军的决心：“奉令固守南市，正督率所属，拼死抗御，决保此淞沪最后一块土地，与整个上海共存亡。”日军从两个方面围攻南市。由苏州河南岸绕道沪

西的日军，进犯日晖港一线，从西线进攻南市，为攻击的重点；从黄浦江沿岸登陆的日军，从东线进攻，作为牵制。9日上午，中国军队西线的前哨在谨记路一带警戒，日军步兵300余人，坦克5辆，在火炮掩护下发起进攻。55师前哨部队当即进行还击，将进犯之敌打退。午后，日军增援部队进至日晖港西岸，与守军隔河对峙。当晚，日军在徐家汇土山湾、枫林桥、谨记路及斜土路一带，向东发动进攻，但均遭守军阻击，越日晖港之企图未能得逞。

11月10日晨，日军出动飞机30余架，向南市投弹百余枚。在浦东东昌路至周家渡沿江地段的日军火炮四五十门，隔江向南市射

第五章

全线溃退



混乱不堪的撤退

淞沪会战发展至11月7日间，日军第十军已攻占金山、松江，前锋直指青浦，上海派遣军从苏州河一线北上，进攻矛头指向虹桥、黄渡一带。南北两路日军，在淀山湖以东围歼中国军队的态势，已十分明显。中国军队从淞沪地区全线西撤已是刻不容缓，再也无法犹豫拖延了。蒋介石和南京统帅部有鉴于形势的严重，遂下决心命令第三战区当即实行全线后撤。11月8日晚，蒋介石批准顾祝同、陈诚关于开始组织实施向后方既设国防线转移的决定。9日起，左翼和右翼两大作战集团共60多个师的大军，从北起长江南岸的江苏浏河，南至杭州湾北岸的浙江乍浦这一线上，由东向西开始了大规模的转移。

第三战区司令部在11月8日夜，先由电话下达撤退命令。这一大规模撤退行动，本来已是意料中事，因为最高统帅部事先未指示各级指挥机关预作准备，8日夜晚的命令遂成为一道突如其来的指令。前线部队的指挥机关，集团军司令部一级也只是在11月10日中午前后，才接到西撤的正式通知。右翼集团先开始行动。张发奎于9日凌晨下令，原中央集团各部放弃苏州河南岸阵地，向青浦—白鹤港之线转移，利用既设国防阵地阻敌前进。由薛岳统率的左翼集团，坚持到10日晚才开始西撤。11月10日至14日，顾祝同以书

面形式连发几道部署全军转移的正式命令。

第三战区的转移计划，是以左翼作战集团西撤至吴（县）福（山）线，以右翼作战集团撤至乍（浦）平（湖）嘉（兴）线，左右两大集团由苏（州）嘉（兴）线相互联结，把日军阻止于常熟—苏州—嘉兴之线以东；同时，抽调一部分主力部队，后移至锡（无锡）澄（江阴）国防线上，预作抗击敌军的准备。为实施这一作战计划，在兵力部署和作战区划等方面，曾作出以下各项规定。

1. 首先要求守住昆（山）支（塘）掩护阵线。昆支线北起长江南岸的支塘镇，南抵沪宁线上的昆山，是中国左翼军从上海西进苏南地区和南京的必经之线，也是吴福线的前卫阵线。在这里，战前已修建有一些简单的防御工事。顾祝同11月10日13时半下达给左翼集团总司令薛岳的命令中，已要求15集团军以44师、32师2个师和第19集团军共同占领昆支线阵地，作为左翼集团西撤的第一道防线。同月14日上午7时，顾祝同下达的命令，再次规定守卫昆支线的任务，该命令要求薛岳“指挥税警总团、11师、36师、6师、46师之1个团、44师、706师、171师、173师、74师、176师、228旅，占领大墅镇—支塘—白茆口之线，掩护主力军之转进及左翼军吴福线阵地之占领”。在吴福线主阵地占领后，昆支线各部再向后转移。



■ 闸北一带烟尘遮天蔽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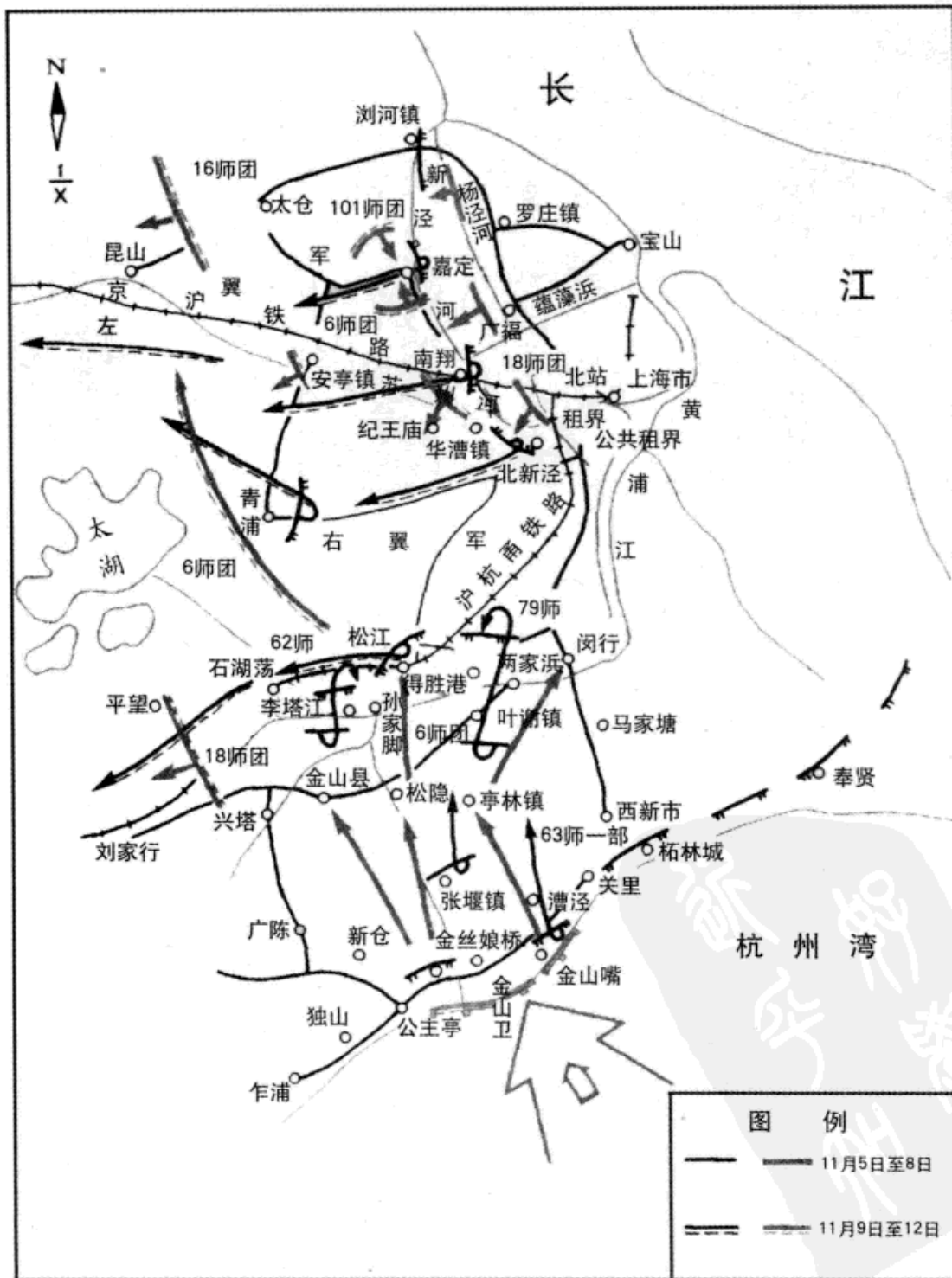
2. 左翼作战军占领吴福线阵地。第三战区司令部11月10日和14日的命令,规定左翼集团的第9、第15、第19、第21集团军各部,从浏河、广福、嘉定、江桥之线,沿吴淞江南北地区和长江南岸西撤至吴福线。以第8师、第14师、第154师、第159师、第160师、第44师、第706师、第32师、第98师、第60师、第13师、第56师、第40师、第228旅和第534旅等部构成第一阵地带。其阵地为自吴淞江南岸向北,经正仪、巴城、东塘墅、梅里、浒浦,再沿长江西向至福山。第二阵地带,南起平望以北,经同里、车坊镇、外跨塘、唯亭、沙湖、斜塘镇、相城镇、昆城湖、莫城镇,北至常熟城。担任第二阵地带守卫的部队,为第107师、第87师、第3师、

第58师、第57师、第53师、第33师、第67师、第11师,以及从昆支线转用的第171、173、174、176师等部。

3. 右翼作战军占领乍平嘉线阵地。第三战区司令部的上述命令规定:“右翼军应坚固占领乍平嘉本阵地,拒止敌军前进。”右翼集团由张发奎统率,辖有第8、第10集团军共9个师又5个旅,以及直属预备部队5个师。其中第55师从上海转移至平望,第62师西撤苏州转到嘉兴,第59师和第90师由唯亭、正仪转移至嘉兴和盛泽,第19师、第16师、第107师经苏嘉公路转至嘉兴,第108师、第545旅到苏州集结,再向嘉兴方向推进,第6师待昆山阵地撤退后,亦向嘉兴集结。显然,第三战区的目的,是计划以嘉兴为中心,集中右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图十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撤离淞沪战场时期作战经过要图 (1937年11月5-12日)



翼军的全部主力，防守乍平嘉国防线，阻击自金山卫地区登陆的日军第18师团、第114师团等部的西进。

4. 以总预备队在锡澄线构筑野战工事，作为吴福线后方的第二道防线。在第三战区司令部11月14日上午发布的作战命令中，指令第17军团军团长胡宗南统筹锡澄线的防务，组成战区总预备队，由淞沪战场径直退往锡澄线预作准备，其一部分部队先行参加昆支线作战，然后再西移至锡澄线。作为总预备队的部队，有第1师、第78师、第36师、第61师、第88师、第102师、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总团等部。

第三战区的淞沪撤退和吴福线、乍平

嘉线防卫作战计划，如果以战略计划而言，不失为一个全面和周密的计划。可以说，它是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关于京沪杭地区反侵略作战的战略战役构想的具体运用，也是以吴福、乍平嘉和锡澄线为依托，进行对日作战计划的具体实施，而其撤退部署亦符合当时的战场实际态势。如果是从容不迫、紧张有序地把淞沪前线部队转移到新的阵线，重振旗鼓，日军在一个相当的时间里，是难以突破京沪杭之间的三道国防线的。

可是，这个计划在实际上大部分并未得到贯彻和实施。因为这个计划及其实施的行动远远失之过迟，当正式下达之前，淞沪前线相当多的部队，已在11月9日闻风而动，



■ 由于制空权的丧失，日军飞机对中国军队造成了极大威胁。

纷纷争先恐后地向西撤退，随即出现失控局面，以致形成一场纷乱的大溃退。同时，还因为日军的前进速度很快，其追击部队近距离地紧随着撤退的部队，日军少数突击队甚至超越了撤退的队伍，以致第三战区的上述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原定要守住的阵线不少就已经陷于敌手了。

这时，日本统帅机关为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在上海、南京、杭州地区进一步扩大其侵略战争，决定成立华中方面军。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以临参命第138号令编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为司令官、冢田攻为参谋长，下辖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同日，华中方面军下达第一号作战命令，提出要“在昆山附近围歼上海西北方的敌主力”，命令“上海派遣军仍继续攻击苏州河南面地区、封锁上海市，同时把重点保持在京沪铁路北面地区，应准备向昆山方向攻击”。并命令“第十军以主力进入松江附近，协同上海派遣军在苏州河南面地区作战，同时须准备以后向昆山方面的攻击”。按照上述计划，日军两大集团遂开始实行全线向西追击行动。

日本第十军以乍平嘉线和苏嘉线为进攻的主要目标。第6师团在11月9日发现松江境内的中国军队正向西北方向转移，当即以国崎支队占领松江，以师团主力向青浦方面追击。11月11日，青浦失守。第18师团攻占

枫泾镇后，主力向北攻击前进，企图进占嘉兴。11日，第十军主力向平望—嘉兴一线推进，以第6师团主力指向昆山，以18师团和114师团指向嘉兴。14日，平望陷落。15日，昆山被日军攻占。

上海派遣军以吴福线为进攻的主要目标。其主力在沪宁铁路北侧地区，沿着太仓—昆山一线进行追击。11月12日各师团全面开始行动。第13师团于14日攻占浏河镇，接着进入太仓北面地区向西追击，19日突破了肖家桥、谢家桥附近中国军队的阵地。第101师团从南翔、广福以东向嘉定发起进攻，于13日夺占嘉定，14日进抵陆渡桥以北一带。第3师团主力经南翔向太仓追击，于14日到达太仓。第11师团于11月10日夺占苏州河附近的江桥镇，12日攻占南翔，14日占领太仓。随后，该部又向支塘镇攻击前进。同时为配合第16师团在长江白茆口的登陆作战和进攻常熟城，11师团主力一部通过水上运输，向昆城湖西岸的莫城镇进犯。15日到达昆山，17日起，向昆山、苏州间铁路沿线各要点发起进攻。

当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发动全线进攻和追击之时，日本第16师团在长江白茆口发起了登陆战。这是日军为策应第十军金山卫登陆，实施南北两翼迂回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参谋本部早在10月中旬于组建第十军时，已确定了这一计划。10月17日，参谋

本部及其作战部的多田骏、下村定等人商定：“从华北调出第16师团入列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登陆作战进行配合，该师团从白茆口进行登陆。此事得到参谋总长的裁决，立即开始准备。”第16师团先从华北车运至大连。11月9日自大连港起航，12日其先头部队到达吴淞口海面。在16师团进入长江下游常熟附近江面时，上海派遣军为加强登陆的兵力，又调派重藤支队和永津支队共2个联队的兵力加入16师团的行列，于12日早晨在吴淞上船西航，参加登陆作战。

11月13日6时许，重藤支队和永津支队作为先头部队在白茆口西面的浒浦口先行上陆，占领沿岸地带后，于当日傍晚进至常熟东面约10公里的一线。16师团一部在同日15时在白茆口附近登陆，向支塘镇方向进攻。14日，该师团主力在白茆口全部上陆，分别向福山和常熟进犯。

当日军16师团在浒浦口、白茆口登陆，自北而南向支塘、福山、常熟攻击前进之际，从太仓西进的日军第11师团，从14日起沿太仓—常熟公路进行追击；第13师团于14日攻下浏河后，也西向常熟梅李进犯；第9师团沿沪宁线西进，在15日占领昆山后，攻势直指苏州方向。其时，中国左翼集团的第9、第15、第19、第21集团军的30多个师的部队，正自太仓至昆山南北这一线匆匆向西撤退。西撤部队本来的目标，是守住昆支阵

线，掩护大军进入吴福线抗击敌军。然而在短短的几天里，战局急转直下。日军第9、第11、第13师团的平行式的自东而西的大规模地追击，第16师团自北而南的中途截击，使中国左翼军陷于空前的危境之中。一路溃退，组织不起有效的抗击战。于是，昆支线和吴福线的阻击战计划很快化为泡影。

在一路溃退的狂奔之中，常熟附近历时7天的阻击战，算是这次大撤退中的一个例外。当11月13日至14日之间日军16师团在白茆口一带登陆时，在这里担任江防的第40师首先奋起抗击。13日上午，40师在新泾口、白茆口与登陆之敌展开激战，而该师在浒浦口、徐六泾口的1个团伤亡严重而退却。这时，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率部西撤到达支塘，15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已抵常熟城内，经双方会商决定：以176师、173师和174师当即向登陆之敌发动进攻，以98师协同171师迅速占领常熟至福山之间的阵地，支援176师、173师的战斗，尽力保障昆支线和福山、常熟间阵地，掩护主力军转到吴福线。14日，21集团军对敌不断发动攻击，将攻入徐家市之敌驱逐，战至中午仍与敌在徐家市前方与前墩桥之间拉锯之中。当日下午，守军阵地在敌坦克的冲击下濒于崩溃，乃逐次向常熟方向后退，支塘乃于傍晚失守，昆支掩护线遂告瓦解。

日军攻占支塘后，即向福（山）常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熟)线进犯。15集团军和21集团军再次协同作战，于15日起进行保卫福山和常熟的战斗。

在常熟方面，15日上午，日军向曹家村等地发动进攻。中国军队第60师和第171师在兴隆桥、曹家村附近展开阻击。98师、44师、32师、11师等部担任常熟城内外的防务，13师则担任虞山阵地的防守。敌我双方为争夺常熟城和虞山两个要点，连日激战不止。15日下午，日机20余架对常熟城轮番轰炸，日军一部从15集团军与21集团军的间隙地带，窜入城北面能俯瞰全城之虞山。次日，日军增兵虞山，以火力控制常熟城。17

日至19日，罗卓英亲自指挥第11师和44师进行反攻。19日拂晓，第11师和第26师向虞山进击，上午8时夺取218高地，日军退据244高地，双方数度冲杀，相持不下。午后，11师等部继续猛攻，98师以一部出击威胁日军后侧。战至下午14时，攻击无大进展。同时，98师在常熟城的北门、东门至大悲桥以南之线，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大。鉴于全盘态势不利，薛岳下令后撤，逐次转移。

在福山方面，17日，敌向福山、谢家桥、李家桥等处攻击，尤以福山为攻击之重点。防守福山的706师伤亡严重。176师和173师当即派兵增援。这时顾祝同来电，说“福



■ 攻入市区的日军部队。

山为国防重地，万不得有失，着廖（磊）罗（卓英）两总司令协力筹办”。廖磊调集19军、48军各部奋力抗击，战况至为激烈，176师和171师各有团长1人伤亡。19日上午，常熟、虞山被日军攻占，11时许福山亦告失陷。当日14时，薛岳下令，放弃固守吴福阵地的计划，命令左翼军全部西撤锡澄线。

中国右翼作战军的退却也是在11月9日开始的。右翼军此时辖有第8、第9、第10等3个集团军，其中第9集团军在11月12日起归属于左翼集团序列。这方面的撤退同样是在非常被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张发奎在事先毫无预闻，别的部队已开始撤退行动之后，才接到撤退命令。他回忆当时向右翼军各部下命令的情形说：“我仍基于上级的指示而下达三个集团的撤退命令，以完成我的手续，而我命令中的各种规定，恐没有办法实施，因为各部队已早于我的命令下达之前而自动开始退却了。”张发奎的司令部原设于上海附近的龙华以西，当日军第十军攻占松江、枫泾，截断沪杭铁路以后，他已不可能从原路归队，而绕道在13日到苏浙边界嘉善。在途中，他“电令第10集团军迅速突破占领乍浦、嘉善之线既设阵地拒止敌人”。

日军第18师团在11月9日攻占枫泾后，即向嘉善和嘉兴进犯。第6师团在11月10日至11日先后进攻青浦和白鹤港，接着在14日进占昆山，随后折回松江，改道向平望和吴兴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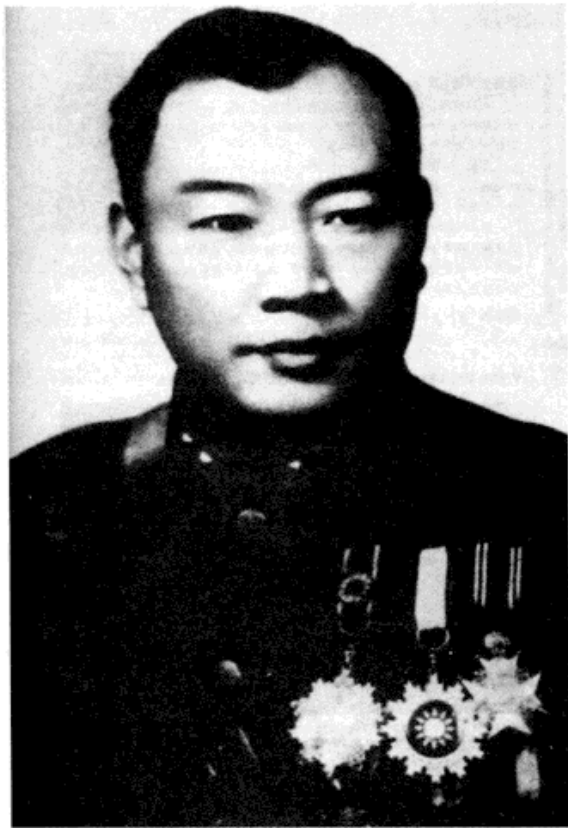
向进攻。国崎支队自11月13日起，从枫泾、平湖、嘉善一带向南浔、吴兴方向进犯。

当11月中旬结束之时，上海以西的苏南地区和苏浙边境地区的军事态势，一方面，是中国军队沿太湖南北两线，急剧地向无锡、常州、南京方向和吴兴、长兴、广德、宜兴方向撤退；另一方面，是日本华中方面军分两路由太湖北面和太湖东南地区进行追击。11月19日，日军西进到达的地方为：第18、第114师团攻占嘉兴；国崎支队占领太湖南岸的南浔；第9师团攻占苏州；第11师团占领苏州以北的莫城镇；第16师团攻占福山；第13师团占领常熟以北、福山以南之肖家桥一带。

大溃退

在这场规模巨大的淞沪会战中，1937年10月之战是阵地战的高潮，接踵而至的11月的大撤退，则是大转移的高潮。阵地战高潮以大场的陷落画上句号，而这场大转移且在其实际进程中迅速演变为一场大溃退，一直退到南京城下和苏皖边境，才告终结。

淞沪前线60多个师几十万人的西撤，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略性的大转移，这种大规模的撤退行动，不仅在抗日战争中是空前绝后之举，就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一战略性的退却行动，直接决定了



■ 78军军长宋希濂。

淞沪会战的最后的结局，而其影响所及，也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抗日战局和南京保卫战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本来，众所公认，撤退是任何军队都可能经历的战斗行为，又是组织最为困难的战斗行为。稍有不慎就会演变成为全军的崩溃。成功的战略性撤退，必然离不开精密的计划和精心的组织。对于撤退开始的时机、退却的路线，以及退却终点的选择，乃至用于阻击敌尾追部队所需要的兵力等方面统帅机关都必须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和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方针和坚强有力的举措，而绝不能让退却成为一场逃跑式的溃退。以此而

论，淞沪会战后期的这次退却，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不成功的，事实上，它成了一场纷乱失序的大溃退，而定位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

这场大规模的战略退却，决策过迟，一再迟延导致丧失先机，这是最高统帅部的严重失误所致。如前所述，在9月底10月初刘行失守前后，蒋介石未能接受陈诚、张发奎等人的建议，主动调整战线实行战略退却，这是丧失退却的最佳时机于先。10月25日大场失守时，如果当机立断，主动实行战略退却，虽然形势于我已不如刘行失守之时有利，但仍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可是，蒋介石再次拒绝了白崇禧、刘斐等人的建议，力主在苏州河南岸进行固守，丧失了退却的有利时机。殆至日军第十军在金山卫登陆，日军两翼迂回的战略攻势已难以击破，蒋介石再次不接受陈诚等将领立即调整战线、实施战略转移的意见，仍要求再坚持若干天，这就丧失了最后的退却时机。

前线指挥部同样被动应付，缺乏预见。“特别是敌在金山卫登陆后，还只知投入不足之兵力来堵塞突破口，还企图在松江地区消极固守，而不知急速在青浦、青阳港设置收容阵地，在其掩护下，使上海正面部队退守吴福线、锡澄线，进行持久抵抗。”11月8日晚的撤退命令，可以说是一个不该迟到而在事实上却是先后三次被延误了的命令。

这场大规模的战略退却，在事先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准备。作为一个有几十万大军参加的规模巨大的撤退行动，南京统帅部事先竟然并未命令全军进行准备。在部队官兵中从未作过战略转移的任何酝酿和部署。各支部队对自己的退却路线茫然不明，更谈不上在事先派出先遣队进行勘察和探路了。退却的命令突如其来，前线的高级将领在事先都毫无所知。当时担任78军军长的宋希濂回忆道：“11月9日下午6时，张发奎和我通电话，说：‘委员长命令我军务必在沪西再支持几天。’但到8时，张又突来电话，命本军于当晚立即向昆山方向撤退。9日这一夜的退却，简直是混乱极了。”

在大量部队西撤的沿途各地，事先均未设置兵站、筹措供应，以致成为“兵马已动，粮草无着”的局面。作为大军西撤的主要终点吴福线、乍嘉线、锡澄线阵地，在事先又未作作战准备。这几条战前苦心经营的国防线，在西撤部队到来前竟然毫无准备，掌握工事图纸和钥匙的地方官员竟已逃之夭夭，连工事的门户也未打开，作战通道都未清理疏通。及至后撤部队到达时，“既设阵地线工事无图可按，无人指示，无钥开门”。此外，地方军政机关亦都未为配合战略退却作过何种准备。薛岳在西撤途中于11月18日向蒋介石、顾祝同、陈诚提出的一个报告中，对地方军政机关就有所指责：“在国防阵

地带内之军政机关人员，尤其兵站、交通、通讯、卫生等设置，同时失却联络，无人负责。”

这场大规模的战略退却，是在没有任何一支战略预备队的配合和接应之下进行的。淞沪会战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战役，并未设置具有足够实力的战略预备队，尤其是在吴福线、乍嘉线和锡澄线没有配备必要的可以机动的兵力，这不能不认为是最高统帅部的一大失误。这第一和第二道国防线，按照既定的战略构想，是在淞沪前线部队逐次后撤，继续抗击日军的主要阵地，在这里预先集结和驻扎必要的机动部队，乃为战略上所必要。还在9月间，张发奎和张治中有见于此，曾向蒋介石建议：在上海作战的同时，“先以约10个师的兵力预行占领苏、嘉、吴、福之既设国防工事，作为第二抵抗线，此10个师之兵力，除非用在扩张战果方面，不得为其他状况转用”。可是，南京统帅部并未重视在国防线预置战略预备队的必要性，相反，却是孤注一掷，不计后患，把所有可以使用的部队悉数调到淞沪战场。因为战略预备队用尽，以致到大军西撤时，既设国防线上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前来接应，掩护撤退和阻滞敌之进攻。显然，这也是这次撤退溃败的一个原因。

这场大规模的战略退却，因为其行动丧失先机，全无准备，又无战略预备队可资机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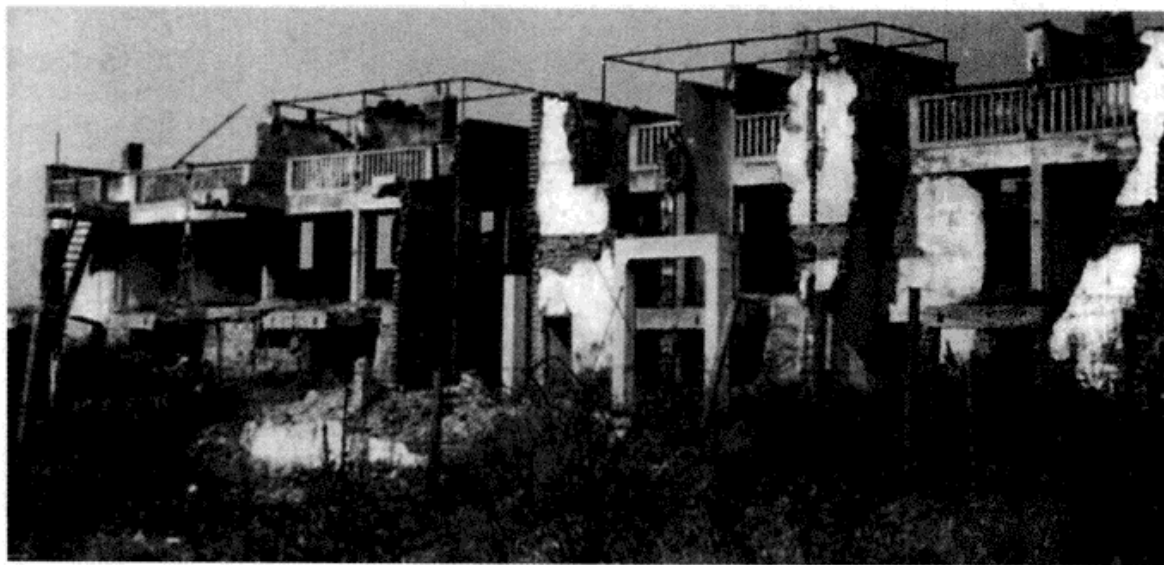
动，以致完全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主动权的得与失，固然是同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分不开的，但也是和作战指导的正确与否分不开的。南京统帅机关和第三战区的战争指导和作战指挥上的严重失误，是造成这次战略撤退陷于全面被动的主要原因。撤退过程中极度混乱的失序现象，如各个部队行进的交叉、方向的迷失、友军之间的误会、指挥官与部队相脱离、上级不能掌握下级、部队寻觅不到自己指挥机关和长官所在的位置，以及各部之间的混杂和军民的混杂等等现象，无不是丧失了战场主动权的种种具体表现。一路溃退中，不少高级指挥机关屡遭日军挺进队和便衣队的袭击，陷于瘫痪。薛岳所在的第19集团军总司令部进至安亭时，因巫剑雄部的自行撤走，意外遭到来自青浦的日军侦察分队的袭击。在转移中，

薛岳的座车又遭日军扫射，司机、副官、卫士都被打死。薛岳从车上跳出，泅渡过河，才幸免于难。胡宗南的第17军团司令部在南翔至昆山间的公路上，也遭到日军挺进队的攻击，司令部人员和警卫连士兵牺牲不少，胡宗南侥幸生还。如此纷乱的结果，在整个退却过程中，几十万大军竟然几乎组织不起一次真正的有效的反击战，几乎是一路溃退，这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集中表现。

这场大规模的战略退却，不仅左、右两大集团之间，几乎没有作战上的协同与配合；在两大翼内部，各个集团军、各个师之间，往往也是互不协同，各奔行程，如同一布袋破裂了的马铃薯散落在地，各自纷纷滚走，谁也不管谁了。

右翼集团的许多部队因为在苏州河和黄浦江之间，与日军距离很近，为免于被进展



■ 闸北大统路青云坊的成排新式里弄住宅被日军炮火完全摧毁。

迅速的日军包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西撤。退却的路线也未划分清楚，与友邻部队的联系中断，各部车辆、马匹、火炮堵塞道路，各部又竞相争路，人员和武器均不能顺利通过。又加上日军飞机轰炸、便衣队袭扰，部队陷于混乱，以致预定守住青浦—白鹤港之线的计划未得实现。遂于11月11日后纷纷渡过苏州河，退向昆山、苏州、无锡方向。

左翼集团本来打算守住昆支阵线，但从南翔、嘉定、浏河到昆山100多华里，大军崩溃，各部争先恐后，撤退下来的部队已很纷乱。昆山当地军政机关又多已星散，粮弹补给全无着落；日军又已在浒浦口、白茆口登陆，直接威胁大军前进道路。结果昆山守不到2天，就被迫弃守。当常熟、虞山阵地被日军突破后，廖磊与罗卓英电话会商处置办法，并向薛岳和顾祝同请示。不到半天，廖磊与罗卓英之间的电话即告中断，廖派出参谋长前往练塘镇罗卓英司令部联系，到达时始知罗卓英和15集团军司令部早已撤退，但却在事先不向21集团军通报。集团军一级的情形如此，师一级的状况更为纷乱。67师黄维所部奉命守御泗江口公路桥，掩护大军过河。这时该部实力已所剩无几，原来的4个团只够编成为4个营，留守桥头，让其他部队先行撤离。但在部署完成后，却发现自己的左右两翼已无可以依托的部队。原来担任侧翼

掩护的广东部队已经先行开走了。结果当夜日军就在67师防地的西边偷渡过河，袭击西撤的中国军队，给中国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甚至出现自相践踏的情形。

这次溃退式的大规模撤退，兵员、武器装备以及马匹和车辆损失极为严重，对全军士气造成的消极影响也不可低估。在这半个多月的撤退过程中，兵员和武器等各项损失，难以精确统计，也未见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公布过这方面的材料。在这里引述一位这场大撤退亲历者的认识和估计——当时担任第18军14师参谋长的郭汝瑰说道：“淞沪战役我始终在第一线，深知3个月硬顶硬拼，伤亡虽大，士气并不低落，战斗纪律良好，只要撤下来稍事整理补充，即可再战。唯有大溃退，数日之间精锐丧尽，军纪荡然。”这即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大溃退遭受的损失，甚至比此前3个月作战的损失，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述估计是从总体而言，如果从部队的个体来看，情形亦是如此。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1团第9连代理连长李纂超的回忆，提供了这方面的实例。这个连从莘庄附近向昆山方向后撤，“到达苏州河上的黄渡大桥时，天已破晓，大部队涌向一点，混乱无法形容。同时桥头已敷设地雷，桥身已遭到敌机破坏，尤其意外的是，由松江、青浦方面突入的敌挺进队，已用火力封锁了该桥，有

意让我军自投虎口。在这紧急情况下，大家无暇深思熟虑，但求在敌机开始活动之前，迅速通过，原来的后撤序列，再也无法维持。因此，通过大桥时，争先恐后，以致许多重火器和人掉到河里去。我连通过时，采取了前后战士紧拉腰皮带的办法，依靠人墙的掩护，才未遭受重大的伤亡。通过后清点人数，100多人幸存者约70名”。其实，这仅仅是这支部队在西撤途中首次遭到的损失而已。

这场大规模溃退的最大的恶果，莫过于京沪之间的吴福、锡澄国防线和沪杭之间的乍平嘉国防线的丧失，以致首都南京的门户洞开。本来，按照南京军事当局的战前对于淞沪作战的计划，在上海并不准备进行旷日持久的死守，而是计划在这几道既设国防线上节节抵抗。可是淞沪作战时几次该退未退，一再拖延，最后又撤退过迟，同时日军两翼迂回，追击迅速，并从空中日夜跟踪轰炸，西撤部队争先恐后向西奔突，一批批马不停蹄地越过国防线，再也不可能在这里组织起有效的阻击战了。

这一局面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缺乏战略目光，指挥不当，致使上海各部未能及时主动撤至永久阵地，利用这些永久工事，继续作战，消耗敌人。当部队被动撤到永久阵地时，迫于敌人尾追，无喘息余地，不得不一退再退，永久工

事无从利用”。

同时，国防线所在地区，作为军事要地本应预作准备，部署专门队伍进行掩护和应接，并对国防工事妥善维护。可是，在事实上，这一切全都付诸阙如，完全无人负责。第15集团军98师从广福向常熟撤退时，“当时官兵思想，认为常熟、昆山有国防永久坚固工事，能作持久抵抗，待机反攻，因此在撤退时并不气馁”。哪知，该师进到常熟城以东既设阵地时，却“出现既没有现地工事位置图，找不到工事位置，亦找不到钥匙。据当地老百姓说，工事位置图和钥匙是由保长保管的，而保长早就逃跑了”。该师的一个副旅长龚传文率部进入既设阵线，找了许久，才发现掩体的所在。但门洞都有暗锁锁住，无法打开，用十字镐和大石头来打都未能把门敲开。最后从师部得悉，钥匙在附近村子的乡长手里。等派人赶到那儿，乡长已不知去向。凡此种种，在国防线上各地几乎都有发生。罗卓英11月19日率部撤离吴福线之前，曾向薛岳报告国防线上的诸多问题，其中写道：“一、既设阵地与工事无图参考，无人指示，无钥开门。二、因前线之撤退，而在国防阵地带内之军政机关人员，尤其兵站、交通、通信、卫生等设置，同时失却联络，无人负责。”

再者，这些国防工事的分布和建筑，也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些工事大都是一

些钢筋水泥的重机枪巢，作为阵地的骨干，有少数还只是简单的机枪掩体。至于交通壕、步兵掩体和工事前方的障碍物都并未完成。各个工事之间也无交通壕沟通。98师参谋长方靖本来对国防线寄予希望，到了吴福线实地勘察，大出意外，只见“所谓国防工事，钢筋水泥机枪掩体在公路大道两旁南北

三四百米之线，仅有十几处像垃圾堆的土包一样，当时掘开上层，有的是机枪掩体，没有钥匙打不开，只有立即钻开。有的扒开了是棺材，不是水泥工事，再向三四百米以外去寻找，就找不到水泥的掩体工事了。……掩体工事皆没有联络交通壕，每个掩体工事仅能容一班兵、一挺轻机枪，在日间不能联

淞沪会战中上海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淞沪会战期间，上海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从卢沟桥事变到淞沪会战结束，根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民众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就达180个之多，从政府公务员到洋行职员，从工人到商人，从老师到学生，从农民到城市贫民，从妇女到儿童，从基督徒到佛教徒，其范围之广，数量之众，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抗日救亡团体，尽管政治立场不同，政治背景也不同，但在抗日的大旗下走到了一起。

上海抗日救亡团体的工作主要有：抗日救亡宣传，这方面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这也是全国成立最早的救亡团体）发挥了巨大作用。该协会组织街头演讲、电台广播、出版救亡报刊、救亡戏剧等活动，同时大力进行国际宣传，取得很好的宣传效果。

募捐救亡，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各界立即掀起了救国募捐的热潮，尽管此时上海已深陷战火，但上海民众却以毁家纾难救国自救的精神，竭尽所能支援抗战。救国募捐活动至9月10日共募集150余万元，此后则改为认购救国公债活动，至10月9日全市认购的救国公债已达1900余万元，其中市民个人认购约300万元，商界认购1100余万元，各同业公会认购570余万元。

战地服务，主要是进行军队的政治宣传、唤起民众、侦查汉奸、救护伤兵、慰勉将士等工作，其中据不完全统计，淞沪会战三个月中战地服务队救护伤兵和难民就达8200余人。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民众，面对强敌入侵的危难关头，踊跃投身抗战救亡运动，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而英勇奋斗，在抗战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络，后方弹粮也送不上来，只有在夜间补给”。

工事本身在建筑上也有许多不合作战要求，有的设计不合理，有的基础不固，有的偷工减料、质量低劣。而且，当初选择国防阵地时，以为江南一带河汉纵横，又有淀山湖、阳澄湖、昆城湖、太湖等诸多湖泊，可为天然屏障作为依托，日军难以迂回。结果，湖岸上都未置防御设备。但日军对于在江河湖汉地区的作战，事先早有准备，配备有工兵和汽艇部队，架桥填沟，轻舟涉水，行动甚为快捷。特别是金山卫登陆的日军，事先更准备了可以装卸的摩托艇，由专门队伍背负，遇水即渡。在横渡淀山湖、昆城湖、阳澄湖和太湖的作战中，日军即利用快艇部队，轻易地渡越未设防的水域，每每打乱和截断中国军队的防线。

这场近乎总崩溃的在中外战史上罕见的大撤退，除了客观上的原因以外，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和南京统帅部在战略战役指导上的严重失误所造成的，是此前几个月在军事上、政治上和外交上的错误酿成的恶果，归根结底是其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产物。就这次撤退的本身而论，其所以遭到如此惨重失败，主要原因也正在于蒋介石的决策失误和指挥不当。正如旅美的史学家黄仁宇，在对《蒋介石日记》作研究后指出的：“大兵团在敌前退却，为军事上最高

度及最难能的技术，即是训练成熟之部队，素质一致，彼此有信心，也须绵密的部署，经过演习，方能希望行动不脱节，维持必要之秩序，断无在不执行佯动，不指定掩体阵地，不派遣收容部队，不部署通信联络，和不予筹兵站补给之情形下达成期望。从蒋介石日记及其他有关文件看来，以上各种举措可能全未施行，即有执行亦不过挂一漏万。”如此领导和指挥下的这场大撤退，其失败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当11月中旬结束之时，上海以西的苏南地区和苏浙边境地区的军事态势，一方面，是中国军队沿太湖南北两线，向无锡、常州、南京方向和吴兴、长兴、广德、宜兴方向撤退；另一方面，是日本华中方面军分两路由太湖北面和太湖东南地区进行追击。11月19日，日军第18、第114师团攻占嘉兴；国崎支队占领太湖南岸的南浔；第9师团攻占苏州；第11师团占领苏州以北的莫城镇；第16师团攻占福山；第13师团占领常熟以北、福山以南之肖家桥一带。

从上海到南京

日本军部原先制订的上海作战计划，就其直接目标而言，是要歼灭当面的中国军队主力，占领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当时尚未提出要攻占南京。1937年11月7日日本华中方面

军组成时，东京参谋本部给予它的任务是：“在海军的协同下消灭上海附近之中国军队，摧毁其作战意志，以达结束战争之目的。”同时，规定“华中方面军之作战地区大体为连接苏州、嘉兴一线以东”。同月14日，松井石根向正在西进的部队发出关于作战境界的命令，大体上仍以参谋本部的上述命令为准。其中规定：“上海派遣军的部队前进占领至福山镇、常熟、苏州一线为止；另以2个师团在昆山、太仓地区集结”；“第十军前进占领至平望镇、嘉兴、海盐一线为止。”

但在事实上，所谓“嘉兴、苏州一线以东”这条控制线，只不过“控制”了短短的5天时间，就被日军完全冲破了。充满着冒险性和疯狂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这时整个国家的战争机器已经全部开动了起来，再也无法控制了。上至日本天皇裕仁，下至前线军人，特别是在军部占着压倒优势的战争扩大派，如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作战部长下村定，以及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等等，无不主张扩大用兵，对中国实行彻底打击。乘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之前予以征服，以实现日本的长久对华目标，并以此为基础，北与苏联较量、南与英美争霸。虽然，在军部中也有

以原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并不主张扩大对华战争的意见，但此一主张的影响力已越来越弱了。淞沪战场中国军队的失败，以及以出乎日军意料的速度向西溃退，使现地日军的战争狂热急剧升温，增强了松井石根等人进攻南京的信心并影响着东京统帅机关。

松井石根迷信于“支那一击”论，认为只要南京国民政府存在一天，“中国事变”就无法解决，要解决就必须打垮南京政府，逼蒋介石下台。他并且鼓吹说，如果“中国事变”能予解决，苏联问题就等于兵不血刃地解决到了某个程度，英国问题亦复如此。松井石根之外，柳川平助也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急先锋。无论是进攻南京，或是冲破苏—嘉控制线，他都是打头阵。11月15日，他就在前线私自决定，将向南京实行进攻，并且向东京鼓吹道：如果能够把握这次机会，断然前进，20天之内必可攻占南京。

11月19日，松井石根和柳川平助未待东京参谋本部的命令，来了个“先斩后奏”，下令以全力向南京追击。上午，柳川平助向第十军各部发布命令：“国崎支队经湖州、广德向芜湖追击，断敌退路。第18师团经湖州、广德、句容向南京追击。第114师团经湖州、长兴、溧阳向南京追击。第6师团先向湖州前进。”同日下午，松井石根命令上海派遣军准备进攻无锡。松井石根惟恐东京方面对进攻南京有不同意见，于22日向参谋本部

提出“为迅速解决事变，华中方面军须乘当前敌之颓势攻取南京”的书面报告。参谋总长闲院宫对松井石根和柳川平助的意见表示首肯，“24日由参谋总长发出撤销过去以苏州、嘉兴一线为作战地域的指示”，批准了向南京进攻的军事行动。

11月20日，日本战时统帅机关大本营成立。24日，在天皇裕仁的主持下，召开首次大本营御前会议，参谋总长闲院宫、军令部总长伏见宫、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参谋次长多田骏、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下村定、军令部第一部长近藤信竹等人出席。大本营会议全面肯定七七事变以来的日本侵华战争。闲院宫和伏见宫分别就陆军和海军的作战方针和计划作了说明，并获会议的确认。下村定强调：“陆军自事变发生以来，在海军的密切协力下，在各方面予敌军以重大打击，今后将继续此种强压作战。”被初期作战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本最高决策者们，在天皇的直接主导之下，确定了今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作战计划。对于华中地区的作战，会议确定：“根据今后的情况，命该(华中)方面军做好新的准备态势，进攻南京或其他地区。”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以《大陆命第八号》命令，向华中方面军下达了“以现有兵力攻占南京”的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攻略敌国首都南京。”日本军国主义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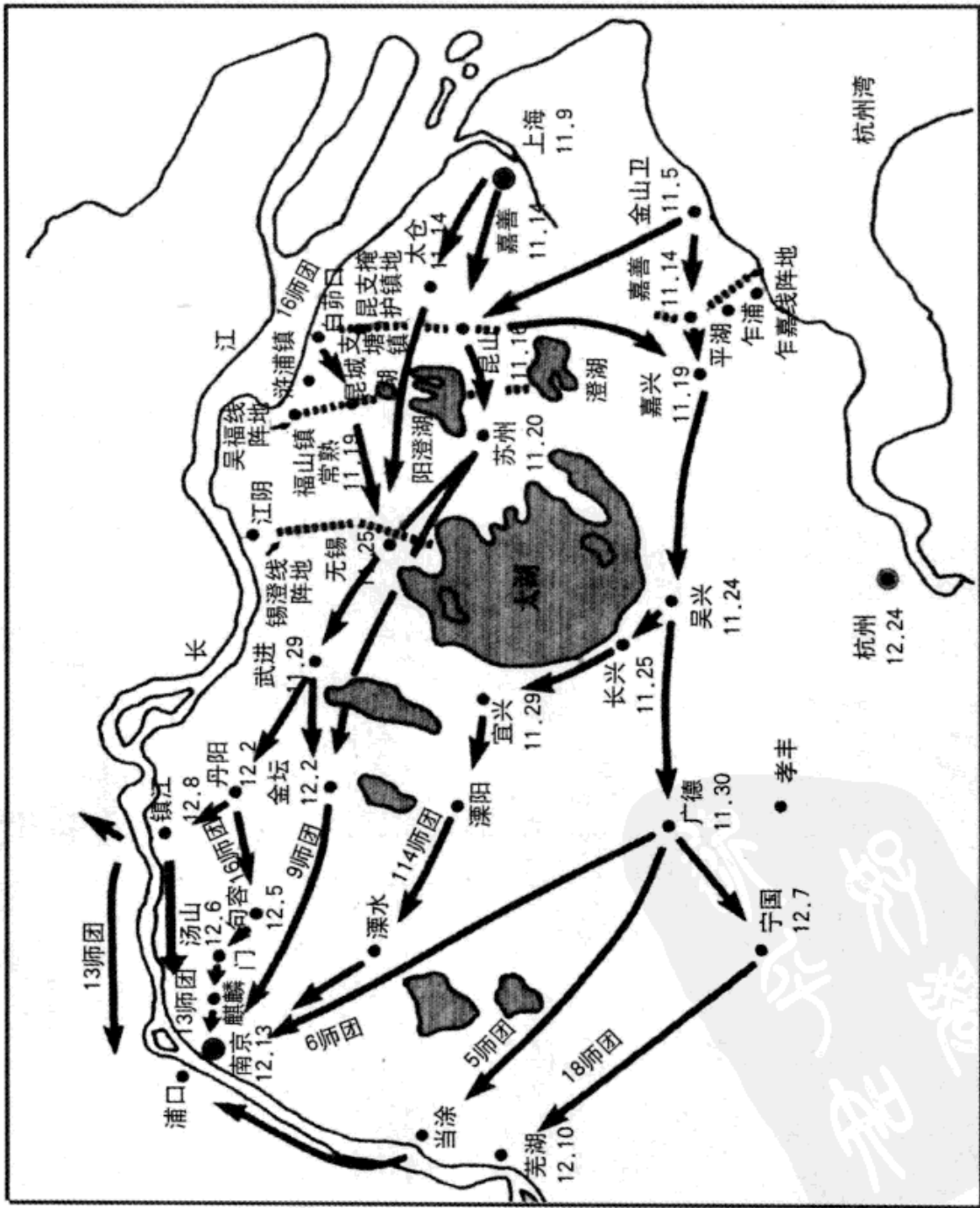
侵华战争的道路上又跨出了危险的一大步。

太湖南北地区退却战

在日本华中方面军接连向着吴福线、苏嘉线和锡澄线进犯，进窥南京的意图愈来愈明显之时，南京统帅机关在11月16日发布了《淞沪抗战第3期作战计划》。这是南京政府关于淞沪会战的最后一个作战计划，它已经把守卫既设国防线的作战与防卫南京的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个计划规定的作战方针，是以“打破敌由杭州湾方面包围我军之企图，并巩固首都”为作战目标。要求在京沪线和沪杭线两个方面阻敌前进，逐步将主力退却集结于以广德为中心的地区，待四川军队6个师到达后“转移攻势”，歼击敌军；“同时抽调一部，巩固首都”。

上述作战计划下达后不久，福山、常熟、苏州、嘉兴先后弃守，吴福线和苏嘉线被日军突破。中国军队向太湖南北地区且战且退。日军侵入吴福线和苏嘉线后，即分兵三路向南京方向进犯。一路以海空联合力量，进犯江阴、镇江、江宁要塞，企图突破长江封锁线，长驱直入内江，从水路进窥南京；一路在长江南岸、太湖以北，沿京沪铁路，越过锡澄线，直迫南京；一路循太湖南岸、京杭国道，窜犯苏皖边境，企图包抄南京，并截断中国军队的归路。

图十一 “国防线”作战要图（1937年11-12月）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这时，中国军队的大规模溃退并未终止，不过速度有所减低。左翼作战军总司令薛岳在11月19日14时下令“放弃固守吴福线阵地之计划，逐段撤退，以掩护锡澄线阵地之占领”。同时命令第15集团军主力和第21集团军，分别向宜兴和武进撤退，以第26军萧之楚部和第39军刘和鼎部留置于锡澄线上，掩护第15和第21集团军的后撤。顾祝同和薛岳其时已预计锡澄线难以固守，敌攻南京势在必至，遂部署第21集团军沿京沪线西撤武进，以便尔后向南京正面集结，掩护南京外围阵地。同时，以第15集团军之第11、第14、第67、第98、第13、第40师等各部，从

京沪线无锡以西向太湖西南方向转移，进入宜兴、广德地区，以阻击日军沿太湖南岸进犯南京。11月21日夜，第15集团军主力到达宜兴。23日进至广德。第21集团军指挥的第48军和第39军等部，在19日傍晚开始，从常熟以西向无锡方向后退。20日至21日到达锡澄线。

这时，21集团军指挥的2个军近8个师的部队，并未参加守卫锡澄线的战斗，也没有按预定计划向武进方向西撤，而是在无锡“奉命改向长兴转进。各部将抵长兴时，又奉命到宜兴张诸镇集结整理。后因吴兴情况变化，复奉命经广德向孝丰西南山地布防”。



■ 日机轰炸上海城区，浓烟四起。

第21集团军撤退方向从京沪线改变为退向苏皖边境的广德一带，当时在该集团军担任兵站分监的蓝香山有如下回忆：“蒋介石原令桂军参加南京保卫战……由于白崇禧恐桂军全部牺牲，不让桂军入南京。”在第15、第21集团军从无锡附近向宜兴、广德方向撤退的同时，薛岳直接统率的第19集团军和胡宗南第17军团，亦沿着京沪线向武进、南京方向西撤。作为京沪之间第二道防线的锡澄线，未经战斗，未予发挥其御敌作用的情况下，在26日晚被放弃了。这时，只在江阴附近尚留有2个师，协同江阴要塞部队担任守卫，锡澄线就在一片溃退声中陷落。接着，日军第3、第9、第11和第16师团西向常州、丹阳、镇江进犯，攻击矛头直指南京。

在太湖南岸，日军第十军的行动甚为凶猛，中国军队同样无力阻挡其攻势。按照蒋介石的原定计划，是以左翼军守住锡澄线，右翼军确保临平—吴兴之线，为11月下旬至12月的作战目标。他曾在11月21日向刘湘、顾祝同、陈诚、张发奎、薛岳等高级将领发出电令，说“第三战区现在阵线，右翼临平、吴兴之线，为我军主力之后方，左翼锡澄之线，为我首都及长江之屏障，有良好地形，坚固阵地，可资扼守。此两方如辅车之相依，苟缺其一，均足倾陷我军整个之阵线，关系重大，莫过如此”，要求各军“必须确保现有阵地”。尽管蒋介石一再发令督促，

西撤的两翼大军这时已组织不起有效的阻击战。在锡澄线弃守的前后，右翼作战集团各部也正在纷纷向太湖西南方向转移，并未有组织新的战斗的企图和行动。

日军第十军沿太湖南岸推进，对于南京的安全，以及第三战区主力的转移，都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如果日军夺占长兴、广德，进而攻下芜湖、当涂，不仅会对南京形成迂回之态势，还可以与上海派遣军合围由京沪线西撤的中国军队。为此，顾祝同一方面下令第21集团军火速派兵赶到长兴附近布防，另一方面又一再催促新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刘湘，速调四川部队第23集团军向广德一带集中。蒋介石还于11月21日直接下达手谕给21集团军，强调守卫吴兴的重要性，说“吴兴为今日抗战全局之重心，即为第三战区之枢纽”，要求“不惜任何牺牲，死守阵地”。可是，这时右翼十几万溃军与成千上万的逃难民众，一路势如潮涌地向苏浙皖边境山区退走，形势岌岌可危。21集团军的7个团在转运不及的情况下，仓促开抵长兴，迎击来势凶猛的日军。中国军队既无构筑工事的时间和器材，更无空军和炮兵的支援，连战防炮也没有几门。面对日军的优势火力，士兵们冒死冲锋，一批批爬上日军战车，用手榴弹和刺刀与敌搏战。整个作战全凭一片血肉之躯。如此作战，自然难望持久。11月23日，日军18师团一部由太湖分乘汽轮和橡皮

艇百余艘，窜抵宜兴、长兴一带。次日，18师团一部占领吴兴。25日，长兴又告失守。第6师团亦在11月26日突破平望—吴兴之线，窜犯广德。国崎支队则由南浔经吴兴进犯泗安。

这时，中国军队除了一部分主力沿京沪线撤向南京外，大部分主力已退至以广德为中心的苏浙皖边境。同时，新近从四川北上参加抗战的川军第23集团军，已在11月上旬集结于南京附近各县。当日军向广德一带苏浙皖边境进犯时，23集团军奉命由溧水、溧阳和芜湖等地，向广德、泗安一线开进，会同从前线后撤的部队，阻击日军进攻。川军第23集团军，由新近出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刘湘兼任总司令，唐式遵任副总司令，下辖第21军和第23军，共有5个师又2个旅，兵力约5万人。这个集团军，是淞沪会战中最后投入战场的一支主力部队。

广德、泗安地居苏浙皖边境之要冲，从这里向西前出芜湖、当涂，可切断长江航道、从后面包抄南京；而向西北进犯，则可直指南京城下。23集团军为阻敌进犯，命令第144师师长郭勋祺率部由泗安向长兴推进，145师师长饶国华率该师固守广德，146师师长刘兆藜率部协同守卫广德，147师师长杨国桢和148师师长陈鸣谦率2个师共同守卫泗安，独立第13旅和独立第14旅则部署于广德周围。当日军来犯、军情紧急之际，川军中

有个别将领在23集团军代总司令潘文华召开的会议上，主张采取稍战即退，保全实力的方针，有的人说：“中央军尚抵挡不住，我们这些地方军又得不到装备武器，现还有使用旧式双筒枪的，咋个得行嘛！”144师师长郭勋祺抗战态度坚决，力主作战，他当即表示说：“‘敌沿太湖进兵，势颇披猖。为国家民族安危，只有在此奋战，寸土必争，予敌寇迎头痛击，使寇遭受重创，才能振奋人心，然后逐步退却。如不战而退，则寇军势焰方张，我们要退亦无法退了。’……潘深以郭的谈话为然，当即指示应奋力决战，不得后退。”11月25日，日军占领长兴后，分兵2路进犯泗安和广德。郭勋祺与进犯泗安日军1个旅团展开激战。川军初上战场，士气振奋，英勇冲杀，战斗竟日而不退。郭勋祺腿部负伤后，仍指挥部队进行夜袭，日军大感惊慌。经过3日的血战，郭师伤亡甚多，无力再战。28日11时，泗安失守，23集团军主力在泗安以西约3公里之高地线一带继续与日军激战。次日午后，在日军压迫下撤至广德县城以东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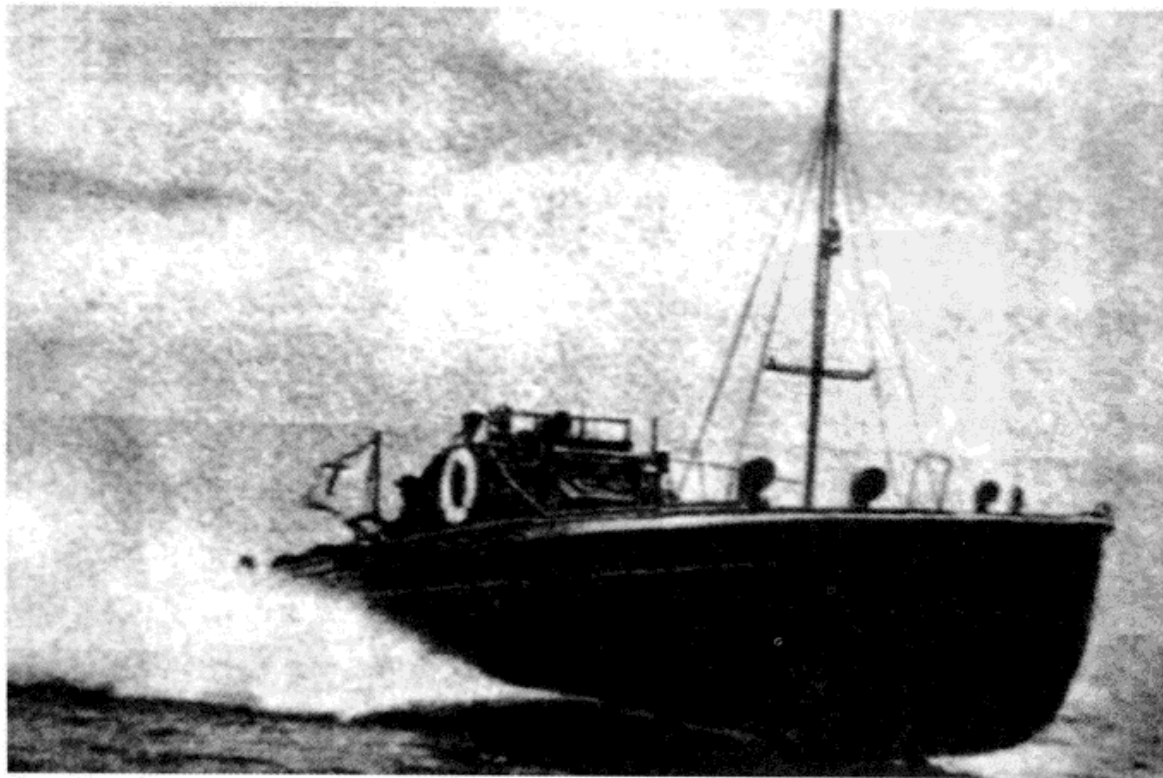
接着，11月27日至29日之间，23集团军展开保卫广德的战斗。当年参加这一战斗的黄应乾回忆道：“攻广德之敌约4千人，挟其机炮优势，冒死进逼，并以飞机27架整天轮番轰炸，工事尽毁，城舍为墟。潘文华率同饶国华师长、田冠五旅长等与敌激战甚烈，

士兵甚勇，坚强抵抗。”这场保卫战本来还可能坚持更多一些时日，因为145师有团长刘洪斋不听饶国华指挥，擅自后撤，以致阵线瓦解，日军在29日攻入广德，30日广德陷落。师长饶国华于广德失守后，愤而自戕。他是在淞沪会战中，继朱耀华因大场失守而自戕的第二个师长。第146师为阻敌西进，以438旅抄敌后路，向占据泗安之敌发起进攻，歼敌众多，还缴获了一批辐重车辆，创造了广德之战中的一个成功战例。

日军第十军夺占广德，打开了北上的通道，遂舍弃向皖南方向南撤的中国军队的追击，以主力直趋芜湖、当涂、南京，与沿京沪线西犯的上海派遣军相呼应，合围南京。

淞沪会战的最后一战：江阴战斗

保卫江阴之战，是一场地面部队、要塞炮兵部队和海军舰艇部队共同进行的，持续多日的激烈战斗，也是中国海军在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江阴有长江下游水道最狭的一段江面。江阴县城北枕长江南岸，城外有黄山、萧山2座山头陡立江边，形势险峻。黄山脚下，中国海军设有雷电学校，开山凿洞，建有舰库以储存鱼雷、水雷、弹药。在黄山、萧山之上，建有要塞重炮之垒，装置有从德国购入的大炮。在江阴江面，中国军队已在8月间构筑了沉船堵塞



■ 中国海军的鱼雷艇对日军舰艇展开了游击战。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线。江阴是日本舰队西入长江的一大障碍，也对西进的上海派遣军构成侧面的威胁，自9月以来，就遭到愈来愈猛烈的攻击。

9月中旬开始，随着上海附近会战的激化，日军对江阴发起大规模空袭。9月20日，长谷川清下达攻击江阴江面中国舰队的命令，调动以“加贺”号航空母舰为基地的第2航空战队，以及以上海公大纱厂为基地的第2联合航空队，协同作战。9月22日，日军出动飞机50余架。日机首先袭击“平海”号，炸弹纷纷落在该舰周围。“平海”号虽被炸伤，全体官兵毫不退缩，沉着应战，终将日机驱走。与此同时，“宁海”和“应瑞”号也遭日机攻击。10时半，15架日机袭击“应瑞”号，弹片炸裂了锅炉舱，炸毁鱼雷发射管。11时半，日机又向“宁海”、“应瑞”号发动两次攻击，均被击退。经1小时激战，“平海”号受损，但日机被击落4架。

9月23日上午，日军战斗机10余架掩护轰炸机16架，向江阴江面的中国舰艇进行袭击。中国海军舰艇以密集的火力对空射击。下午，日机逐渐增至70架以上，布满江阴上空。下午14时，日机11架攻击江阴炮台，吸引要塞火力，另以29架轰炸机围攻“宁海”号。舰上官兵斗志昂扬，大小火炮一起开火，当即击落日机2架。“宁海”也遭重创，江水滚滚涌入舱内。舰长陈宏泰一面组织抢修，一面指挥战斗，又击落2架日机。战至

下午16时许，“宁海”号终因负伤过重而沉没于六圩港。同日，日机再次轰炸“平海”号，该舰虽中弹累累，仍奋战不已，最后在无法行驶时，向江岸花滩搁浅，数日后被日机炸毁。

9月25日，日机再次出动，集中攻击“逸仙”号。该舰当即猛烈反击，经1小时激战，中弹负伤，机舱被毁、船体倾斜，官兵伤亡11人，终被炸沉入江底。这时，海军部长陈绍宽在南京急令“建康”号驱逐舰前来增援。“建康”号驶至龙稍港面，遭日机11架空袭，中弹沉没。9月29日，“楚有”号又被炸成重创。10月，“青天”、“湖鹏”、“绥宁”、“江宁”各舰先后被炸沉，“海容”和“海筹”号2舰亦被迫自沉江中。中国海军除一部分舰只西撤长江中、上游外，将尚未沉没的各舰之舰炮拆卸，移至陆上，组成海军太湖炮队，集中打击长江上的日本军舰。

当中国海军舰队江阴战斗结束后，鱼雷快艇部队展开对日舰的“游击战”。10月上旬，日军在上海猛攻蕴藻浜沿线，日海军舰队亦由吴淞口西犯，逐渐移至江苏南通附近江面，颇有从正面进窥江阴的动向。中国鱼雷快艇部队在装备劣势、力量悬殊的情势下，灵活机动地与日军周旋，节节抗击。在江阴外围的张黄港起，至江阴上游的四墩子港一带，于各小港间分别驻守鱼雷快艇，随

时阻击西犯的日军舰艇。同时派出快艇在夜间乘日军飞机活动困难之际，在江阴封锁线外游弋，骚扰日军。此种战法，实为一种水上游击战，使日本海空军难以聚歼而穷于应付。日军每日派出侦察机，搜索中国鱼雷快艇，因各艇伪装得法，一直未被日机发现。

鱼雷快艇部队巧妙对敌，不怕牺牲，事迹至为动人。《海军沪澄战役之检讨》一文中，记录有下一段事迹：10月初旬之某晨，“史34”号鱼雷快艇，自封锁线外换防归来，忽遭日机6架空袭。该艇毫无惊慌，以高射机枪沉着对敌射击，曲折疾驰于江中，对空鏖战约达半小时之久。日机连投12颗炸弹均未命中。其后日机再以机枪扫射，始不幸洞穿快艇油柜，汽油爆炸起火。全艇官兵被焚，悉数殉难江底。此为开战3个月以来，鱼雷快艇被日机击沉之第一艘。

10月下旬，集结于南通一带的日舰，已逐渐增至百余艘之多，且每于白昼，动辄遣三五艘舰艇在飞机掩护之下，向上进窥，但未抵张黄港即又转航回去。其目的在窥探虚实及测量水道、树立航行标志。惟入晚则仍驶至南通南岸，以避快艇攻击。因日舰熟知鱼雷快艇作战性能，必须在有适当深度之水道，始能放射鱼雷，而且在通州至张黄港一段，河床积沙甚多，正好可以避鱼雷快艇之偷袭。故在此时两方之战术，成为日舰“昼出夜伏、我艇“昼伏夜出”；日舰尽量设立航

行标志，我艇尽量破坏航行标志，有如捉迷藏之形势。但是始终不敢越过适宜快艇作战的张黄港以上水道。

当淞沪战场作战部队在11月9日开始作大规模撤退时，为策应正面大军的转移，鱼雷快艇部队进行了一次主动的出击。11月12日晚，江阴雷电学校总训练官马步祥，奉令率“史181”号快艇向江阴下游袭击日舰。13日清晨，“史181”号艇在金鸡港江面与日军3艘驱逐舰相遇，马步祥当即下令实施鱼雷攻击，不料因江面复杂，鱼雷误撞暗礁，未中目标，随即遭到日舰火力还击，“史181”号被击中。面对生死考验，马步祥与全艇官兵毫无畏惧，决定与侵略者同归于尽。负伤后的快艇以高速向日舰冲去。日舰慌忙掉头逃避。其中两艘日舰相撞，另一艘搁浅。正在这时，日本海军航空队飞机飞抵现场，向我快艇发起攻击，“史181”号中弹沉没，马步祥与全体官兵为国捐躯。

锡澄线于11月25日被日军突破，无锡在同日沦陷后，江阴乃陷于日军的直接围攻之下。驻守江阴的中国军队面对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展开保卫江阴的最后一战。在这场江阴保卫战中，陆军部队和要塞炮兵部队以及海军鱼雷快艇部队紧密配合，并肩战斗，表现了同仇敌忾的高昂战斗精神。

这时，守军部队有直属江防军总司令部的2个步兵师：以何知重为师长的第103师、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以霍守义为师长的第112师；江阴江防部队步兵2个营，工兵、通讯兵、小炮各1个连；江阴要塞炮兵部队有火炮61门，内有150毫米大炮4门、88毫米大炮8门，均为战前新近从国外购置的。11月26日下午，江防军总司令刘兴发布战斗命令：

1. 江防军以主力团固守要塞，以一部警备江岸，施行持久抵抗，以保长江门户；
2. 112师以主力占领由夏港口、夏港镇、青山、江阴城南，至金童桥间之主阵地带，拒止敌人；
3. 103师以主力占领由金童桥经杨家港、凤凰山东麓，至长山东麓间之主阵地带，拒止敌人；
4. 57军率111师以一部警备南通，拒止敌人上陆，以大部在靖江附近，协同要塞部队妨害敌舰活动，并拒止敌人上陆；
5. 要塞部队严整备战，构成江上火力阻塞线，制压敌舰之动作，尤须对于陆正面准备火力，支援陆军作战；
6. 江防部队须以鱼雷快艇袭击敌舰，妨害敌舰活动，掩护要塞地区。

这时，日军第13师团分两路进犯江阴，一路从常熟出发，约有2个联队，沿常澄公路西进，另一路约1个旅团，从无锡沿锡澄公路进击。11月26日，日军前出华墅、杨合之线，与守军前哨部队交火。日军进攻江阴，从陆、海、空三方下手，来势汹汹。地面部

队拥有重炮10余门、战车30余辆，向江阴正面发动进攻。海军舰炮在张黄港以下长江江面，瞄准江阴要塞，不时进行远距离轰击。日军飞机更是从空中实行轰炸扫射，掩护地面部队的进袭。江阴要塞三面受敌，形势危殆。

日军的攻势以舰炮和地面炮火为主要突击力量。11月26日，日舰60余艘向段山港、毛竹港等沿港守卫部队发炮射击。27日，日军地面炮兵进占小茅山附近阵地，向黄田港口和君山等处进行射击。江阴要塞炮“丙一台”发炮还击。日军地面部队经过2日的准备，在28日开始向南闸镇、云亭镇之线发动猛攻。中国军队拼死阻击，但在日军战车的攻击下渐告不支，情势甚危。这时，要塞炮“丙一台”和黄山台立即发炮，对日军实行火力压制，迫使骄狂的日军抱头退缩，守军士气为之一振。同时，日军在小茅山的炮兵推进至南闸附近，支援其步兵进犯。当日晚上，日军袭占南闸，守军冒着炽烈的炮火发起反击，战至次日拂晓，又从日军手中夺回南闸。

11月29日，长谷川清下令第1水雷队进攻江阴，企图突破封锁线。次日上午，日军驱逐舰5艘和扫雷艇4艘驶近江阴封锁线。中国江阴要塞炮兵迅即予以轰击，萧山炮台和巫山炮台火炮齐发。日舰不及躲避，被隐藏在巫山的海军舰炮击中1艘。日舰匆忙还击，



■ 撤退途中小憩的中国军队。

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巫山炮台第3座炮被击毁，第1座炮被击伤。但将日舰1艘击成重创，其余日舰见势不妙，转舵下驶。

11月29日至30日，日军地面部队主力强攻南闸、云亭镇，花山、起山两据点先后失守。经要塞炮台各炮以强大火力进行支援，守军数度反击，曾将失地恢复，但因损失过重，阵地得而复失，后退至青山、板桥之线。然后，日军在南闸、云亭镇一带增强炮兵，在海军与空军的配合下，向要塞区进犯，企图击毁炮台。与此同时，要塞炮兵亦与江面日舰展开炮战。30日上午，日舰10余艘于新港、巫山江面上驶，要塞炮台当即开炮轰击，击沉1艘、击伤2艘，余均向下逃

去。经此一战，日舰未敢再犯。

虽然当时中国军队因拥有要塞大炮，在炮兵火力上占有优势，对日军地面部队和江面舰艇予以有力扼制，然而，日军却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对要塞炮台和地面部队造成严重的威胁。29日，日机10余架竟日向要塞炮台一带投弹轰炸。接着，连续2日轰炸更烈，日机轮番向要塞炮台大肆轰炸，并向八圩港、十圩港投弹百余枚，企图切断江上交通，堵我退路。

12月1日，是江阴保卫战决定性的一天。这天，日本海军军令部下达了“中国方面舰队与陆军协作，攻占南京”的命令。日海军溯江部队在第11战队司令近藤的指挥下，向

江阴进攻。日军的舰炮与江阴要塞的火炮，展开猛烈的交战。下午，炮战进入高潮，“敌我不断炮战，激烈达于极点。我鹅肖、黄山各台共毁火炮4门，通讯设备几乎全被破坏”。至此，连同上一天因炮膛温度过高发生自炸的2门大炮，已有6门要塞炮损毁，尤其是要塞通讯网被毁，各炮台面临陷入瘫痪的危境。

同时，地面作战态势亦趋恶化。这天午后，守卫要塞城垣的步兵，受到日军坦克和炮火的轰击，渐形不支而后撤。12月1日下午17时许，西北关被敌突破。日军坦克20余辆，掩护步兵冲入城内，分别进至君山、龙岗两炮台区之下。守备部队虽经奋勇抗击，但伤亡过重，阵地呈现动摇。入夜，日13师团一部进迫江阴城下。守军112师师长霍守义负伤，军心混乱，已再难支持。刘兴鉴于情势危急，乃忍痛发出撤退命令。当夜至12月2日，步兵由夏港突围，向武进撤退；要塞部队在一腔悲愤之下，发射出最后一排排炮弹，掩护友军退却后，渡江北向靖江撤退。海军鱼雷快艇部队从11月26日江阴保卫战开始以来，凭借黄山山洞之坚强，国防工程之坚固，与日军周旋5日之久，未受损失。在江防总司令部的撤退命令下达后，鱼雷快艇部队和布雷部队，亦于12月1日晚向南京方向转移。12月1日，中国海军第2舰队司令曾以鼎率驻江阴海军向西撤退。同日，日军地面部

队占领了江阴城和要塞各炮台。至此，悲壮惨烈的江阴保卫战落下了帷幕。

江阴保卫战的结束，标志着淞沪会战的终结。

此后，日军兵锋直指南京，千年古都即将迎来一场空前的大劫难。

得失点评

在战略方面，淞沪会战中方的得分不少。第一，淞沪会战的爆发，是中国抗日战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国民政府全面抗战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就在淞沪之战爆发的第二天，即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向全世界宣示中国抗战的严正立场和政策以及永不屈服的决心。

第二，淞沪会战促进了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成立。从1937年2月开始国共两党已经进行了四轮谈判，但却一直没有进展。而淞沪会战爆发后进行的第五轮谈判却立即达成了协议，8月22日，南京军事委员会发布命

令，正式宣布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9月中旬国共两党的第六轮谈判就《合作宣言》取得一致意见，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由此开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随着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局面展开，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系也相继转变为拥蒋抗日。在淞沪战场上，参战的中国军队中不仅有中央嫡系部队，还有桂系、川军等等各地方杂牌，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能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的统一命令，投入到抗战战场，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在面临国家民族存亡之际，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派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甚至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了起来。

第三，从军事上来说，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的日本侵略军第一次遭到了真正意义的迎头痛击。迫使日本前后四次大规模增调援兵，使日军无法集中使用兵力，减轻了华北战场的压力，直接迫使日军取消了山东作战计划。一场局部冲突终于演变成了两国的全面战争。本钱并不充裕的日本被拖入了虽不富有但家大业大的中国的全

面消耗战的泥潭，日本军事当局原设想的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的狂想彻底破产。从这场大战之后，此前一直顺风顺水的日本终于开始一步步滑向覆灭的深渊。

第四，淞沪抗战为上海和华东沿海地区工业的内迁，物资、设备和企业机构的转移，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和人员向后方的撤退，赢得了时间，有助于掩护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日力量向中南和西南腹地转移，对全国持久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军民在淞沪会战中所表现的顽强斗志和伟大民族精神，极大改变了国际上对中国的看法，赢得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英国的著名国际评论家尤特莱在《日本在华的赌博》一书中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在1937年夏，国外一般都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就是发疯，战争一定会以日本的全胜而迅速结束。但中国在上海的英勇抵抗证明了这一次日本并不能轻易取胜，中国已经兴起了一种精神，使它的战士以必死的英勇与占据无比优势的敌人奋战。日本在上海占有一切便利，拥有最新式的武器：坦克、重炮、飞机，它的军舰可以安然停泊在外滩江面上炮击中国军队，它的部队可以在公共租界的“中立性”掩护下登陆……可是日本虽然有着这一切军事上和地位上的便利，而几乎只配备着步枪和机枪的中国军队却遇阻了

日军达4个月之久。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于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异于中国士兵的英勇和坚忍，斯摩莱（驻沪英军总司令）少将就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敢死队（笔者注，这是指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最后保卫闸北更伟大的事情了。

战略上的成就不能改变战役战术上日军占据明显优势的这一事实。

第一，有效的动员机制是日本最终赢得战役的基本保证。

1873年，日本明治政府颁布了《征兵令》，正式在日本国内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按照1927年颁布的《兵役法》规定，每一个在前一年12月1日至当年11月30日期间内年满20岁（1943年下降为19岁）的日本男性均有义务参加征兵检查。检查结果按身体素质高低分为甲乙丙丁戊5个等级，其中乙等又分为第一乙种和第二乙种两级。凡体检结果在乙种以上的日本男性国民为适合现役，丙种为只适合国民役但不适合现役，丙种为不适合服兵役，戊种为暂时难以判定身体状况，留待下年体检者。以陆军来说，被判定为适合现役后，每个日本男性国民就需要入营服役。首先为2年的现役。服役期满后转入预备役，预备役期限为5年零4个月。预备役期满后，转入后备兵役，后备役期限为10年。1941年11月，预备役与后备役合并，统一为预备役。后备役期满至年满40岁，转入

国民兵役。到此，才算是正式地脱离了兵役。当然，至少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军队的规模有限，并不需要太多成年男子服现役。不过日本政府也没有打算饶了这些人，所有适于服现役但未被征入军队的，改服12年零4个月的两类补充兵役，补充兵役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延长为17年零4个月。

日本海军的兵役制度与陆军大体上差别不大，只是服役期有所不同。

截至1937年7月，日本陆军共有现役师团17个（番号为1-20师团加上近卫师团，缺第13、15、17、18四个师团的番号），总兵力约38万人，预备役兵员却有73.8万人、后备役兵员87.9万人，补充兵役248.4万人。两相比较，日本陆军的后备兵员的数量超过现役部队的10倍。

到战争全面开打乃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的规模一天比一天扩大，于是军部不但把征兵的标准降低，以往可以缓征入役的人员如高等院校的学生、熟练的技术工人等也被打发上了战场，结果很大程度上导致日本国内的工厂技术工人严重不足，生产出的新型飞机之类的武器质量低劣送掉了不少日本军人的命。不知道军部的高层知道这个消息后该作何感想。

不过在1937年，日本人显然还没有狼狽到这种地步。后备兵员只需要经过简单的召集，不经训练或者稍经训练即可送入部队

使用。到淞沪会战后期，日本陆军在华东战场上部署了2个军9个师团约30万人，在华北战场上有2个军6个师团约20万人。这已经大大超过了战前日本的现役陆军的全部数量，这显然就是日本的人员动员机制的功劳。日本军方除了将后备兵员大批补入现役部队以外，还用来迅速组建了13、18、101、108、109等特设师团投入到华东和华北战场。其中101师团1937年9月1日方始组建，到9月下旬便能够在上海参战，比中国军队抽调1个现役师参战还要方便许多。

与此相对照，中国的动员体制就实在差得很远。前面提到过，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募兵制，当兵吃粮打仗发饷，谈不上有什么后备兵员可以使用。中国空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基数，却难以迅速转化为兵员。在缺少有效的人员补充制度下，无论是什么样精锐的部队也必将在持续的战斗中逐渐被削弱逐渐化为乌有。

第二，强大的海军不仅为日军提供了实时有效的火力支援，更提供了中国军队所望尘莫及的战略机动性。这种机动性不仅使远自日本本土和中国华北的日军地面部队可以迅速地投入淞沪战场，而且可以自由地选择中国军队的薄弱地段实施打击。

对比中日两军的军事实力，日本的海军无疑又是最为强大的一个方面。在战役的开始阶段，日本地面部队处境危急时，日本海

军便能从本土和中国东北将援兵送上战场。尔后，又是依靠海军的绝对优势，日本陆军才能够连续两次在中国军队防御的薄弱地段实施大规模登陆，使胶着的战局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尤其是第十军实施的金山卫登陆，日军登陆部队刚好出现在中国军队防御最为薄弱的地段，令此前一直表现不错的中国军队一时手足无措，导致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如果没有海军在战略机动性上的先天优势，战役的结果可能就是完全两样。相比之下，中国的海军建设就实在令人叹息。从当时的力量对比上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可能建立起一支可以在最低限度上与列强海军对抗的海上力量。不过中国的要求也不可能是与对手决胜于大洋之上争夺制海权，而非非就是防御敌由海上向陆地投送兵力，更准确一点来说就是抗登陆作战。一支精干、高速的轻型海上兵力至少能够提供这样的可能。这样的一支海上作战力量，至少用来突击敌运输船队，威胁敌海上交通线还是可能的。遗憾的是，中国海军当时既没有适用于反舰作战的攻击机，也没有潜艇，少量的鱼雷快艇对于大规模的战争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何况偶尔的单艇出击成功的可能性也甚微。

第三，战役期间，中国军队自身在战役战术方面的问题也很突出。

首先，战役的准备严重不足，尤其是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缺乏对坚固防御之敌实施攻击的经验和手段。战役前期的进攻作战阶段和中期的要点争夺作战中，中国军队都面临了很多次对日军坚固防御据点的进攻。而在这些攻坚作战中，中国军队往往表现得毫无办法，乏善可陈。众所周知，攻坚作战的难度相当高。它不仅要求进攻部队要有充足的兵力和顽强的斗志与敢打敢拼的牺牲精神，还要有准确的情报、周密的准备、完善的训练和密切的配合。相比之下，中国军队的进攻作战就显得相当粗疏。8月10日，张治中确立了扫荡日军驻沪部队的决心。从理论上来说，这一处置，当然是正确的。因为，如不施行突击，等到日本陆军增援部队抵达以后，扫荡上海

日军根据地就会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了。然而，这个主动强袭计划是不是确有把握能予实现，是否作了充分准备？回答都是否定的。战前，中国军队对于上海日军的战斗力如何，日军防御工事的坚固程度怎样，如何才能摧毁这些坚固设防的建筑物，黄浦江上的日舰会对陆上作战造成何种影响，中国仅以2个师兵力进行序战，兵力足否？步兵能否适应城市街巷攻坚战？以及炮兵的火力能否摧毁敌之坚固工事等等，这一系列关系到攻围战成败的关键问题，在事实上并未作过切实的筹划和进行充分的准备。当战斗打响后，这些问题遂一个个突现而出，致使进攻的部队，陷入临时应付、甚至无法应付的



■ 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的战术问题相当突出，攻坚能力薄弱是最为突出的。

局面。实际上，仅仅从兵力上，中国军队最开始投入战斗的是2个步兵师，总兵力当在2.5万人左右。这样的兵力如果在野战条件下，要歼灭5000名日军也是很不容易的。要在短时间内歼灭凭坚固工事固守的同等数量日军，则基本上没有可能。其次，战术极其呆板。初期市区围攻作战时，只是一味正面平推，全无穿插迂回，在日军优势火力和坚固工事下，难有进展，最终无法在日军援军到达前肃清驻沪部队的目标，失去了“先发制敌”所形成的先机主动。后期的阵地防御作战中，将几十万军队密集部署在日军海陆空火力优势最易发挥沿江沿海的平原地带，使部队饱受日军火力轰击，造成了大量的无谓伤亡。预备队也是逐次添油式地投入作战，全然失去了集中使用兵力的基本战争原则。对于日军的登陆，实现既无充分准备，也没有掌握强大预备队可以实施强力反击，因此一旦日军登陆，便是侧后洞开，只能仓促后撤。在战局出现危急迹象时，又不能及时调整部署，将部队有序转移到既设战线，最终出现兵败如山的崩溃局面。

在具体的战术上，攻坚能力不强一直是中国军队的一个突出弱点。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在防御作战中出色的表现很多，在运动战中也不乏亮点，但是在进攻作战中却屡屡受挫，也一直未能总结出一套合理有效的战术。炮兵的运用也问题不少。中

国军队的炮兵无论装备上还是数量上或者训练水平上都与日军难以相比，不过如果中国炮兵能够以集中使用抵近攻击的方式进行作战，还是有机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的。至少，在战役前期的进攻作战中，如果步兵部队能够得到这样的炮火支援，就很有可能取得更大的战果。遗憾的是，中国炮兵阵地距离前线太远瞄准精度不够，难以摧毁敌军坚固设防的建筑群。中国空军的表现不俗，不过也不是没有值得批评的地方。战役前两天，中国空军利用有利的天气条件（台风过境）和地理条件（日军没有陆上机场），充分发挥了实际上并不大的优势，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不过中国空军显然没有利用好这个有利时机。以当时中国空军的兵力来看，如果将飞机集中使用或用于突击敌江上舰队，或用于支援陆军作战，都有可能获得更大战果。而中国空军实际上是两个一齐打，结果造成逐二兔而一兔未得的结果。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投入的地面部队有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团、炮兵7个团、宪兵1个团以及上海保安总团、江苏省保安团、上海警察总队，总兵力约75万。空军为8个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飞机共约300架。海军为第1、第2舰队和练习舰队以及鱼雷快艇大队、江阴要塞部队等。

日军参战部队为陆军9个师团又2个支队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相当于旅团)，海军为第3、第4舰队，日军空中力量分属陆军和海军，共投入作战飞机约400架。

中国军队的伤亡，各种史料数据不一，也无定论，一般认为在25万人至30万人之间。

日军的伤亡，1937年11月20日日军华中方面军发言人公布的数字是40750人，但很显然这一数据是明显缩水的。战后日本防卫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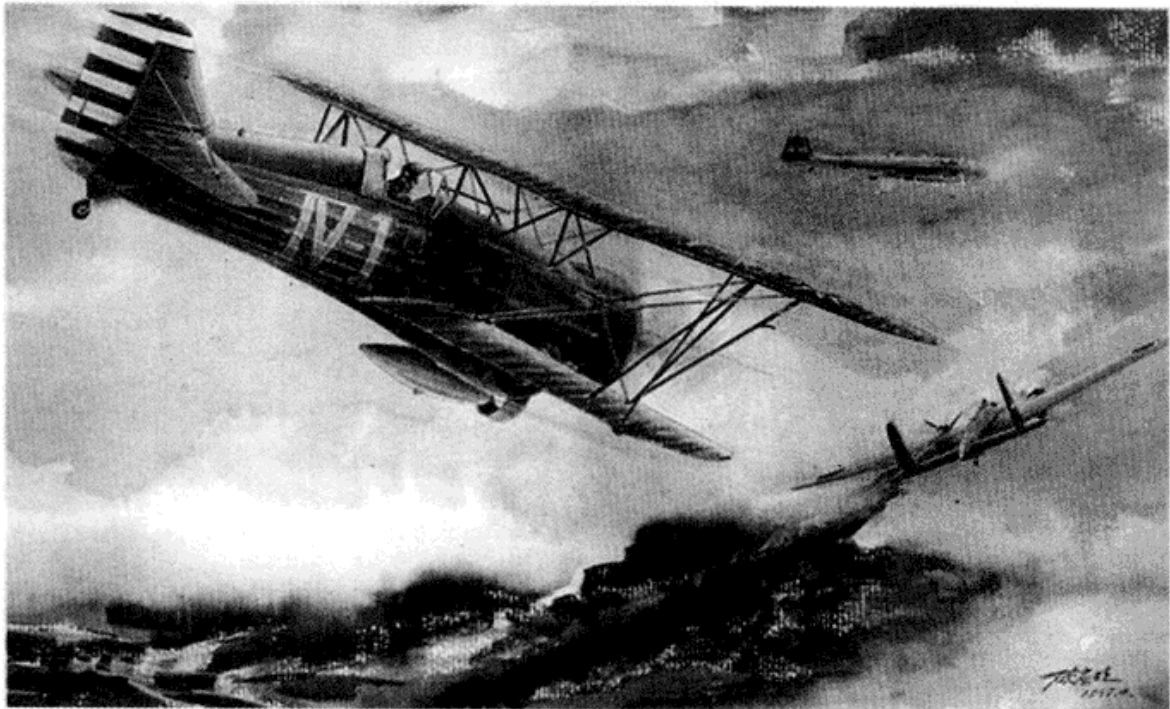
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中的数据为：阵亡19360人，伤79057人，合计98417人。

淞沪会战是全面抗战真正的开始，其在国内外的影响以及在抗战历史进程中的地位，都是极其深远而重要的。特别是中国军队在会战中所表现出的报国之忠，陷阵之勇，牺牲之烈，足以彪炳史册！



第六章

海空作战



空战扬威

8月13日，淞沪战事正式爆发。鉴于日本的海上威胁，南京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于14日凌晨2时发布了第二号作战命令，下令第2、第5大队对淞沪地区的日军陆、海、空部队实施攻击，第3大队专任首都南京的防空警戒，第6大队担任海面侦察，搜索日军舰只。中国空军的雪耻之战终于到来了。

在中国空军紧张备战的同时，日本海军航空兵也在磨刀霍霍。8月8日，日本海军将其装备有最新型三菱G3M 九六式中型轰炸机的鹿屋航空队（简称鹿屋空）和木更津航空队（简称木更津空）临时合编成第1联合航空队准备投入到中国战场的空中进攻作战。8月8日，木更津空离开原基地进驻位于长崎的大村基地，鹿屋空进驻台北松山机场。10日，

日本海军水上飞机母舰“神威”号进抵我国浙江省韭山列岛。11日下午，从“神威”号上起飞的水上侦察机对浙江、上海实施了空中侦察。同日，日本海军第1航空战队所属的航空母舰“龙骧”、“凤翔”号再加上第2航空战队所属的航空母舰“加贺”号都集中到距上海只有132公里的马鞍列岛待机，随时准备投入到上海作战。不过人算不如天算，8月13日有一股强台风从上海附近过境，日军航母不得不北上避风，没有赶上8月14日的战斗。

8月14日，随着地面战斗的全面展开，中国空军飞机也飞临上海上空参战。

早7时，从笕桥机场起飞的暂编大队（暂编大队由中央航空学校所属的飞机和人员临时编成）第35中队的5架OM2C“可塞”战斗机，在许思廉队长的率领下，袭击了上海杨



■ 中国空军飞行员。

1937年8月中国空军实力

第1大队（轰炸机），下辖2个中队：装备诺斯普罗-2E型18架、弗力特-7型教练机1架；

第2大队（轰炸机），下辖3个中队：装备诺斯普罗-2E型27架；

第3大队（战斗机），下辖3个中队：装备霍克III型9架、波音281型10架、布瑞达-27型2架、菲亚特-32型3架；

第4大队（战斗机），下辖3个中队：装备霍克III型28架、福克·华夫型教练机1架；

第5大队（战斗机），下辖3个中队：装备霍克III型28架、福克·华夫型教练机1架；

第6大队（战斗机、轰炸机），下辖4个中队：装备道格拉斯轰炸机27架、菲亚特-32型战斗机3架、波罗尼-111型轰炸机7架、德·哈兰-摩斯教练机2架；

第7大队（侦察机），下辖4个中队：装备可塞型侦察机27架；

第8大队（轰炸机），下辖3个中队：装备萨伏亚S-72型6架、道格拉斯轰炸机6架、亨格尔111-A型6架、马丁型6架、福克·华夫型教练机1架；

第9大队（攻击机），下辖2个中队：装备雪莱克A-12型20架。

直轄部队：

第13中队：装备道格拉斯轰炸机7架；

第18中队：装备道格拉斯轰炸机9架、可塞型侦察机3架；

第20中队：装备可塞型侦察机11架；

第29中队：装备霍克III型战斗机9架、霍克II型战斗机3架；

第31中队：装备道格拉斯轰炸机9架。

树浦日商公大纱厂内的日军军械库。

8时40分，中国空军第二批攻击部队飞临上海上空。这是驻安徽广德机场的第二大队21架“诺斯罗普2E”轰炸机。诺思罗普机群在副大队长孙桐岗率领下起程，轰炸了吴淞口的日舰及公大纱厂、汇山码头等日军据点。公大纱厂被命中起火爆炸，汇山码头中

弹3枚。

9时20分，驻扬州的第5大队25中队8架“霍克III”战斗机，他们当日上午9时20分从扬州机场起飞，每机各挂载250公斤炸弹一枚攻击日舰和地面目标。在南通附近江面上，这批中国飞机盯上了1艘日军驱逐舰，对这艘曲折航行规避攻击的日舰实施了下滑轰炸。

血肉磨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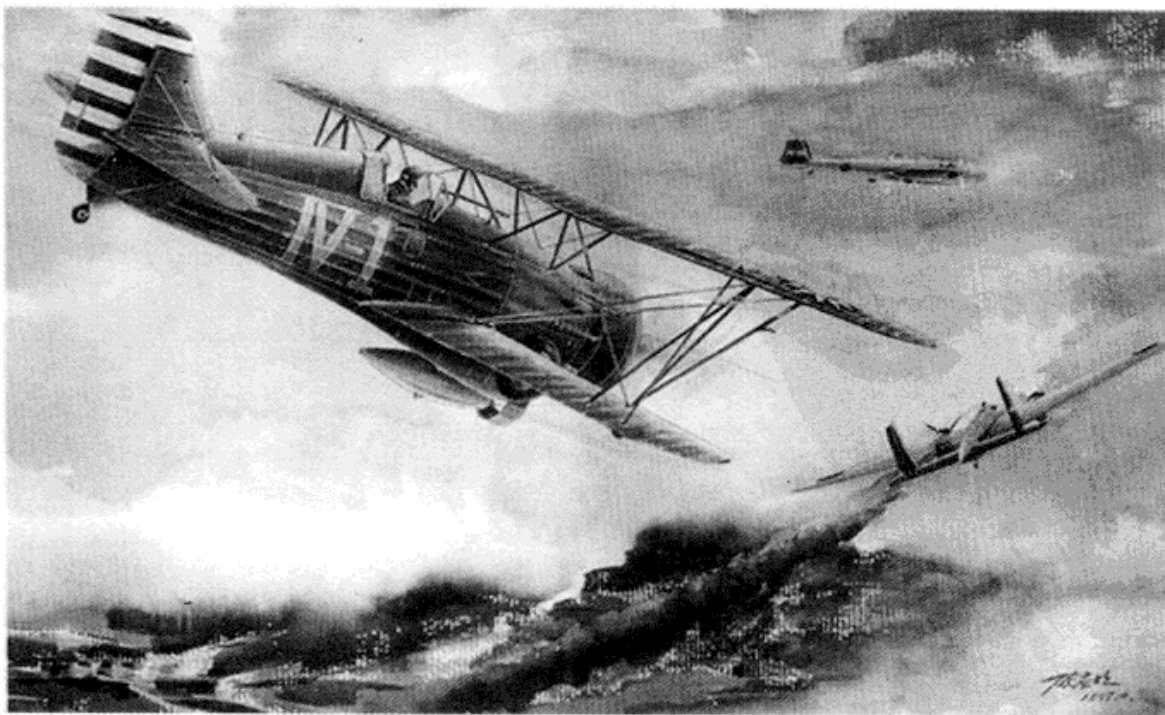
淞沪会战

据中方战史记载，副中队长梁鸿云驾驶的2410号机投下的炸弹命中日舰尾部，日舰向左倾斜约40度，可能受伤不轻（笔者注：日军战史中没有相关记录）。

下午14时，第5大队再次出击。这一次，24中队精选了3名飞行员，分别是中队长刘粹刚、副中队长梁鸿云和飞行员袁保康，目标是日本海军陆战队驻沪司令部。起飞一小时后，编队飞抵目标上空。当上午建功的梁鸿云正在聚精会神地瞄准日军地面目标时，却被日军进行防空警戒的中岛E8N九五式水上侦察机偷袭击落，飞机被日机击中后坠毁于距上海市区约20公里的市郊，梁鸿云成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牺牲的第一名中国飞行员。

14时40分，第5大队第25中队“新霍克”机3架，在队长胡庄如率领下，自扬州机场出发，轰炸了上海日军陆战队司令部和虹口兵营。

与此同时，第2大队的诺思罗普轰炸机22架补充油弹后，再次从广德机场起飞，轰炸上海公大纱厂、汇山码头及日军陆战队司令部，日军地面目标多处被击中起火。另一架九五式水上侦察机偷袭了中国空军轰炸机编队，907号和1408号飞机中弹受伤，飞行员和后座舱机枪射手各一名牺牲。而这架九五式水上侦察机又遭到暂编第34中队中队长，未来的王牌周廷芳驾驶的霍克Ⅲ战斗机的攻击。日机被击中多处后躲进雨云中逃走。随后，周廷芳驾机轰炸了日军地面目标。



■ 著名空战史画家陈应明绘制的八一四空战油画。

14时40分，驻笕桥机场的第35中队的3架“可塞”机，在队长许思廉率领下，再次袭击公大纱厂和汇山码头。各机穿过日军的重重火网，将多枚炸弹投下，日军在公大纱厂附近的临时机场，顿时一片火海。

令8月14日的空战名垂青史的战斗发生在晚间18时前后。

当天下午14时50分，鉴于天气略有好转，长谷川中将命令鹿屋航空队立即出击，歼灭中国空军于地面。鹿屋空组成两支攻击队，各编有9架九六式轰炸机，其中由浅野楠太少佐为指挥的编队袭击广的机场，由新田慎一少佐指挥的编队袭击杭州笕桥机场。这18架飞机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越过台湾海峡，在浙江永康上空分道，各自飞往预定目标。

迎战日军杭州空袭队的是中国空军第4大队。该大队原于8月7日奉命从南昌移防河南周家口准备参加华北作战。8月13日中午，大队又接到周至柔的电令，令其于次日4时之前飞赴杭州笕桥机场执行战斗任务。

由于台风影响，设备简陋的单座战斗机无法在13日出动，大队长高志航遂临时征用了一架外籍客机先飞往笕桥领受任务，他自己的大队长座机临时由其他飞行员驾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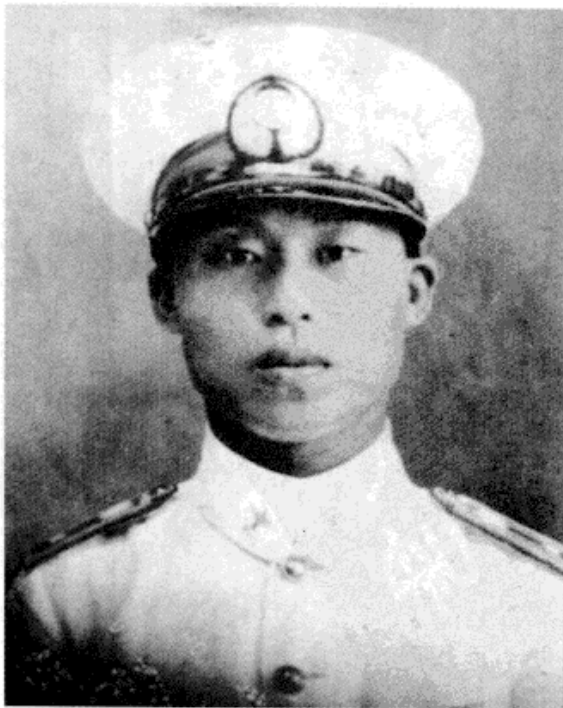
8月14日下午，第4大队的27架霍克Ⅲ战斗机先后飞抵笕桥机场。机群正准备降落时，日机来袭的警报就拉响了。情况紧急，

已经来不及让飞机降落加油。当时的单座战斗机还没有装备机载无线电，于是高志航在跑道上向着滑行降落中的飞机边狂喊边打手势，将还没有来得及停下的一架架飞机又轰回了天空，然后迅速跳进一架燃油不足的战机，升空后赶上了机队。

中国航空史上一场著名的空战开始了。

在我机重上天空的时候，日军编队也飞抵机场上空。当日气象条件很差，云高只有300至500米。日机便在500米高度上投下了炸弹。而我机多数却阴错阳差，飞到了云层上方，很难找到日机。

第一个攻击得手的便是高志航大队长本人。他从云洞里发现了1架机身涂着迷彩、翼翅漆着日之丸标志的敌机。高大队长向日机



■ 中国空军的空战英雄，第4大队大队长高志航。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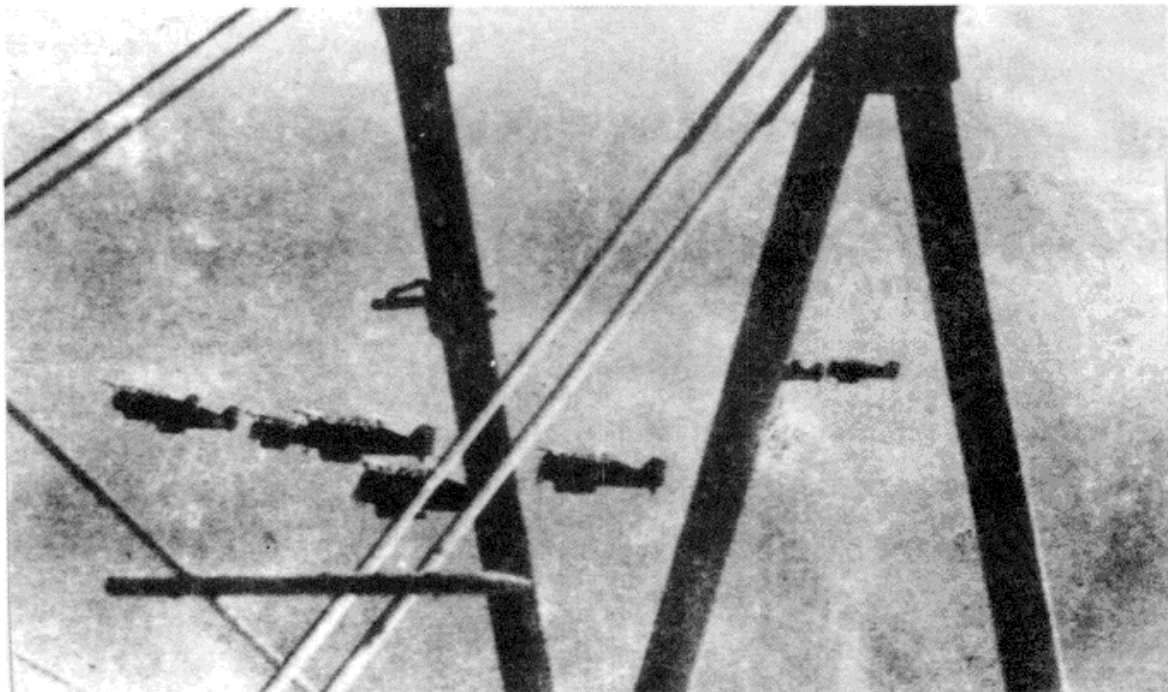
俯冲下去，先以准确的火力击毙了日机机尾炮手，然后便大胆接近到距敌机只有20米左右的距离上开火。中国空军的霍克Ⅲ装备有7.62毫米和12.7毫米机枪各1挺，按照30年代中后期的水准来说火力是很强的。高志航的子弹击中了日机的左发动机，发动机立即喷出了火焰，随即引爆了机翼油箱，使这架日机当场凌空爆炸，尸骨无存。高志航也创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击落敌机的纪录。

高志航当先建功以后，中队长李桂丹和飞行员柳哲生、王文骅所组成的编队联手攻击了第二架日机，将其击落于乔司机场上空。

鹿屋航空队的苦难还没有结束。2架未与我机遭遇的九六式轰炸机刚刚投下炸弹，燃

油将尽的中国战斗机又回到了机场上空。正准备降落的高志航大队长正好与由大串均三等飞行兵曹担任机长的九六式撞了个正着。高大队长驾机紧追过去，IV-1号机的2挺机枪再次喷出了火舌。大串机多处中弹，左发动机冒出了白烟。与此同时，大串机与其他日机也纷纷开火还击。IV-1号机的发动机中弹冒出了火焰。加上燃油已尽，高志航果断驾机脱离，返回机场安全降落。

在上午击伤1架九五式水上侦察机的周廷芳返航后，接到命令将1架刚刚修理好的霍克Ⅲ飞往南京。下午，就在周廷芳准备起飞时，空袭警报响了。随即他又看到刚刚由周家口转场到笕桥的4大队的飞机才一落地便又径自滑跑起飞。事态紧急，必须马上升空



■ 中国空军全力出击，配合地面部队作战。

迎战！然而遗憾的是，周廷芳所驾驶的这架飞机是刚刚出厂的检修机，还没有来得及装弹。2挺机枪的弹舱都是空空的。

日机即将临空，显然已经没有装弹的时间，总不能在地面上等着挨炸，满腹郁闷的周廷芳只好驾机升空避战。离地后，周廷芳转向西飞。不经意间，却与日军广德攻击队的9架96式遭遇。从日机的航向，周廷芳判断出日机的攻击目标正是中国空军的重要基地广德机场。

尽管没有子弹，周廷芳仍然冒着日机的自卫火力对日军编队连续实施了多次模拟攻击以干扰日机的轰炸。在他的“空手入白刃”式的模拟攻击下，日机编队惊慌失措，没有一枚炸弹命中机场，全部投到了机场附近的稻田里。

恰在此时，飞往机场加油起飞的第4大队第22中队也与浅野编队遭遇，分队长郑少愚将1架日机打成重伤，最后坠毁于台湾附近的海面上。

第4大队的飞机落地后，经过对参战各飞行员的作战报告的审核，这一天的战绩以中国空军第4大队击落日机6架，自己则无1架飞机被击落而载入史册。6：0的大胜利！多年来鸦片空军的耻辱终于在这一天得到了洗雪，1939年11月，中国国民政府颁布命令，将每一年的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近年来，通过对中日双方战史的考证，可以确认

当日日机实际上有2架在杭州上空被击落，1架在返航途中重伤坠海，1架被高志航所重创勉强飞回基地后报废。中国空军实际上的战绩应该是3.5：0，中方当时统计的战果虽略有放大，不过并不过分，更不会对这场空战中国空军赢得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胜利的结果构成影响。当日建功的中国飞行员中，高志航、李桂丹、乐以琴、周廷芳、柳哲生、郑少愚都成为不久以后的中国空军的著名英雄人物。高志航的英名和八一四空战的胜利被永远载入史册。

有趣的是，尽管当日日军出动的18架轰炸机实际上只炸毁了1辆油罐车，在广德机场则只在附近的稻田里留下了十多个大坑，但在素以擅长在白天找星星的皇国海航精锐眼里，这漫天飞舞的稻苗和泥土不知为何却变成了诺思罗普轰炸机和霍克战斗机，于是，鹿屋空的这次攻击便以击毁击伤诺思罗普2E轻型轰炸机10架、寇第斯霍克战斗机20架、空中击落中国战斗机6架的重大战果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日军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越洋航空歼灭战而载入史册。

8月15日，中国空军再度出击，分八批飞往上海上空执行空袭任务。因受台风影响，第5大队有3批飞机被迫中途折回。9时许，第6大队的5架飞机冒雨轰炸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多枚炸弹击中目标。但因炸弹威力太小，未能给敌予重创。接着，从滁县出

发的第7大队6架钱斯·沃特O3U2侦察机与从广德出发的第2大队8架诺思罗普2E轻型轰炸机，又先后袭击了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大楼。第2大队的另7架轰炸机还袭击了停泊于杭州湾的日舰。这天晚上，第4大队8架驱逐机前往上海，空袭了虹口的日本兵营。

在执行空袭任务的同时，中国空军再次赢得了空中作战的胜利。8月14日晚，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根据情报判断，估计中国空军在南京约有驱逐机9架、侦察机30架，在南昌约有驱逐机40架、侦察机7架及部分轰炸机，决定在15日命令鹿屋、木更津航空队以及3艘航空母舰上搭载的舰载机部队全部出动，攻击南京、南昌、杭州及上海等地的机场，企图一举消灭中国空军。长谷川清给各航空队下达了如下任务：

1. 鹿屋航空队轰炸南昌机场；
2. 木更津航空队轰炸南京机场；
3. “龙襄”、“风翔”号航空母舰上的第1航空队攻击、轰炸杭州、苏州及上海虹桥机场；
4. “加贺”号航空母舰上的第2航空队攻击、轰炸杭州附近各机场；
5. “神威”号水上飞机母舰上的水上飞机，攻击杭州机场。

8月15日，日海军各航空队奉命出击。从台北机场出发的鹿屋航空队14架攻击机，袭击了南昌机场；从大村机场出发的木更津航

空队20架攻击机袭击了南京大校场和明故宫机场。日海军“加贺”号航空母舰上的九四式舰载轰炸机、九六式舰载攻击机和八九式舰载攻击机共35架也同时出动，飞往浙江乔司、绍兴、笕桥、嘉兴等上空，攻击那里的中国机场。

迎战“加贺”号舰载机群的仍然是高志航的第4大队。骄狂的日军舰载机编队缺少护航战斗机，对于新霍克战斗机来说，脆弱的舰载攻击机是比九六式轰炸机更容易打的目标。在第4大队战斗机的猛烈攻击下，共有7架日机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另有3架返航途中坠入杭州湾。中国空军仍无空战损失。唯一的遗憾是，骁勇善战的高志航大队长在抵近攻击1架日军八九式攻击机时，右腕中弹负伤，暂时入院治疗。

木更津航空队在轰炸南京时，也遭到中国空军第3大队的波音281战斗机的拦截和地面部队的高炮射击，被击落4架，击伤6架。首次与中国空军交战的木更津航空队，损伤近半。而在曹娥机场上空，中国空军第9大队的寇蒂斯A-12攻击机（当时中国飞行员习惯于用其绰号Shrike（伯劳鸟）的音译，称之为雪莱克）与来袭的日军舰载机编队发生空战，攻击机VS攻击机的空战又以中国空军获胜而告结束，日机被击落3架。至此，在第一天与“加贺”号航母飞行队的空战中，“加贺”号就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攻击兵力。



■ 视死如归的空军英雄阎海文。

这一天，南京机场及南昌机场先后遭到敌机的轰炸，蒙受了重大损失。

为配合上海地面部队作战，中国空军从8月16日起，每天都频繁主动出击，轰炸日军在杨树浦、虹口的阵地及黄浦江上的敌军军舰，同时抗击入侵的日本空军。

8月16日，华东地区的台风影响基本消除，日本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大批参战。中国空军由于得不到补充，在前两天作战中的优势地位已经丧失。蒋介石下令征集20名敢死飞行员，袭击日军航空母舰，规定凡炸沉一艘可得赏金20万，并授勋章。这天清晨，中国空军第6大队的8架“道格拉斯”式轰炸机，从苏州起飞，分三路轰炸上海日军陆战队司令部、公大纱厂、汇山码头等地。当逼

近目标上空时，突然遭到日机袭击，中国303号飞机被击落，飞行员桂运光、黄文模牺牲。

同一天，中国空军在句容上空迎战日军鹿屋航空队，击落攻击机3架。日军木更津航空队原计划空袭南京，因天气关系改为攻击苏州，也被击落1架攻击机。8月14日至16日这三天中，日本海军号称“虎之子”的第1联合航空队38架新型九六式攻击机，竟然被击落击伤了18架之多，令日本军方高层大为震惊。

中国空军在这些作战中，虽然损失惨重，但却涌现出了一批视死如归、以身报国的空中英雄。8月17日，第5大队第25中队副中队长董明德率领8架“霍克Ⅲ”式战斗机



■ 驾机撞击日舰的第2大队第9分队分队长沈崇海。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 驾机撞击日舰的第2大队第9分队飞行员陈锡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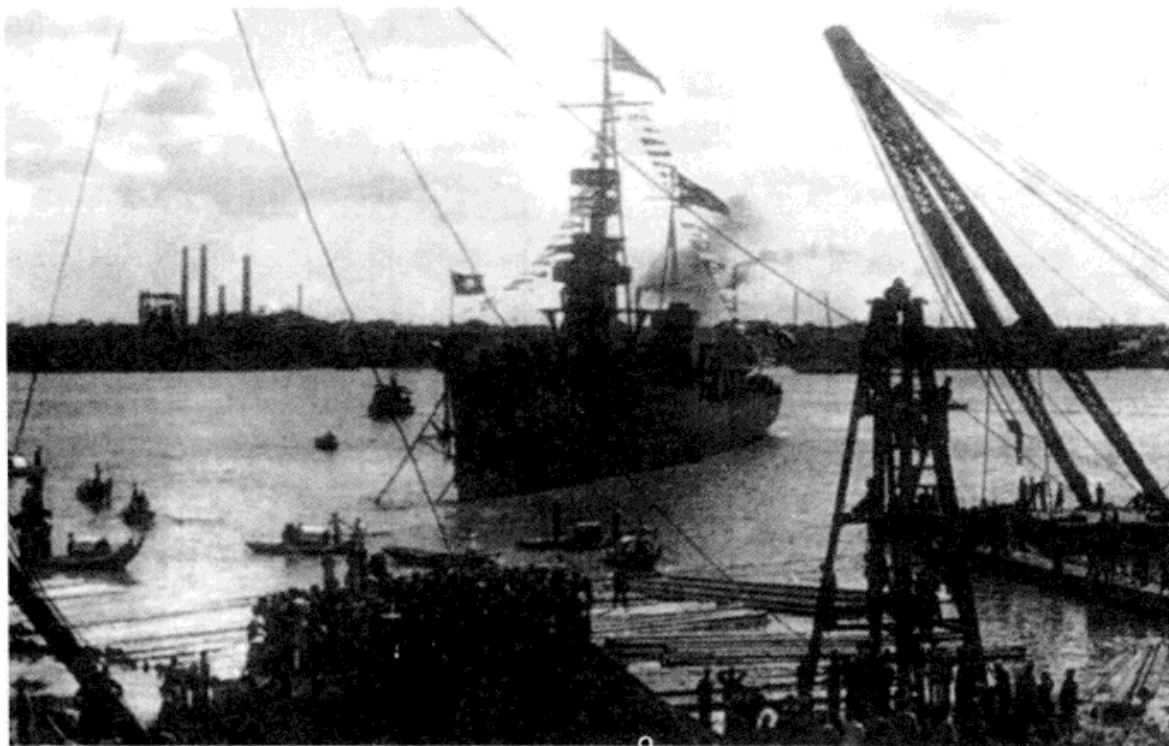
从扬州机场出发，攻击上海日军陆战队司令部。飞行员阎海文驾驶的2510号战机不幸被日军高射炮击中，跳伞后落入日军天通庵公墓阵地。日军将他团团围住，狂叫着要他缴械投降。面对众敌，阎海文大义凛然，拒绝投降，他从容地拔出自卫手枪击毙了冲在前边的5名日军，然后笑望青天，把最后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头颅。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令全国抗日军民大受鼓励。烈士舍身报国的事迹在各地广泛传颂。戏剧家赵景深还编写了一首鼓词，在上海报端发表，一时间阎海文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8月19日上午9时，第2大队第9分队分队长沈崇海和轰炸员陈锡纯驾驶904号“诺思罗普”轻轰炸机，轰炸长江口外的余山、白龙

港一带海面日军舰队。当飞至南汇上空时，904号飞机突然发生故障。此时，南汇尚未失守，他们完全可以跳伞或迫降。但沈、陈两位壮士驾驶着飞机从2000米高空对准1艘日舰撞去，随着“轰”的一声巨响，904号战机与日舰同归于尽。烈士们忠骨未留，但他们的壮举永世长存。

第1联合航空队的严重损失，使日军认识到昼间进攻损失太大，于是鹿屋、木更津航空队改变了作战方法，采用了夜间小编队、长途轰炸宁波、南京、扬州、滁县、淮阴、徐州以及安庆、九江、南昌、汉口和孝感等地的机场。第3舰队司令部经研究后确定，主要以舰载攻击机、轰炸机，战斗机的掩护下，由上海以东马鞍列岛的航舰上起飞，攻击南京及附近机场。从9月19日长谷川清向驻南京的第三国发出了离开该地的劝告之后，至9月25日，日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共起飞了291架次，攻击、轰炸了南京。此外，还经常攻击句容、广德、蚌埠等地。8月22日，日军最新型的三菱A5M 九六式舰载战斗机也投入战斗，这种飞机的性能全面优于当时中国空军所装备的任何一种机型，大大加剧了中国空军的困难处境。在这一天，在苏州上空，日军飞行员兼子正等4机与中国空军发生交战，宣称击落中国飞机9架。

自淞沪抗战以来，中国方面曾集中全部空军，以南京、广德为根据地，以曹娥、



■ 与日本海军实力相差悬殊的中国海军面对强敌依旧英勇奋战。

杭州、嘉兴、扬州、苏州、长兴等为前进机场，以主力袭击日军海上基地——航空母舰和军舰，协助我地面陆军作战。当时，由于中国方面在飞机数量上处于优势，因而在战略和战术上都采取攻势。但从8月下旬以后，日军在华北战场发动强大攻势，中国空军从淞沪战场抽调部分兵力支援华北战场，加上作战中损失了大批飞机而又未能得到及时的补充，中国空军飞机在数量上已经明显处于劣势。至10月下旬，中国空军的314架作战飞机，只剩下81架。而侵华日军的飞机则随时得到补充，除了舰载机以外，随着日军在公大纱厂的机场的完工，在战区的飞机数量这时已增至近400架之多。

中国空军在抗战初期的对日空中作战，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进行的，历时3个月的淞沪抗战结束时，中国空军共击落、击毁日军飞机230架，击毙日军飞行人员327人。其中空军和高炮部队击落37架，陆军袭击日军机场击毁54架。在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由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我空军飞机损失惨重。至11月初，中国空军几乎全军覆没，基本上失去了作战能力。此后，处于最困难的中国空军，得到了苏联的援助。苏联向中国方面提供了飞机、航材、油料、武器弹药等等急需的军用物资，使中国空军获得了新生，得以继续坚持抗战。

中国海军封锁长江

在当时的陆海空三军中，中日之间实力对比最为悬殊的无疑是海军。

中国海军自从甲午战争全军覆没以后，40多年间一直未能得到大的发展。民国初期，海军几度分裂，实力更加削弱。1928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了在名义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但是中国海军一直各成体系，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蒋介石本人倒是提出过迅速建立一支60万吨舰艇组成的中国海军的口号，不过考虑到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国力，再加之国民政府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对至关重要的海防和海军建设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建立一支顶用的海军只能是一句空话。至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只拥有中国海军大小各式舰艇118艘，总排水量11万余吨，其中勉强可用的不过只有60艘左右，总吨位约6万吨。中国海军所拥有的舰艇不但少，而且陈旧落后。海军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还是1899年服役的老旧舰艇，连所用的炮弹市面都已经无从购买。整个海军中只有少量巡洋舰如“宁海”、“平海”、“应瑞”号和十多艘鱼雷快艇勉强可以一战。

反观日本海军，自1905年日俄战争中取胜之后，一跃成为太平洋海军强国。根据

1922年的华盛顿条约规定，日本海军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大海军。但日本军国主义者并不满足，于1936年悍然退出华盛顿条约，更加放手地扩充海军军备。到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的实力已经接近英美两国海军。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后统计：

“1937年6月调查，日本海军共拥有285艘舰艇，其中包括9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12艘重巡洋舰，13艘轻巡洋舰，70艘驱逐舰，44艘潜艇。另外，还有1艘练习战列舰，2艘水上飞机母舰，5艘潜水母舰等。总吨位1153000吨。同时正在建造中的军舰有37艘，其中包括2艘战列舰和2艘航空母舰。”

双方的海上实力对比如此悬殊，表明中国海军完全不具备在海上与日军交战的能力。据中国军方决定“海军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保持我之实力”，“全部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同陆空军及要塞扫荡扑灭在我长江之舰队，而后则封锁长江各要口并杭州湾、胶州湾、温州湾，阻止敌之登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各军事机关负责人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公馆聚会，讨论决定了《关于长江封锁》等事项目，要求沿江各部队“注意不失时机，拆除长江之灯塔航标”，“妥定海军使用计划”。

7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副武官本田忠维少将会见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和代理军政部长曹浩森，要求中国政府对日本侵略中

国的军事行为，不能采取抵抗方式，并横蛮无理地扬言，如果中国海军不按此执行，就要诉诸武力，将其歼灭。考虑中日海军力量悬殊，不利于海上作战，中国海军仍然执行上述作战任务，陆续退入港口。

8月11日，海军部正式接到“阻塞江阴水道”的命令。这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通告各国驻华大使馆，定于8月12日封锁江阴水道。时任海军部部长的陈绍宽立即下令“甘露”、“敷日”、“青天”号等测量船和“绥宁”、“威宁”号炮舰驶赴江阴以下江面，对江面上的航路标志进行破坏。当天晚上，陈绍宽亲临第一线指挥。他登上“宁海”号巡洋舰，率领第一舰队主力“平海”、“海容”、“海筹”、“应瑞”、“逸仙”号等舰艇向江阴进发。12日拂晓抵达江阴要塞附近江面。这

时，海军已将准备退役的“通济”、“大同”、“海圻”、“海琛”、“自强”、“德胜”、“武胜”号等老式舰艇以及从招商局等各轮船公司征用的23艘旧船，在拆除舰炮后，依次沉入江阴水道。

由于江阴段水面宽阔，各沉船之间间隙过大，8月24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将汉口、九江、芜湖、南京、镇江、武穴等地所有的日本趸船，交海军处理。海军部奉命又将8艘日本趸船和新征用来的3艘商船沉塞于江阴封锁线。并从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征用石子3094英方以及“民船、盐船188艘，用以填补罅隙，同时并从事布雷工作，将江阴一段敷布水雷；以期在国防上造成坚强之封锁线”。淞沪会战打响后，日本海军飞机开始实施轰炸江阴封锁线，海军部则于9月25日奉命将当时海



■ 水雷成为中国海军对抗日本海军的有力武器。

军最大的巡洋舰“海圻”、“海琛”、“海容”、“海筹”号沉塞于江阴封锁线之后，又构成了一道辅助阻塞线。在这前后，中国海军于江阴水道总共沉塞了35艘舰艇和商船。另外征用了2000余名民工，日夜工作了两个月，构成了一道相当严密的江

上封锁线。

江阴封锁线筑成后，南京军事委员会组建了长江阻塞设计督察委员会，具体负责长江堵塞事宜，并决定在长江中游要塞马当、湖口、田家镇、城陵矶等地修筑工事，安设火炮，作好战斗准备。同年12月中下旬，马当阻塞线第一期工程开始，共沉下商船4艘、趸船5艘，以及大批木船。此外，青岛、厦门、广州等地的海军也奉命作准备，于必要时将军舰、商船沉塞港口航道，构筑封锁线。

与沉船阻塞线迅速筑成的同时，在江阴水面还布置了水雷封锁线。前者由海军部负责实施，后者则由海军电雷学校负责进行。8月12日深夜，电雷学校使用出动小型船艇和一批民船，由学员进行施布，在江阴沉船阻塞线的东面，自萧山之山脚起，至张黄港为终点，向东展开约20公里，布满了数千枚以上水雷，其中包括触发式水雷和电发式水雷两种，这些水雷在长江航道上组成了第一道屏障，成为沉船阻塞线的前沿阵线。

袭击“出云”号

在构筑江阴封锁线，阻敌沿长江水道西进的同时，中国海军于淞沪抗战爆发后，立即以全力投入了对日作战，并付出了重大牺牲。

8月14日，中国海军练习舰队司令王寿廷奉命指挥上海海军部队参战。首先将“普安”号运输舰沉塞于董家渡航道；并陆续在黄浦江上设置三道封锁线，将扣押的“洛阳丸”等6艘日本货船沉塞于海军江南造船厂浮筒上游的阻塞线上。

同一天，海军电雷学校教育长兼江阴江防司令欧阳格下令该校所属快艇大队出击上海之敌。电雷学校曾先后从英、德两国进口了15艘鱼雷快艇，分别编组成“岳飞”、“史可法”、“文天祥”、“颜杲卿”等4个中队。这天晚上，在快艇大队副大队长安其邦的率领下，2艘“史”字号快艇由内河伪装潜赴上海。15日清晨抵达黄浦江之龙华。8月16日上午，进入黄浦江的各快艇部队，一面与各友军取得联系，一面利用白天时间，由欧阳格亲率快艇，指挥官兵及艇长等，登岸侦察日军“出云”舰位置，熟记作战时之战斗地形。当晚20时许，“史102”号快艇担任主要攻击任务，“史171”号快艇担任接应。于是，“史102”号快艇在艇长胡端静指挥下，以高速度的敏捷行动，冲出董家渡封锁线。此时，日本海军设于董家渡封锁线担任监视的驱逐舰，因疏忽大意，被我快艇冒险冲过。“史102”号得以顺利地沿着外滩江面，经过英、美、法、意等国排列成行的军舰，疾行下驶。接近到距离“出云”300米距离上时，“史102”以50度发射角向日舰发射

“出云”号装甲巡洋舰

出云级装甲巡洋舰是根据日本六六舰队计划中的1897年第二期扩张计划制造的，由浅间级巡洋舰改进而来，同级舰共2艘，“出云”号（Izumo）和“磐手”号（Iwate）。

“出云”号建造时被称为装甲巡洋舰。1898年5月12日在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开工建造、1899年9月19日下水、1900年9月25日建成服役，被编入佐世保的第2舰队担任旗舰。参加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7月成为天皇座舰参加了横须贺海上阅舰式。1920年在佐世保换装部分高射炮。1921年8月20日被编入练习舰队担任旗舰，随后载运海军学员进行环球航行。1921年9月1日被列为一等海防舰。1931年6月1日被列为海防舰。1932年2月2日编入第2舰队担任旗舰，开赴中国华北。1934年4月16日在佐世保完成水上飞机搭载的改装工作。1937年7月开赴上海参加侵华战争，后被中国海空军击伤。1941年12月31日触雷受创。1942年7月1日被列为一等巡洋舰。1943年在濑户内海担任练习舰。1944年2月20日改任练习舰兼警备舰。1945年春再次进行改装，撤除部分主副炮。1945年7月24日在吴军港被美军飞机重创，后坐沉。1945年11月30日除籍。1947年在吴军港的船坞中解体。

主要性能：

标准排水量：9750吨

满载排水量：9906吨

长：132.28米

宽：20.94米

吃水：7.37米

动力：2部往复蒸汽机，输出马力14500匹，最大载煤1412吨

最大航速：20.75节

武备：4座双联203毫米主炮，14门152毫米副炮，4座450毫米鱼雷发射管

舰员：672人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了2枚鱼雷。第一枚鱼雷打在日舰用作防备攻击的驳船上，将驳船当场炸毁。第二枚鱼雷从“出云”号舰尾方向掠过，打到了附近的江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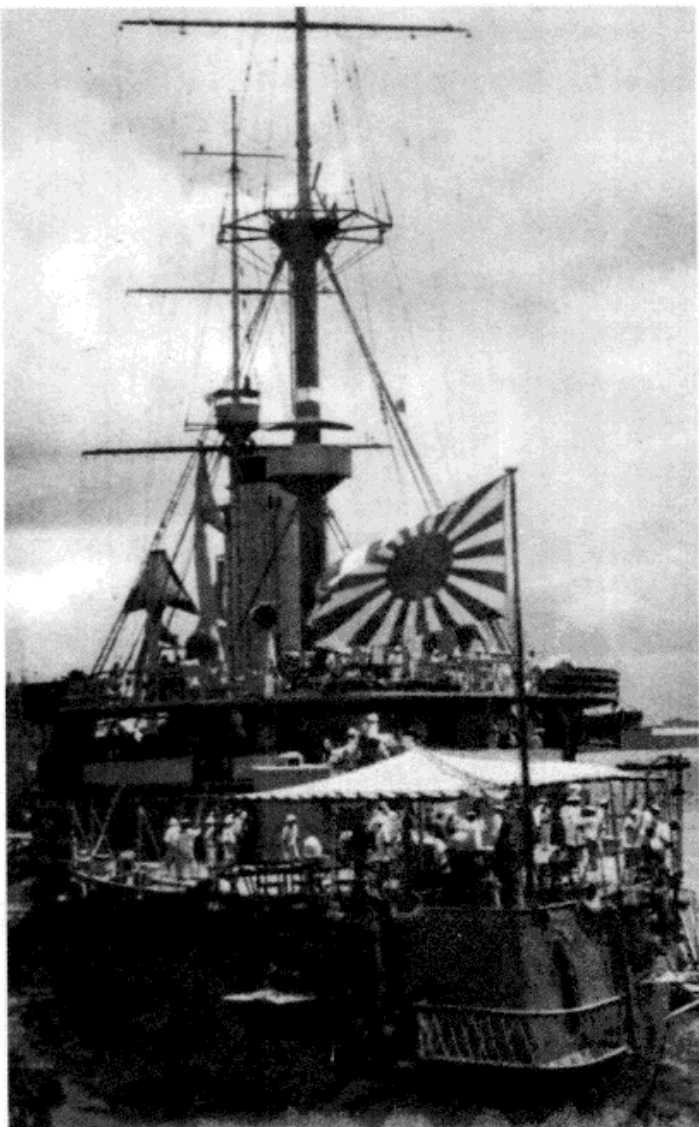
“史102”号艇在爆炸声中按原路返航，遭到“出云”号舰炮射击，不幸中弹，沉没于九江路码头附近。安其邦等官兵泅水回到中国军队防区。据日方资料记载，“史102”号艇后被日军打捞出水，结果不知所终。

中国海军鱼雷快艇对“出云”号的袭击，使日本海军当局极为震惊。17日，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令：“停泊在苏州河口15号浮标间之舰船，哨戒各地附近，尤其对中国高速鱼雷艇用鱼雷奇袭，更要严密警戒。”18日，日本海军军令部致电长谷川清，谓：“中国海军用鱼雷发射等行为，充满敌意，希望考虑击灭上海方向敌人之海军为要。”

上海方面的中国海军首先遭到了日军的报复性攻击。8月20日，在上海的各海军机关和炮舰“永健”号，以及江南造船所、上海海军司令部、海军军械处、海军警卫营营房、吴淞海岸巡防处等地，均遭到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猛烈轰炸，损失

惨重。“永健”号面对日军机群的轰炸，一直坚持战斗，最后于8月25日被日机炸毁，半沉于江南造船厂附近江上，舰上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战役结束后，日军把“永健”号打捞出水，就近在江南造船厂修理完成后改为特设鱼雷炮舰加入日本海军服役，改名“飞鸟”号，1945年5月7日被美军轰炸机炸毁。

经过这次攻击，在上海的中国海军除警



■ 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

淞沪会战中的海空作战

中国空军主力汇集

要说巧合还真的是巧合，在日本称为“第一次上海事变”（即1932年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变）的战斗中，初出茅庐的中日两国航空兵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交手。空战中，日本海军飞行员生田乃木次大尉驾驶的中岛A1N三式舰载战斗机击落了由志愿参战的美籍飞行员罗伯特·肖特驾驶的波音218型战斗机，创下了日军历史上第一个击落纪录。而在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即1937年发生在上海的淞沪会战），面对气势汹汹的日本海军航空队，兵力处于明显劣势的中国空军屡创佳绩连挫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航空兵，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留下了非常灿烂的一页。

1932年初，日本军方一手策动了上海“一·二八”事变。据日军战史记载，早在事变爆发前一周，日本海军就以航空母舰“凤翔”号和“加贺”号再加上3艘轻巡洋舰、6艘驱逐舰组成机动舰队投入到上海战场。1932年2月，中国空军投入战斗，并与日军舰载机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外空中交战。战斗中，中国飞行员表现出相当顽强的战斗意志，无奈技不如人，既未能在空战中击落1架日机（日军有不少于3个可靠的被击落记录，但应该都属于地面防空火力的战果），也未能阻止日机对我方机场的空袭，反有多架飞机被日机击落击伤，整体而言基本上处于下风。战后，狂妄的日本海航给中国空军起了个“鸦片空军”的绰号。

事变后，为了应对未来来自境外的威胁，南京国民政府下决心编练起一支能顶得上用处的空军。成立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由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担任，航委会组建后，通过从国外引进航空技术和整合各地方系统的空军部队，到中日战争全面打响以前，中国已经编练成了一支由9个航空兵大队31个飞行中队再加上1所航空学校所组成的航空兵部队。中国空军所拥有的飞机的数量各种资料说法不一。陈香梅在她的著作《陈纳德与飞虎队》一书称中国空军只有95架飞机，这数字明显过少。大多数资料显示，当时中国空军共拥有各种型号的战斗机约105架、攻击机20架、轻型轰炸机约45架、中型轰炸机约15架。所有的作战飞机合计约在300架上下。其中战斗机的主力是约60架美国寇蒂斯（Curtiss）公司出产的霍克Ⅲ（HawkⅢ）战斗机。这些数量有限的飞机分布于南京、南昌、洛阳、广州等4个航空总站范围内的100多处机场。当时，中国空军的各种飞机主要购自美、德、意等国，甚至还有少量日式战斗机存在。这些飞机机种繁多，维修困

难，常常因为缺少个别零部件而使飞机长期搁置；多数场、站设备不全，物资保障不足，地勤指挥能力不强。由于抗战前中国空军主要参与打内战，几乎没有遇到过空中对手，其着眼点只是在提高攻击地面目标的技术，忽视并缺乏空战训练。而日本的陆、海军航空队阵容强大，并且早就以别国空军为假设敌人，以夺取制空权为主要目的，进行了严格的空战训练。与日本空军相比，中国空军战斗力的方方面面都处于劣势地位。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空军本来准备调往华北参战。要求以“集中使用，奇袭敌空军根据地，逐渐消灭敌空军之实力，而作持久战，间接协助陆军取胜为目的”的作战方针。同时针对华北局势，设立了天津支队和南苑支队，以华北为战略之重点，担任防空作战任务。其战略部署为：“先以空军主力奇袭天津、丰台等处，摧毁敌陆军根据地，并相机协同我陆军击破该方面之敌；同时以空军一部担任京沪杭防空及沿海沿江之侦察与警戒，并对京沪方面仍作紧急时主力转移之准备，以防万一。”

8月10日前后，随着华东前线敌情的日益紧张，日本海军向淞沪地区增派兵力，集结舰艇，大战迫在眉睫。再加上平津的迅速沦陷，导致调空军主力北上参战已无很大迫切性，中国空军据此改变了原定北上作战计划，转而抽调兵力南下，将主力向华东的杭州、南昌等地集结，准备应对来自淞沪战场的威胁。

在抗战初期进行调整，改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宋美龄为秘书长、周至柔为主任委员的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于8月13日召开紧急会议，并且以空军总指挥周至柔和副总指挥毛邦初的名义，于下午14时，即中日军队在上海闸北开始交火之后的5小时，发表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内容如下：

1. 上海之敌，约陆军7000人，凭多年暗中建筑之工事，及新近集中之大小兵舰约30艘有侵占上海，危及我首都之企图。连日以来，敌水上侦察机2架或3架，陆续侦察我宁波、丽水、杭州、阜宁、海州诸地，其有无航空母舰在远海游弋，我正侦察中。

2. 空军对多年来侵略之敌，有协助我陆军消灭盘踞我上海之敌海陆空军及根据地之任务。

3. 各部队应于14日黄昏以前，秘密到达准备出击之位置，完成攻击一切准备。

4. 各部队之出击根据地如下：

第9大队 曹娥机场

第4大队 笕桥

第2大队 广德、长兴

暂编大队 嘉兴

第5大队 扬州

第6大队第3、5中队 苏州 第4中队 淮阴

第7大队第16中队 滁县

第8大队 大校场

第3大队第8中队 大校场 第17中队 句容

5. 各部队于明(14日)日开始移动,以16点至18点到达根据地为标准,其由现驻地出发之时间,由大队长定之,已驻在根据地之部队,可就地休息准备。

6. 各大队可以大队或中队成队航行,但须避开省会及通商大镇,第4大队可在蚌埠加油。

7. 每飞行员可带极简单之寝具。

8. 到达后须迅速报告。

9. 出动开始日时刻另行命令。

10. 各大队长(第7大队长除外)于14日14时到京,面授机宜。

11. 余在南京航空委员会

右令

空军总指挥 周至柔

副总指挥 毛邦初

卫营外,几乎损失殆尽。歼灭了在上海的中国海军部队以后,日军又出动轰炸机12架,空袭江阴,妄图摧毁中国鱼雷快艇基地。当8月22日日机飞临江阴江面时,中国舰艇部队和岸上的炮兵部队协同作战,以密集的炮火对空射击。日军飞机1架被击中坠落,其余日机仓皇退去。

中国海军在抗战初期尽管遭到如此巨大的创伤,但仍然坚持各种形式的顽强抵抗,以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9月7日,海军特工人员携带由水雷厂研制成功的一种威力很大的浮动水雷,泅水潜入浦东日商三井码头。日军在三井码头堆积了大量煤炭和汽油,特工人员将其炸毁,停泊在码头旁的2艘

装满汽油的趸船也引爆起火。顿时，大火和爆炸声震动黄浦江两岸，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都以大幅版面对此作了报道。数日后，海军特工人员再传捷报，他们又成功地炸毁了日海军码头，摧毁了日军一批军用品，浮动水雷也又一次显出其神威。

抗战以来，中国海军一直把歼灭“出云”号作为自己最重大的战略行动。9月28日，海军特工人员王宜升、陈兰藩等携带3枚水雷泅水潜至春江码头，向停泊该处的“出云”号靠近。但是，“出云”号舰自遭到“史102”号快艇袭击后，防范措施十分严密，不仅在军舰四周布下防雷网，并在军舰旁边系留大批驳船、轮船，以防中国海军攻击。王宜升、陈兰藩等人在靠近“出云”号

时，被防雷网阻拦，他们立即进行破坏。不料被“出云”号舰上的哨兵发现，只好引爆水雷，炸毁了“出云”号周围的4艘铁驳船和2艘轮船，“出云”号由于距离稍远，虽然没有遭到重创，但其尾部被炸伤。

此后，中国海军又两次寻机轰炸“出云”号，均因日舰防范严密而失败。于是，即将攻击目标转向日军第11舰队旗舰“安宅”号。11月3日，海军特工人员携带水雷，越过敌人多道封锁线，刚刚接近“安宅”号时，即被日舰上的哨兵发现。这次偷袭也没有成功。后来，中国海军虽仍计划偷袭，无奈整个上海战局已经接近尾声，因而未能实施。



附录一： 壮士悲歌——四行仓库 八百壮士纪实



决策留守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但先发制敌的中国军队苦战十日，却没能一举肃清上海的日军。9月23日，日军第一批援军2个师团分别在川沙、吴淞登陆，双方的攻防开始易手。9月下旬10月初，日军第二批援军也陆续到达，在淞沪战场已集结了5个师团又15个步兵大队和1个重炮旅团，总兵力已达12万人，火炮约300门，坦克约200辆，飞机约200架，后方供应线和野战机场也相继建立起来，战局的优势已然转到了日军手里。

10月26日，大场陷落，战况急转直下，中央作战集团面临着被日军合围的危险，被迫于当晚放弃闸北、江湾一线，退守苏州河南岸。72军88师在闸北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此后又在闸北先攻后守，血战两个多月，屡挫日军，被日军称为“可恨之师”。而此时最后撤出闸北的还是这支光荣的部队。

就在中国军队放弃闸北江湾后撤时，《九国公约》的签字国代表正齐聚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计划11月初召开会议，而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控诉案。这是一次国民政府寄予厚望的国际会议，而在国际上，从来就没有正义和公理，中国只有靠自己向国际社会证明自己抵御外侮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才有可能使九国公约做出对中国有利的裁定，进而获得国际社会

的支持和援助。而国际化都市的大上海几乎就是当时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唯一窗口，所以在上海的坚持抗战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远比其他地方要重要得多。因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市区仍坚持保留最后一个阵地，以向世界显示中国军队并未放弃上海。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在命令中央作战集团放弃闸北江湾时，同时指示第三战区代司令长官顾祝同直接部署将88师留在闸北，坚守北站至苏州河北岸一线阵地，这个部署的目的再明确不过，就是不惜牺牲88师，以达到“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的意图。

当顾祝同打电话向88师师长孙元良传达这一命令时，孙元良当即坚决表示反对：“统帅的命令自应遵办，但请长官考虑，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留在闸北就有意义。但可虑的是我们是孤立在这里，激战之后，我们的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战斗组织解体，粮弹不济，而在混乱无指挥的状况之下被日军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88师固然士气高，而且坚守闸北两个月，但我们已经补充五次，新兵训练时间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就是实际情形！所以我不同意。”

孙元良考虑到电话里还难以说明自己反对的理由，马上派师参谋长张柏亭上校赶往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

中国最高当局之所以要不惜牺牲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也要在闸北坚守最后阵地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时，能证明中国自己有抵御外侮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才有可能使九国公约做出对中国有利的裁定，进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

所谓《九国公约》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等战胜国为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和中国北洋政府在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上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称《九国公约》。条约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1937年10月6日，正是淞沪会战高潮之时，国际联盟召开大会，通过了国际联盟理事会远东问题咨询委员会提交的关于中国事变的决议，正式以文件形式指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对中国的抗战表示了同情和支持。但只是道义上的声援和支持，对中国提出的制裁日本和财政物质援助的要求均未通过，最后决议决定于11月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就中日冲突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国际联盟是把这个皮球踢给了《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这也是中国如此看重这次会议的原因之一。蒋介石于11月5日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将《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称为是解决中日问题一个最难得的机会。据此给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最高目标是在英美斡旋下与日本进行谈判，实现停战议和。最低目标是促请各国共同制裁日本。

11月3日，《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除了9个签字国外，还向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有着重大利益的苏联、德国等21国发出了邀请，但日本和德国拒绝参加。会议先是由各国代表作基调性发言，再进行磋商讨论，最后通过会议宣言。

11月24日，会议通过了大会宣言，宣告暂停，实际上无限期停止。但此次中国方面寄予厚望的国际会议，无论是在促成日本与中国的停战议和还是对日本制裁以及向中国提供物质财政援助等方面，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仅仅是在道义上表示支持中国谴责日本。当然通过这次国际会议，使国际社会更清楚地了解了中日冲突的真实情况，获得了国际社会和舆论的更多同情和支持，同时使中日问题“国际化”，打破了日本使中日问题“孤立化”的企图。对于中国开展抗日外交，争取国际援助和孤立日本，都具有积极作用。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第三战区司令部前线指挥部直接向顾祝同当面汇报。第三战区司令部前线指挥部位于沪西近郊一片竹林中的茅草小屋，距离火线还不到20公里。顾祝同就在这里指挥作战，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的指挥



■ 日军在上海市区的巷战中用步兵炮向中国军队攻击。

部却远在300公里外的宜兴西南禹峰山的张公洞。因此当时第三战区实际负责指挥作战的是顾祝同。

张柏亭在来顾祝同指挥部的路上已经不断遇到大批溃退的散兵，而且多次遭到日军飞机的扫射，见到指挥部距离前线如此之近，立即感到指挥部的安全已经受到很大威胁，便请求顾祝同考虑转移指挥部，接着报告了88师在闸北地区的布防，然后就反对留88师死守闸北进行了解释：“委员长的命令当然绝对服从，不过就任务遂行的效果，有些意见孙师长要我来面报。闸北除市街之外，市郊一片平坦，毫无隐蔽，地形上不具

备游击战的条件。至于分守据点，事实上也有困难。因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五次，目前老兵只有十之二三，这就像一杯茶，冲了五次开水……新兵连枪都没放过，目前全靠干部与几成的老兵在阵地上支撑，对新兵且且训，渐渐在实战中锻炼战技，层层节制在各级干部掌握与老兵带头之下尚可保持战斗体系，一旦分散配置则维系力顿告消失，期望发各自为战的效果，恐怕难之又难。部下的想法，委员长训示的是目的，是要强调日本军阀的侵略行为。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中外视听所系，要在国联开会时把淞沪战场的实况带到会场去。既然如此，似乎不必要

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是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家银行共同出资建造的货物堆栈，故名四行仓库。位于新垃圾桥（今西藏路桥）以西，乌镇路以东，北临国庆路，南沿光复路，与公共租界隔苏州河相望，是这一地区最高的建筑。由当年设计国际饭店的著名犹太设计师乌达克设计，建于1931年，占地0.3公顷，长120米，宽15米，高25米，七层大楼，总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钢筋水泥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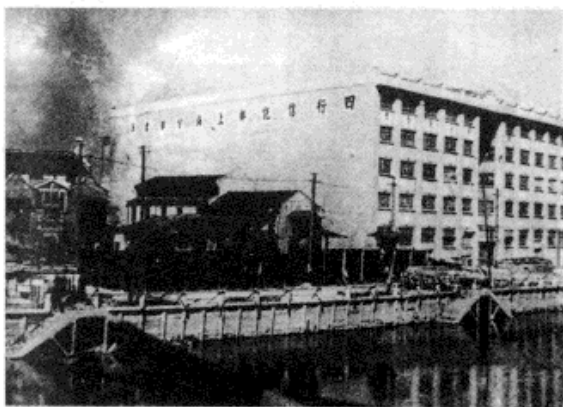
1937年10月，著名爱国将领谢晋元率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与日军进行殊死抗击，四行仓库因此而名扬四海，成为抗战圣地。1985年9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该处勒石纪念，文曰：“八百壮士四行仓库抗日纪念地”，并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加以保护。

硬性规定兵力，也不要拘泥方式。尽可授权担任的部队斟酌状况作適切处置。”见顾祝同对此表示赞许，张柏亭便大胆地提出孙元良的计划：“依部下看，留置闸北最后阵地的部队，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同时，守多数地点是守，守少数地点也是守，意义完全相同。”

顾祝同说道：“孙师长电话中也曾提到这些，但没有说明究竟留置多少兵力，守备何种据点。”



■ 第88师师长孙元良（中，著名影星秦汉之父）、副师长冯圣法（右）、（前任）参谋长陈素农（左）。



■ 硝烟笼罩下的四行仓库。

张柏亭见顾祝同并没有反对这个计划，但是他也没有具体计划，所以只好简单地提出以1个团的兵力，守备一两个据点。顾祝同同意了方案，让张柏亭马上赶回部队，通知孙元良师长立即照这一方案部署执行。

张柏亭离开指挥部就发现回部队的大路已经被撤退的车辆堵住，根本无法通行，只好绕道漕河泾转入租界，再从租界的苏州河畔找了条舢舨渡过苏州河，于17时30分赶回了88师师部所在地——日后名扬中外的四行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仓库。

张柏亭一回到师部，孙元良就告诉他已经接到顾祝同的电话命令，留置1个团在闸北坚守最后阵地。但孙元良对留下1个团的兵力仍然感到可惜，最后决定只留下1个加强营坚

守1个据点——也就是师部所在地四行仓库。

之所以选择四行仓库为最后阵地，日后孙元良在其回忆录里详细说明了理由：四行仓库高大坚固，易于防御，同时也易于掌握部队，因为连日苦战部队伤亡很大，补充的新

谢晋元

谢晋元，字中民，1904年出生于广东省蕉岭县同福乡。早年入中山大学预科，受大革命的风暴激励，于1925年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后任第1军第2师第5团排长，随军参加北伐。1928年升任中尉连长，在1928年4月的济南事变中身负重伤。1929年伤愈后升任机枪营营长，旋调任武汉要塞司令部少校参谋。1931年转任十九路军78师补充团少校参谋。1933年10月福建事变之后，谢晋元又回到中央军系统，任88师补充团营长，后升任补充团中校团附、师部中校参谋。1936年10月调任88师262旅中校参谋主任。1937年10月底，因原524团团附黄永淮负伤后送，由谢晋元接任其所遗团附一职。

1937年10月26日，奉命率88师524团1营400余官兵，坚守四行仓库，多次击退日军进攻，其事迹为国内外瞩目，被赞誉为“八百壮士”。28日凌晨，官兵又在四行仓库屋顶升起国旗，表示捍卫祖国尊严，誓与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30日，接蒋介石“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遂于31日率部冲出重围，退入租界。八百壮士坚守仓库4昼夜，击退日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余名，写下中国抗战史上极为壮烈的一页。谢晋元因此受到通令嘉奖，并升任上校团长。退入租界后，被英军解除武装，送往胶州路“孤军营”。但他仍每日清晨带领孤军唱国歌，举行精神升旗仪式，出操上课，教育部属勿忘爱国军人的人格和国格。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汪伪政府，派员以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的高官诱降，为他严词拒绝。

1941年4月24日早操时，4名被日伪收买的叛兵乘他不备，用匕首将其刺死。谢晋元遇害消息传出，举国震惊。5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嘉奖，追赠为陆军少将。上海30万民众前往瞻仰遗容。毛泽东高度赞誉八百壮士为“民族典型”，蒋介石称其为“精忠贯日”。新中国成立后，上海设晋元路、晋元中学，广东蕉岭县设晋元中学作为纪念。“文革”中陵墓遭破坏，1983年4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虹桥万国公墓（即宋庆龄陵园）重建其陵墓。

附录一：壮士悲歌——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纪实

兵比例很高，集中在一个据点便于控制。而且四行仓库中粮弹储备充足，甚至为了防备自来水管被切断还储备了大量饮用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守备据点。

临危受命

在张柏亭回到88师师部之前，孙元良师长为了挑选担负这个赴死重任的部队和指挥官，召集了团以上军官会议。在会上孙元良说明了留守闸北的任务和情况，询问谁愿意担当这一重任，这时262旅524团中校团附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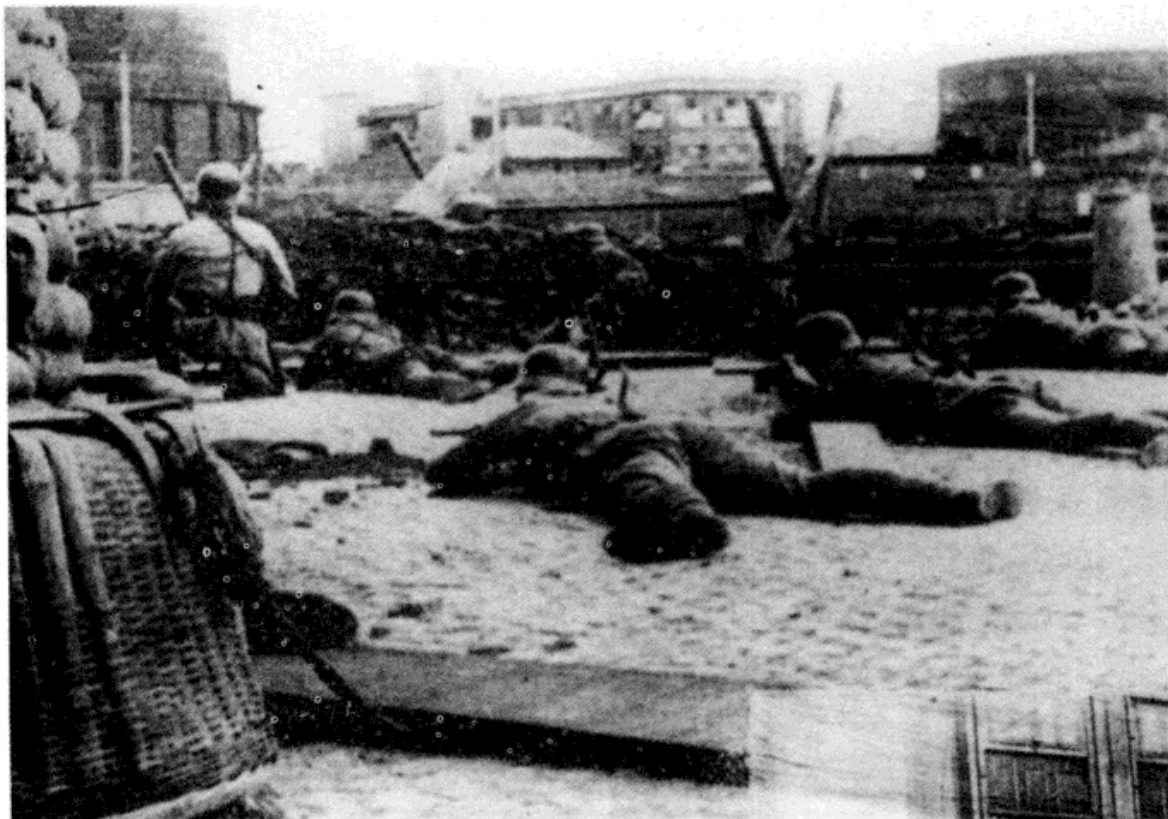
晋元站起身，表示自己愿意指挥这支最后的留守部队。于是，孙元良便向谢晋元下达了最后留守的任务，以262旅524团1营为基干，组成1个加强营，冒用524团的番号，死守四行仓库。同时将四行仓库里的所有物资都移交给谢晋元。谢晋元在接受任务后，豪情万丈地向孙元良表示：“在未达成任务前，决不轻易作牺牲。任务达成之后，决作壮烈牺牲，以报国家！”

此时，524团1营还驻守在闸北北站附近的天通庵地区，于26日晚22时接到团部下达的撤退命令，1营营长杨瑞符少校实在无法

杨瑞符

杨瑞符，字节卿，1902年出生于河北省静海县（今天津静海）。1921年投入吴佩孚的北洋军第3师当兵，累升至排长。1927年吴佩孚的北洋军第3师被北伐军击溃，杨瑞符随即被编入中央军，并于1928年进入中央军校第6期深造。1930年毕业后在警卫师中担任排长。之后以战功升任连长、营长。出身北洋军行伍的杨瑞符能在以黄埔生为军官主体的88师中发展，足见其必有过人之处。

1937年8月率部参加淞沪抗战，10月26日率部死守四行仓库，在10月31日的突围行动中左腿负伤，在外国友人的救护下，被转送到天主教圣保罗医院治疗。1939年5月，辗转来到了大后方重庆，因四行仓库的战功升任第6师17团团长，后又转至合川铜梁洞二仙观养伤。养伤期间，将孤军奋战四行的详细经过写成《孤军奋斗四日记》，发表在1939年6月12—17日《合川大声报》副刊上。1940年2月枪伤复发，经送重庆抢救无效而病故于医院，终年37岁。遵照杨瑞符生前嘱咐，由民生公司的船队将其灵柩运回合川，安葬于二仙观左侧。二仙观道长谭遁九感于与杨瑞符萍水相逢，交往莫逆，对其抗日殊勋十分崇敬，将自己多年积蓄捐出，购置楠木棺材一副，埋葬忠骨。合川人民募捐集资，在其墓前建3丈余的纪念石塔1座。1940年合川县人民又在其墓前建纪念亭1座。1958年其陵墓和纪念塔、纪念亭均遭破坏。



■ 在四行仓库楼顶英勇奋战的八百壮士。

接受这样撤退的现实，就打电话给524团团团长韩宪元上校：“从八一三以来，到现在已经有两个月了，敌人虽然以大量炮火做了四次总攻，但敌人非但没有得逞，反而给予敌人很大的打击。今天我军虽有伤亡，但还有这么多巩固的工事与实力，难道就这么白白丢弃？”面对撤退的命令，韩团长同样难以接受，但军令如山，只能劝励了杨营长几句。

23时，韩宪元又接到新的命令，即抽调1营担负死守四行仓库，于是立即打电话要杨营长马上赶到团部。当杨瑞符抵达团部时，韩宪元深知这个任务是绝对的有去无回，实在难以对自己忠勇的部属下达这样的赴死使

命，所以足足二十多分钟一言不发，气氛沉闷得让杨营长几乎难以忍受，就在这时，谢晋元匆匆赶到，将孙元良师长命令1营死守四行仓库的手令交给了杨营长，然后说：“你赶快下命令集合部队，我先到四行仓库去。”说完就赶回四行仓库。

看到这个手令，杨营长这才意识到韩团长刚才难以启齿的苦衷，他慷慨地对韩团长说：“请团长放心，我誓以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不等杨营长说完，韩团长就一把紧紧握住杨营长的手，说道：“好，你在这里和敌人作最后一拼吧”——杨营长并不知道这就是他和韩团长的生死诀别，一个

留守四行仓库的88师262旅524团1营

进入四行仓库的524团1营，早已不是开战前训练有素的精兵了，因为从8月13日开战以来，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原来的524团官兵早已伤亡殆尽。所以进入四行仓库的1营已经在火线上整补过五次，尤其是第三次整补时，524团几乎完全拼光，只剩下一个空架子，所以是把刚刚从湖北开来的湖北省保安第5团成建制地补入524团。根据当时火线整补的惯例，对补充的部队，士兵是照单全收，军官则是任其去留。但因为88师的中下级干部伤亡也是非常惨重，如1营的3个连长就只剩下1连连长陶杏村，所以对保安5团的干部也基本留用。因此可以说，524团1营几乎就是湖北省保安第5团1营改编而来，只是将保安第5团1营1连连长上官志标调任少校团附，原来524团1营残余的老兵则多充任班排长。保安5团是新成立的部队，最新的一批新兵甚至是在1937年7月抗战爆发之后才入伍的！这些新兵甚至“连枪都没开过”，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不过1营作为中央嫡系部队的精锐，其装备在当时中国军队中是属于一流水准，而且原先官兵素质也相当之高，尽管伤亡殆尽但主要装备基本都保存着，直到退入四行仓库时，1营所属各连仍然有轻机枪27挺，这个数字是抗战前国民党军甲种师步兵连装备的满编数字，可见尽管1营遭受到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但重要武器却基本没有丢失。除了机枪，许多照片及回忆都证明四行孤军仍然都配备德式钢盔，德式防护面罩与干粮袋，这些个人装备也都是老524团1营战友留下的。

1营的重武器还有2挺重机枪和机枪连的2挺高平两用重机枪。另外，本来孙元良还计划配属给1营1个迫击炮排，但所有的历史记录和回忆都没提到守军有迫击炮，所以可以推断迫击炮排并没有参加四行仓库的战斗。

四行孤军作战序列

524团团附 谢晋元中校

团附 上官志标少校（原湖北保安第5团1营1连连长）

1营营长 杨瑞符少校

第1连连长 陶杏春上尉

第2连连长 邓英上尉

第3连连长 石美豪上尉（负伤后送），唐棣上尉

机枪连连长 雷雄上尉

合计官兵452人。

半月后的12月12日，韩宪元团长在南京光华门壮烈殉国，当时光华门是日军进攻南京时的主攻方向，坚守光华门的88师在血战中共有两位旅长，三位团长与七位营长牺牲，全师官兵伤亡更是高达6000余人，几乎是全师拼光！

当杨瑞符营长回到营部的时候，已经是27日零时20分了。此时1营各连都已根据26日22时下达的撤退命令后撤，连营部直属部队都撤走了。杨营长急忙派两个传令兵分头去追，自己则在营部等待部队回来。结果传令兵只追到第2连以及第1连的第1排与第2排，于是杨瑞符营长只好先率这一个半连到四行仓库向谢晋元报到。谁也没想到27日上午9时许，没联络到的1营3连、1连3排和机枪连居然也来到四行仓库报到，原来这两个连在撤退途中遇到团部人员，知道1营的任务已经改变，虽然谁都知道这是一个送死的任务，但这两个连毅然返回四行仓库报到。就这样，至27日9时，524团1营共452人全部进入四行仓库。

首战告捷

524团1营进入四行仓库后，立即开始备战。谢晋元与杨瑞符勘察完地形便开始分配兵力，先派资深排长尹求成率2个班在旱桥警戒，1连在右翼西藏路占领阵地，2连居中在

四行仓库周边占领阵地，3连在四行仓库左翼交通银行周围占领阵地，机枪连除了在四行仓库屋顶配置2挺重机枪，另外2挺重机枪则分别配属给1连和3连。另外，还发现四行仓库西侧北苏州河路有中国军队修筑的地堡，这本来是针对租界的防御工事，所以枪眼都朝着四行仓库。杨营长随即命令在地堡内布置手榴弹与迫击炮弹，准备在日军利用时便引爆破坏。

谢晋元还命令官兵尽量征集炊事器具、粮食、燃料等必需品，做好长期坚守的准备。

此外，谢晋元还召集全体官兵进行了战前动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现在我们四面被日军包围，这仓库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他还首先立下遗嘱：“余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流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在他的带领下，所有官兵都预立了遗嘱，以示与敌决一死战之心！

就在1营积极备战的时候，蒋介石为了掌握最后留守闸北部队的情况，便指示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设法与四行仓库守军建立联络。戴笠便将从租界洋行买到的4部西门子电话机中的1部派军委会特务处驻沪办事处处长文强上校将电话送到四行仓库，巧的是文强与

附录一：壮士悲歌——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纪实



■ 谢晋元率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成为淞沪抗战中最为激动人心的篇章之一。

谢晋元是黄埔四期政治科的同队同学。据文强回忆，他将电话机送到四行仓库，并告诉谢晋元：“这纸盒（指装电话机的纸盒）中有‘通天术’，雨衣先生（戴笠字雨衣）等着与您通话，校长也等着了解情况……”谢晋元见到老同学自然非常高兴，还带着老同学在四行仓库巡视了一圈。文强仔细询问了守军的情况，并多加勉励。谢晋元知道文强是戴笠派来的，戴笠肯定会把四行仓库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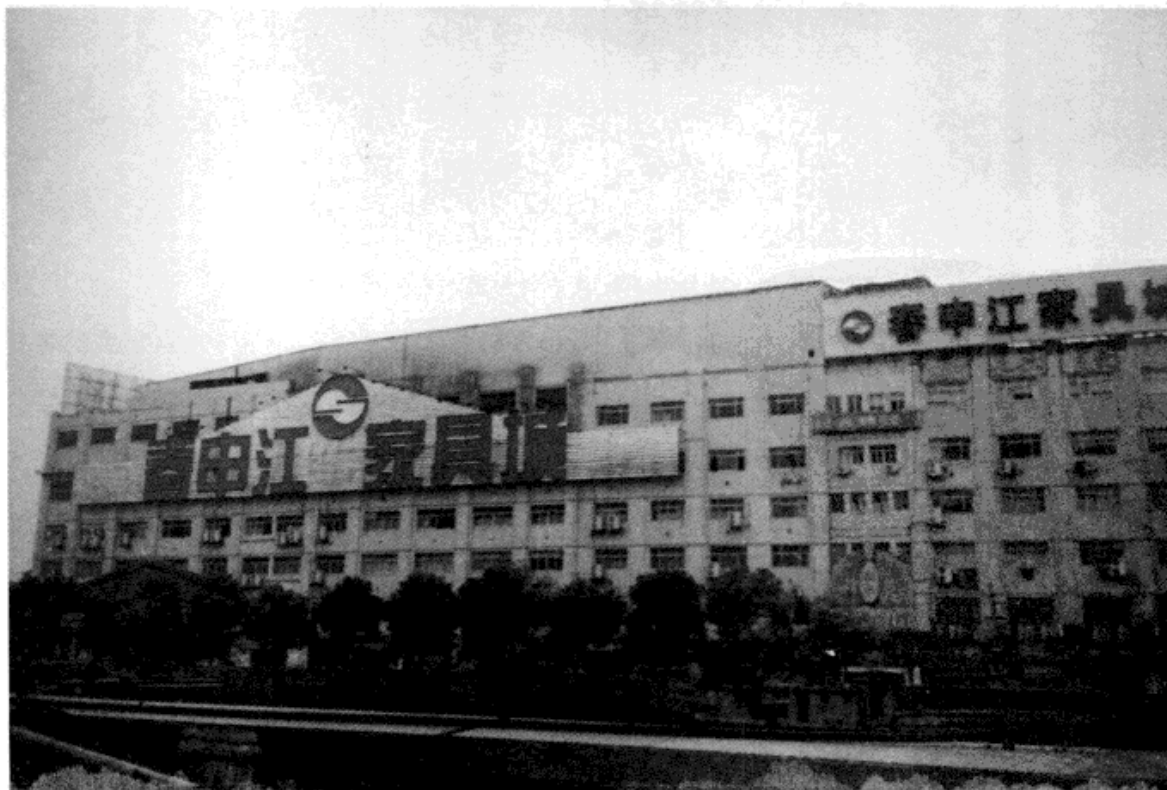
报告给蒋介石，所以他在与文强分手前拿出日记本撕下一张纸，写下两句话交给文强：“永保长城万里在，留得丹心照汗青。”

文强果然没有辜负老同学的期望，他将这张纸条交给了戴笠，并详细汇报了在四行仓库所看到的一切，这张纸条和有关情况自然很快就交给了蒋介石。

上午7时30分，日军第3师团的前卫部队从北站出发自东向西搜索前进，刚接近四行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 今天的四行仓库。

附录一：壮士悲歌——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纪实

仓库就遭到了1营的猛烈射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才重新组织队形展开进攻，战至12时许，被守军击退。

13时，日军再兴攻势。数名日军发现了北苏州河路中国军队修筑的地堡，待这几名日军进入地堡，守军就拉响了事先布置的手榴弹，将这几名日军全部炸死。

14时，日军发起了全面攻击，杨营长命令坚守了一上午的旱桥警戒阵地守军退入仓库，尹求成排长率部且战且退，班长蒋敬不幸中弹倒地，蒋敬倒地后一动不动佯装死去，当日军逼近时毅然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尹排长则率部顺利退入仓库。

日军主攻方向是四行仓库左翼的3连阵地，3连奋起抗击，石美豪连长面部中弹，血流满面，但却只是以毛巾捂着脸，继续坚持指挥。很快石连长腿部又负了伤，杨营长忙命士兵将石连长抬入仓库包扎。不久3连阵地也被日军突破，70多名日军冲到四行仓库的西南墙角。杨营长急忙命令刚退入仓库的尹求成排长率部爬上屋顶向西南墙角投弹。尹排长率部冲上楼顶后立即向西南墙角猛投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炸死日军7人，炸伤日军20多人，其余日军不敢再战，仓皇后撤。日军攻击失利后便在四行仓库西北角纵火，一时间浓烟滚滚，守军急忙用仓库里的消防水龙灭火，至17时将大火扑灭。

日军第一天只是试探性攻击，所以在退

出3连阵地后也停止了进攻，只是包围了四行仓库，准备下一轮进攻。

入夜后，杨营长断定日军不会再进攻，于是下令各连抓紧时间开饭休息，同时抢修工事整理装备弹药，准备应付明天的战斗。在27日的战斗中1营阵亡2人，伤4人。

夜深后，杨瑞符营长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想，这次假如我成功了，我不愧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军人，不愧为先总理的信徒，不愧为蒋校长的学生。这次假如我成了仁，那么关于我家的善后，早经最高领袖为我备妥了。我父亲兄弟一辈子是不会受苦难的。而我个人呢？我相信我成了仁以后，只要中华民国的历史不断绝，我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光荣的名字，同时恐怕还有无数的中华后裔为我立祠焚香了……不顾一切地拼吧，死算什么？人活百岁，总是一死！”——毫无疑问，这段话代表着整个1营全体官兵的心声，1营上下都洋溢着拼死一战的高昂士气。

献旗传奇

27日四行仓库的战斗虽然规模很小，但意义却非常重大，表示中国军队依然在闸北坚持战斗，这个消息迅速在租界流传开来，正在上海市民苦于没有支援四行仓库守军的渠道时，谢晋元在28日6时许让通信兵拨通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了上海市商会的电话。接到四行守军的电话后，上海市商会异常兴奋，并立即通知了广播电台，四行仓库还有中国军队在坚守，守军需要支援等消息迅速通过广播电台传播开来。租界内的上海同胞顿时沸腾了起来，成千上万的市民赶到苏州河南岸的各幢大楼，隔河向四行仓库守军挥动帽子、毛巾、手帕致意，甚至还将日军的集结地点、行动等写在大黑板上通报给守军。更多的人根据广播电台的指引将守军急需的物资送往上海市商会。不到一天的时间，捐赠的物资就已经足以装满10辆大卡车了。

第一批送往四行仓库的捐赠物资于28日下午装车，17时30分从宁波同乡会大楼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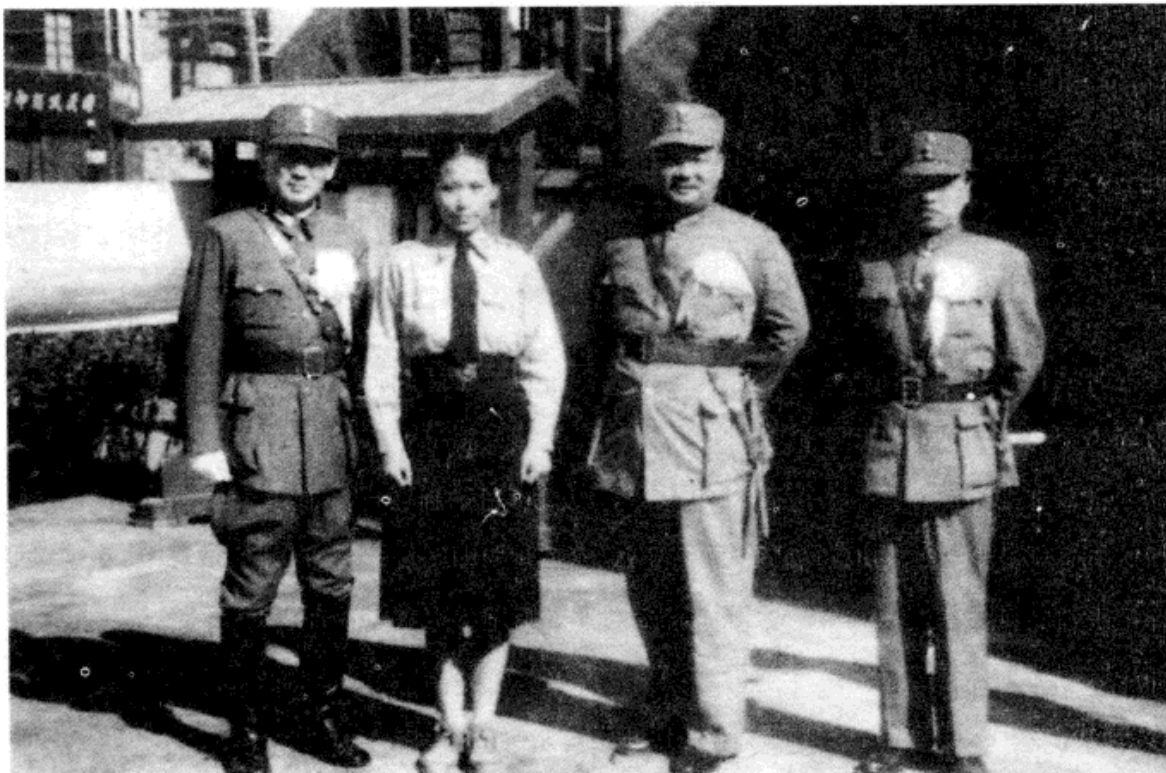
■ 献旗的女童子军杨慧敏。

发，过河南路桥过苏州河，沿北苏州河路到达西藏路东侧，因为卡车目标太大，不能直接开到四行仓库，最后一段路程只能由随车人员用麻袋拖到四行仓库侧门，3卡车的物资整整拖运了4小时。这批物资包括食品、水果、香烟、面包、衣裤、日用品以及刊登四行仓库守军报道的报纸与慰问信。除了上海商会有组织的捐赠物资外，还有很多上海市民自发地向四行仓库守军送来各种物资，杨瑞符营长在回忆中用“络绎不绝”来形容。

通过上海商会这个渠道，四行仓库不仅得到了大批物资，更重要的是通过上海商会与租界交涉，使租界当局同意借路后送伤兵。入夜后，在两天激战中，十余名负伤官兵通过租界后送。

另外，由于上海新闻界对四行仓库守军的集中报道，与部队失散的第524团团附上官志标少校（他是1营补充部队湖北保安第1营1连连长）与1营医官汤聘梓少校，机枪连杨排长都主动赶到四行仓库归队。

28日这天，四行仓库守军在得到捐赠物资后，还得到了比这些物资更有意义的一面国旗！关于献旗的起因，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杨惠敏自述中提到的四行仓库周围东西北三面是日本旗，南面是租界的英国旗，为激励中国民众的抗战决心，才想到要献旗。另一种说法是谢晋元打电话给88师师部，请求给四行仓库守军送一面国旗



■ 张治中（左一）接见杨惠敏。

以鼓舞士气，88师师部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上海市商会，商会又把任务布置给上海童子军团团长叶春年，再由叶团长将这个任务具体布置给41号团员杨惠敏。杨惠敏时年22岁，刚刚高中毕业，卢沟桥事变后加入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投身抗战报国的服务工作。这一说法出自1938年4月2日长沙出版的《战时童子军》第十六号《杨惠敏献旗报告书》——鉴于后者是更为正式的文件，所以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说法。

旗帜在战场上往往具有特别的含义，国民革命军各单位虽然都配有自己的军旗，但通常是保存在指挥部，只在阅兵或其他特定场合才会使用，不会轻易把军旗带到战场

上，极少有为了激励军心而以军旗引导冲锋的事例。而国旗更是除非确有必要，更不会随便带上战场。1营是临时接受死守四行仓库的命令，自然不可能带有国旗。

夜幕降临后，杨惠敏将特制的大尺寸国旗裹在身上，再罩上童子军的制服。通过新垃圾桥后发现四行仓库附近已经被多重铁丝网包围，只好匍匐潜行，从铁丝网的缺口处爬到四行仓库楼下，再由守军从窗口用绳子拉进仓库。

因为此前已通过电话沟通过，所以谢晋元、杨瑞符等主要军官都在等待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献旗的起由是四行仓库守军提出要送国旗来，不然如果是杨惠敏自己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的想法，谢、杨怎么可能事先得知而早早等待？

据杨惠敏的回忆，当她将国旗交给谢晋元时，谢晋元和周围的官兵都感动得落泪，谢晋元对杨惠敏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不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且是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

接旗后，谢晋元立即吩咐准备升旗，因为正在战时，所以谢晋元、杨瑞符都要在指挥岗位，没参加升旗仪式。四行仓库的屋顶上连根像样的旗杆都没有，只好临时找了两根竹竿扎成旗杆。参加升旗仪式的官兵据杨惠敏的回忆，也就一二十人，此时天色微现曙光，官兵们庄重地向国旗敬礼，在号兵吹响的敬礼号声里，国旗冉冉升起，四周不时有一两声冷枪响起，气氛更显肃穆悲壮。

升旗仪式后，杨惠敏由谢晋元带领着参



■ 1975年，台湾“中央”电影公司拍摄抗日电影《八百壮士》，扮演杨惠敏的林青霞与杨惠敏合影，注意这时杨惠敏身着的还是她那年送国旗时穿的童子军军装。

观四行仓库，杨惠敏问谢晋元打算守到什么时候，谢晋元的回答简洁但坚决：“死守！”这个回答让杨惠敏非常感动，她提出要带守军名单回去宣传，好让全国百姓都知道这些英雄。真实的名单自然不可能提供，于是谢晋元让文书兵再加上原来1营的人名，凑成一

杨惠敏

杨惠敏，1915年3月出生，江苏省镇江人。毕业于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暨中山大学体育系，1937年7月加入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为第41号女童子军。因为10月28日向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献旗的经历，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战英雄。她的事迹和照片立即成为上海各大报纸的头号消息，《良友》画报还把她作为当期的封面人物。

1938年，由杨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影片《八百壮士》问世，由袁牧之扮演谢晋元，陈波儿扮演杨惠敏。在影片放映期间，杨惠敏多次受邀作宣传。此后作为国民党宣传抗战的“形象大使”，于1938年8月被派往美国纽约参加世界青年第二届和平大会，受到在美华侨的热烈欢迎，极大地宣传了中国的抗战。此后杨惠敏在两年多时间里出访英、法、德、意、荷等十余国，发表演说达300

余次。回到重庆后，又受到国民党多位要员接见，并在宋美龄的关照下安排到中央大学旁听，但生性好动的她受不了第一学府的严规，又被保送到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就读。后因参加学生运动受到校方警告，于是她接受一位美国侨领的帮助赴美留学。杨惠敏直接找到财政部长孔祥熙申请政府资助路费，在当时战时财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孔祥熙居然批了3000美元支票给她，可见杨惠敏当时在国民政府内受关照的程度！1941年12月杨惠敏到达香港准备转往美国时，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留学计划落空。杨惠敏只好化装成小商贩，混夹在难民之中转回内地。在广东曲江得到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收容。随即接受了赈济委员会曲江难民接待站主任陈志皋秘密接运滞留香港的各界爱国人士回内地的任务。根据陈志皋提供的名单，杨惠敏多次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先后接回40多位重要人士，其中就有东吴大学教授吴经熊全家与国府主席林森的亲属等人，因此受到赈济委员会的嘉奖。1942年10月，陈志皋怕杨惠敏在香港活动时间久了，难免会暴露，就通知她回内地，但杨惠敏却抱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坚持留在香港。1942年11月，因为杨惠敏从香港接回的著名影星胡蝶的30口大箱行李丢失，胡蝶便请军统局局长戴笠追查，杨惠敏随即被捕。开始时被监禁于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后转送重庆渣滓洞。因为杨惠敏是抗战英雄，又受到过宋美龄的召见，所以军统也很难处理，就一直拖到抗战胜利后，将杨惠敏一案转给了地方法院，1946年1月4日杨惠敏才被判无罪开释。获释后，杨惠敏回到江苏镇江老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去了台湾。在台湾，她继续受到国民党高层照顾。后与台大体育系教授朱重明结婚，育有二子朱复圭与朱复轰。在台湾，先后在台北女师专（今台北市立教育大学）、金瓯商职（今台北市私立金瓯女子高级中学）与文化大学等学校任教。除此之外她也积极参与、宣传童子军活动及妇女救国运动。

1967年，杨惠敏出版了回忆录《八百壮士与我》一书。

1975年，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开拍影片《八百壮士》，由林青霞扮演杨惠敏。影片首映时，杨惠敏还亲临现场。

1977年10月28日，杨惠敏在台北不幸遭遇车祸，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从此左半身不能动弹。1980年2月，病床上的杨惠敏又突发脑溢血中风，神志模糊，从此再没有清醒过来，直到1992年3月9日去世。

血肉磨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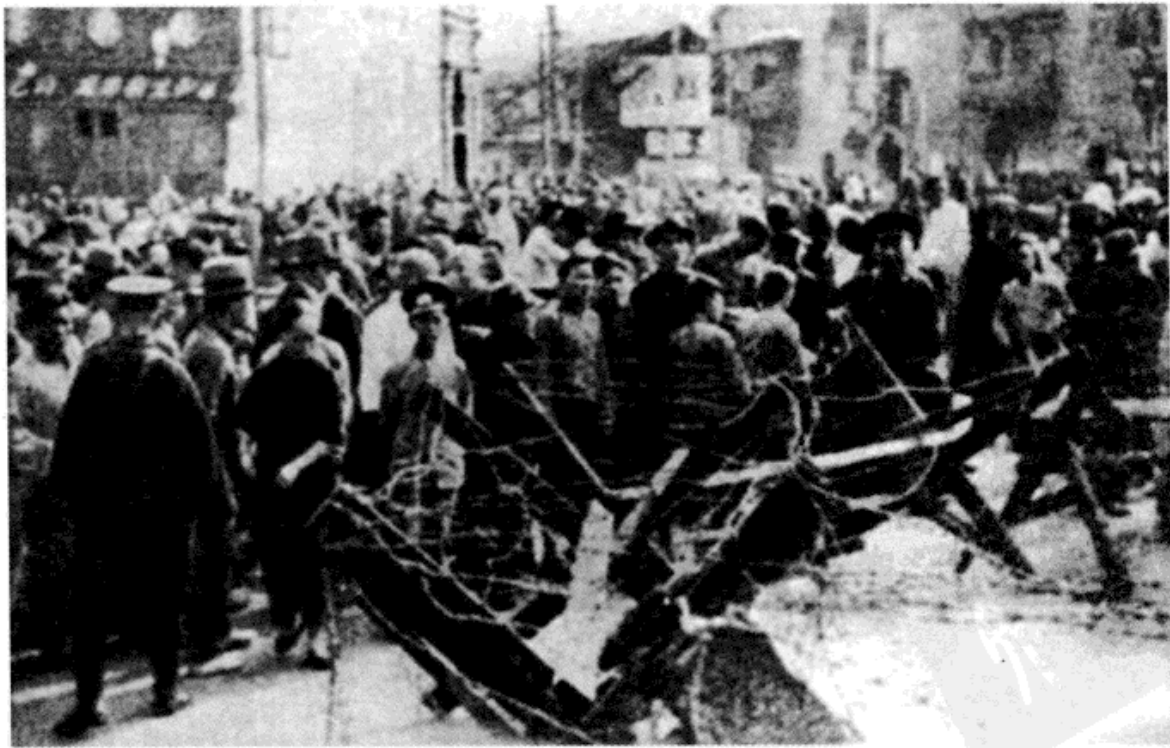
淞沪会战

份约800人的假名单交给杨惠敏——另外，谢晋元也事先关照通过租界后送的伤员在被问起守军人数时不可以据实回复，而要宣称为八百人。可见八百人的数字，谢晋元早已计划好并有意通过伤兵传播，现在更可以通过杨惠敏带走的名单进一步来确认了这个假数字。

这时天色已经大亮，杨惠敏看到许多伤员，她本想留下来照顾伤员，但被谢晋元谢绝，谢晋元将她送到侧门，开门将她硬推出去，并说：“我们永远记得你，冲过去，跳下河。”杨惠敏一出仓库，就听到枪声大起，日军又开始进攻了，她不能再有犹豫，立即跳

下苏州河游回南岸，上得岸去，河畔上已经站满了观战的市民，都在向四行仓库屋顶高高飘扬的国旗欢呼！——四行仓库楼顶飘扬于战火中的国旗，这一幕成为抗战期间最为经典的一个场景，彰显了中国军民不屈的抗战精神。四行仓库楼顶的国旗，极大振奋了上海市民的抗战信心，人们奔走相告，上海报纸这样报道：“29日晨有数千人赴往西藏路泥城桥及新闻地区向北遥望，瞻仰我国旗及忠勇将士……自朝至暮，瞻望群众约达3万余人。”

杨惠敏后来将名单交给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八百壮士”由此天下闻名。



■ 在苏州河南岸向谢晋元孤军遥望致敬意的上海市民。

固若金汤

经过27日晚的彻夜抢修，四行仓库的防御工事可谓固若金汤，1营营长杨瑞符根据两个多月来在闸北的作战经验，命令紧靠四行仓库一、二、三层楼的墙体筑起3米厚的麻包——四行仓库里有的是装满大米、食盐、黄豆的麻包——这种看似简单的防御工事相当有效，日军的枪炮对麻包工事几乎是一筹莫展。守军还将四行仓库与大陆银行之间的墙壁凿穿，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28日7时，日军一队轰炸机飞临四行仓库上空，但只是在仓库上空不断盘旋，却始终不敢投弹。不单是咫尺之遥就有煤气公司巨大的煤气罐，更重要的是与租界仅一河之隔，一旦炸弹落到租界地面，那可就要引起国际争端。何况1营架设在楼顶的重机枪也不断开火对空射击，更是使日机不敢降低高度，而高空轰炸的精度就更不敢保证了，因此日机只能盘旋一阵后就黯然飞离。

8时，谢晋元召集全营军官训话，正式宣布1营的作战任务。虽然这可以说是一定必死的任务，但1营全体军官却毫无畏惧，反而极感振奋，士气高昂，都愿与日军决一死战。此后士气高昂的1营接连挫败了日军的几次小规模进攻。

15时，开始下起小雨。日军乘机再度展开进攻，在四行仓库西北方部署了4门平射

炮，另外还在交通银行楼顶部署了重机枪，以近距火力直接支援对左翼3连阵地的主攻。杨瑞符指挥3连作战，谢晋元则指挥东面的1连2连，分头抗击日军的进攻。日军虽然倾注全力，但是平射炮与重机枪都无法穿透厚达3米的麻包工事，所以日军的进攻一再被击退，至17时许，天色已晚，日军只好停止进攻。

日军第二天的进攻依然以失利告终，恼羞成怒的日军切断了四行仓库的水电供应。

经过两天的战斗，谢晋元看出了日军的顾忌——本来四行仓库从军事上讲是一个绝地，根本没有回旋余地，所以谢晋元最初部署防御时还尽量扩充防御纵深，1连在右3连在左，2连在中围绕四行仓库周边，四行仓库大楼本身基本没部署部队。但是日军顾忌流弹落入租界，所以不敢以重炮直接轰击，只能采取几乎是纯步兵的强攻，于是谢晋元也审时度势地改变了部署，将部队全部收缩回仓库大楼死守，机枪连全部部署在楼顶，对日军形成居高临下之势。

29日10时，谢晋元设法给88师师长孙元良送出了一封信：“职以牺牲之决心，谨遵钧座意旨，奋斗到底。在未完全达成任务前，绝不轻率疏忽，成功成仁，计之熟矣。工事经三日夜加强，业已达到预定程度。任敌来攻，绝不得逞。廿七日敌再度来攻，结果据瞭望兵报告，击毙在八十人以上。昨日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河南同胞望

见，咸拍掌欢呼。现职决心待任务完成，作壮烈的牺牲。一切祈释钩念。职谢晋元上廿九日午前十时于四行仓库。”

孙师长接到这封信也是感慨万千，立即回函：“我中华民族自古多果敢赴难之士，岳家军屹然不动，戚公军驍悍怯敌，以身许国，浩气长留天地间。我国民革命军赋此美德，重以最高统帅之教训，不吝牺牲，早抱成仁之决心。此次杀敌致果，实开震动天地之历史伟迹。我黄帝亿兆子孙，全世界千百万后世人，必以血诚读此史页！”

12时，日军开始集结重兵，还出动了5辆坦克封锁四行仓库以北的主要路口。随即日军昨日布署的平射炮、重机枪也开始猛烈火力准备。

14时，日军开始总攻，坦克掩护步兵发起冲锋，但日军投入的是九四式轻型坦克，装备的坦克炮口径只有37毫米，根本无法轰垮守军的麻包工事。发现坦克炮难以奏效，情急之下的2辆日军坦克居然直接冲向四行仓库，结果只有12毫米装甲厚的“豆坦克”

(注：九四式坦克因为重量只有3.5吨，所以被戏称为“豆坦克”)轻易地便被守军投掷的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双双炸毁。

3连阵地在被日军占领的交通银行俯瞰范围内，而且路面狭窄，难以展开较大兵力，因此成为日军的攻击重点。尽管日军坦克掩护未能奏效，但步兵还是亡命猛攻，2名日

军扛着梯子冲到仓库大楼旁，架起梯子往上爬，爬到二楼窗口，正好被督战的谢晋元与上官志标发现，上官志标从窗口伸出手猛力将第一名日军推下梯子。第二名日军被这突然出现的一幕吓得傻在梯上，谢晋元拔出手枪一枪将其击毙。在楼顶的机枪连排长钱振华即率几名士兵向逼近的日军猛投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将冲到墙角的数十名日军炸得血肉横飞，但仍有20多名日军冲到大楼墙边的死角，开始破坏麻包工事，就在危急之时，2连4班下士副班长陈树生全身缚满手榴弹，由六楼奋身跃下，轰然一声巨响，与20多名日军同归于尽。

15时30分，日军2艘汽艇满载士兵企图从苏州河迂回四行仓库，这时苏州河上的船民奋不顾身地驾驶小木船集中在新垃圾桥东侧，将日军汽艇的航线堵塞，并向守军示警。守军立即向苏州河畔的一名华籍巡捕郑侠飞喊话，要郑侠飞转告租界英军，只要日军汽艇再向前进，就要开枪射击。租界当局知道一旦守军向苏州河上的日军汽艇开火，射击方向是正朝着租界，难免会有流弹飞入租界，所以急忙与日军交涉，日军只好悻悻而退。

天黑后，日军出动坦克企图借夜色掩护直接冲击四行仓库，结果被守军发现，以猛烈的手榴弹将其击退。见日军第一次在夜间组织进攻，谢晋元随即下令准备照明弹、手电筒与浸过煤油的棉花毯子，准备夜战。

30日7时，日军集中各种重武器向四行仓库猛烈射击，据杨瑞符营长的回忆，日军的炮火几乎达到每秒钟落弹一发的程度。为了抗击日军的炮火轰击，谢晋元率部冒着炮火加强工事，四行仓库的一、二、三层楼体外侧全部有3米厚的麻包，第四层因为比交通银行高度低而常遭日军瞰射，所以不设工事。五楼是全封闭的仓库，没有窗户，所以无法压制交通银行楼顶的日军。就在30日的炮击中，五楼墙面被轰出了几个弹孔，杨瑞符营长高兴地下令在把这些弹孔立即改建成机枪射孔，扫射交通银行楼顶的日军，日军失去地利，在守军机枪压制下只得无奈放弃交通银行。就这样，守军在楼顶和五楼的机枪完全控制了整个战场，使日军根本无法发起步兵冲击，而只能以炮火轰击，企图轰垮四行仓库。除了平射炮外，日军还出动了2辆坦克，企图抵近仓库大楼炮击，结果被守军的手榴弹炸毁1辆炸伤1辆。

入夜后日军在西藏路架起了2具探照灯，再增调重迫击炮，以探照灯指示彻夜继续轰击四行仓库，但依然毫无收获。

就在戎马倥偬之间，谢晋元还赋诗一首以明心迹：

勇敢杀敌八百兵，
抗敌豪情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
说到倭奴气不平。

光荣撤退

四行仓库的战斗，使上海市民极感振奋，但与四行仓库仅一河之隔的租界当局却感到非常棘手，一方面距四行仓库仅数十米之遥的西藏路桥南就有一个煤气公司巨大的煤气罐，一旦流弹击中这个煤气罐引起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方面四行仓库与租界近在咫尺，如果有流弹落到租界，引起擦枪走火的事端，难免极有可能演变成国际事件甚至打破租界与日军之间微妙的和平关系，因此四行仓库对于租界当局来说，绝对是如梗在喉，那么希望四行仓库守军尽快撤退，那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同时，日军也忌惮一水之隔的租界，不敢放手攻击，在四行仓库下颜面尽失，所以也向租界当局施压，企图从外交途径来迫使守军撤离。

租界当局首先要求第三战区司令部命令四行仓库守军撤离，同时表示允许其退入租界，并保证四行仓库守军的人身安全。

29日，各国驻华使节团向国民政府正式提出照会，要求基于人道主义立场，下令四行守军撤退。此外，出于对八百壮士的崇敬与同情，各种社会团体和社会名流都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国民政府命令四行守军撤退，以保全这支英雄部队。

从中国方面看，谢晋元和他的1营坚守四行仓库，屡挫日军兵锋，极大振奋了中国

军民的抗战信心，同时也在国际舆论面前，展示了中国以弱抗强的不屈意志，从这点上说，四行仓库守军是出色完成了“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的使命。在此背景下，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白白牺牲这个英勇的部队，于是10月31日上午蒋介石电令88师师长孙元良，据各方之请，命令514团1营于11月1日凌晨2时撤离四行仓库归建。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为主帅者，爱惜所部与牺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谢晋元死守闸北一隅，任务与目的已达，故令其为荣誉之撤退，不必再作无谓之牺牲矣！”

此时，88师已撤至沪西的北新泾、周家桥、丰田纱厂一线，孤悬敌后的1营如要撤退归建，只有渡过苏州河经租界归队。由于租界当局之前已有过允许1营通过的承诺，所以为了保证1营的安全撤退，孙元良师长便派副师长冯圣法和参谋长张柏亭与上海市代市长俞鸿钧、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一起与租界当局交涉。31日14时，冯、张、俞、杨在法租界环龙路的一处豪华花园洋房里与公共租界的外国驻军总司令英军少将斯摩利特（Smoleet）等租界当局代表会谈。军事问题由张柏亭负责，外交事宜由俞鸿钧负责。

张柏亭提出守军撤退最为稳妥的方法，是越过苏州河经租界退往沪西，撤退时希望英军提供三项协助：即通过英军警戒线时的行动协调，对封锁四行仓库后门的日军机枪

阵地与探照灯的压制，以及准备通过租界时的交通工具。斯摩利特对这三项要求是非常爽气地一口允诺，这使张柏亭大松了一口气，认为这次谈判顺利完成。然后还商讨了相互联络等具体细节，也很快达成一致。但实际上，这次会谈却隐藏杀机，首先斯摩利特只是驻军司令，只负责军事行动，而对于租界的行政与外交事务并无权限，会谈时也没有租界当局的正式授权文件，会谈结束后也没有正式签署任何书面协议。

当晚21时，张柏亭通过电话命令谢晋元率部于当晚撤出四行仓库。谢晋元听到这个命令，极感惊异，也非常激动，声言：“全体官兵早已立下遗嘱，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死得其所！请参谋长报告师长，转请委员长，成全我们”！……张柏亭与冯圣法轮番开导，谢晋元、上官志标、杨瑞符也交替接话，态度都十分坚决，张柏亭在回忆录中甚至写道在电话中也可以体味到守军声泪俱下的情状。但军令如山，张柏亭只能用严肃的语气训斥道：“你们成仁取义的决心固然十分可佩，但这是委座的命令，我们只是命令的传达者。军人要以服从为天职，打日本鬼子机会有的是，今后还有比守四行仓库更重要的使命，等你们去担当。如果你们违抗命令，那你们的勇敢与牺牲，只是匹夫之勇而没有意义了！”话说到这个分上，谢晋元只能接受了。

附录一：壮士悲歌——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纪实

31日24时，突围准备一切就绪，谢晋元下令突围！自己亲率1连和机枪连首先冲出仓库，这时日军似乎有所察觉，在西藏路口和曲阜路口两处碉堡内的探照灯来回照射新垃圾桥，机枪也开始射击。这时谢晋元立即下令集中火力打灭日军探照灯，机枪连2班、3班立即以重机枪向日军碉堡猛烈扫射，当即将探照灯打灭。黑暗中日军只能依照白天测定的距离进行盲目射击。谢晋元随即又命以火力压制日军机枪，1连、机枪连迅速冲过新垃圾桥，接着2连、3连也依次冲过新垃圾桥，最后是殿后部队1连3排并加强1挺重机枪由杨得余排长率领，仅仅30分钟，1营全部冲过新垃圾桥进入租界。撤退过程中，5人牺牲，包括杨瑞符营长在内的24人受伤。

11月1日零时许，1营官兵约400人全部撤入租界。在坚守四行仓库的四天中，1营共计阵亡14人，伤23人（连同撤退时的伤亡，总共阵亡19人，伤47人），而击毙日军至少在200人以上。1营退入租界后，先被带到中国银行仓库。租界当局随即要求收缴1营武器，听到这话，谢晋元和全体官兵群情激愤，坚决不同意缴出武器，并声称宁愿重返四行仓库死守到底。双方僵持不下，气氛极其紧张。张柏亭在漕河泾等候1营归队，久等不到，知道出现状况，急忙赶到租界，在了解状况之后，张柏亭让谢晋元暂时先忍耐，同时英方也解释进入租界不许携带武器是惯

例，而且他们只是求代为“保管”，并点清数目出具收据，绝非“缴械”。谢晋元这才命令缴出武器——共计步枪200余支，轻机枪20余挺，重机枪4挺，驳壳枪20余支，手枪3支，子弹12万发，从这个数字上来看，1营几乎是把全部轻重武器都带出来了。

1营被缴械后，步行前往西藏路跑马厅休息，即使是深夜，沿途均有大批群众闻讯自发赶来欢迎。1日上午在吃完早餐后由租界当局派车送往星加坡路（今余姚路）胶州路口的意大利兵营，沿途受到上海市民夹道欢迎，大家争相一睹抗日英雄的风采，甚至连路边屋顶上都站满了人，见1营的车队开来，人们纷纷鼓掌欢呼，道路也不时被欢迎的人群所堵塞，只得时开时停，谢晋元不时向围观人群举手敬礼，以示答谢，场面极为热烈。但是一进入意大利军营后，失去武装的1营随即遭到羁押，由万国商团看守。

1营退入租界后，日军立即向租界提出抗议，并称如果租界准许中国军队通过，日军也将开进租界追击——确实根据租界的相关协议，武装部队是不能任意进出，这是1营借道租界在“法理”上（当然这是租界的所谓法理）的一个软肋。而在得知1营被租界羁押之后，蒋介石立即指示上海市代市长俞鸿钧向租界提出抗议，要求让1营按原协议通过租界归队。日军在得知1营被羁押后居然向租界提出引渡1营的要求，但租界当局这回是两面

都不理睬，从此1营自谢晋元以下共377名官兵（杨瑞符营长与20余位先后被送入租界的负伤官兵均被送往医院救治，这批官兵在伤愈后陆续被安排返回大后方）被软禁在意大利兵营，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1日，军事委员会明令524团1营全体官兵都晋升一级军衔，谢晋元晋升上校团长，还获得青天白日勋章。1营对外仍冒称524团，但实际上88师262旅524团仍在战斗序列中，所以在国民政府内部多以“孤军团”来指谢晋元所部。在主要军官中，谢晋元升任团长外，原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升任中校团附，机枪连长雷雄升任1营营长，接替因伤后送的杨瑞符。但谢晋元日记中却称雷雄实际上是升任少校团附，孤军内部仍称雷雄为连长，而且并没有组建1营营部。所以孤军团的编制是团部直辖4个连，而没有营一级机关。

1营被租界羁押之事乍看似乎很是蹊跷，租界为什么会出尔反尔？其实仔细分析，原因很简单，笔者以为这从头到底就是租界当局精心策划的圈套，目的就是为将1营逼出四行仓库！因为1营坚守四行仓库对于租界来说，实在是个烫手的山芋。最理想的办法就是让1营离开四行仓库，于是老奸巨猾的租界当局先是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1营撤离。再是假意同意1营借道租界归队。最后派斯摩利特与中方谈判，更是处心积虑。因为斯摩利特是军职人员，没有正式授权文件的话不能

全权代表租界当局。即便他与中方签署了书面协议，日后租界当局也能以这个理由来否认这个协议。更何况中方居然没有与斯摩利特签署任何书面的文件，那就更使得中方在1营被羁押后毫无任何依据可以与租界讨说法。可见此次中方在与租界谈判交涉时的重大失误了。

关于撤出四行仓库，谢晋元曾在1938年6月有过一段说明：“我等困守闸北四行仓库凡四日夜，击退敌军六次进攻。弹药消耗不及十分之一，至于给养，虽坚守三年亦无绝粮之虞。我政府为维护世界和平，达成抗战神圣的目的，复兴中华民族，为千秋万世基业计，虽牺牲千万人之生命，亦无所悔恨！似此四百之我等孤军，实沧海一粟耳，何惜牺牲！且我等已有充分之弹药与给养，准备重创敌人，作光荣的战死！藉租界的庇护以保生命，我等绝未作此想。我等之撤退，系因第三者要求维护中立地区（租界）之安全，请求我政府同意，而由我最高当局下令撤退者。”——这番话曾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刊登，澄清了社会各界对于撤出四行仓库的一些谬议。

四行孤军虽然撤离了四行仓库，但他们却依然是广大民众心目中的抗战英雄。上海的《立报》于四行孤军退入租界的第二天即刊登《为你们颂祷》一文，表达了广大民众的心声：“你们这一行动，毫无疑问是代表了

上海租界

租界和租界制度，是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肆意扩大在华特权的产物，是列强在通商口岸辟设外商居留地的基础上，通过不断侵夺中国政府的主权，建立独立于中国政权体系之外的行政区划和管理机构，制定并实施有关租地、税收、司法、警务、城市管理等一系列规章过程中形成的。

上海租界，从1845年11月设立开始，至1943年8月结束，历时近百年。在近代中国出现的所有租界中，上海租界开辟最早，存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管理机构最庞大，发展最为充分。

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划定了外滩英租界的南北界限，南到杨泾浜（后多作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到李家厂（今北京东路）。东西界址则未定，通常将东面边界定为黄浦江，但西界未定给日后租界的扩张留下了伏笔。1845年中英签订《上海土地章程》。这一章程对英商租地方式，在租界的权利和义务，中国地方政府和英驻沪领事同租界的关系等一一作了规定。这一章程被外国列强视为租界的根本大法，为租界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846年，英租界的西界到界路（今河南路），北界延伸到吴淞江（即苏州河），东为黄浦江，南为洋泾浜，总面积为1080亩。

1847年8月，法国领事敏体尼在给上海道台的照会中第一次提出了“租界”（concession）的说法，而此前英国一直使用的是“居留地”（settlement）。

1848年11月，英租界再度扩张，西界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总面积为2820亩。同年，上海地方官允许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的要求，在虹口开辟美国租界，但未签订任何正式文本，也没确定美租界的范围。

1849年4月，上海道台又同意设立法租界，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南至泥城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北至洋泾浜，总面积约986亩。

1854年7月，上海英法美租界联合组建独立的市政管理机构——“上海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直译为上海市政委员会或上海市议会，为了不过度刺激中方，才将中文名称叫做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装，正式形成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租界。

1862年，法租界退出联合管理机构，自设公董局。1863年9月，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称为上海公共租界（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最高市政管理机构仍称为工部局。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时，美国驻沪领事熙华德曾

法权等所有特权。日本政府闻讯，为进一步拉拢汪伪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于1943年1月同汪伪政府签订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据此，1943年7月30日，法租界“交还”给汪伪政府，成为汪伪上海特别市第八区。8月1日，汪伪政府“收回”公共租界，成为汪伪上海特别市第一区。两处租界虽然名义上被汪伪政府收回，但实际上仍处于日军的控制下。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根据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分别签署的废除在华特权新约，以及1946年2月28日中国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订立的《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才在法律上真正完成收回上海租界的程序。同时，上海市政府成立前租界债权债务处理委员会，将租界遗留下来的债务一一处理完毕，至此，在上海存在了百年之久的租界，终于彻底结束。

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意志……打破了亲日派汉奸的和平好梦了！中国的抗战如能永久地坚持下去，中国的抗战如能像你们一样军民合作，我们胜利的把握是极其必然的了。”

西方媒体也对四行孤军给予了高度的赞赏，英国《泰晤士报》赞扬他们是“为人道而战、为文明而战、为和平而战的八百壮士”。英文《大美晚报》发表社论说：“吾人目睹闸北华军之英勇抗战精神，于吾人脑海中永留深刻之印象，华军作战之奋勇空前未有，足永垂青史。”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社论说：“华军在沪抵抗日军之成绩，实为任何国家史记中最勇武的诸页之一。”亲眼目睹孤军团坚守四行仓库的租界驻军总司令斯摩利特少将说：“我们都是经历过欧战的军人，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敢死队员’最后保卫闸北更英勇、更壮烈的事了。”

相反，租界对于一些真正违反相关规定，携带武器溃逃入租界藉以苟全性命的日军官兵，却不敢羁押，而是连人带武器一齐送还，完全暴露了一贯以民主人权道义标榜自己的西方列强，只有强权没有公理的丑恶面目。

羁押岁月

524团1营自退入租界被强行缴械后，便成为了一支真正身陷孤岛的孤军。租界当局将孤军羁押在星加坡路（今余姚路）胶州路口与胶州公园（今静安区工人体育场）一墙之隔的空地，其实这里原本是垃圾堆积场，遍地垃圾，杂草丛生，仅有一排简陋的营房，租界当局再搭起一些帐篷，然后在营地四周围上通电铁丝网，营门及营地四周由万国商团的白俄士兵日夜戒备。通常负责看守

与上海道台黄芳议定美租界界址，但未树立界石。直至1893年7月才正式确定界址，美租界面积为7856亩，公共租界总面积达到10676亩。

1869年9月，英、美、法、德、俄五国公使在1854年《上海英美法租界租地章程》基础上修订并签署《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从此这个新章程就成为了上海租界的“宪法”，但特别说明一点的是，这个章程的修定和签署全过程均未经中国政府批准。

1899年5月，上海公共租界大规模扩展，东自杨树浦桥起，至周家嘴角止；西自泥城桥起，至静安寺镇止，又由静安寺镇划一直线，至新闸苏州河南岸止；南自法租界八仙桥起，至静安寺镇止；北自虹口租界第五界石起，至上海县北边界止，即上海、宝山两县交界之线。此次扩张，公共租界面积达到33503亩，划分为中、北、东、西4个区。

1899年6月法租界也大大扩展，北至北长浜（今延安东路西段），西至顾家宅、关帝庙（今重庆南路），南至打铁浜、晏公庙、丁公桥（今西门路、自忠路），东至城河浜（今人民路西段），总面积达2135亩。

越界筑路是租界扩展的另一种方式。从1862—1925年，工部局在公共租界之外越界筑路41条，面积达5万亩。1914年4月，外交部江苏交涉员杨晟同法国驻沪领事甘世东签订关于法租界界外马路协定十一条，以法租界当局驱逐在法租界活动的革命党人为条件，给予法租界当局在越界筑路区域行使警政和征税权，从而使这些越界筑路区域成为事实上的新租界。通过这一方式，法租界及法租界当局控制区面积达到15150亩。

1925年五卅运动后，大规模越界筑路基本停止。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向外扩张的态势趋于停顿。

1937年8月至11月的淞沪会战中，日军将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人称“上海日租界”。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及西部越界筑路区域分别由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军队防守，保持中立达四年之久，被称为“孤岛”。

1940年，由于欧洲战争爆发，驻沪英军撤退。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不久工部局董事会中的英美荷籍董事全体辞职，总董由日本领馆参事冈崎胜男担任，由汉奸袁履登为副总董，工部局董事会完全为日本人所控制。

1942年10月，英、美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将与中国政府谈判放弃在华治外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营地的白俄士兵不少于1个排，租界当局在营地围墙的四个角，各搭起一座瞭望台，不分日夜由白俄士兵站岗值勤，美其名曰保护，实际上是监视与看管。白俄士兵对于营地的门禁看管极其森严，营区本来有一座大铁门，但很快被封闭，只有旁边一个仅能容一人进出的小门供出入，严禁孤军官兵外出，如有访客要进入营地，必须先在营门口的卫兵室登记，搜过身后始能进入，并限制出入的人数。可以说，完全是形同囚徒。孤军自1937年11月1日至1941年12月18日被羁留在此长达4年又1个月零27天，这块营地也被称为

“孤军营”。

从孤军被租界羁押后，国民政府就全力展开外交努力，以争取孤军获释归队。但直到1938年元旦，一切努力均未奏效。谢晋元也彻底放弃了获释的期待，开始带领部队着手整理环境，搭建起礼堂、浴室、医务室，修建了操场和球场，使整个营地面貌一新。同时也开始将孤军营的生活当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战斗，这种长期在软禁状态下的奋斗，和在炮火连天的前线相比，同样也会有流血牺牲，但艰苦卓绝则更难能可贵。谢晋元也深知这点，从一进入孤军营开始就决心要通

《歌八百壮士》（又名《中国不会亡》）

作词：桂涛声

作曲：夏之秋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
八百壮士一条心，千万强敌不可当。
我们的行动伟烈，我们的气节豪壮。
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战场，
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附录一：壮士悲歌——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纪实

过自己的言行“使友邦从我们身上看到中国军人之气概，从此认识中国的真精神”。进入孤军营的第二天，谢晋元就在接见来访的中外记者时慨然表示：“倭寇与我们誓不两立，我们存在，决与倭寇拼命到底！”

在孤军营中，谢晋元严于律己，时时处处为部下楷模，表现出忠诚、勇敢、坚毅等高尚品质，因此在孤军官兵中赢得了很高威望。孤军扎营后，谢晋元为保持官兵的斗志，严肃军纪，以期恢复自由后能重上抗日战场报效祖国，实行严格的部队生活作息。他亲自制定了军事训练、文化学习、体育锻炼和生活劳动等各项计划，每天按教育、生产、体育3项内容安排时间，每天出操上课，值勤站岗，从不间断。



■ 1937年10月，谢晋元（前坐者）在上海租界孤军营，和524团1营四位连长合影；后排右一为第1连连长上官志标上尉，右二为第3连连长唐棣上尉，左一为第2连连长雷雄上尉，左二为第4连连长邓英上尉。

谢晋元还屡次就孤军的待遇问题致函租界当局进行交涉。他一再重申，四行孤军不同于战俘，亦不同于因弹尽粮绝而逃至中立地区的避难者，四行守军是本着人道立场，为保证上海租界的安全而主动撤退的，租界当局应以中立的态度予孤军自由。但孤军的境遇并未改善，孤军营中被禁止悬挂国旗、拍照。租界当局以孤军并非战俘为由，拒不供应伙食，孤军在入营后最初2个月内全靠各界人士和团体接济，以后则由国民政府按中国军队待遇，拨给每人每月9元伙食费（每月合计法币5500元），汇至租界工部局，但其中多有被盘剥克扣，故孤军营中常因菜金支绌而只能以面蔬充饥。后经多次交涉，孤军被允许自办伙食，并得到外界人士的资助，

生活方有所改善，甚至可以达到顿顿有荤菜，谢晋元也在日记中提到部分士兵一餐饭“吃面两三斤，吃饭五六碗”。时间一久，由于伙食太好，缺乏运动，到1939年孤军官兵的体能状况明显下降，“官兵四分之三体弱，畸形发展。胖的满身

是肉，瘦的面色白而黄，精神萎顿，弯腰驼背”。于是谢晋元命令每天早晨进行50分钟的跑步与运动，还带领部下平整场地，修辟篮球场、排球场，自任球队队长，时常组织孤军球队与上海一些企业、学校的球队进行比赛。另外，孤军还举行多次运动会。

1939年1月，孤军营内成立合作社，从各界捐款中拿出5000元作为开业本金，实行生产自助。先后办起袜子肥皂、毛巾、藤椅等生产组，聘请营外师傅传授织袜技术；请五洲肥皂厂技术员指导“孤军牌”肥皂的生产；由申新纱厂提供原料，进行毛巾的初级生产，再送外加工。“孤军”品牌自然极受欢迎，孤军生产经营活动也逐渐赢利丰厚，使孤军从1940年起不再需要国家负担生活费用，还向重庆国民政府捐赠数千元支援抗战。

谢晋元为使官兵获得自由后能独立谋生，在进行生产经营的同时，还在营内开办1所“孤军学校”，分小学、初中、高中3个班级，每晚授课2小时，聘请营外教育界人士任教。经2年教育，营中扫除文盲。还举办汽车司机训练班。由祥生、银色、云飞、泰来等几家汽车行无偿提供轿车、卡车各1辆和汽油，交通大学2位教师执教，共举办2期，每期40人。还有很多著名学者教授都免费到孤军营演说、授课，甚至连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也到孤军营开班讲授“共产

党宣言”与“资本论”……

孤军营的成立引起大上海地区的爱国热潮，被人们视为在“孤岛”中的一块抗日爱国圣地，除了向孤军营捐赠大量现金、与生活物资外，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拜访者，最多一天更是达到4000人之多，人数之多，使谢晋元不得不指定雷雄团附专门负责招待。另外，各种热心的劳军活动也接连不断，营中也经常开展各种文娱活动，进行爱国宣传，使身陷“孤岛”的人们压抑的心情得到振奋，孤军营也被誉为“小重庆”。

孤军苦斗

除了军事训练、文化学习外，谢晋元还特别重视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每天早晨坚持进行“精神升旗”仪式。精神升旗时，全体孤军向天空行军礼，礼毕唱国歌。谢晋元认为“我们头上有青天白日，脚下有热烈的鲜血，这足以代表国家”。以此培养官兵的爱国思想，使他们不致在幽禁生活中丧失爱国立场。

1938年7月，为纪念七七事变1周年，孤军准备在营地升国旗。租界当局获悉后，立即致函谢晋元要求取消这一活动。谢晋元以中国尚未沦亡，国旗为国家之代表，凡属国人均有升旗自由为由，予以拒绝。租界工部局为此专门派万国商团团长亨培来与谢晋元

孤军营的作息时间表

起床：4时30分；
 早操：5时至7时；
 万国商团点名：8时；
 早餐：9时；
 上课：10时至11时30分；
 晚餐：16时；
 拳术或唱歌：15时至19时；
 自由活动：19时30分至20时；
 就寝：21时。

协商，最终商定这次暂不升旗，以后营内平日不升旗，逢纪念日可以升旗。

1938年8月，谢晋元决定8月11日起连续三天升旗，以纪念88师自无锡出发参加淞沪抗战及八一三事件一周年。但工部局代表万国商团团长亨培认为孤军营升旗，政治影响太大，会导致日军抗议，所以代表租界当局不同意举行升旗。谢晋元称孤军营内属于中国领土，外国人无权干涉在中国领土上的升旗典礼。从法理上讲，整个租界都属于中国领土，而且在相关规章协议上也都没有规定租界内不得悬挂中国国旗。双方谈判破裂，谢晋元仍然按计划购入旗杆，进行升旗的准备。租界当局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将旗杆砍短数尺，与屋顶同高，以免被日军发现。谢晋元不得已，只得命令将旗杆截断数尺。

8月11日晨6时，孤军营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国旗再度飘扬在上海的天空。看到

这面国旗，周围市民群情激奋，也使租界当局担心会激起变故，于是紧急通知孤军将国旗降下，但谢晋元予以断然拒绝。租界当局立即出动300名英国兵与400名意大利兵包围孤军营，准备以武力逼迫孤军降旗，谢晋元见重兵合围，下令部队展开以保护国旗，3连守卫营门，1连守卫瞭望台，作为第一道防线，2连分散在操场作为第二道防线，4连守护在旗杆四周作为核心防线。僵持4小时后，租界当局终于命令万国商团的白俄士兵冲入孤军营，白俄士兵进入孤军营后以警棍乱殴，直扑旗杆，孤军官兵以啤酒瓶为武器奋力反抗，混战之中，白俄士兵最终开了枪，孤军士兵刘尚芳、尤长青、吴祖德与王文义4人殉国，41人重伤，70人轻伤，国旗也被抢去。当时有记者在场，因此全程都有拍照，消息一经传出，顿时震惊上海滩。当晚，谢晋元领导全体官兵绝食抗议，并于次日清晨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6时继续举行“精神升旗”。租界当局恼羞成怒，又怕事态进一步发展引发更大变故，便于13日凌晨1时将孤军营的全体军官强行带离营地，转到外滩的中央银行软禁。

谢晋元于13日致函租界工部局：“自去年10月31日，由第三者要求我当局下令撤退，迄今九月有余，余等始终遵守法纪，毫无越轨行动。而撤退后，英国陆军当局及贵局曾允诺俟战事结束，即将余等送回本国政府。何以迟迟尚未实现？”接着又责问道：“第一，第三者要求撤退，因表现人类同情心，不忍见余等陷入绝境，其次枪弹横飞，顾念及租界中外人士生命财产之安全，今贵局收容余等是否本此意义？第二，余等亦非俘虏，绝非犯人，余等法律地位及私权是否完全丧失？第三，旗杆及升旗问题，业由何式总办等协议妥当，为何突用武力强行拆除，且被殴伤亡至百十一员之多？第四，13日晨1时贵局复派队将全部官兵移押此间，不知是何法律？”

事件发生后，租界内各界和群众团体都不断向工部局提出抗议和交涉，租界内不断出现罢工、罢市与罢课。同时国民政府也电谕在上海的英国大使寇尔务必妥为处理。在种种压力之下，租界当局无奈，只好将孤军军官送回，并遵从谢晋元提出的条

件，将抢去的国旗“披红挂彩，沿途燃放鞭炮”送回孤军营，抚恤死伤人员。18日租界工部局作出严惩肇事者，抚恤死难人员，而且不再干涉孤军营今后升旗自由的许诺。

升旗事件从表面上看，孤军取得了胜利，大长了中国人的威风，但实际上却使租界对孤军的态度开始转为敌视，最直接影响就是与看守孤军营的白俄士兵更是彻底交恶，使白俄士兵在诸如限制访客人数、对访客搜身等小事上大做文章，而且不时与孤军发生摩擦。1940年9月18日，白俄士兵在孤军营举行纪念大会时突然关闭正门，并对因此而无法进入孤军营而情绪激愤的群众喷射水龙头驱散，与群众发生冲突，1名放哨的白俄士兵米其亚可夫向孤军营内开枪，结果导致何玉湘中弹身亡——直到抗战胜利后，仍然在上海的米其亚可夫才被逮捕，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从这点上看，谢晋元确实是一名出色的



■ 八百壮士在孤军营里开展娱乐活动。

附录一：壮士悲歌——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纪实



■ 谢晋元（中坐者）和部下在孤军营。

军人，但却丝毫不会宣传或外交手段。孤军营中外瞩目，正处在“宣传抗战”的绝好地位，以四行孤军的巨大影响，只要对租界工部局进行灵活交涉，完全可以在租界发挥更好的作用。而孤军一味与租界当局强硬对话，使双方始终处在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上，这对生活在租界屋檐下的孤军显然是极为不利的。而白俄士兵敢如此放肆，要是没有租界当局的纵容与默许，是断不敢如此嚣张的。

1939年青年节前，谢晋元知道照例有大量访客来到孤军营，便在节日前秘密召集军官，对白俄士兵可能动武的情况预先进行了详细应对布署，甚至还在3月28日进行了演习。租界当局听说这个计划后，自然是相当紧张，在青年节当天，派一位与谢晋元交情颇好的英军少校来到白俄士兵休息室“以身为质”，白俄士兵也不敢难为访客。结果这天到访孤军营的群众约有700人，平静地度过了这一天。

租界当局对这支孤军显然头疼不已，1939年8月间盛传租界将向日军引渡孤军，显然不是空穴来风，蒋介石亲自指示外交部门与英美交涉，这才打消了租界的这一考虑。此后英国领事馆又提出让孤军以“难民”身份遣返大后方，谢晋元认为自己是军人身份进入租界，怎能以难民身份离开租界？因此予以拒绝，租界自然更不可能让孤军军容整齐地离开租界，所以只好一再拖延。

英雄不死

长期的软禁本身也是一种磨难，随着漫漫时间的消磨，孤军官兵在军纪上也逐渐松懈，在谢晋元的日记中就有多处对官兵的精神涣散感到懊恼的记载，1939年5月甚至发生十余名士兵在老资历的军士带领下当众羞辱排长的严重违纪事件，谢晋元为此集合全体官兵训斥了大半个小时。另外，谢晋元的日记中还有官兵早操只到三分之一，打霍乱预防针有百余人逃开，士兵在澡堂张贴纸条辱骂官长等事情，可见在幽禁岁月中孤军官兵的斗志和军纪都已经大为松懈。而谢晋元对违纪士兵的管教也比较简单粗暴，基本还是采取旧军队的体罚手段，如澡堂纸条事件，对犯案士兵就是“棍责数百”。日后刺杀谢晋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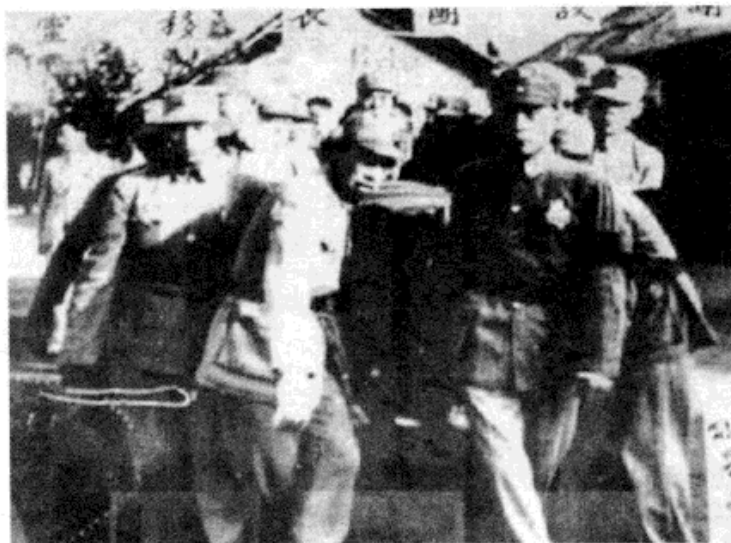
元的士兵之一张国顺是个兵痞，谢晋元对他曾亲自动手“击其数次”，但无可否认，在当时的军队中，体罚违纪官兵是军中惯例，谢晋元也自然难以免俗。但这也埋下了日后的祸根。

日军对谢晋元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宣称“不惜任何代价，必将谢团长劫到虹口，只要谢团长答应合作，任何位置都可给予”。继而又派日本浪人、汉

奸，怀揣武器，伺机闯入孤军营图谋暗害，但租界对孤军营戒备严密而未得逞。鉴于形势日益危急，谢晋元于1939年9月18日预立遗嘱，安排后事。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日军与汪伪政府都先后联络谢晋元，希望谢晋元能率部投效。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陈公博甚至亲自到孤军营劝说谢晋元，但均遭谢晋元严拒。在劝降失败后，日伪便开始策划对谢晋元下毒手。日伪设法通过关系买通孤军中的士兵郝鼎成、张文清、张国顺、张福忠等4人，这4人平时就经常因为违纪而被谢晋元体罚或处分，早就心怀不满，加上日伪的利诱，这4人终于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1941年1月31日，谢晋元饲养的白鸽被野猫咬死1只，这使其他的白鸽在严寒中都不敢再回到鸽巢，有2只幼鸽因此冻死。俗语云：



■ 上官志标（前右第一位抬棺者）和几名军官一起抬着谢晋元的棺材，前往墓地下葬。

“鸽逢家运，运好盛，运坏衰”，鸽子横死冥冥之中已经显露了不吉之兆。

1941年4月24日晨5时，孤军在操场集合准备早操，郝鼎成等4人故意迟到，没有参加跑步。谢晋元见到又是这4名经常违纪之人，于是当众痛斥。当大队跑远之后，郝鼎成等4人突然拔出匕首和洋镐刺向谢晋元，谢晋元猝不及防头腰两处重伤，血流不止。谢晋元身边的上官志标急忙上前救护，也被连刺六刀，重伤倒地（后被急送入仁济医院救治）。带队跑步的雷雄发现情况有异，立即带队赶回将4名凶手当场拿获。延至6时许，谢晋元终告不治，时年37岁。

噩耗传出，上海市民哀痛至极，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表达哀思。谢晋元遗体停放在孤军营临时搭建的礼棚里，从4月25日起的三天里，前往孤军营吊唁的中外群众就多达30

附录一：壮士悲歌——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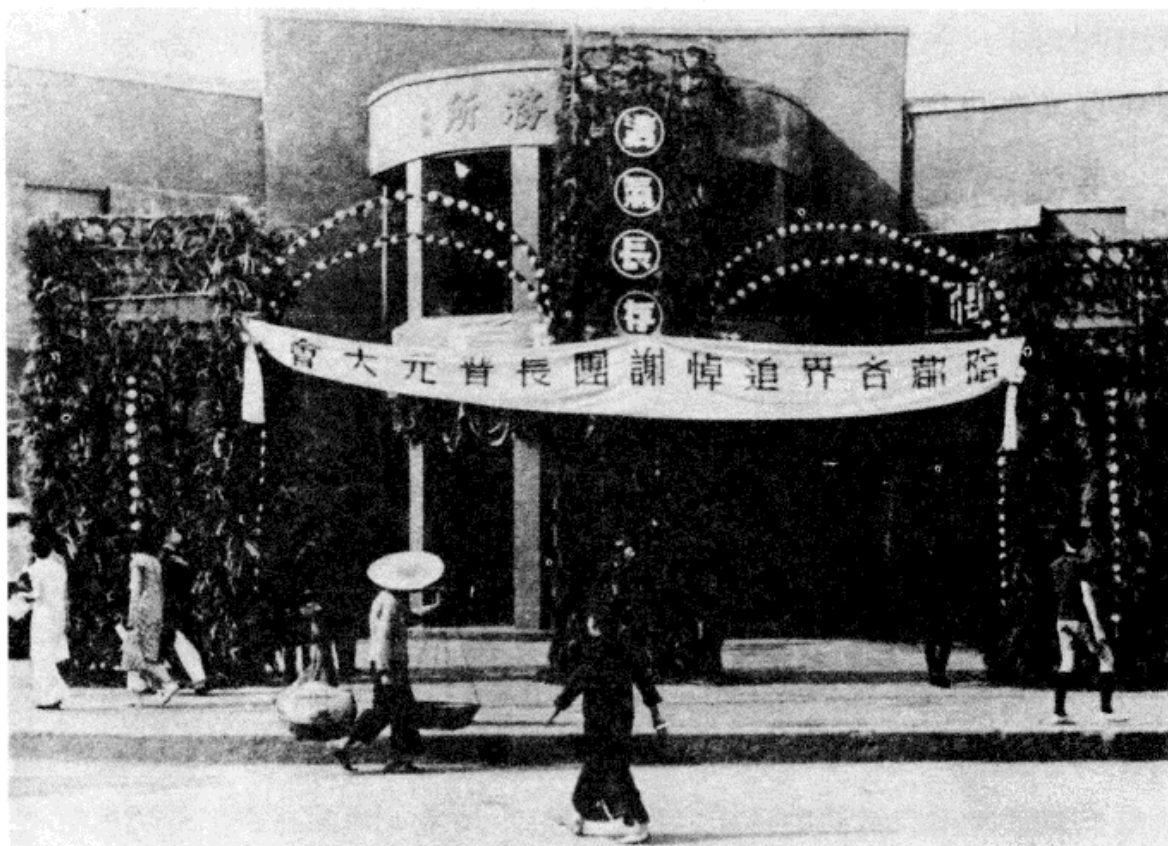
万人。

4月28日，蒋介石通电全国：“谢晋元同志之成仁，为我中华民国军人垂一光荣之纪念，亦为我抗战史上留一极悲壮之史迹。回溯该团长率领八百孤军坚守闸北，誓死尽职，守护我国旗与最后阵地而绝不撤退，其忠勇无畏之精神，已获举世之称颂。而其留驻上海孤军营中为时三载以上，历受艰难，尚能坚毅不移，始终一致。保我国民革命军独立自强之人格，此种长期奋斗，实较之前线官兵，在炮火炸弹之下浴血作战，慷慨牺牲，尤为艰苦卓绝，难能而可贵。此次被刺



■ 从4月25日起的三天里，前往孤军营吊唁的中外群众就多达30万人。

殒命，显为奸人久已蓄意，收买暴徒下此毒手。而我孤军营之忠勇官兵赤手擒奸，固绝不损其全体之荣誉，谢团长虽不幸殒命，然其精神实永留人间而不朽。谢团长不仅表现



■ 在重庆为谢晋元举行的追悼会现场。



■ 谢晋元墓地的墓碑。

我军人坚贞壮烈之气概，亦为我民族不屈不挠之正气代表。除已优予褒恤之外，甚望我全体官兵视为模范，共同景仰，以期无负先烈之英灵，而发扬我民族正气之光辉也。”

4月30日，举行盛殓大典，上官志标不顾伤势担任主祭，并亲自抬棺。谢晋元被安葬于孤军营宿舍前的小花园内。

5月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追晋谢晋元为陆军少将。

“河山破碎实堪伤，休作庸夫恋故乡。”中外报纸也纷纷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对谢晋元遇难表示哀悼，同时高度赞扬谢晋元奋斗到底的精神。

1947年，上海市政府将胶州公园命名为晋元公园，并将孤军营原址内的小学命名为市立第十二区晋元国民小学。在孤军营原址围绕谢晋元墓地建起的一带旧式里弄房屋则被当地居民称作“孤军园”。1983年4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因城市建设而将谢晋元墓迁至上海市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1984

年起，原孤军营周围旧式里弄相继被拆除重建，同年该处新建居民小区被命名为晋元里（今余姚路321弄）。

4名行刺的凶手被孤军抓获之后，孤军官兵悲痛之下，本打算当场寸磔这4名凶手，但被雷雄加以制止，表示要详细盘查凶手，以查明幕后指使。这4名凶手随即被看守的白俄士兵强行带走。不久租界法院对这4名刺客进行审判，孤军也派代表列席旁听。4名凶手均被判处极刑，并很快执行。日方并没有出面干涉，因为买凶杀害谢晋元本来就是干犯众怒的事，所以日方也希望尽早杀人灭口。

孤军结局

谢晋元殉国后，上官志标团附被送往医院养伤，孤军营官兵推举少校团附兼机枪连连长雷雄为代理团长，孤军继续依照谢晋元生前制定的各项制度生活。



■ 1984年起，原孤军营周围旧式里弄相继被拆除重建，同年该处新建居民小区被命名为晋元里（今余姚路321弄）。

谢晋元将军纪念碑文

谢将军讳晋元，字中民，广东焦岭人。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之役，国军以持久战略，诱敌深入，将军则奉命来，所部八百人坚守四行仓库。时间北正在劫火中，敌集精锐环攻，烟火蔽天，弹落如雨，历四昼夜，莫能克持。区市民咸惊敬鹜立，隔河向国旗遥拜，西桥亦有感至泣下者。租界当局以战区迫近，惴惴焉，惟虞波及，请求我最高统帅下令撤离。弗获已，始于十月三十一日晨二时退胶州路孤军营。四稔以还，风纪整肃，训练不少懈。旋又兼授工艺，卑归农后得自食其力，其卓识类如此。沪人往劳，辄以大久相勗辞语激扬，闻者动容。将军平日，恂恂有儒将风，善属文，居恒不离翰墨；横逆之来，又坚抗如铁石。以是益为奸徒所忌。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适循例早操，有营兵四人后至，将军方斥其违纪，刃已及身，中要害，遂愤志殉难。噩讯传出，举国震恻，各界往吊者途为之塞。

将军生于民国纪元前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其尊公发香尚健在，太夫人李氏已歿。德配凌维诚女士，生子二：长幼民，次继民；女二：曰雪芬，曰兰芬。将军曾肄业国立中山大学。十四年十二月入黄埔军官学校。十五年冬北伐时战于龙游、桐庐，身先士卒，当者辟易。十七年五月三日战于济南，数负创而报国之志弥坚。后历任排、连、营长、参谋主任及团附等职。沪战起，政府以将军守四行仓库有功，擢升团长，授青天白日勋章。遇害时，三十有七岁。以春秋鼎盛之年，当光明在望之际，虽未克参与反攻以争胜利，磅礴正气将与中国抗建史并垂不朽。爰为之铭。

保卫疆宇，血战玄黄，摧坚攻锐，我武威扬。孤军殿最，声蜚八荒，愤志没地，举国恻伤。四万万人同继起，雷霆成奋消冰霜。秋风烈，黄花香，四行遗迹扬芬芳。

施庆华敬书 中华民国三十年六月上海云飞、祥生、泰来、银色四行汽车司机企以敬立。

国民政府对谢晋元之褒扬令

中华民国卅一年五月八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谢晋元，并追晋少将。

陆军少将第八十八师团长谢晋元，致身戎旅，夙着忠勤，二十六年抗战军兴，日军以全力攻占淞沪，该团长率孤军八百守护闸北仓库，异常艰困。卒能坚定火移，始终如一，洵足保持革命军人之人格，为长期抗战之矜式。乃闻突遭狙击，竟至殒命，深感悼惜。应予明令褒扬，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用旌忠烈，而示来兹。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日军占领租界后，并不敢轻易为难孤军，因为日军最初是想能劝动四行孤军投效汪伪政权，从而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因此对四行孤军态度一直相当友善。

12月28日，日军将孤军转至宝山月浦机场旁的一处空置军营。据原机枪连2班班长李锦堂上士回忆，迁营是由日军一名宪兵大佐负责指挥，这名大佐对孤军官兵相当客气，甚至先在谢晋元墓前举指挥刀致敬，然后向孤军宣称改换营地只是为了让孤军“换换空气”，迁营时连行李都妥为安排代运。

孤军迁到月浦后，不但给养照常，而且日军也不随便轻侮孤军官兵。只有几个日本特工不断登门游说代理团长雷雄，尽管此时谢晋元已经去世，但他的高尚人格一直深深影响着孤军官兵，而且广大四行孤军官兵对自己的光荣地位也感到无比骄傲，即便面

对日军的屠刀，全体孤军官兵依然保持着气节，甚至一致同意在必要时效仿战国田横五百壮士，全体自杀殉国也绝不辱没四行孤军的威名。日军先是逼迫雷雄团长写信支持“和平运动”，但雷雄团长宣称不识字，坚决不写。日方仍不死心，认为孤军这种不妥协的态度主要是由于军官带头，于是派翻译直接给每名孤军士兵发问卷，问些“什么为什么要当兵”、“对移驻重庆国民政府看法”、“对南京汪政权的看法与认识”、“对中日战争看法”、“现在情况如何”、“将来有何打算”之类问题。孤军官兵经过集体讨论，决定每份问卷都填写一样的回答，不识字的官兵则干脆缴上白卷。针对日军的这些举动，雷雄组织了一次绝食以示抗议。

劝降失败后，日军便强迫孤军挖掘沪杭铁路宝山到上海段的护路沟，孤军颇有电影《桂河大桥》中英军战俘的风范，挖沟的

附录一：壮士悲歌——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纪实

效率特别好。但当日军要求提高工作量时，雷雄团长便予以断然拒绝。在挖路过程中，有2名士兵逃出集中营，而军统也在计划营救孤军，但被日军察觉。日军恼羞成怒，命令孤军官兵罚跪。孤军的几名军官当即表示抗议，宣称“既然称中日两军平等，那我们少了人应当向你们索要，岂有让我们罚跪之理……”搞得日军无法收场，只好让汪伪政府接手孤军。

汪伪政府为了藉孤军提高自身的声望，便将全体孤军官兵以“晋谒中山陵”的名义安排到南京，同时对孤军抵达南京大造舆论，还以小包车带孤军官兵参观南京市区，并发给大笔慰劳金。但是孤军全体官兵不为所动，无奈之下，汪伪政府于1942年3月将孤军官兵全部关入南京老虎桥监狱，整整8个月后才被转到南京莫愁湖畔监禁，并被强迫担任莫愁湖及周围河渠的挖泥疏浚苦工。疏浚工程让孤军官兵非常震撼，因为湖底沉积的不是污泥，而是在南京大屠杀中罹难同胞的尸骨！日后参加疏浚工作的官兵回忆，湖中的遗骸至少在万具以上。

素以残暴虐杀战俘著称的日军却始终不滥杀孤军官兵，因为日军深知四行孤军的价值，一直有意将孤军作为日后的谈判筹码。甚至在一次冲突中，一名孤军士兵将一个日军手臂打断，日军随即将整队孤军包围，架起机枪威吓。雷雄团长毫无畏惧，质问日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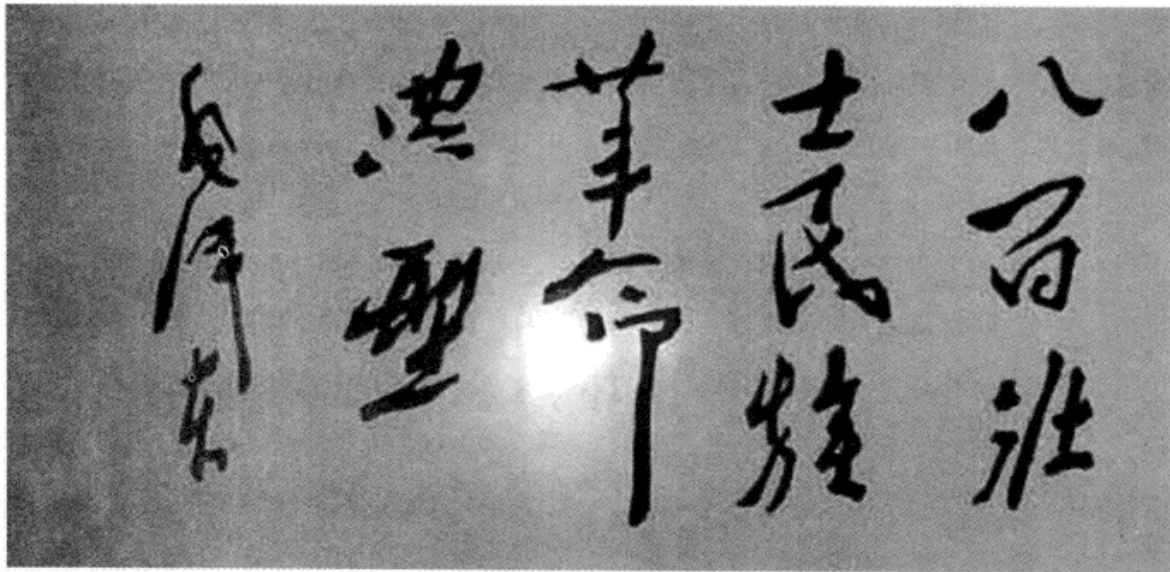
“我们不是战俘，为何将我们作俘虏看？”孤军的特殊地位使日军最终不敢大开杀戒，但日军也意识到这样长此以往必然会出事，所以决定将孤军分开监禁。

于是从1942年5月开始，日军将孤军分成六批，押往不同地方作苦工。

第一批约100人，被送到杭州西兴镇养马，其中15名士兵后来又被调到上饶。此时上饶地处前线，因此这15人在通信班班长刘益林指挥下抓住机会脱逃。日军只好将另外的80多人又押回南京监禁。

第二批36人，是从4个连每个连各挑选出身体健壮的9人组成，被押运到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Rabaul）。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新不列颠岛上的约1000名中国战俘被澳大利亚军队接管，编成中国军人大队。1945年年底中国军人大队被安排回国，36名孤军官兵中最后回到祖国的只有20人（另外14人客死异乡，1人被日军打伤致残，1人精神错乱而留在当地）。这批回国的战俘先是被安排在上海江湾音乐学校暂住，三个月后查明身份后发放抚慰金并安排退役。

第三批87人，其中包括雷雄代理团长。这批官兵被押送到安徽芜湖裕溪口装卸煤炭。这批孤军到达裕溪口后很快就了解到附近山上有新四军游击队，所以便组织了暴动逃亡，但最后到达游击区时只有雷雄等29人，其余的大多是在脱逃途中遇难或被日军



抓回，也有少数失散而下落不明。29名逃脱虎口的孤军官兵进入游击区后受到了新四军的热烈欢迎，后来辗转到了宣城，再经河南回到重庆。

第四批约70人，被转到孝陵卫的日本军官教导队。这批官兵到孝陵卫后就发现营地周围的电网没有通电，于是有9名士兵逃出。这9名士兵奇迹似地穿过半个中国，抵达重庆的88师留守处，愿意继续留营的在经过3个月集训后都被提升为少尉排长。

第五批约100人则一直在南京老虎桥、莫愁湖等地做苦工。

最后日军将仍在中国境内的孤军官兵再次集中，总共约200人全部转到上海，尽管这些孤军都是做苦工，但都受到很好的待遇，例如在上海龙华寺修路的一队孤军士兵甚至还有啤酒供应。1945年2月孤军组织了集体逃亡，其中有33名官兵在苏南的新四军游击队接应下获救，随后新四军护送这批官兵转移到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安徽立煌县，再回到重庆。抵达重庆后，这批孤军还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

第六批为36名军士和军官，其中包括1连连长陶杏春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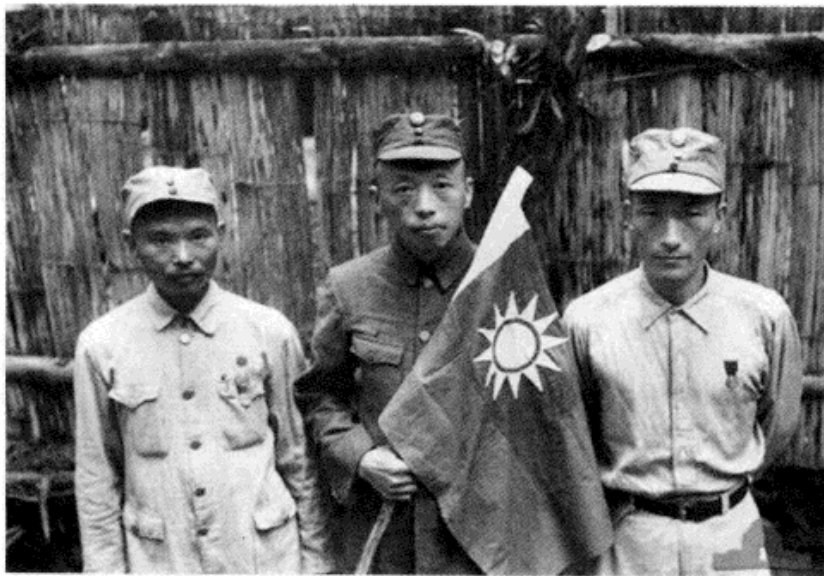
■ (上) 毛泽东为八百壮士的题词

■ (中) 国民政府发行的谢晋元纪念邮票

■ (下) 1941年谢晋元遇害后上海制造的谢团长纪念像章



附录一：壮士悲歌——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纪实



■ 抗战胜利后从日军战俘营里生还的八百壮士。

校、3连连长唐棣少校和汤聘莘少校医官，被送到新几内亚岛做苦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也由澳大利亚政府派军舰遣送回国，于1946年8月到达上海。

1937年11月撤入租界被羁押的四行孤军共377人，1941年12月日军占领租界前，有约40人因各种理由先后离营，这些官兵的下落已经无从查考，还有10多人在与白俄士兵冲突中遇难或病逝，因此被日军俘虏的孤军官兵约320名。在这320名官兵中，先后约有100人逃脱虎口，抵达大后方（其中可以确认的有：1942年初由月浦逃出的士兵姚连玉等2人；1942年5月由上饶逃出刘益林班长等15人；1942年11月由南京孝陵卫逃出陈德松等9人；1942年12月由雷雄团长率领从安徽芜湖裕溪口逃出29人；1945年2月由上海逃出卫士班班长景勘等33人）。另外，至少有100名官

兵在做苦工或逃亡中遇难。

送往海外的两批72名官兵中，第一批36人中仅20人生还，第二批36名军官军士倒是全体生还。抗战胜利时，包括由新几内亚、新不列颠两地回国的56名官兵，四行孤军此时总共还有170多人，军事委员会对所有能够找到的

孤军官兵都颁给忠贞奖章1座，并从优待遇，而在抗战时期逃回后方的孤军官兵更是多受到破格提升，如1945年2月由上海脱逃的卫士班准尉班长景勘在被确认身份之后立即由准尉班长直升上尉连长。

1942年底由芜湖逃出的雷雄团长抵达重庆后就提出恢复孤军团建制，但因为此时逃到大后方的孤军官兵人数太少而未能获准。雷雄与不少官兵因为原88师师长孙元良的关系先后到河南进入汤恩伯系统部队任职，雷雄1944年病逝于河南军中。

上官志标团附1942年3月被转到南京后因旧创复发送到无锡就医，在就医期间乘机脱逃，后任第三战区江苏保安第四纵队独立支队支队长。抗战胜利后由时任第三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孙元良介绍任第三方面军政治部第一科科长。1946年改任第一绥靖区政治部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科长兼督导团组长。1947年8月调任台湾省台南县兵役科上校科长，1967年9月病逝。著有《四行作战手记》。

忠魂永在

四行孤军八百壮士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2008年12月23日，网友“天竺道”在网络上发出题为《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抗日壮士遗骨在海外无人问津》的帖子后，立即引起了网上网下的高度关注。帖子里称在遥远的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在那个热带海岛国度的偏僻山坡上，有一千多名埋骨异域的中国将士，死无安宁栖所，其中就包括参加1937年淞沪会战中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谢晋元“八百壮士”的官兵——毫无疑问，这就是上文中提到的第二批被押到这里做苦工的36名孤军官兵中的死难者。

据发现这批荒冢的当地华侨透露，在拉包尔附近的这批中国将士坟墓，是一位前澳大利亚飞行员首先发现的。由于二战时期盟国与日本在当地曾有激烈战斗，很多战机一去不回，因此至今美国与澳大利亚

仍派人在当地寻找飞机残骸和失踪官兵的下落。这位飞行员在搜寻任务中意外发现了密林中有几座刻着中文的墓碑。这名华侨从澳大利亚飞行员嘴里得到消息，便付钱请土人带路，果然在山坡荒烟蔓草间找到三座中国军人墓碑，其中两个还能辨识碑文，分别是陆军67师200团的上尉吴坤、陆军新30师上士孔宪章，另一座则因破坏严重而难以辨识，死亡时间都是1945年。显然他们都是抗战期间被日军送到当地当苦工而客死异域的中国战俘。根据澳大利亚的档案资料，当年接管拉包尔的澳军报告，先后有约1600名中国战俘被送到这里当苦工，在战俘营里有653人死亡，抗战胜利时还约有1000人幸存，1946年由美国海军派船分批送回国。当年曾在战俘营里担任过翻译的当地华侨张荣熙回忆，这



■ 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处偏僻山坡上，有一千多名埋骨异域的中国将士，其中就包括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壮士。

电影《八百壮士》

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事迹广为传扬之后，激起了文艺界的创作热情。1937年11月著名剧作家田汉、陈白尘创作的舞台剧《八百壮士》在上海公演，即受到极大欢迎。

1938年7月，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黑白片《八百壮士》，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王士珍摄影，袁牧之、陈波儿主演，片长53分钟，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中较为著名的一部，其中女童子军冒死为壮士们送国旗的情节，极具感染力。影片上映时“观众拥塞于途，购票不可得”。看过这部电影的“莫不兴奋异常”，纷纷表示：“我们今天看了八百壮士，我们敬仰他们的气节，崇拜他们的勇敢，我们要以他们的精神来保卫大武汉！”《新华日报》认为这部影片：“气壮山河，节风千秋，悲壮激昂，可歌可颂！”该片除了在大后方引起轰动外，在香港、菲律宾、缅甸等地放映也引起热烈反响，在法国、瑞士召开国际反侵略大会时也曾放映该片，极大宣传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抗战精神。

1975年台湾“中央”电影公司拍摄彩色电影《八百壮士》，丁善玺导演兼编剧，柯俊雄、林青霞、徐枫领衔主演，片长112分钟，该片获得亚太电影节最佳电影、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金马奖最佳发扬民族精神特别奖。与《英烈千秋》、《梅花》、《笕桥英烈传》并称为台湾四大抗战经典影片。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 2005年7月八百壮士幸存者之一的杨养正来到四行仓库故地重游。



■ 2005年，八百壮士幸存者郭兴发、王文川在上海见面。

些幸存战俘在回国前曾与当地华侨一起修建过一座公墓，总共安葬了259位在拉包尔战俘营里死难的官兵遗骸。但数十年来，这座公墓年久失修，逐渐荒芜。加上后来拉包尔市区毁于火山爆发，当年知情的华侨也大多迁居澳大利亚，因此几乎已没有人再记得这些埋骨他乡的忠魂。

2009年2月28日，台湾军方派出的专案小

组抵达拉包尔，随即进行了11天的勘探、清点和抄录姓名，并在现场举行简单的招魂仪式。据带队的台湾后备司令部留守业务处处长任全森透露，在迎灵过程中冥冥之中似有天意，使整个工作顺利完成。由于1月底刚发生过近年来最大的火山爆发，所以道路全被厚厚的火山灰覆盖，原本还准备推迟行程，不料出发前一天，天降豪雨，将火山灰全部冲掉。而到了预定行程之日，又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使专案小组顺利成行。同时也因为这场豪雨，使土质变软，挖掘工作非常顺利。

当专案小组开始抄录名册时，墓碑上的文字因为经过60年的风雨侵蚀，早已难以辨别。于是小组成员在心中默默祷告：“前辈们，如果你们不想默默无闻地乱葬异域，就让我们带你们回家吧。”说来奇怪，这番祷告后，原本阴暗的天空突显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碑文上原本难以分辨的文字居然清晰地闪现而出，使小组成员能够将554个碑文（其中82个无名碑）都抄录完后，碑文又再恢复到原先难以分别的状态。这个奇异的现象，给小组成员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3月7日，专案小组带着忠魂牌位返回台湾，在台北中正机场举行简单的军礼迎灵仪

附录一：壮士悲歌——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纪实



式后，便安放于大直忠烈祠。台军发言人虞思祖表示，将在3月29日台湾春季祭祀大典当天，为忠灵在大直忠烈祠举行隆重的人祀仪式，以表达对这些殉职官兵最崇高的敬意。

就在本书写作之时，正逢这样一个新闻事件，或许我们可以引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老兵不死，他们只是悄然隐去”（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他们的忠魂永在，他们的精神永在。



- （左上）八百壮士幸存者之一郭兴发。
- （左下）2009年刚被确认身份，但四天后就去世的周大发。
- （上）八百壮士幸存者之一王文川。

2009年尚在人世的八百壮士

目前在世的八百壮士有3人：

现居重庆的杨养正，原籍湖北随州，当年任1连3排少尉排长，在撤出四行仓库时负责断后，在战斗中重伤失去左眼，94岁；

现居上海的郭兴发，原籍河南商丘，当年是1连1排的机枪手，93岁；

现居北京的王文川，原籍安徽寿县，当年是机枪连的重机枪手，91岁。

另外，最令人唏嘘的是南京的周大发，原籍湖北监利汪桥镇，当年是2连步兵下士。2009年3月27日周大发的身份才刚刚被发现，引发媒体和社会关注。4天后的3月31日，就因病辞世，享年96岁。

附录二： 淞沪会战中 中日两军 轻武器简介



手枪篇

王八盒子

这是二战时期日军装备的一种制式手枪，在日军中装备极为广泛，从将军到士官，从步兵到炮兵、工兵、装甲兵等各个兵种，以及海军和空军都有装备，几乎是日军手枪的标准性装备。它的正式名称是南部十四式8毫米半自动手枪，南部是设计师南部麒次郎，因为研制成功定型是在1925年，正是日本大正十四年，故名十四式。因为设计者独出心裁地将备用子弹盒和枪套合二为一，把备用子弹盒缝在枪套上部，这样枪套盖的扣就只能安装在枪套下部，为了盖住枪



■ 南部十四式手枪枪套。“王八盒子”因此得名。



■ 南部十四式8毫米半自动手枪。

套和备用子弹盒，只得将枪套盖加大，最终成为类似于乌龟壳形状的圆形硬壳枪套盖，因此被中国军民形象地称为“王八盒子”。

这是南部在南部陆式8毫米半自动手枪的基础上参考很多欧洲国家自动手枪改进而成，如自动方式模仿德国毛瑟手枪的通过锁定阻块的短后坐式，后拉式枪机借鉴了奥地利8毫米M1907式罗思-斯太尔手枪，而握把保险则是克隆了德国7.65毫米鲁格手枪，因此也



■ 南部十四式外形和德国鲁格手枪相像，因此也被称作亚洲版鲁格。

曾被人称为亚洲版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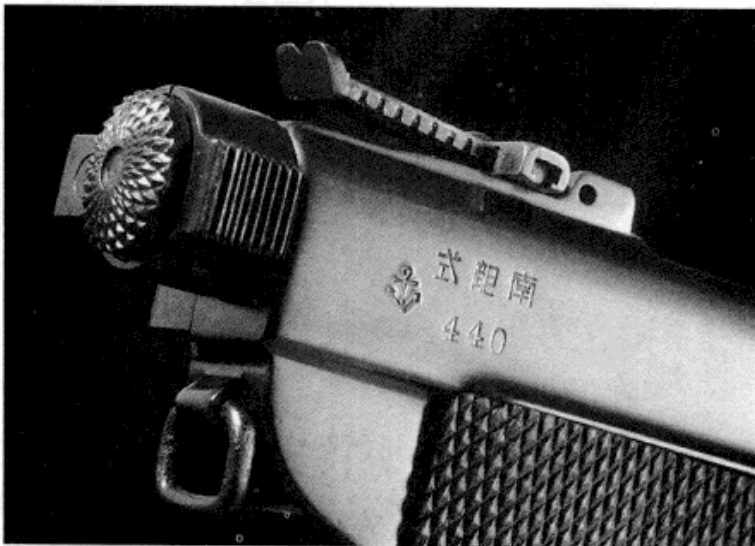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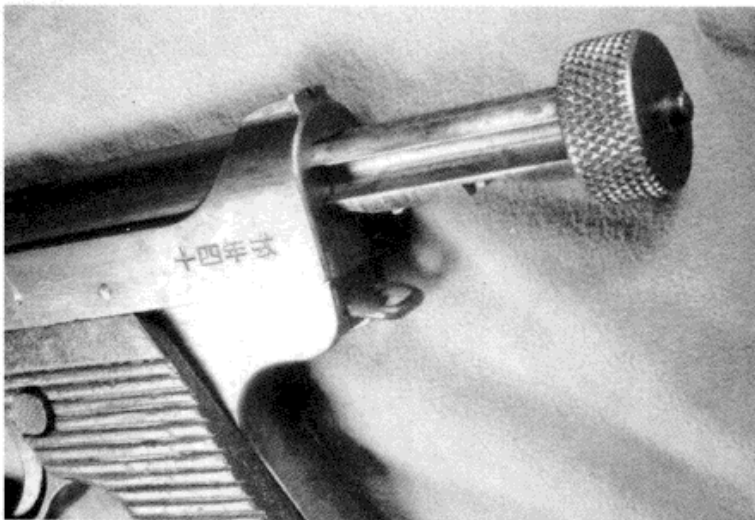
“王八盒子”的造型布局，基本模仿了鲁格手枪，充分考虑了手枪射击时的指向性这一重要的人机工程问题。其握把与枪管轴线之间的夹角设计为 120° ，故在紧迫局面仓促出枪射击时，可以握枪手食指指向物体的习惯开枪，有效提高手枪的战斗反应时间和射击精度。这种造型布局，使“王八盒子”的重心基本上处于掌心位置上，而且瞄准基线长达200毫米，精度较高。特别是其细长的

枪管，对瞄准的导向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因此，“王八盒子”的射击精度，在当时世界各国的手枪中，算是比较优秀的。同时在整体结构设计上，比以前的日式手枪简化了很多，结构更为紧凑简单。特别是摒弃了南部陆式手枪左置复进机和可调式照门的设计，采用沿枪机两侧布置复进簧和固定式照门，既简化了结构，减轻了质量，减少了宽度，更增强了全枪的对中性，有助于提高枪的射击精度。

附录二：淞沪会战中日两军轻武器简介

除了精度较高外，“王八盒子”就几乎再无长处了。早期的“王八盒子”毛病很多，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击针的设计存在重大缺陷，在使用中经常发生击发无力和击针折断等问题，特别是在高寒气候中，由于击针上涂抹的润滑油粘稠度增加，问题更为严重。因此不得不给每支手枪都随枪多配一根击针，放在枪套下面的备份弹盒中，以备更换。直到1932年改进设计的击针才全部取代了早期的击针。

由于早期“王八盒子”在卸下弹匣之后，弹膛内还会留有一发子弹，很多人会有取出弹匣就是安全的错觉，导致发生很多走火事件。所以南部1934年在对“王八盒子”改进设计中采用了勃朗宁-塞维手枪的弹匣保险结构，即只要弹匣向下抽出三四毫米时，扣动扳机就无法击发，从而避免了卸下弹匣还能射击从而导致走火的问题。



■ 南部十四式后部特写。





■ 南部十四式分解图。

早期的“王八盒子”没有考虑在高寒地区射手要戴着手套使用，扳机护圈过小，戴手套伸进扳机护圈难免触动扳机发生走火。因此在改进中特别加大了扳机护圈。

最初“王八盒子”采用德国鲁格手枪的弹匣和弹匣扣结构，可以实现单手退弹匣。但“王八盒子”的弹匣扣比鲁格略向前倾，低于握把护板平面一点点，就是这一点点的差距，使“王八盒子”出现容易掉弹匣的毛病。改进时只好在握把的前下部，增加了一个弹匣防落簧，在弹匣前下部的相应位置上，增加了一个缺口，以配合弹匣防落簧阻止弹匣脱落。这样按下弹匣扣，弹匣向下

脱出三四毫米，就被弹匣防落簧阻止，如果确实是更换弹匣，就再用另一只手将弹匣拔出。这样一来，单手退弹匣的优点就完全消失了。

“王八盒子”射击精度高，近距离杀伤力较大，但距离一远子弹就乱飞，而且穿透力很弱。此外该枪故障率很高，必需严格保养才能保证可靠性，否则击发后容易出现第二发子弹上膛不到位的现象，导致射击停顿。几乎可以这么说，“王八盒子”只能对付手无寸铁的百姓，作为战斗手枪实在太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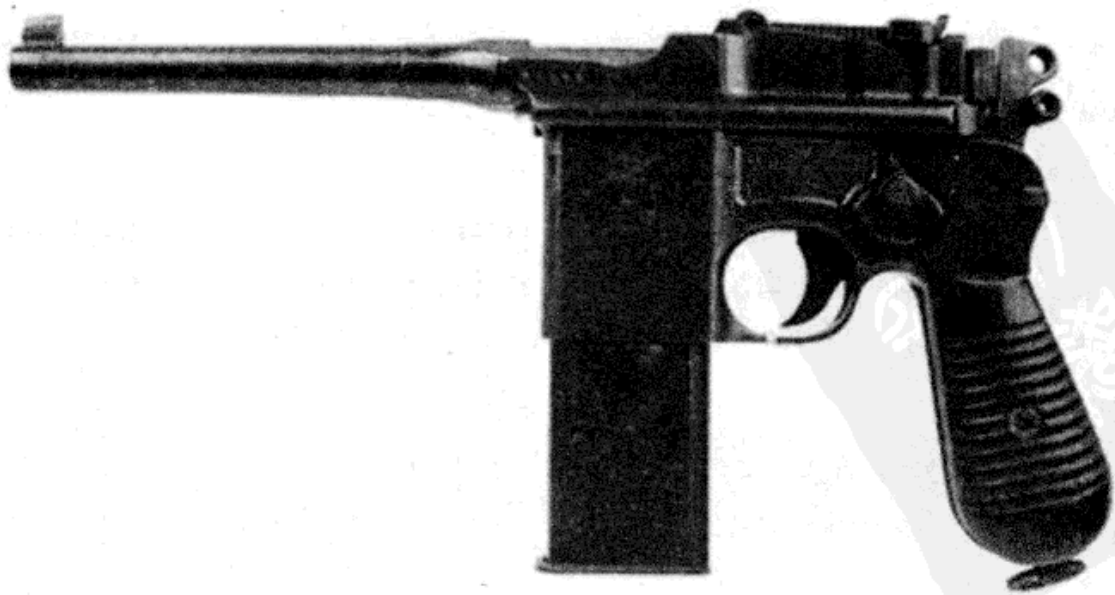
驳壳枪

驳壳枪的正式名称是毛瑟军用手枪（Mauser Military Pistol）C96型，其实驳壳枪是德国毛瑟兵工厂的非德勒三兄弟（Fidel, Friedrich, and Josef Feederle）在工作闲暇之余发明的，而毛瑟作为企业主申请了专利，于1896年开始正式生产，所以叫毛瑟C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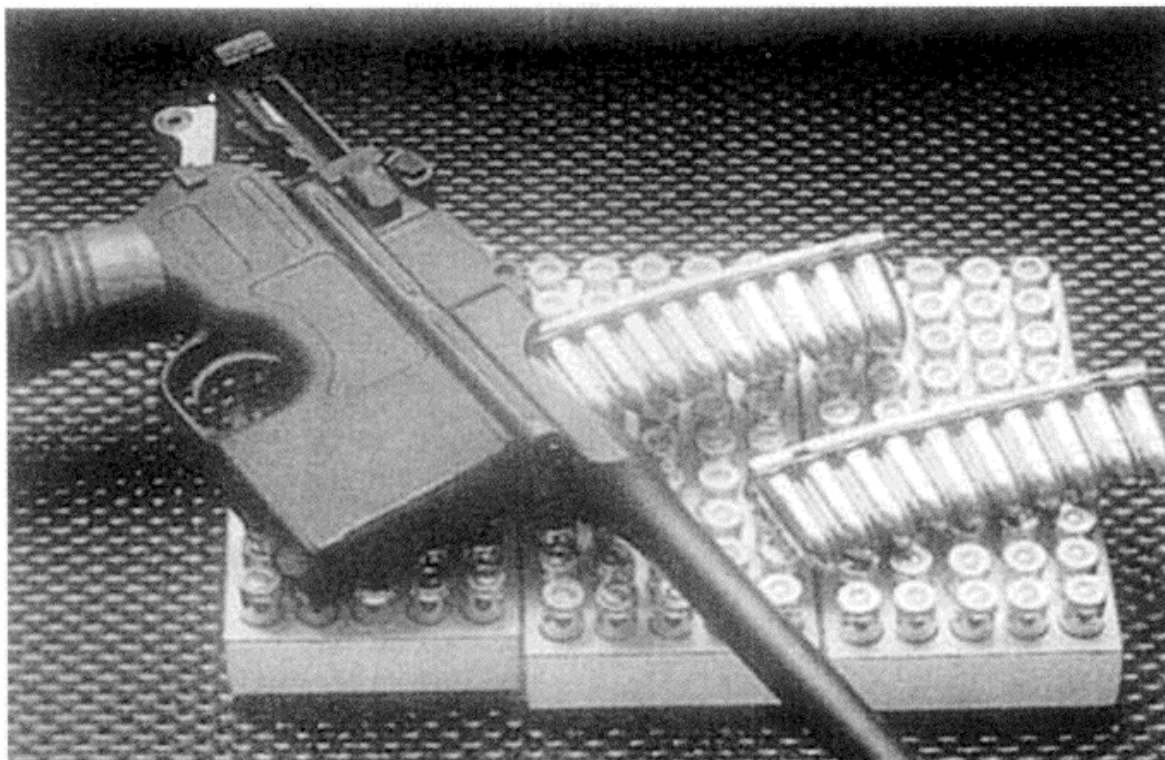
毛瑟C96在1908年与著名的鲁格手枪竞争德国陆军制式手枪中落败，但毛瑟C96却是一种最典型的园里开花园外香，在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和青睐，仅从五花八门的别称中就可见一斑。早期最正式的中文通称是“自来得”；由于枪套是一个木匣所以也叫“匣子枪”；由于木制枪套可以接在枪把手上作为枪托进行抵肩射击所以叫“盒子炮”；因

为“盒子”的英文叫“BOX”，所以音译为“驳壳枪”；因为配备20发大弹夹则被称为“二十响大肚匣子”；因为枪身宽大，机头大而圆，机匣两侧无任何凸起与铭记光滑如镜，因此被称为“大镜面匣子”；有全自动功能，可以单发可以连发，因此称作“快慢机”……简直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自从1912年毛瑟手枪传入中国后，立即受到国人几近狂热的追捧，不管是正规军，还是游击队，也不管是保家护院的保镖卫士，还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豪杰，都以能拥有一支毛瑟手枪为荣，甚至不少高级将领也是以毛瑟手枪作为馈赠的上选礼品。在中国，不论是毛瑟手枪装备的数量，还是毛瑟手枪效能发挥的程度，都是其它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相比的。据不完全估计，从各种渠道进



■ 国人皆知的大名鼎鼎的驳壳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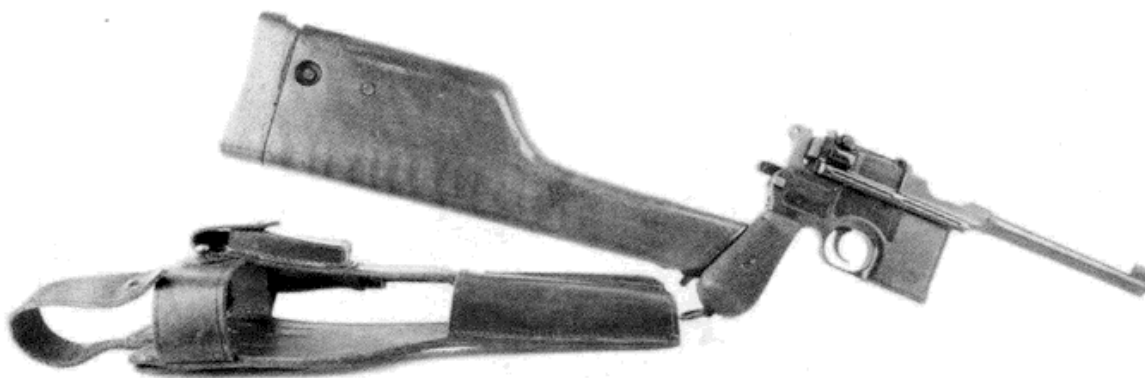


■ 驳壳枪可装20发大弹夹，也被称为“二十响大肚匣子”。

入中国的德国造和西班牙造的毛瑟手枪不少于30万支，而中国仿制的数量则约有10万把。因此到后期，德国和西班牙生产的毛瑟手枪主要就是出口到中国，而质量上乘的德国和西班牙的原产货为了体现自身的价值，甚至在枪上用汉字刻上“德国制”。此风一开，一些别的国家，包括一些中国的小兵工厂也在自己生产的仿制品上同样刻上“德国制”，从这三个字上，也可以看出毛瑟手枪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

从1921年开始，汉阳、青岛、太原、沈阳、大沽、长沙等11家正规的兵工厂先后进行仿制，除这11家兵工厂外，还有更多的小型兵工厂、修械所甚至是手工作坊都有仿

制，无论是生产的厂家，还是生产的数量，都已无法统计。而毛瑟厂从1896年开始生产到1939年停产，总产量约100万支，其他国家的仿制数量更是高达数百万支，但却没有一个国家将毛瑟手枪作为制式手枪，主要是因为毛瑟手枪作为手枪尺寸太大，而作为冲锋枪威力又小了点，有点处在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特别是连续射击时枪口上跳，从第二发子弹起，就会越打越高，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另外价格过高也是一大原因，当时一般的手枪单价不过七八美元，而毛瑟手枪的价格一般是25美元，相当于别的手枪三四倍。手枪装备部队动辄就是上万把，因此价格因素是各国不得不考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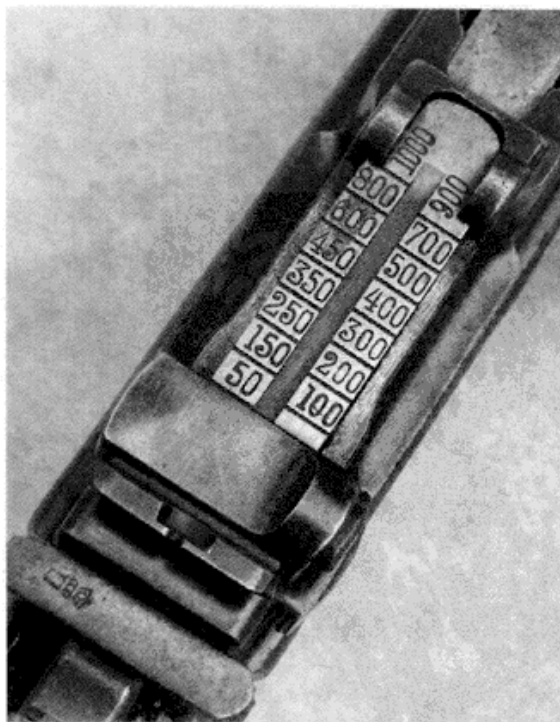


■ 驳壳枪特有的木匣可以安装在枪把上，从而可以进行抵肩射击，当成冲锋手枪来使用。

但在中国，毛瑟手枪的装备数量相当惊人，还出现了全部装备毛瑟手枪的手枪营、手枪团甚至手枪旅，几千人的部队清一色装备毛瑟手枪，实在有些令人瞠目结舌。毛瑟手枪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受青睐，一方面主要是中国军队自动火器严重不足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由于军工生产的落后和列强对中国的军事禁运，一直到抗战结束前，机枪和冲锋枪等自动火器在中国军队中的数量一直很少，而驳壳枪却可以半自动发射，10发标准弹夹的容弹量也比普通步枪多一倍（如果是20发弹夹则要多三倍！），自然成为近战时令人生畏的自动火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手枪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之列，而具有自动火力的驳壳枪自然更是上上之选了。也正是因为这两大原因，使得毛瑟手枪在中国其作用被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一个经典，一段传奇。

中国人在使用毛瑟手枪的大量实践中，还有一个极其聪明的发明，就是在用毛瑟手

枪进行连发射击时，将枪身翻转90度，使枪身平放，这样连发射击时，子弹就会借着枪管沿枪身轴线的上跳，很自然地形成一个扇面横扫出去——令西方人伤透了脑筋也没有解决连发枪口上跳的难题，被中国人轻轻地转动了一下手腕，就轻轻松松解决了。另外，一些优秀射手常常会磨掉准星，使拔枪



■ 表尺特写。



■ 驳壳枪装弹是由上至下将子弹压入膛内。

更为迅速。而因毛瑟手枪枪管长，瞄准基线长，所以很多优秀射手根本不用准星瞄准就能轻而易举击中200米外的活动目标！

驳壳枪的外观几乎堪称艺术品，远看是深黑色的，但当你把枪拿在手里端详的时候，由于光线的变化，全枪的色泽呈现晶莹剔透、黑里透蓝。而在枪的局部，还有机体、发射机组件、表尺板以及扳机上的自动发射凸笋等几处银白色点缀其中，使全枪呈现出一种明快的动感。从全枪看来，银白色的枪机与蓝黑色的抽壳钩、银白色的表尺板与蓝黑色的游标和表尺分划、银白色的击锤与蓝黑色的保险机柄和机匣，既有鲜明的反差，又有内在的协调。跳跃的点缀与总体的沉稳相呼应，令人心生赞叹。

密集的火力和威猛雄壮的外型，使驳壳

枪最终成为了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中的佼佼者——德式师的制式装备，仅1938年1月至3月，国民政府就分两批从德国购进毛瑟手枪共5万支。中国进口的德制驳壳枪主要有5个型号：M1896式7.63毫米毛瑟手枪、7.63毫米警用型毛瑟手枪、M1912式7.63毫米毛瑟手枪、9毫米毛瑟手枪和M1932式7.63毫米毛瑟冲锋手枪（又称“712”式）。此外还有西班牙的阿斯特拉（也称为星牌）、皇家手枪和MM31手枪。阿斯特拉手枪中又有M900型、M901型和M902型三种，容弹量有10发和20发，且有单发和连发之分。皇家系列手枪中亦有单发和连发以及长、短管之分。因此毛瑟系列手枪在中国的种类竟达20余种之多。

驳壳枪的外形独特，方形枪身，细长枪管，圆形握把，弹匣位于扳机的前方，从外

王八匣子与驳壳枪性能对比

	王八匣子	驳壳枪
口径:	8毫米	7.63毫米
枪全长:	230毫米	288毫米
瞄准基线长:	695毫米	230毫米
枪全重:	0.91公斤	1.16公斤
枪管长:	117毫米	132毫米
膛线:	4条右旋	6条右旋
膛线缠距:	200毫米	200毫米
枪口初速:	290米/秒	455米/秒
表尺射程:	600米	1000米
有效射程:	60米	150米
装弹具:	8发弹夹	10发弹夹或20发弹夹

形上极易辨认。采用管退式自动原理，发射后枪机和枪管一道后坐，运动2.5毫米后，枪机脱离枪管继续后坐，完成拉壳和抛壳，然后在复进簧的作用下复进，推弹入膛，完成一个循环。闭锁方式为闭锁卡铁起落式，弹匣供弹，枪管内刻有6条右旋膛线，并首次采用了空仓挂机机构。这些使毛瑟手枪的功能比其他同类手枪更为完善。而在中国，直到40年代后期，由于冲锋枪的装备数逐渐增加，毛瑟手枪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王八匣子PK驳壳枪

其实这两种手枪的对比已经没有什么意

义了，一种是臭名远扬，另一种则是备受推崇。无论是外形还是性能，王八匣子几乎全都落在下风，王八匣子根本算不上是一种战斗手枪，只能对着手无寸铁的平民逞威风，而驳壳枪却已经具备了冲锋枪的某些作用，两者根本就不是处在同一水平线之上。

可以用使用者的态度来做一番比较，就连一向缺少武器的八路军新四军，即使缴获到了王八匣子通常也是交给地方部队或侦察人员使用，战斗人员几乎很少使用。而拥有驳壳枪则几乎可以说是每一个战士的梦想，在实战中，往往到了关键时刻，投入战斗的敢死队员的标准装备就是一把大刀、一支驳壳枪外加几颗手榴弹！

步枪篇

三八大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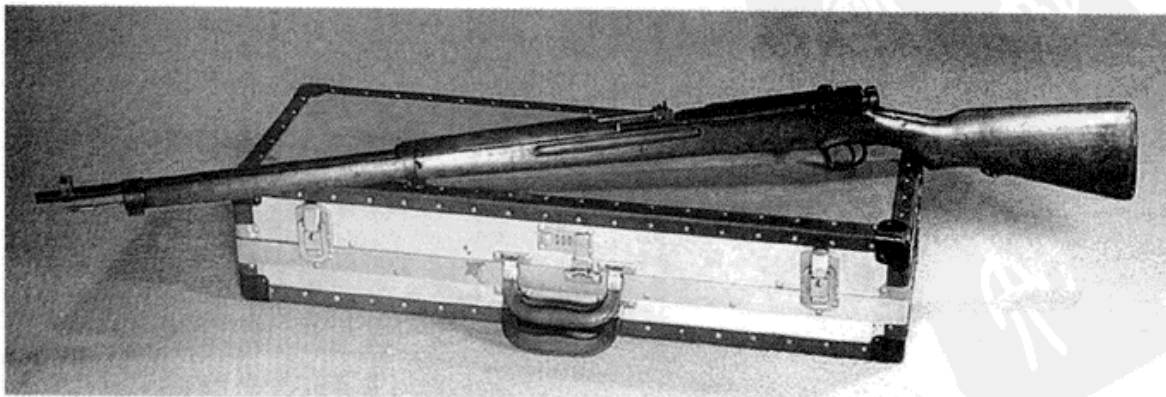
一提起抗战中的日本兵，人们肯定首先就会想到“三八大盖”，“小日本，大盖枪”的说法几乎是家喻户晓。那么“三八大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步枪呢？

“三八大盖”的前身是三十年式步枪，这是日本所装备的第一代制式步枪，因为在枪机机尾后端设有一个钩状部件以便于操作保险装置，因此通常被叫作“金钩步枪”。

日本根据三十年式步枪在日俄战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由日本著名的枪械设计师南部麒次郎大尉——“王八盒子”（日本十四年式手枪）和“歪把子”（日本十一年式轻机枪）的设计者负责主持对其进行了全面改进。改进后的新枪于明治三十八年（公元1905年）研制成功，故定名为三八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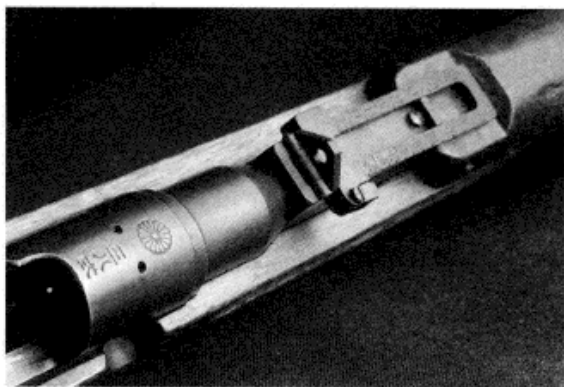
因为三十年式步枪的总设计师是友坂成章，三八式又基本沿袭了三十年式，所以日军对该枪的正式编号是友坂三八式。三八式步枪与三十年式步枪在外观上最显著的不同，就是三八式在机匣上方增设了一个“∩”形的防尘盖，这个防尘盖可随枪机前后滑动，当枪机呈关闭状态时，防尘盖便将整个机匣完全盖住，可以有效防止沙尘进入机匣。因此三八式步枪就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三八大盖”。

“三八大盖”对于“金钩步枪”最大的改动之处，就要数枪机了。“三八大盖”的枪机结构是当时世界上结构最简单、分解最简便、零部件最少的，将其前身最显著的特点——“金钩”取消了，把机尾部件的保险机改成一个滚花的扁圆柱体，既不会钩挂服装、装具，又便于射手操作，特别是便于在



■ 日本三八式步枪，俗称“三八大盖”。

附录二：淞沪会战中日两军轻武器简介



■ 日本三八式步枪表尺特写。

严寒条件下士兵戴着大手套操作。此外，枪机栓体上的拉机柄头，采用了独特的椭球体而不是传统的圆球体，也是为了提高在严寒条件下戴大手套时的便利——如此重视在严寒条件的使用，可见日俄战争中在中国东北的严寒给了日本人怎样的深刻印象！

“三八大盖”的机匣上方和右侧各有一道纵向沟槽，用来安装和规正其独特的“大盖”——防尘盖。在防尘盖的后端，有一个供拉机柄穿过的方形孔，当枪机拉开时，防尘盖随枪机一同向后滑动，打开机匣的装弹/抛壳口和弹夹导槽，以供射手向弹仓内填压枪弹以及完成抽、抛弹壳动作；当推枪机时，防尘盖又随枪机一同向前滑动，直至完全封闭机匣，完全阻止了泥沙、尘土进入步枪的核心部位。这一点是世界各国步枪都绝无仅有的，由此带来的战术技术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使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也不失为点睛的妙笔。“三八大盖”之称也是由此而来。这个防尘盖，却真切地反映出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本本土气候湿润，植被覆盖好，所以很少有沙尘，因此日本设计的步兵武器，几乎不考虑防尘能力。但自从甲午战争后，日军领教了中国华北特有的沙尘，步枪武器经常卡壳，所以在三八式步枪上特别加装了防尘盖，可以说，“三八大盖”就是为了侵略中国而专门设计的。

“三八大盖”全枪长1275毫米，是二战时期各国军用步枪中最长的，比苏联红军的莫辛纳甘1891-30式7.62毫米步枪还要长43毫米。但从外观上看，全枪纤细紧凑，视觉上似乎还是莫辛纳甘更长一些。“三八大盖”的枪管长769毫米，也是二战时期各种步枪中枪管最长的。枪管内部有4条右旋膛线，为了追求射击精度，膛线导程确定为200毫米，这是同时期各种步枪中最小的，因此弹头转速高，飞行稳定性好，命中精度高。“三八大盖”命中精度高，瞄具自然功不可没。准星为“Λ”形，用燕尾槽与准星座配合，可以横向调整，后期生产的还加装有准星护翼。

“三八大盖”的表尺，与一般步枪的板状弧形表尺不同，它是一个可以立起的“框”式表尺，上面有3个砧孔照门（其中表尺框板上有2个，游标上有1个），相应地可以适用于300米以内、500米以内和500米以外。“框”式表尺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优点，就是当在50米至100米距离（也就是步枪战斗使用的最密集射程）时，可以竖起表尺框，并把目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标与准星同时套在立框之中，作概瞄快速射击，只要进行过一定训练，这样的概瞄快速射击枪命中基本不成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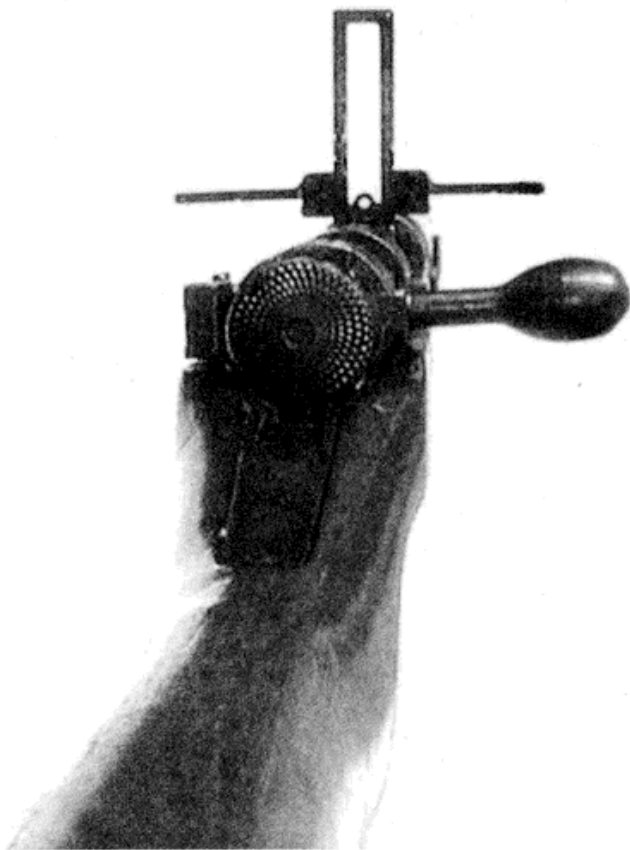
“三八大盖”的缠距是二战各国主要步枪中最短的，只有200毫米，所以子弹的旋转速度高，飞行稳定性好。虽然子弹的初速也差不多是同时期各型步枪中最小的，但其射击精度却是最棒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弊的，正是由于过于强调子弹的飞行稳定性，也带来了该枪停止作用的降低，不过对“三八大盖”杀伤力弱的论点由于种种原因，还是存在误区，至少在400米距离之内，

“三八大盖”还是具有相当的威力，只是在400米之外，才多为贯穿伤，这是要一分为二来看的。

“三八大盖”的表尺射程高达2400米，有效射程600米。实战中训练有素的日军士兵往往能在800米距离上准确地命中目标，这个射程几乎已经和今天大多数狙击步枪的射程相当！加上“三八大盖”使用的6.5毫米半边缘尖弹，具有非常稳定的飞行状态和完美的弹道，如果在优秀射手手上，可以在很远的距离精确击中目标。实战中“三八大盖”在2000米距离命中目标的实例也并不少见，要

知道即使在今天12.7毫米大口径狙击枪射程也不过1500米，“三八大盖”的射程远精度高，由此可见一斑。

“三八大盖”的弹膛正上方，有两个泄气孔，粗看似乎没有多大用处，其实这两个泄气孔可以在枪机开锁的瞬间，与枪口形成一个与现代坦克炮抽烟筒作用类似的气体拉动力，极有利于弹膛的冷却。



■ 照门特写，只要将目标和准星同时套在立框里就可进行概略快速射击。

附录二：淞沪会战中日两军轻武器简介

弹仓与德式毛瑟步枪相比，多了一个弹罄提示，即当最后一发弹壳被抛出枪外之后，枪机的机头即被弹仓的托弹板挡住，无法继续前推枪机，以此告知射手子弹打完了！这个类似于现代枪械的“空仓挂机”功能，在实战中的意义不言而喻是非常重要的！“三八大盖”的弹仓底盖结构，卡笋在扳机护圈前缘内侧，用拇指向前按压，不需要借助工具，就可以很方便地卸下弹仓底盖，非常方便和安全。“三八大盖”的枪托从人机工程的角度看，无论纵向尺寸、枪颈握围以及枪托厚度和倾斜夹角，还是造型圆弧过渡、粗细过渡以及托底板的设计和枪背带环的位置等方面，都非常适合亚洲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体形，使用起来包括据枪、端枪、托枪、背枪以及拼刺等等动作都感到比较舒适。从加工生产方面讲，“三八大盖”的枪托和下护木虽然也是一个整体，但却是由两块木材制成。其中，枪托的上半部分和下护木是由一条长条木材制作，而枪托的下半部分则由一小块三角形木材拼接。仅此一项，就可以节约大量的木材。这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木材资源缺乏，又需要大量制造武器的国家来说，意义可想而知。

“三八大盖”配装的刺刀也是极具特色，众所周知，日本的刀剑打造技术和工艺水准一直很高。加上深受武士道精神的熏陶，非常重视白刃格斗，因此对于刺刀是非

常重视的。刺刀采用单刃偏锋样式，全长500毫米，其中刃部长400毫米，全重0.5公斤，可以在所有日本制式步枪以及九六式轻机枪上通用，还可以直接握着刀柄当短剑用。刺刀的钢口质量极高，与二战时期各国装备的主力步枪刺刀进行对比试验，“三八大盖”的刺刀刚度最好，是在对比试验中惟一不卷刃、不崩口的刺刀。

“三八大盖”实际上是一个枪族，在设计三八式步枪的同时，还设计了三八式马枪，这款马枪除了枪管比步枪短306毫米，背带环位置在枪身的左侧，上护木从头箍一直覆盖到表尺座处以外，其他机构与步枪完全相同。马枪比步枪更短小，重量也更轻，以便于骑兵携行。但是由于枪管缩短，三八式马枪的有效射程和射击精度比三八式步枪都有所下降。

明治四十四年（公元1911年），又在三八式马枪的基础上派生了一型带有可折叠的三棱锥形枪刺的6.5毫米马枪，定名为四四式。

1937年，日本在“三八大盖”的基础上又派生出一型狙击步枪，因为当年为日本神武纪元2597年，故称之为九七式狙击步枪。粗看九七式狙击步枪与“三八大盖”几乎没什么区别，只是九七式有瞄准镜座，可以安装瞄准镜，并且在枪的二箍上装有一个钢丝支架，平时向前折叠于枪身之下，使用时向下展开，作为脚架。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三八大盖”在日本军队中，从1905年到1945年整整使用了四十年，生产总量超过了340万支。成为二战中日本陆、海军最主要、最基本的步枪武器，也是当时各国步枪中装备量最大、装备时间最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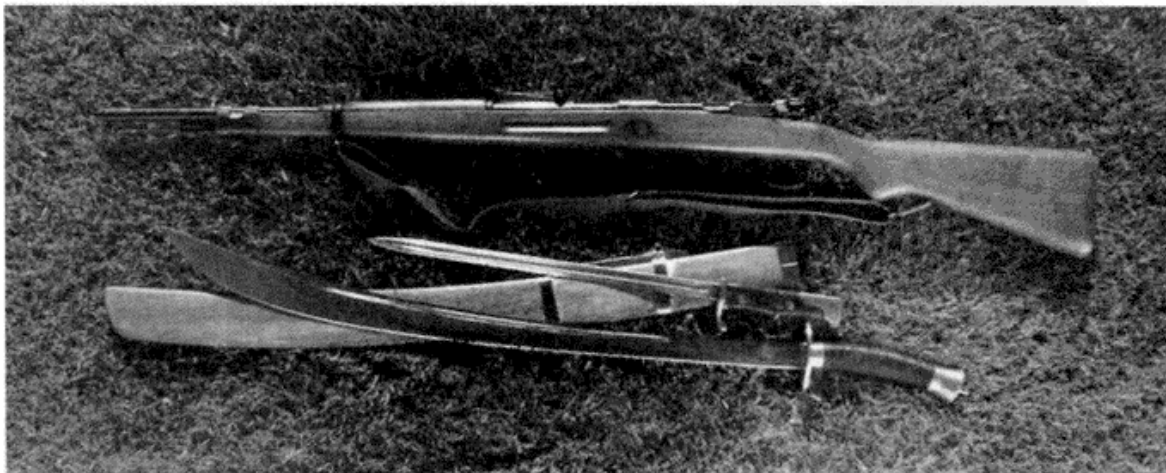
中正式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开始军事整编。193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全国制式武器会议，决定以德国1924年式毛瑟步枪及其所使用的弹药为原型进行仿制，以该型步枪作为中国军队统一的制式步枪——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中国各派系的军队总共装备了日、美、英、法、俄、德等10多个国家30多种步枪。这些步枪的口径有六七种，即使相同口径使用的弹药也有三四种，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军队的步枪共有超过20种弹药在使用，这对于任何一

支军队的后勤系统来说，简直就是噩梦。

193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向德国毛瑟厂订购了一万支1924年式毛瑟步枪来装备税警总团（即后来著名的新编第38师的前身，也是日后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新编第1军的建军主力师），并得到该厂提供的图纸技术资料，由巩县兵工厂负责仿制。可是由于毛瑟厂提供的图纸及检验样板有误，于是兵工署技术司委派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巩县兵工厂厂长毛毅可，向德国有关部门正式商洽购买1924年式步枪及检验样板和图纸。经过这一番周折，1935年7月巩县兵工厂才终于开始试生产。因为1935年是民国二十四年，所以该枪最初定名为“二四式”步枪。实际上最初生产的约2000把步枪，确实都印有二四式的标记。

二四式步枪在筹备、试生产过程中，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高度重视，1933年、1934年蒋介石先后两次到巩



■ 中国的中正式步枪系德国毛瑟步枪的中国版。

附录二：淞沪会战中日两军轻武器简介

县兵工厂视察，并对二四式的仿制提出了改进意见。蒋介石认为德国1924年式毛瑟枪的枪长是根据欧洲人身体设计的，而中国士兵普遍要比欧洲士兵矮一些，因此建议将枪管枪托略微缩短。1924年式毛瑟步枪全长1.25米，枪管长0.738米。中正式与其最主要的差别就是枪管缩短了0.138米，为0.6米。一方面枪长缩短，更符合中国人的身材特点。另一方面，短枪管在制造上也比长枪管更容易，对于兵工工业薄弱的中国来说，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何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步枪的使用范围80%集中在400米距离内，也根本不需要长枪管。所以枪管的这一缩短，确实是明智之举。正是鉴于蒋介石对这款新枪的如此关爱，1935年8月国民政府便将新枪用蒋介石的名字命名为“中正式”。1935年10月，中正式正式开始批量生产。

因为中正式枪身较短，为了与日军枪身较长的三八式步枪在白刃格斗时相抗衡，其刺刀全长达到了575毫米，仅刀身部分就长达428毫米，比1924年式刺刀的全长还要长。不过中正式上刺刀后的全枪总长仍比三八式加装刺刀短。中正式的刺刀为单刃偏锋、直形护手，刀尖形状有两种，一种是对称剑形



■ 中正式步枪枪身短，因此刺刀就特别长，以此来抵消枪身较短的缺陷。

刀尖，一种则是仿照英国M1907步枪刺刀的非对称形刀尖。早期中正式的刺刀刀鞘为薄钢板冲压成型，配有皮制挂件，后期因钢板缺乏，多采用皮制刀鞘。中正式刺刀设有套环，这样与枪管的连接更为牢固。另外，中正式还参照了“三八大盖”的经验，部分中正式的枪托采用二段式，但没有接榫，只是用胶粘住，然后在枪托底板再用螺丝固定。

抗战爆发后，从1937年9月开始，全国的兵工厂内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同时利用这次内迁，对原属于各地军阀的兵工厂进行全面彻底的归并、合组，统一命名，从而成为国家统一计划统一组织统一生产的高度集中。在这次兵工厂内迁并收归国府的过程中，地方军阀都非常配合，表现出了高度的以国家为重的爱国精神。归并合组

后的兵工厂，在兵工署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实施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根据战争的需要，各厂集中全国的专业人才、专业机器进行某一项产品的集中生产。中正式步枪的生产就专由第一厂（原汉阳兵工厂并接收巩县兵工厂）、第二十一厂（原金陵兵工厂）和第四十一厂（原陈济棠粤军第一兵工厂）三家厂承担。

1940年第二十一厂开始转产中正式步枪，同时承担了对中正式步枪的改进研制，主要参考了当时德国装备的Kar98k毛瑟步枪进行了改进——Kar98k就是Kar98 kurz，Kurz是德文“短”的意思——因此新的中正式枪身更短，零件更少，新中正式各方面都比老中正式更为精良。改进式中正式于1943年10月开始批量生产，1944年月产量达7000支。在制造中正式步枪过程中，由于引进成套国外资料及技术，制造工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37年兵工署在整理1924年短式毛瑟枪产品图时，以德国工业标准为参考制定颁发了《中正式步枪应用材料之规格》，并统一规定汉阳式和中正式两种枪的枪件名称、材料名称、化学成分及机械性能要求等。1946年12月兵工署又制定颁发了《中正式步枪检验暂行规格》，详细规定了枪管及部分枪件的互换、高压弹试验、精度试验、刺刀、附件、涂油及包装等项验收内容和方法，以及枪件淬火的硬度等。至此中国步枪制造，开

始有了成套完整的技术资料。1944年后第二十一厂、第四十一厂等生产中正式的工厂，都采用同样的图纸、同样的检测标准，生产完全相同的步枪。因此中正式的生产，在中国兵器工业史上毫不夸张地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而在1944年之前，由于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过于薄弱，国内的制造工艺差，除了第一厂和第二十一厂生产的中正式步枪质量相当不错，甚至可以与德国原厂货相媲美外，其他一些厂家生产的中正式步枪质量就差别很大，有些枪的有效射程甚至只有400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正式的声誉。

从清末到民国，德制毛瑟系列步枪在中国一直享有良好的声誉，仅在抗战前就进口过不少，其中既有德国原产的K98、1924年式，也有比利时FN M1924/1930、捷克VZ24等国外仿制品，这些步枪外观相似，故许多资料中经常将这些枪张冠李戴，连中正式的原型也有几种错误的说法。中正式与K98k、1924年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外观上：K98k的背带环在左侧，中正式在下方；1924年式的头箍下有阅兵钩，早期的中正式也有阅兵钩，后期则将其略去；中正式和1924年式枪托上有方便握持的凹槽，而K98k没有；K98k有准星护罩，中正式则没有，采用刀形片状准星；K98k及后期1924年式的拉机柄均为向下弯折的形状，而中正式的拉机柄为水平伸

附录二：淞沪会战中日两军轻武器简介

出；德国原产毛瑟步枪的枪托上嵌有金属圆孔，供分解枪机和击针用，中正式则将其省略。

中正式的枪机继承了著名的毛瑟式枪机，操作简单、结实耐用。枪机为一个整体，前端有两个闭锁凸笋，右后方也有一个凸笋，当枪机断裂时，可以防止枪机冲出枪体伤人。枪托中部设置横销，将机匣与枪管牢牢固定在枪托中，有利于提高射击精度。保险装置位于枪机后部，扳至90°时，武器即呈保险状态，但此时仍可拉动枪机，称为“活保”；扳至180°时，枪机处于锁定状态，此时枪机不能被拉动，称为“死保”。中正式的装填系统使用毛瑟步枪特有的五发桥夹。装填时，右手将上满弹的桥夹由上方插入弹仓槽中，拇指向下用力便可将枪弹一

次全部压入弹仓，然后将桥夹拔出，桥夹可重复使用。如果没有桥夹，也可以逐发装填枪弹。中正式的弹仓底盖与枪托平齐，不像汉阳造步枪那样突出在外而造成用肩扛枪不便。子弹装入弹仓后枪机停于后方位置。将枪机向前推就可将一发枪弹入膛，再将拉机柄向右水平扳倒，完成闭锁，此时只要扣动扳机，便可发射。将拉机柄向左上方扳动90°并向后方拉动，此时，枪机头部的抽壳钩便会将膛内空弹壳抱住。机匣左侧的抛壳挺撞击弹壳底部左侧，将弹壳向右后上方弹出。然后再将枪机向前推，枪机将下一发枪弹推入弹膛。

毛瑟式枪机的设计几近完美，唯一的缺点就是拉动枪机比较费力，特别在持续射击时，机匣与枪机因受热膨胀而紧贴在一起，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正式历年产量

1937年7—12月：45000支
 1938年：38000支
 1939年：30000支
 1940年：20600支
 1941年：7000支
 1942年：17000支
 1943年：34000支
 1944年：64500支
 1945年1—8月：53000支
 合计：309100支

使枪机更难拉动。同出一门的中正式同样存在这种弊病，实战中一旦碰到这种故障，中国士兵的解决方法往往是直接用脚将拉机柄踹开，由此可见毛瑟式枪机的“皮实”。

中正式的表尺由毛瑟1898年式的弧形表尺改进而来，表尺射程为2000米。表尺板中间开有纵槽，照门缺口不大，为了不影响瞄准视线，表尺板贴近照门处有一半圆形凹槽。表尺底部是用螺钉固定在基座上，如因改用其他弹药而使弹道性能有所改变，可以很容易更换表尺。

中正式采用7.92×57毫米轻尖头弹为制式弹药——特别要注意的是，中正式并不能使用毛瑟步枪的重尖弹，而很多资料却多用重尖弹的数据来进行比较，因此存在不小的误区。轻尖弹弹头质量9.98克，弹头底部呈裙边状，发射后变形紧贴枪管壁，可有效密闭火药燃气。弹头质量较轻，初速较高，加之弹头形状呈流线形，空气阻力小，弹道特性更好，不易受横风影响，从而使得中正式的射程和精度都比较出色。而且可以与中国军队大量使用的捷克ZB26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的弹药通用，极大方便了后勤补给。

中正式结构简单，维修保养都很简便，内部机件、构造均大体相同，包括枪机在内的绝大部分零件只需稍加修锉即可互换，有的甚至可以直接通用。即使部分零件损坏，有经验的老兵也可以自己拆卸修理。由于结构

简单，因此耐用性非常好，不论是高寒的东北，还是炎热的中南，不论是沙尘满天的华北，还是潮湿多雨的华东，中正式都能正常使用。正因为结构简单，所以操作也就相对简单。

八年抗战中，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种制式步枪，中正式总共生产约30万支（至1949年停产时，中正式的总产量约60万支），不仅在中国的兵工生产历史上，而且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都是极其重大的。

三八PK中正

三八式最大的特点是枪身长，枪身长第一瞄准基线长，射程远精度高；第二火药燃烧充分，既经济又降低了枪口焰，提高了夜战和狙击作战的生存能力；第三有利于白刃战，所谓一寸长一寸强，三八式又长又轻（三八式枪身虽长但质量比中正式却还要轻），无疑在白刃战中大占了上风。

三八式另一个特点是命中精度高，为了追求这一目标而过度强调子弹的飞行稳定性，从而产生了三八式最大的诟病——子弹杀伤威力小，尤其是在400米距离之外，往往只是贯穿伤，而且进口和出口基本一样大，加上子弹出色的稳定性，在进入人体后不易翻滚，使杀伤效果大大降低。

三八式后坐力比较小，对新手的训练也

附录二：淞沪会战中日两军轻武器简介

就比较容易。采用的钢质好，经久耐用，如果保管得法，使用寿命可以达到1万发。相比之下，中正式后坐力很强，新兵容易产生惧怕心理。由于当时中国的铬钢、钨钢等制造枪械所必不可少的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加之工业基础薄弱，因此中正式的质量特别在早期参差不齐，其中不少相当粗糙。

因此，综合而言，除了杀伤威力外，三八式在射程、精度、使用寿命等各方面都要胜过中正式一筹，尽管中正式本身也是一款非常优秀的步枪，但比较三八式还是落在下风。

对这两种枪的比较，最有发言权的是使用者，当年中国士兵对中正式的评价要明显低于三八式。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抗美援朝初期，为了便于弹药补给，入朝的志愿军部队以师或团为单位统一步枪的型号，在全军内进行调换。这时所有被要求缴出三八式而换装其他型号步枪的战士都普遍出现了抵触情绪，而奉命上缴其他型号步兵的战士，虽然也有少数不情愿的，但只是个别现象，而与交出三八式那样的普遍不满，有着天壤之别，用枪人的态度，就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问题。

三八式与中正式性能对比

	三八式	中正式
口径:	6.5毫米	7.92毫米
枪全长:	1275毫米	1110毫米
瞄准基线长:	695毫米	503.5毫米
枪全重:	3.9公斤	4公斤
枪管长:	769毫米	600毫米
膛线:	4条右旋	4条右旋
膛线缠距:	200毫米	240毫米
枪口初速:	762米/秒	840米/秒 (轻尖弹)
表尺射程:	2400米	2000米
有效射程:	460米	600米
弹仓容量:	5发	5发
弹药:	6.5×50毫米	7.92×57毫米
刺刀全长:	500毫米	575毫米

轻机枪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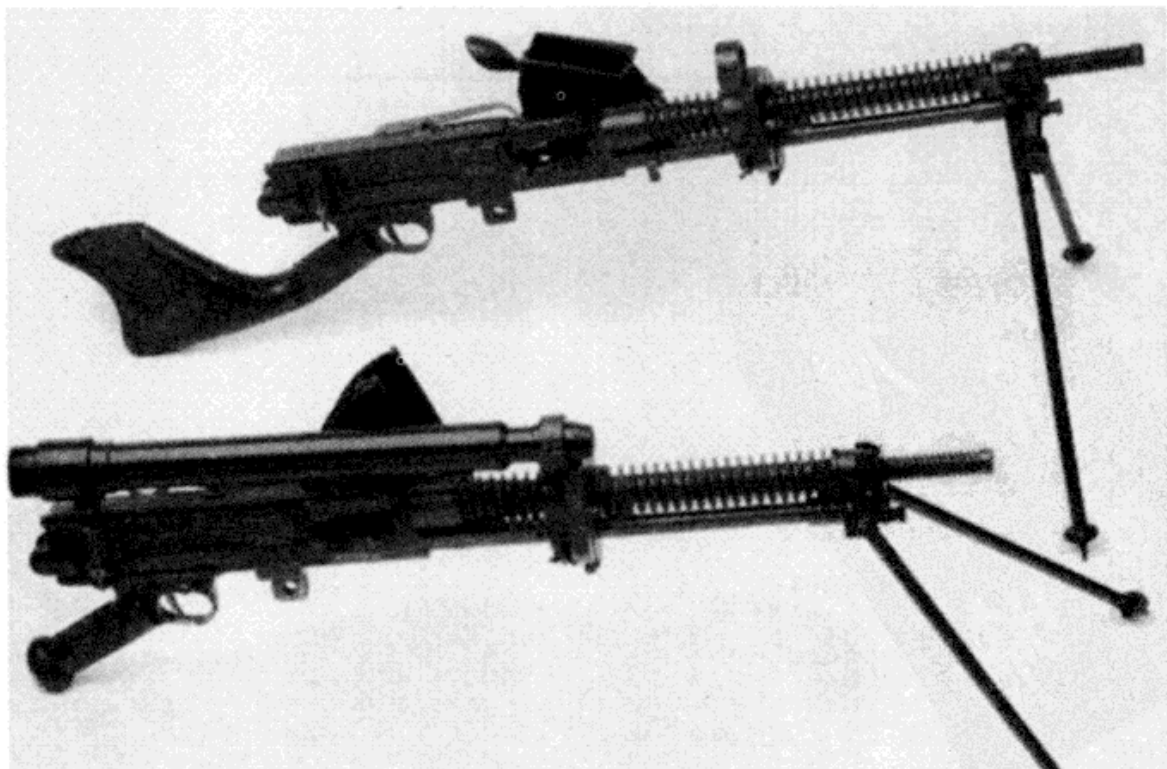
歪把子

日军轻机枪“歪把子”之名，在抗战时期可谓如雷贯耳，某种程度上几乎就是轻机枪的代名词了。“歪把子”的正式名称是南部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南部是指设计师南部麒次郎大尉，因为于1922年研制成功，当年是日本大正十一年，所以叫大正十一式。

设计师南部的设计思路主要沿袭了法国“哈奇开斯”（hotchkiss）1908年式和1909年

式轻机枪，瞄准基线偏于枪面右侧，为了避免使用者在瞄准时过于向右歪脖子，所以将本来就十分细长的枪颈向右弯曲，以使枪托的位置能满足抵肩据枪瞄准的人机工程。这也就是“歪把子”绰号的由来。

“歪把子”最大的特点也是其研制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步枪、机枪弹药的通用性，为了这一点，甚至教条刻板到了连步枪、机枪供弹具都要通用的地步。当然无可否认，这一观念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但在当时的工业技术条件下难度非常之大，真正



■ 日本的“歪把子”轻机枪，正式名称为大正十一式。

附录二：淞沪会战中日两军轻武器简介

实现这一点，一直要到50年代中期的苏式AKM步兵枪族。为了实现与步枪供弹具——五发弹夹的通用，“歪把子”采用了可装入6个弹夹（共30发子弹）、形状酷似“漏斗”的装弹装置。在“漏斗”前面装有一个带弹簧轴的压弹盖板，装弹时先要扳开压弹盖板，再向“漏斗”中放入6个弹夹，然后扳回压弹盖板，这样关闭“漏斗”后既可以确保子弹不致从“漏斗”中掉落出来，又可以使子弹稳固地保持在进弹位置上。如此复杂才刚刚解决了放弹的第一步，下面是向枪内压弹的第二步。在这一步骤上，“歪把子”成功并且创造性地运用了弹链供弹机枪的供弹原理。在枪机框上开了一个斜向导槽，“漏斗”底部的拨弹臂凸块置于斜向导槽之中。当拉动枪机（包括枪机在射击中前后往复运动）时，拨弹臂凸块在枪机框斜向导槽的作用下随之做横向往复运动，拨弹臂上的拨弹齿便将弹夹上的子弹不断地拨压到进弹口部，枪机复进时再推弹上膛击发。由于弹夹受到“漏斗”两侧壁限制不能左右移动，故当拨弹臂向枪内拨弹时，空弹夹就被留在“漏斗”之中，当最上面的弹夹的子弹在自身质量和压弹盖板的压迫下进入进弹位置时，最下面的空弹夹则从“漏斗”下面的开口中漏出。“歪把子”的整个供弹机构，说说就如此复杂，以当时日本的工业技术来进行生产，确实也很不容易，而在使用时自然

也是麻烦多多。

谁都知道，结构越简单可靠性也就越高，反之结构越复杂，自然可靠性也就越糟。“歪把子”过于复杂的供弹方式，同时也埋下了高故障率的隐忧。“歪把子”对使用环境十分敏感，在东北地区严寒的条件下可靠性很差，于是出现了把油壶装在装弹机旁边随时为机件和枪弹涂油的解决办法，这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枪械中是非常罕见的。而在东南亚地区高温潮湿的条件下，可靠性就更差了，连挂油壶也无济于事了。事实上“歪把子”只有在不冷不热、不干不湿的环境下，并且要在精心保养以及战斗烈度柔和的理想条件下，故障率才会相对低一些。而在实战中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其次这种供弹方式，也使“歪把子”的人机工程极为恶劣。由于装弹装置偏于枪身轴线左侧配置，导致全枪质心偏左，连续射击时射手始终要向右正枪，不然射点会越来越偏左。同时瞄准具也必须右置，一般枪械的瞄准具通常配置在枪身轴线的正中间或者在枪身轴线的左侧，这样才比较适合人的头、颈、眼和脸颊的人体工程。瞄准具偏右配置，人的头颈就要歪过去斜着眼睛才能瞄准，为了改变这个别扭的瞄准，不得不将枪颈向右——“歪把子”之名由此而来。扛枪时“漏斗”压迫右肩枪面向右翻转，必须向左偏着。如果扛在左肩，那么“漏斗”又会顶住左脸，



■ 射击中的“歪把子”轻机枪。

而且枪身不能完全搭在肩上根本无法扛住。

“歪把子”没有提把，无法提枪行进，所以只能扛枪或端枪姿势，时间一长，臂、肩、颈、腰的疲劳可想而知。“歪把子”的前、后背带环都设在枪的右边，而且在背枪或挎枪时还得把“漏斗”翻向上或倒向下十分别扭。端枪射击时副射手会被射手左侧遮挡，补充装弹困难，要是端着枪打完子弹后就必须把枪放下来才能再装填。“歪把子”的“鱼尾”形枪托与整枪造型倒也协调，不过在抵肩射击时，托底板的突出部正好抵在射手的右锁骨上，极不舒服。“歪把子”枪管上的散热片外径过粗，又没有提把或前护手之类的部件，枪管打热后手就没有地方可以抓握，所以“歪把子”只好在枪管散热片上包了一个防烫灼帆布套作为权宜之计。由于

“漏斗”的位置已经确定，两脚架只能靠前配置才能避免与“漏斗”干涉，这就导致两脚架过长，火线过高（机枪的火线高度是指机枪脚架架于地面时枪管轴线垂直于地面的距离，通常机枪的火线高度不超过300毫米，而且还要尽可能降低。但“歪把子”的火线高度达到400毫米），火线一高，对于发扬火力是极其不利的，仰射还勉强可以，平射特别是俯射时射手就必须要把上半身探出老高才能构成瞄准线，这就使射手难以隐蔽，伤亡概率自然居高不下。此外两脚架脚头用驻栓连接在脚头环上，既没有收折定位，又没有支撑定位。操枪过程中两脚架会随着惯性乱晃；架枪时常常会因没有定位而一只脚歪斜，出现架不住枪砸倒在地情况，射击时经常出现前倾后拖，再加上会可能歪仰，那

附录二：淞沪会战中日两军轻武器简介

么很可能造成自伤。因此完全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歪把子”的人机工程——可恨。

由于采用五发弹夹，所以每打完五发后，自然会有个停顿，由此“歪把子”在连续射击时有着非常独特的“断续”节奏。而“漏斗”只能装6个弹夹，打完之后必须再经过复杂的再装弹，这一点在实战中可是大忌——中国军队对付“歪把子”最有效的战术就是等一“漏斗”的30发子弹打完立即进行压制或反击。

“歪把子”采用导气式自动方式，闭锁机构为楔闩横动闭锁，楔闩位于枪机后部，由枪机框上的开闭锁斜面带动楔闩作上下起落运动。枪管上有螺纹状散热片，使用与三八式步枪相同的6.5毫米步枪弹以及标准五发弹夹。射程较远，精度较高，但与三八式步枪一样杀伤威力不大。采用独特的弹斗供弹原理，开放的“漏斗”状供弹弹斗可以容纳6个水平放置的五发弹夹，弹斗位于枪身左侧，弹斗上方的盖子向下施加压力使最底层弹夹进入输弹位置，弹斗底部的推弹装置将弹夹中的枪弹推向给弹口推弹入膛，依次反复。弹壳需要润滑才可以靠枪机后坐提供的动能退壳。机枪上配有油壶，子弹需要经过油刷给弹壳涂润滑油否则容易出现退壳不畅。理论上只要不断向

弹斗中装填弹夹即可持续射击，但是由于弹药装填过程繁琐，实际射速根本达不到理论射速。另外在实战中存在枪管过热（不能换枪管）、结构复杂故障率高等问题。

“歪把子”设计核心是通用步枪弹夹供弹，为此牺牲了其他一切要求，甚至牺牲了战斗使用和战场生存的最根本要求。用“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来形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因此“歪把子”可以说是一挺极具特色的机枪，但绝不是一挺性能出色的机枪。

捷克式

捷克式顾名思义肯定是捷克生产的，1920年捷克布拉格军械厂（Parga Zbrojovka-Prague Armory）的枪械设计师哈力克（Vaclav



■ “歪把子”的装弹方法。

Holek)设计出了一款全新的轻机枪——布拉格I式(Praga I),不过捷克国防部对这款枪机枪并不重视,不料在测试中,布拉格I式的性能与当时先进的勃朗宁(Browning)、麦迪生(Madsen)和维克斯(Vickers)等机枪不相上下,甚至有些性能还更胜一筹。于是捷克国防部要求布拉格军械厂在布拉格I式的基础上研制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正式型号。

1923年,捷克国防部公开招标自动步枪或轻机枪,在这次竞标中由布拉格I式改进而成的布拉格II式测试成绩非常优秀,综合性性能仅次于麦迪生轻机枪名列第二。此后哈力克继续改进设计,最终研制出了布拉格I-23型轻机枪,其性能极为优秀,射击精确度和持续射击性能尤其突出,加上又是捷克本国设计,很快便被捷克国防部选中,成为捷克军队的制式武器。但此时布拉格军械厂因经营不善已濒临破产,虽然获得了国防部的订单,却无力进行生产,因此只能于1925年11月与勃诺国营兵工厂签署生产合约,授权勃诺国营兵工厂生产并销售这款轻机枪。1926

年4月通过捷克国防部验收,开始批量生产,并且定名为国营勃诺兵工厂26型,简称为ZB-26型。ZB-26除装备捷克军队外还大量出口,至1939年捷克被纳粹德国占领,总共有约12万挺ZB-26出口到中国、伊朗、伊拉克、埃及、智利、瑞典、土耳其等十多个国家。

1934年中国政府开始着手制式化装备的统一,将捷克轻机枪确定为制式机枪,派人赴捷克洽谈引进事宜。此时ZB系列枪机枪已发展出了多个型号,如ZB-27、ZB-30、ZB-33等,其性能都要比ZB-26更为先进。但捷克只同意出售一套ZB-26的校枪用模板,连图纸都不卖。最后中国只能订购了5000挺ZB-26,利用派人在勃诺兵工厂监督生产的机会偷偷记下了图纸,回国后再结合早先得到的校枪用模板,推算绘制出了生产图纸。而卖给中国的5000挺ZB-26还都不全是新货,因为当时捷克兵工厂已经开始生产更为先进的其他型号,已经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来满足中国订购的老旧的ZB-26,于是捷克就将其军队淘汰下来的ZB-26翻修之后混在新货中卖给中国——从这个曲折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当时就连小小的捷克都没把中国放在眼里!

早在1927年大浩造船所就已经仿制成功捷克ZB-26轻机枪。30



■ 性能优异的捷克ZB-26轻机枪。

附录二：淞沪会战中两军轻武器简介

年代后，西北铸造厂、广东兵工厂、巩县兵工厂、浙江铁工厂，先后都曾仿制过捷克式轻机枪。在重庆的第二十一兵工厂1942年后更是达到标准化生产。云南昆阳的第五十一兵工厂是专门制造轻机枪的专业兵工厂，从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共制造捷克式轻机枪14920挺。但该厂的产量虽大，却因原材料质量低下，工人经验不足，所生产出的机枪品质最差，甚至常有不能连续射击的严重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生产过捷克式轻机枪的兵工厂、修械所，大大小小至少有30家。能够进行简单维修的兵工厂修械所更是十倍于此，甚至连在敌后的八路军游击队，也曾有以简单机器和手工维修制造捷克式的记录。中国自1927年开始仿制和进口捷克式轻机枪以来，到抗战爆发时已有十年之久，积累了大量制造修理的经验和相关人才。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又对捷克式进行了简化，以减少原材料的消耗缩短制造工时，同时还改进了捷克式的一些缺陷，甚至还曾出现侧面供弹的捷克式。整个八年抗战中，中国各兵工厂总共生产了约3.5万挺捷克式。

1944年后，加拿大根据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了约40000挺捷克式改进型——也就是被称为布伦II式（BREN Mark II）的轻机枪。同时还提供了20000根枪管和169000个弹匣。

此外，根据捷克勃诺兵工厂的统计，从

1927年至1939年，先后一共出售给中国ZB-26轻机枪高达30249挺！

由上述资料估算，在抗战期间，至少有10万挺各式捷克式轻机枪在中国军队服役，构成了中国军队班排火力的绝对支柱。

尽管这么庞大的数量中绝大多数都是ZB系列中最为老旧的ZB-26，但即使是ZB-26，其性能也是相当不错的。

ZB-26具有结构简单，坚固耐用，动作可靠，维护使用方便，精确度高，威力大等特点。工作原理采用活塞长行程导气式，枪机偏转式闭锁，即靠枪机尾端上抬卡入机匣顶部的闭锁卡槽实现闭锁。枪管外部加工有圆环形的散热槽，膛口装置上四周钻有小孔，无气体调节器，故不能进行火药气体能量调节。枪托后部有托肩板和托底套，内有缓冲簧以减少后坐力，两脚架可根据要求伸缩。采用20发弹匣供弹，弹匣安装于枪身上方，因此导致瞄准具不得不向左偏移，成为该枪的一大瑕疵。瞄准具由普通准星和缺口照门组成的机械瞄准具。由于弹匣在枪身上方，因此瞄准具向左偏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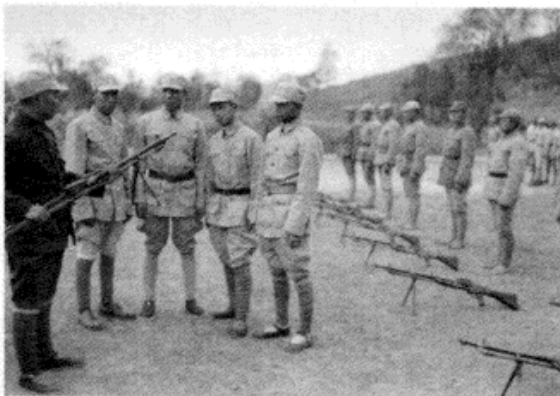
捷克式精度极高，根据当时的抗战老兵回忆，捷克式在900米射程内，基本上可以说是瞄哪儿打哪儿。持续射击性也非常出色，即使连续射击一两小时也很少出现卡壳——不过国产捷克式因为原料质量低下，加工工艺粗糙，问题就相对比较较多。由于采用气冷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式，所以通常在连续射击200发后就要更换枪管。捷克式更换枪管极为简单，只要将枪管上的固定环向上旋转，脱离闭锁的凹槽，便可向前卸下。接着将新的枪管插入闭锁的凹槽，向下旋转枪管上的固定环就可安装完毕，在熟练的机枪手手里，这个过程10秒不到就可完成。捷克式使用与中正式步枪通用的7.92毫米子弹，威力很大，加上机枪又多是连射，一般如果被捷克式打中二三发，那基本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捷克式的使用也非常简单，即使没有受过任何机枪射击训练的士兵，也只需要几小时的培训就能正常操作了。实战中，如果捷克式的机枪手中弹牺牲，通常随便一个老兵就能接过机枪继续射击。

几近完美的捷克式要说缺点的话，就只有20发弹夹的装弹量过小了。20发弹夹对于



■ 捷克式机枪是中国军队的骨干火力。

机枪来说显然过小，换句话说，就算是二三发的短点射，七八次之后就会打光了弹夹里的子弹，必然造成火力的中断。当然，在当时各国主力轻机枪的装弹量也不大，20发弹夹也算是主流，还是可以接受的缺陷。针对这一缺陷，通常会以两三挺机枪相互协同，相互掩护更换弹夹。而一些有经验的射手则会在还有三四发子弹时，就更换弹夹，让对手无法估计更换弹夹的时间。

中国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捷克式历年产量

1937-1938年：2000挺
 1939年：892挺
 1940年：1324挺
 1941年：2440挺
 1942年：6000挺
 1943年：9391挺
 1944年：10900挺
 1945年1-8月：6000挺
 合计：38947挺

歪把子PK捷克式

其实，这场PK根本不需要进行，因为这两者差距实在太大了。无论是口径、威力、精确度、持续射击时间，还是射程、可靠性，捷克式都占尽了上风，更重要的是人机工程，“歪把子”简直可以说是恶劣到极点。因此在实战中，几乎装备了捷克式机枪的中国部队，都对缴获的“歪把子”不屑一顾。而日军很多部队都会使用缴获的捷克式，从这一点上来说，两种机枪的对比结果就不必再多言了。

防守作战时，只要被捷克式瞄上，在精

准的两三发点射下，单兵军事素质再好的士兵都几乎难以躲过，因此才会有了“老兵怕机枪”的说法。而在进攻时，轻便的捷克式可以紧随步兵前进，射手甚至可以平端着机枪一边冲锋一边射击，可以提供不间断的火力掩护。尤其是日军大量装备步兵炮和掷弹筒等轻型随伴火器，中国军队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因为比较笨重，难以迅速机动，一旦开火就会很快被日军锁定进而精确摧毁。而可以随时转移阵地的捷克式自然就成为中国军队最可倚重的自动火器了，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来说，捷克式无疑就是近乎于完美的利器了！

歪把子与捷克式性能对比

	歪把子	捷克式 (ZB-26)
口径:	6.5毫米	7.92毫米
枪全长:	1105毫米	1165毫米
瞄准基线长:	470毫米	568毫米
枪全重:	10.25公斤	9.6公斤
枪管长:	485毫米	672毫米
膛线:	4条右旋	4条右旋
枪口初速:	778米/秒	830米/秒
表尺射程:	1600米	1500米
有效射程:	600米	900米
射速:	500发/分	550发/分
供弹方式:	30发“漏斗”式弹斗	20发弹夹
弹药:	6.5×50毫米	7.92×57毫米
自动方式:	导气式	导气式
枪管冷却方式:	气冷	气冷

重机枪篇

九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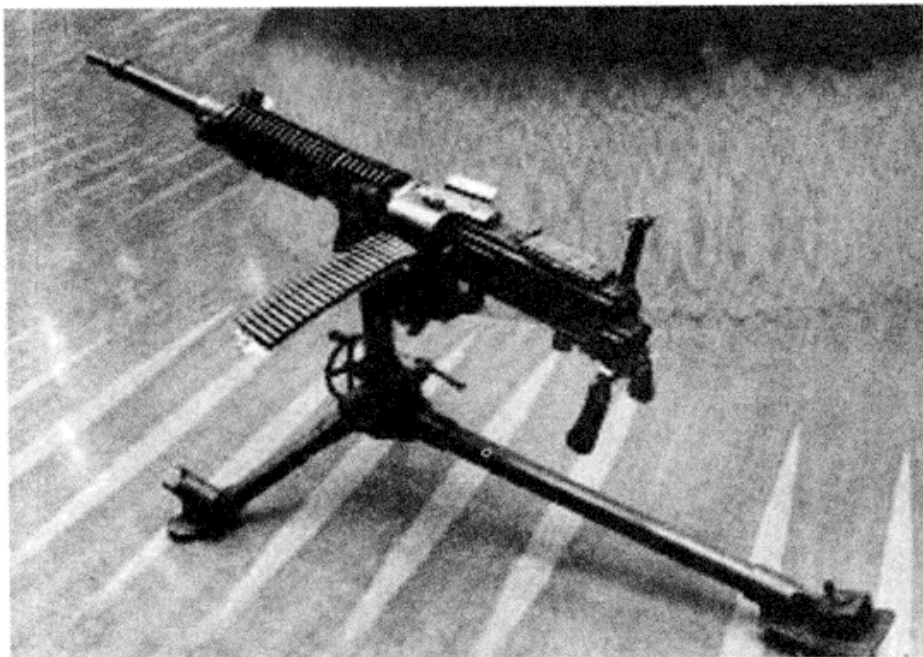
日军九二式重机枪是在三年式重机枪的基础上，经过改进而成的制式重机枪。因为是在1932年改进研制而成，这一年是日本神武纪年2592年，所以列装编号为九二式。九二式的改进主要是将口径6.5毫米改为7.7毫米，将框式把手改为呈“八”字布局的拐式把手，瞄准具改进以及在枪口加了可以取下的防火帽等。这些改动都比较细小，一般人若不是特别注意分辨，是很难区分的。不过在这两型重机枪的机匣上方，分别刻有“九二式”和“三年式”，一眼就能分辨。

九二式重机枪采用导气式自动方式，枪机起落式闭锁机构，利用空气冷却枪管；采用刚性金属弹板供弹；光学瞄具瞄准射击；枪架兼有平射和高射两种方式。为了利用空气来冷却枪管，所以枪身上的螺旋状散热片几乎占了全枪的60%，成为其外观上的最显著特点。这一点与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重机枪所使用的水冷式截然不同。从外观造型和内部结构特点来看，九二式仍然继承了日军“歪把子”机枪的血统，只不过是口径变大体形放大了而已。其前身三年式重机枪，由于使用6.5毫米子弹，因此连防火帽都不

要。九二式改用7.7毫米子弹，包括枪口动能和枪口焰在内的各方面能量都相应增大，才设计并安装了一个防火帽，要是卸下防火帽，其枪口就与三年式并无两样。由于九二式装上防火帽以后，与枪身上的散热片以及全枪整体外观酷似一只“斗鸡”，加上其射击时的频率不高，枪声听起来又类似“咯、咯、咯”的鸡叫声，所以在中国被戏称为“鸡脖子”。而盟国士兵则根据其独特的枪声，将其称为“啄木鸟”。

从九二式的外观和整体造型布局可以看出，其总体上仍然继承了“歪把子”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例如，枪口部分螺旋状的散热片；枪管的后半部分加工出光滑表面，但是这一段表面光滑的枪管又套装进了带有更大螺旋状散热片的枪管套之中，从外观上看，这两部分螺旋状散热片浑然连成一体。日军对机枪的散热片极其感兴趣，但对防火帽却毫无兴致。“歪把子”和三年式重机枪，都没有防火帽，九二式最初设计时也没有防火帽，只是为了抑制硕大的枪口焰，才被迫无奈地加装了。九二式的外观比较独特，“独树一帜”的真正原因并不仅仅是追求技术上的“标新立异”，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其实九二式的内部结构基本参考了法国的“哈

奇开斯”重机枪，毫无创新之处，但外观却与“哈奇开斯”大相径庭。这种内部结构基本一样而外部造型迥然不同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化观念在作祟，力图通过外形上的不一样，来使人们认为其内部结



■ 日本九二式重机枪。

构也与“哈奇开斯”不一样，从而形成一种胜过“哈奇开斯”的心理暗示。

九二式的供弹方式比较独特，采用的是30发金属弹板供弹。供弹装置在机匣的前部，由进弹口、弹板制退齿、输弹板以及拨弹板等主要部件组成。九二式的弹板用黄铜薄板冲压制成，子弹以单排排列卡装在弹板上。进弹口在供弹机构的左侧，上面装有可以兼作进弹口防尘盖用的进弹导轮。装弹时，射手右手拉动拉机板向后到定位，使机枪处于待击状态，随即向前送回拉机板；副射手在射手左侧，以右手四指在上，拇指在下抓握弹板中部——子弹必须在弹板上，弹头朝前，左手握住弹板尾部，将弹板头部放在进弹口进弹导轮上，并使弹头对准受弹机定位，然后左手在稍稍托起弹板尾部的同

时，将弹板向右插入进弹口直到听到“咔”的一声。输弹板底面的菱形凸笋配合在枪机框上面的斜向导槽之中，枪机框每纵向复进一次，即带动输弹板左右滑动一次，使拨弹板将弹板向右移动一发子弹的位置，这样就把子弹一发一发送进进弹口，并一发一发打出去。弹板制退齿的作用，是制止弹板在射击振动等情况下向回移动，以确保供弹的可靠性。在弹板制退齿的中部下方，有一个凸齿，其作用是当枪上未装有弹板时，阻止自动机复进，有点类似“空仓挂机”的意思，如果一个弹板打完，又没有挂上下一个弹板时，自动机即被阻止在后方，此时即使按动扳机也无济于事。当再次插入弹板时，弹板制退齿下方的挂机凸齿即解脱自动机，自动机在复进簧张力作用下，向前移动约8毫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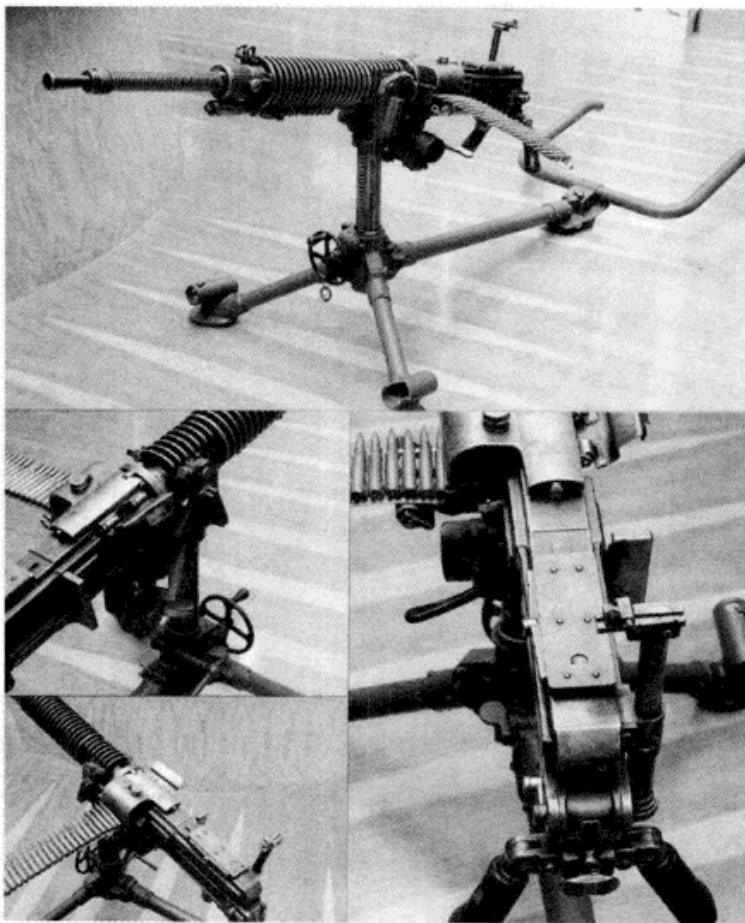
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

后，被击发阻铁扣住，射手按压扳机，又可以继续射击。

30发弹板供弹，射速相对较低，连续射击能力远不如用弹链供弹，而且必须要副射手将弹板送进进弹口，这种供弹方式也正是九二式最大的缺陷。

九二式配有光学瞄准镜，准星上还配有夜光管，以方便夜间射击。这些措施使九二式的射击精度比较高，但对于重机枪来说，最重要的是火力的连续性，而不是准确性，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九二式实在是大大失算了。



■ 日本九二式重机枪细节特写。

二四式

美国工程师海勒姆·斯蒂文斯·马克沁 (Hiram Stevens Maxim) 1882年从步枪射击的后坐力中受到启发，利用射击时子弹喷发的火药气体使枪完成开锁、退壳、送弹、重新闭锁等一系列动作，从而实现了自动射击。1883年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自动步枪，随后利用研制自动步枪所积累的经验，于1884年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支能够自动连续射击的机枪，从此马克沁几乎就成了机枪的代名词。

马克沁机枪在中国的历史相当长，早在1888年就引进了马克沁机枪并由金陵制造局进行仿制，当时被叫作“赛电枪”。1934年，金陵兵工厂根据德国兵工署免费提供的7.92毫米MG08/15马克沁重机枪的图纸——闭锁机与1908式略有不同，更接近于1909式外销型号——开始仿制。仿制时还进行了多项改进，如增加高射装置、横扫射装置、练习弹枪口罩等部件，并改良了击发、保险装置和三脚架等。1935年仿制成功，因为当年是民国二十四年，所以被称为二四式重机枪。金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二四式历年产量

1937年：	626挺
1938年：	1060挺
1939年：	1971挺
1940年：	2468挺
1941年：	1860挺
1942年：	1980挺
1943年：	2680挺
1944年：	2986挺
1945年：	3063挺
合计：	18694挺

陵兵工厂二四式重机枪的生产能力1929年时为月产20挺。1936年，金陵兵工厂对二四式的护手部改装单手击发机、添设保险，机枪盖板前端增加顶盖板簧，改用尖弹表尺，使重机枪的性能进一步有所提高，初速由原来的630米/秒（圆弹）提高到870米/秒（尖弹），表尺射程由2000米提高到2500米（尖弹）及3500米（重尖弹）。抗战爆发后金陵兵工厂迁往大后方，复工后的1938年达到了年产1060挺，而最高年产量为3600挺，整个抗战八年中总共生产二四式约2万挺。

二四式由枪身（包括身管与枪机）和三角枪架两部分组成，从外观上看，粗大的黄铜注水散热管，格外显眼，因此在军中有着“老黄牛”之称。

30年代，马克沁机枪的相关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性能稳定、威力强大，已为世界所

公认。与马克沁一脉相承的二四式自然也具有这些优势。但是由于当时兵工生产工艺和原料的限制，二四式在中国军队中装备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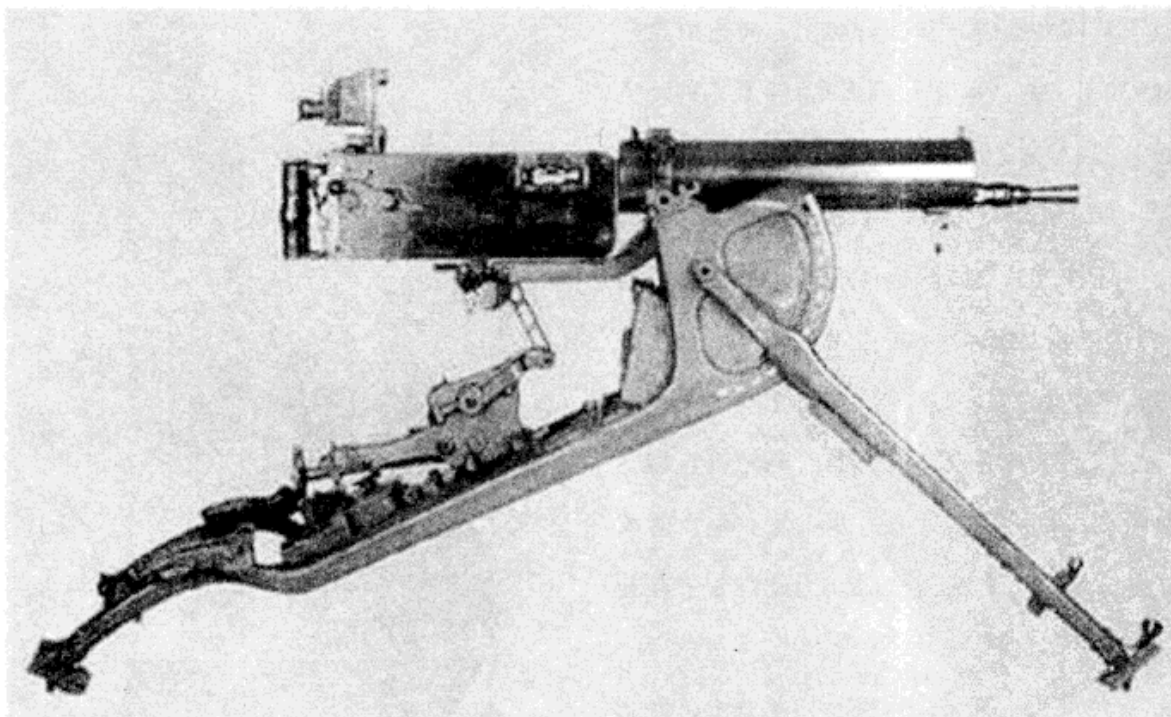
■ 中国军队使用二四式重机枪防空。

却非常有限，即使是在最精锐的嫡系头等主力部队中，二四式的装备数量也不过每个步兵营配备一个重机枪连，总共装备区区6挺，作为对比，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每个标准步兵营就装备12挺！少了整整一半。而在一些杂牌部队中，二四式的装备数量就更少了。

九二式PK二四式

九二式除了精准度方面胜过二四式之外，其他各方面都要比二四式逊色。尤其是在重机枪最重要的火力持续性方面，九二式在战斗中更换枪管比较困难，又是使用30发弹板供弹，实际射速仅仅达到200发/分钟。

二四式采用水冷式，只要有水，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连续射击。又是250发弹带供弹，火力持续性是明显胜过九二式。说到冷却水的问题，二四式的冷却套筒里可以装大约4公升水，另外一般配有两个约8公升容量的备用水箱。连续发射约600发子弹，枪管套筒中的水就会开始沸腾，蒸汽经由一个水管连到备用水箱的水中，一方面避免蒸汽伤人，另一方面也减少水分消耗。之后冷却水的消耗率大约是每发射500发会消耗1公升。套筒加上备用水箱里的水在持续射击的情况下最多只能撑20分钟。所以对于重机枪射手来说，一般都要求尽可能采取点射，以免长时间连续射击而使枪管温度过热。而在30年代，由于原料和工业等方面的因素，水冷式是绝对的



■ 二四式重机枪仿造的是著名的德国马克沁重机枪。

附录二：淞沪会战中日两军轻武器简介

主流。

弹板供弹与弹带供弹应该说是各有千秋，从连续射击100发时间来看，肯定是弹带供弹要快。但弹板是金属质地的，固定效果好不易卡壳，而且可以反复使用。二四式弹带是帆布的，子弹容易移位而导致卡壳，另外也容易损坏。

二四式比九二式更轻，射速更快，子弹口径大因此威力更大，而且二四式的子弹可以与捷克式轻机枪、中正式步枪通用，在后勤供应上也比九二式更为轻松简单。

二四式另外一个缺陷就是因为采用水冷式，所以在射击时会产生水蒸气而容易暴露目标，而一旦暴露目标，由于重机枪比较重，难以迅速机动，日军大量装备的掷弹筒、步兵炮能迅速对二四式重机枪进行精确打击，因此在抗战战场的特定环境下战场生存力较低。

特别要说明一点，中国军队装备的重机枪数量相当有限，难以与日军的重机枪数量相比，尽管在性能上明显占据上风，但数量有限，自然作用也就大受影响。

九二式与二四式性能对比

	九二式	二四式
口径:	7.7毫米	7.92毫米
枪全长:	1156毫米	895毫米
枪全重:	54.4公斤	49公斤
枪管长:	721毫米	672毫米
膛线:	4条右旋	4条右旋
枪口初速:	732米/秒	(重尖弹) 770米/秒, (尖弹) 870米/秒
表尺射程:	2700米	3500米 (重尖弹)
有效射程:	450米	900米
射速:	500发/分 (实际200发/分)	600发/分
供弹方式:	30发弹板	250发弹带
弹药:	7.7×50毫米	7.92×57毫米
自动方式:	导气式	枪管短后坐
枪管冷却方式:	气冷	水冷